



喜马拉雅学术文库

阅读中国系列

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

Stat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 1853~1937

腹地的构建：

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

〔美〕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
马俊亚

译 著

喜马拉雅学术文库

这部对中国现代史上某些重大问题进行全新评价的著作，探索了清末民初华北内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变迁。彭慕兰采用了大量的新资料，认为一些地区的发展造成了其他地区系统的不发展。他阐述了当地的金融、农作、交通、税收情况和农民的反抗斗争，并分析了不同阶级、地区和性别的因果关系。

彭慕兰认为，腹地是被创造的，而不是被发现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地群体与外部力量的方略所造成的。

ISBN 7-80190-686-1



9 787801 906861 >

<http://www.ssap.com.cn>

ISBN 7-80190-686-1/K · 193

定价：28.00元

喜马拉雅学术文库·阅读中国系列

腹地的构建：

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

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

Stat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 1853~1937

[美]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 著

马俊亚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喜马拉雅学术文库·阅读中国系列

腹地的构建:

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 (1853~1937)

著者 / [美] 彭慕兰 (Kenneth Pomeranz)
译者 / 马俊亚

出版人 / 谢寿光
出版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址 / <http://www.ssap.com.cn>
责任部门 / 编辑中心
(010) 65232637
责任编辑 / 柯舟
责任校对 / 边申
责任印制 / 同非

总经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 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刷 / 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 889×1194 毫米 1/32 开
印张 / 13.25
字数 / 309 千字
版次 /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7-80190-686-1/K·193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2004-2554 号
登记号
定价 / 2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献给我的双亲，他们甚少告诉我该做些什么，但却寓教于行；并献给本杰明，我从他那里获得的助益远过于他所知道的那些。



阅读中国序

刘 东

已经是第二次在为这类译丛撰写总序了，这件事本身就使我忧心忡忡——我们如此大规模地引进当代汉学，究竟最终对中国文化是福是祸？

如果在上次作序的时候，我们对于西方同行的工作还只知一鳞半爪，那么今番再来作序，简直就像在介绍老朋友的一些新作了。换句话说，其实再没有什么时候，我们曾对汉学有过现在这样系统的、与时俱进的知识，不仅可以密切关注其学术发展的动向，就连译介工作都与其展开过程日渐同步。这当然可以算作一种成绩，不过这小小的成绩却不仅没有使我沾沾自喜，反倒带来了进一步的精神煎熬。作为长期以来此类工作的主要主持者，我完全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越是系统地引进某种活生生的外来学术话语，就越要给原有的文明基础带来深重的冲击和致命的紊乱，古代的佛学是这样，近代的西学是这样，当代的汉学也肯定会是这样。

的确不错，如果借用康德的一个说法，我们可以尖锐地

揭露和批判说，人们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文明环境本身，往往会产生某种“先验幻象”，以致对那些先入为主的价值或事实判定，会像对于“太阳从东方升起”之类的感觉一样执信。也正因为这样，那些学术研究家的文化使命，才恰在于检讨现有的知识缺陷，适时地进行修补、突破和重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挑明：任何人都不会仅仅因为生而为“中国人”，就足以确保获得对于“中国”的足够了解；恰恰相反，为了防范心智的僵化和老化，他必须让胸怀向有关中国的所有学术研究（包括汉学）尽量洞开，拥抱那个具有生命活力的变动不居的“中国”。

然而，僵化的另一面却又是泡沫化。汉学毕竟既是中学的一支，更是西学的一支，那中间潜伏着许多未曾言明的外在预设，本质上跟本土的国学判然分属于两大话语系统。正因为这样，尽管中国传统早在西风中受到过剧烈震撼，可一旦大规模地引进作为完整系统的汉学，它仍然要面对着新一轮的严峻挑战；我们甚至可以说，此间的挑战竟还大过对于主流西学的引进，因为它有可能直接触及和瓦解原有文明共同体的自我理解，使国人在一系列悖反的镜像中丧失自我认同的最后基础。当今中国知识界可怕的分化与毒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汉学和汉学家的影响。这种要命的相对化刺痛着我们：一旦丧失阅读和思考的主动性，陷入别人的话语场中而无力自拔，就有可能被别人特有的问题意识所覆盖，乃至从此难以名状自己的切身体验，暴露出文化分析的失语和学术洞察的失明。

幸而，我们还没有泯灭进行文明对话的渴望，还把这种

对话看成惟一现实的救度之路。在这种深深的渴望之中，国学与汉学这两种自成系统的学术话语，在彼此解构与相互竞争的同时，就仍有可能彼此解毒和相互补充，从而在文明之间激发出辩证发展的“中国性”来。换句话说，对抗着堕入绝对主义或相对主义的双重危险，那个构成了两大学术群体之对话基础的“中国性”，作为双方共同意识的主动构成物，仍有可能在学术的文化间性中不断漂移，在互动的知识增长中不断漂移，在超越的文明对话中不断漂移，从而使我们既不丧失自我认同的坚实前提，又能跟现实世界构成良性的互馈。

由此一来，“中国”一词所包藏的无尽学术潜力，中国研究领域所蕴涵的无穷思想魅力，也就太值得发挥主动精神去阅读去领略了！这个肯定要伴随我们生命始终的学习过程，也同样需要既不封闭又不盲从的阅读心态，以便同时对抗固陋的本质主义和油滑的虚无主义。我们必须认识到，正像当年的佛学曾经挑战出了宋学高峰一样，我们现在大规模引进的汉学成果，也有可能表现为空前文化创造力的机遇和前奏；而中国事实也终究有可能不再只被遵循外来语法去解释，相反倒有可能在理论创新上对世界表现出顺差。——大家赶紧打开这些书本吧，因为所有这一切，其实全都在我们的一念之中！

刘 东

2001年12月18日于北大草庐

中文版序言

本书原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这项研究始于 1985 年，论文完成于 1988 年。那时中国史研究中存在着一些基本的变化，尽管其意义还不甚明了。

从长远角度而言，最值得一提的是具有中国背景和外国背景的中国史研究者们在大约 30 年的几乎完全隔绝后，重新进行了交流。尽管所有相关之人显然均受其益，但开始阶段总是别别扭扭，因为太平洋两岸的学者们要竭尽全力来弄懂对方通常所提出的问题类型。当我 1985 年抵达山东并说明我的研究范围是 20 世纪该省西部的一个特定地区时，大多数人认为我不是对义和团起义、就是对抗日战争发生了兴趣。当我说明我主要对这两次事件之间所发生的事感兴趣时，这总是意味着无所足道。而从 20 世纪中国正统的历史叙述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看法不无道理：对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或这个时期其他一些重大事件来说，这并非关键之所在。但从我受其训练的那种社会史的角度来看，这恰好是这个地区突发重大事件的相对次要的影响，在这个阶段，使考察更缓慢出现的模式或观察我最感兴趣的事——因为曾被视为举足轻重的“京师咽喉”的大运河，在沿海轮船和南北铁路的网络中地位一落千丈，人们对他们生于斯的地区的边缘化是如何做出反应的——成为可能。我

的一个相关的兴趣——试图解释施坚雅所用的中国史的地理依据的分析方法，有可能被较注重人类对地貌（如运河和铁路）的改变所修正，它在中国根本就行不通：当施坚雅的著作在美国背景的中国学领域风行一时之时，它在中国却并没有引发人们太大的兴趣。

其时，在西方学者中间，出现了两种明显的趋向。一是从社会史、经济史和政治史转向了文化史和心智史。这一方面受到了来自文学和人类学中被称为“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尽管这两者并非一回事）的新方法的推动。那些希望从社会科学中借来的方法能提供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释历史中的因果关系的模型的史学家们，经常发现比其预想的要更复杂，而与其定义相比，总有太多的例外：这种情形特别适用于非西方世界的史学家们，那里的类型是源于马克思、韦伯所描述的欧洲经验，其追随者们似乎很少能满意地加以应用。新文化—心智史反对重视对模型的研究，尤其反对重视对事件之间因果联系的研究。相反，它主张考察单独的事件或文献，来理解它们对那些与其相关的事物的可能的意义。这牵涉再造那些人们曾用来解释其世界的类型，而不是引进我们的类型，即便那些类型中的某些类型（如阶级）对我们如何分析这个世界极为关键。同时，新史学强调我们不可能经常发现一个为所有那些与之相关的事件所共有的事件的单独意义：当我们可能揭示某些已成共识的假设时，我们几乎总是发现不同的人以极不相同的方法经历着同样的事件，并提醒我们在断定这些观点的任何一个具有优势时，要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当这种格调的珍贵著述已大量出版——并将继续出版——时，它们还引导着我们离开那些尚未解决的基本的历史问题：关于不同类型的政府是如何出现和垮台、为什么富裕和贫穷像现在这个样子来分布，为什么在某些时空中产生了大量的抗议运动，而其他时空中则没有

的问题。本书从另一个方面仍然着重研究这些类别的问题。

第二种趋向具体说来与中国史研究具有更多的关系。没有人能对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民革命背景的中国提出异议，这场革命曾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也没有人能否认现代中国（以别于20世纪后期的其他国家）的许多鲜明之处主要是由一个具有农民背景的政党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从20世纪50~80年代，许多研究中国的外国著述其目的在于解释这场革命是如何发生的；在50和60年代集中研究旧士绅如何失去对社会的控制之后，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集中研究农民自身的社会史日渐增多（在这个阶段的许多时间里，美国与越南和其他地方具有农民背景的革命运动的开战，无疑加剧了这种研究的强度）。这种研究导源于那时历史编纂学的传统。

但到我着手这项研究之时，那种传统已成明日黄花。已现端倪的向文化史转向的趋势意味着对农民学的冷落。不是人们不欢迎农民学对事件的解释（实际上，研究印度农村的学者们的尝试，作为底层研究运动的一部分，曾极其令人鼓舞），而是我们所发现的让这种方法变得实用的记录实在太少。其间，在中国本土所发生的研究趋向也似乎偏离了农民学。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对“红”的强调后，致力于四个现代化建设和对“专”的培育，导致了对群众运动（不论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中心地位的重新评价。20世纪70年代末期对太平天国的重新评价，与以往相比，较多地强调了其作为农民运动的局限性，并对作为这场运动中潜在的现代化人物洪仁玕表现出了较大的兴趣，就是这种变化的一个早期迹象。地方史和回忆录（如《文史资料》丛刊）的大量涌现，也使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当地革命活动中那些人所起的重要作用，他们既不是农民，也不是由中共从外部派来的组织者：进步的学校教师和青

年等。

这种偏离农民运动的变化作为历史的主要原动力很快也在西方汉学家中体现出来。并且，由于20世纪80和90年代在该国沿海城市开始出现的新中国，此前许多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出现的似乎很像是历史死结的现象——广告和商业文化、中产阶级的市民团体、西方训练或西方影响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兴起，等等——似乎再次影响中国的现在与未来。伴随着向文化史和心智史的转向，这些趋势导致了像我这一代受西方训练的大多数中国史学家更加注重中国的都市。卷帙浩繁的重要著作涌现了出来，但也付出了代价。这种新的著述通过提醒我们都市的事件和角色，把对某些不平衡进行了重新梳理，但有时却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并忽略了中国历史中农村无可替代的中心地位。

结果，尽管本书着重研究中国农村相对贫穷的地区，但当它出版时却备受好评（获得了那一年美国历史学会现代东亚研究最佳著作奖），它并不能与对20世纪90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讨论至为关键的大部分争论——那些关于性别角色的变化、市民社会的出现、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和大众文化的出现的讨论——一吻合。但近年来的发展大概使本书在历史编纂学方面比其首次出版时意义更大。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一个重要的发展是对中国环境史的兴趣越来越高。由于这项研究主要与治水——既包括黄河，也包括大运河——密切相关，本研究与那种类型极为吻合，并且，这项研究成了更大的西方汉学家（包括罗伯特·马克斯 [Robert Marks]、埃多德·弗美尔 [Edouard Vermeer] 等人）研究群体的构成部分，他们运用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们所倡导的方法，试图把一个特定地区在长时段里的环境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结合起来。而当我对这个地

区进行更细致的考察时，我开始认识到这个地区的其他环境问题——特别是与砍伐林木和燃料供给有关的问题——与普通百姓息息相关。总之，这个生态方面的变化，尽管通常游离于标准经济学（如，燃料很少通过市场获得，并因此被对人均年收入的估计所忽略）之外，但大得足以彻底改变经济发展趋势的画面，这幅画面仅是在我观察具有巨大市场的商品（小麦、棉花等）时所获得的。今天，人们对当代的生态问题和历史上环境的重要意义有了更多的了解。

本书所关注的另一个与目前似乎特别相关的重要问题是经济财富方面的地区性分化。当然，与任何巨大的社会一样，中国历来就存在着较富和较穷的地区，而人们也一直在争论自然资源、政府的政策或特定地区的文化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这些差异。不过，近年来，中国某些地区（主要是沿海）经济的快速成功已经造成了更大的地区性经济差异，并增加了人们解释这些差异的兴趣。在那样的背景下，本书强调华北沿海和内地之间日益增大的鸿沟，也可能是开启了一项新的有意义的研究。基于 100 年前的条件与今天的条件明显大相径庭，本书所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似乎与此密切相关：参与到国际经济中的沿海与总的说来并不一定是由地理因素造成的内地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差距吗？或者说，用来支持经济增长或保护其免受帝国主义侵害的政策加剧了内地的困难吗？在这个阶段的华北实例中，本书证明了政府的政策确实使得这个地区变得更加贫穷——沿运河地区一度为政府特别关注的事实，说明这样的一种变化极为痛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今天会发生同样的事。正如本书所强调的那样，原因之一是清末和民国时期支持沿海、损害内地的政治经济战略是对外国威胁中国主权的一种反应——今天的情形与那时已不可同日而语）。从那时起，在其他研究中（既包括拙著《大分流：中国、欧洲和现代世界经

济的形成》，也包括研究更近些的中国和世界经济关系的系列论文)，我越来越认识到：帝国主义对正在发展着的、重新形成的中国地区之间关系的干预，对某些地区有推动作用，但却极大加剧了其他地区的困境，并短暂地把中国某些最肥沃的地区与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分隔开来（而把它们与新的海外贸易伙伴联在一起）。这些扭曲了的地区性的变化，反过来极大地束缚了中国政府维持甚至是基本的秩序的能力，极少提供帮助推动现代发展所必需的服务。就那个意义而言，我们现在可以把本书中的事件视为较大模型的构成部分，这个模型把中国不同地区的成功与失败联系在一起，并有助于我们解释内地与晚清和民国政权相疏离的原因。

更为普遍的是，对当代全球化的争论，既激发了对这种通常被 80 和 90 年代初期的后现代史学家们所回避的大规模变迁叙述的兴趣；并且还激发了对帝国主义的新的兴趣，部分原因是由于 19 世纪后期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似乎特别预兆了当代全球化的某些方面。按照那种趋势——包括某些我认为肤浅地把帝国主义与市场融合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而无视其代价的新著作——我认为本书的分析、特别是对在帝国主义压迫下所做出的政治决策造成的经济影响的缜密思考，大概比其初撰时与今天的关系更为密切。

同时，本书对一种特定的变化——20 世纪 20 和 30 年代向机器棉纺厂赞助的新棉种的过渡——显示了当地的社会结构决定哪个地区可以在新机遇中获得优势时起着关键的作用。另外，它还证明了影响全部社会经济现象——对新棉种的接受、农村社区与都市信贷市场的关系、对治水危机的反应——的社会结构的同样特征，就是那些本地区对不同的社会和政治运动（从义和团运动——正如周锡瑞所描述的那样——到这个地区共产党活动的早期阶段）形成不同的地区性反应的特征。在本

书尝试把环境、日常社会模型和特定群体的物质利益与社会运动的模型联系起来考察时，本书大量地利用了 20 世纪 70 年代的社会史。但当那些著作较多地注重研究成为中共主要根据地的地区并因而非常直观地试图解释对革命的参与时，本研究则考察了一个更加迂迴转向革命的地区。那么，在某些方面，对这个地区比那些变成了根据地的地区更少使用政治的变化来解释。但如果这个地区没有变成中共的重要资产，它肯定会成为、且仍然是国民党的一个重要难题，部分原因是由于水灾、匪患及这个地区的其他问题无法在这个地区内得以控制；而持久的混乱（与成功的革命动员相比，其英雄气魄要少得多）也是中国 20 世纪早期政治史的重要构成部分。由于新的著述使我们更加了解国民党可以在某些地区进行相当成功的建设，而为什么其他地区证明了直到解放后才能够被治理的问题，就变得更加有趣。我想，至少问题的部分答案将被证明是源于帝国晚期和近代中国地区性推力的变化，而某些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则加剧了其他地区的“落后”——特别是在一个中国领导人那时不得不时常担忧似乎对极为脆弱的国家统一构成威胁的环境中。我希望本书对揭示那些推力聊尽绵薄之力，而在那些途径中，不少——尽管丝毫不值得欣喜——依然与今天息息相关。

彭慕兰

2004 年 8 月 31 日

鸣 谢

很难说这部书是何时启动的。一种答案可以说成是 1979 年秋，当时作为一名大学四年级学生，我不经意听了高家龙的中国史课。到了学期结束，我想以中国史为业；此后，高家龙一直是我极为钦敬的一位老师、批评者、引路人和朋友。在研究生院，我非常幸运地找到了愿意忍受一位研究中国的古怪后学的导师，并帮助我克服了后来遇到的许多困难。乔纳森·斯宾斯和比阿特丽斯·巴特利特对我是有求必应，并且还不止这些；自我离开耶鲁后，这两位仍然与我亦师亦友。与我在耶鲁一同学习的另外两位人物——约翰·梅里曼和詹姆斯·斯科特——也一直对我帮助有加；尽管他们两人的著作都不是研究中国的，但这两位的影响在这部书中应该是非常突出的。

作为一项计划慢慢地成为一篇毕业论文，后又成为一部著作，其他许多人也提供了有益的意见。这些学者中最为重要的是王国斌，他阅读并讨论了似乎无休无止的正文文本；我尚未遇到比他更好的同事。另外许多人——韩起澜、李中清、彼特·林德特、唐·麦克罗斯科、汤姆·罗斯基、詹姆斯·斯科特以及 1989 年 4 月“南加州中国论坛”研讨会的与会者们——对章节大纲、后来收入本书的论文及其他零碎片断做了有益的评议。作为加尼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的文稿审读人，周锡瑞提供了

使本书最后改定稿更加精辟的意见；其他的匿名审稿者同样助益匪浅。

在研究阶段，我从许多图书馆和档案馆以及从乐于助人的工作人员那里获益颇多。在美国，我在（耶鲁）斯特林图书馆、（哥伦比亚）斯达尔东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国会图书馆、（康乃尔）查里斯 W. 瓦森收藏库、（密西根大学）本特利历史图书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及纽约公共图书馆找到了许多稀见资料。在中国，我受到了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图书馆以及山东省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第一和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热情接待。我要特别感谢韦庆远和鞠德源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提供的帮助。我还要感谢本特利历史图书馆为本书使用克利夫顿·奥尼尔·凯里文件中的几幅照片提供的方便。

本项目在研究过程中，获得了许许多多制度上和经济上的资助。在研究与撰写的大部分时期里，耶鲁东亚研究委员会提供了研究经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为我安排了很关键的在中国为期一年的研究；最后我要感谢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与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ACLS-SSRC）的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与加州大学校长研究基金在学术假（基本上全用在了一个新研究项目上）中的资助。本书的编辑加州大学出版社的希拉·莱文和艾米·克拉兹金像所有作者所期盼的那样予以帮助并进行了愉快的合作。作为文字编辑的乔安妮·桑德斯特姆梳理了许多不妥帖之处，并对我从未注意到的问题提出了富有创见性的解决办法。

我还要感谢那些不在上述名单中的许多人。戴维·帕金森提供了一份我离开济南后可以说是遗失了的关键文件的新版本。阿兰·麦克唐纳和詹里·翁布尔他们把我从咬文嚼字的苦海

中救出；霍德·芬克来斯坦因使插图 1 变得非常清楚。最后，莫琳·格拉夫斯做了超过所有人——宣传者、审稿人、最为重要的同事——的工作，使本书得以面世；如果没有她，我无法想象本书、或者是本书在成书中的日子。



导 言

如果没有单一的民族国家与国内和国际市场，现代世界是无法想象的，而各地区“融入”到这些巨大的结构中，通常被当作一种至关重要的“现代化”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前的社会就是由零散和孤立的社区组成。例如，晚期的中华帝国拥有自己规模巨大的市场网络，这种网络造就了比大部分国家还要大的统一的大区。^① 并且，尽管这个帝国不具备忽略地方特性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势力，但它确实在其整个地域中引导着重要的人口、资源和观念的流动。这些早期的网络不仅是现代国家和市场粗陋的雏形；它们还因不同的原因和以不同的逻辑联系着一个融为一体的世界。

在 1850 年以后的中国创造一个现代国家和民族经济，涉及在建立新的、甚至更大、且通常更强网络的过程中较为古老网络的瓦解。尽管是在西方帝国主义的背景之中，但这两种活动主要是由中国人来进行的。在这种背景下，这个国家新的网络及其对经济的干预越来越指向新的目标。官员们寻求生产和动员财富以用于国际竞争，因为中国已被帝国主义强行纳入其

① 见 G. William Skinner, "Cities and the Hierarchy of Local Systems," 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G. William Skinner (Stanford, 1977), pp. 273~351, esp. 275~288。

中，而不是像其前辈那样重建一个儒家社会。这种新的经世方略既改变了国家专注的任务，也改变了它认为最为重要的地方。随着中国地位的改变，中国内部地区的地位也在改变：既有一个区域的核心和边缘的地理界线，也有一个社区成为核心或边缘的政治和经济含意。

这是中国的一个地区从在这些旧网络中担当至关重要的地位，向在新的、更强大的网络中沦为边缘性地位的痛苦演变的过程。这个地区——我称之为“黄运”，下面将予以更具体的定义——是华北平原一块较大的内陆部分。它的演变被一种技术性的变迁象征性地表现了出来：跨越该地区的大运河，被接近但未穿过该地区的铁路和轮船所替代。但这种演变的原因和结果皆要追溯得更远。

黄运在数世纪里都是华北大区核心的一部分。^① 尽管如

① 周锡瑞认为，黄运南部的山东部分，实际上属长江下游地区（*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Berkeley, 1987], pp. 5~7），但他的看法似乎让我不敢苟同，至少对 20 世纪来说。如果这个地区是那个大区一部分的话，这个地区人口的高密度和每英亩土地上的高产量，意味着一个核心及它们比离长江下游核心地区更近的淮北地区的人口和产量要高的事实，将造就一个不合常规的模式。而在他观察周期性的受灾者从这个地区向长江下游核心地区流动时，我对 20 世纪资料的印象是这些人更愿意向东北移动。另外，源于这个地区其他类型的移民实际上更愿意向华北大区中的其他地区移动。这个地区无数的教派在鲁西北和直隶进行传教，在贯穿于 18~20 世纪的反叛中，其目标是临清。至少在 20 世纪，这个地区大部分地方的大多数知名人物是在济南、北京和天津而不是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寻找职业和投资。

当任何一方面的问题出现时，对我来说，保留施坚雅关于华北大区及其核心的描绘似乎仍然是合乎情理的。正如周锡瑞指出的那样（前引书，第 6 页），运河使这个地区中大区的界线通常很模糊且具有渗透性；如果黄运南部边界上的一些县被增列到长江下游中，这将不会影响我的论点的要旨。最早提出中国大区模型的施坚雅现在正基于 20 世纪的资料重新思考华北地区的轮廓；但在我看来，像他最初表述的某些东西似乎正好适用于明朝和清初在与东北发生联系以前拥有现在重要地位的华北。这样的一种模型并不适用于本书描绘的更近的、非常强调变迁基本性质的资料。

此，运河的衰落与沿海贸易——尤其是东北和外贸——重要性的不断增加，在山东半岛上造就了新的核心地区，并把黄运的大部分变成了边缘地区。这是沿海经济增长所造成的所有大区核心的最大转变。^① 这种听起来很抽象的过程严重地搅乱了人们的生活。例如，黄运居民获取石头和木材开始变得艰难起来，这些木材是治理洪水和作为燃料所必不可少的。作为一个长期的核心地区，黄运拥有稠密的人口，在这些不可或缺的日用品中排除了自足；但作为一个新的边缘地区，它不再拥有良好的水运，无法把它们运进来。

新的政治经济使黄运既受益又受损。在贸易方面，黄运从演变为一个更具活力的核心腹地中获得了益处；如果不是黄运南部的本地士绅为了信用和其他资源阻止当地融入到更广大的市场中，它得到的益处可能会更多。但如果我们通过非市场手段——诸如治水事务、基础设施的建立、或是植树规划——来观察资源分配的话，在新的外贸、技术和 19 世纪后期的威胁把国家的注意力引向沿海、并引离黄运之前，黄运的境况本来是极其优裕的。

外国的冲击摧毁了明清治国方略的基本原则、特别是通常要求富裕地区接济较为贫穷地区基础设施的社会重建信条。取而代之的是，外国的压迫有助于给一个正在奋力求存的国家带

① 上海和香港确实分别是从小镇和荒地上兴起的，但它们都非常接近早已建立的核心地区。青岛至少接近施坚雅所认为的甚至在西方到来之前曾一直是华北核心的边缘地区，但在修建铁路之前，从济南到这里大约要 10 天，而从这个“核心”的其他重要城市到这里则甚至更远。（至少暂时地）由于外国影响而繁荣的烟台从 1850 年以前的核心城市到这里甚至要更远，而事实上与东北则具有更密切的关系；威海卫曾经几乎被完全孤立。相反，其他沿海大区中的某些临河城镇，如扬州，在鸦片战争后可能曾越来越被长江流域的其他城市所遮蔽，但它们从未变得像黄运一度兴盛的临清、聊城或滑县那样的隔绝。

来一种类似重商主义的逻辑，资源不得不用在他们尽力来保卫的地方——直接的干涉或是作为外债的结果、或是两者兼而有之所造成的中国面临危险的独立。按照这种逻辑，维持黄运的基本事务变得无关紧要了；通过从国外为它运来商品（如木材）或服务（如水利规划）来缓解这类次优地区的困难，实际上具有危害作用。回过头来我们可以看出，这种重新定位具有巨大的福利成本；并且，由于中国的革命最终兴起于腹地，作为一种国家构建之策，它似乎很值得质疑。但在那个危机时期，新的途径似乎是显而易见或别无选择的，抑或两者均是；几乎听不到倡导其他事情的声音。

如果不考虑经世方略中这种根本性的变化，人们甚至无法评价帝国主义的经济影响。在中国许多地区，1850年以后向重商主义方向的转变，是一个比1911或1928年的那些变化更为重要的政体转变，是一个具有深层经济意义的变化。与把从贸易中获得的收益与直接的经济损失——像黄运在庚子赔款上的负担或是它在进口鸦片上的支出——相比较不同，我们也将试图来估价当一个备受压迫的国家停止资助该地区基础设施的时候黄运失去的是什麼。

这份新的政治经济概要介绍了本研究重要主题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黄运持续不断地（尽管是非常不平衡的）融入到集中于条约口岸的市场中。第二方面是该地区以大运河为基础的某些旧的经济联系的瓦解，大运河曾一直作为生态方面至关重要的进口（如木材）的一条辅助性的渠道，而新网络却无法替代这些进口。第三方面是国家政府对该地区水利系统——不仅是大运河，而且还有黄河——的抛弃。

第四个方面源于一个显而易见但却时常被忽略了的论点：黄运并非一块供国家和市场的创造者们来书写的白板。旧网络的分崩离析，主要是外来者造成的，但有些当地人比其他人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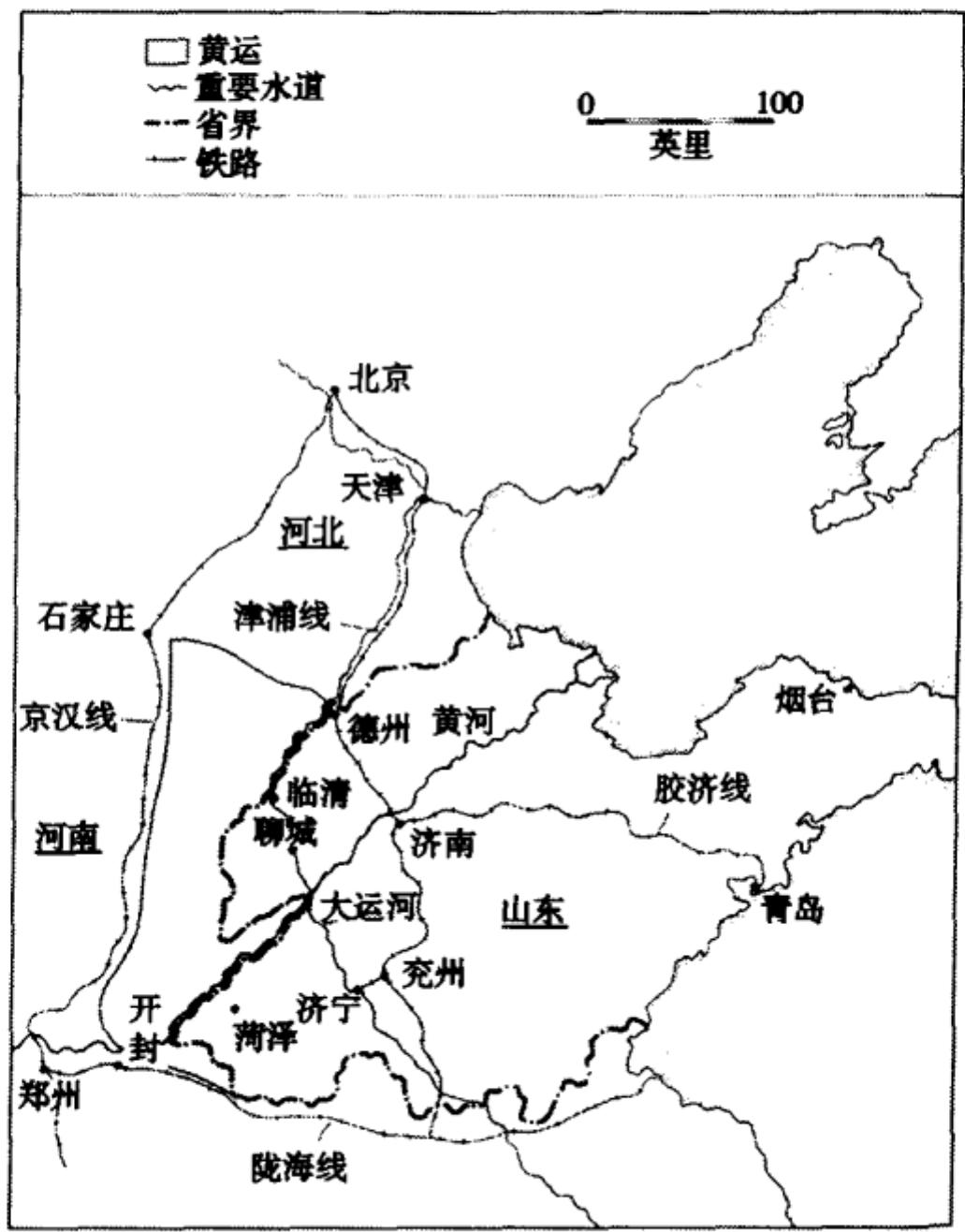
备更好的条件来抵制它。进言之，旧网络的崩溃并不保证与新网络的融合。在更多地分享新市场和其他网络的支持者们与反对者们之间的斗争兴起了。这些斗争的结果有赖于黄运北部和南部地区迥然不同的当地社会结构；因而，与地方及国家政府断断续续建立的超地区市场和现代国家相融合的范畴和过程也有赖于此。

区 域

这里所研究的区域没有正式的名称，但到 1900 年，它至少拥有 1500 万人口。由于两条水道（黄河和大运河）在这个地区的中部交汇并形成了这里的环境、经济和政治，因而我称之为“黄运”。它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山东西部，加上毗邻的直隶（1928 年更名为“河北”）和河南部分地区（见地图 1）。均于 20 世纪早期修筑的中国两条南北向铁路有助于标定其界线：它从东部的津浦线延伸至西部的平汉线，以及从山东的南部边界延伸至略微越过它的北部边界的界线（实际上，也可以把江苏的最北部分放进来；我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既有空间的因素、也因资料的限制）。用后来的东西向铁路来划界，这个地区处于 1898 年计划、但直到 1949 年以后才修筑的石德线（德州至石家庄铁路）与陇海铁路（它始修于 1915 年，1924 年修到海边，并于 1934 年展筑到西安）之间。^①

非常古老的南北纽带（大运河）也是这个地区的界标：不是作为它的边界、而是穿越了它的中心。因此，在大运河的繁

① 见 Ralph Huenemann, *The Dragon and the Iron Horse* (Cambridge, Mass., 1984), pp. 86~88, 及刘近义的《中国铁路创建百年史》（台北，1981 年）书中的地图。



地图 1 华北的黄运（尽可能使用最大的边界）

荣期，黄运环卫着“中国的咽喉”。随着运河的衰落，围绕黄运的铁路和轮船联系着中国的南部和北部地区；它们使黄运与一个比以往更大的世界——但却是从一个越来越边缘化的位置——互相影响。

因此，当铁路环绕黄运有便于我的论点时，它们却无助于产生像运河所创造的那种途径。在某些地方，铁道线沿着自然地貌延伸，有助于划定黄运的区域（例如，沂蒙山区正好越过了津浦路，或是太行山正好在平汉铁路的西部）。在其他情况

下，它们为社会经济的区分提供了便捷而又一致的代替物。例如，平汉线正好从滑县西部穿过；作为随着大运河（它通过卫河与大运河连接在一起）的盛衰而起落的最西部城市，滑县也是黄运的一个外部边界。^① 同样在其他情况下，铁路线有助于标出新的网络，对它而言，黄运成了边缘地区。正好在黄运东部的津浦铁路，穿越了山东的省会济南；济南也是通向繁华的新兴港口城市青岛的一条铁路的西部终点。由于在济南东部不远，山东通向半岛的方向变得狭窄起来，较远东部的一切事物几乎不是接近沿海，就是接近铁路。因此，这些地区与充满活力和竞争力的华北和东北沿海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黄运却在某种程度上被与沿海繁华地区的松散联系所限定。

那么，在当代的地图上，这个区域可能看起来很奇特，因为它被铁路和像济南及石家庄这样重要的中心地区所围绕。但这仅是问题的一部分。在铁路修筑以前，当石家庄还是一个村庄，而济宁、临清、聊城和滑县是与济南相比肩的城市时，^② 黄运是华北核心地区的一部分^③ 并拥有稠密的国内网

① 关于滑县，见 Odoric Y. K. Wou, "Development, Underdevelopment and Degeneration: The Introduction of Rail Transport into Honan," *Asian Profile*, 12: 3 (June 1984), pp. 215~230。

② 例如，1843 年前后华北都市地区的地位，见 Skinner, "Regional Urbaniz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G. William Skinner, p. 238; 1800 前后的地位见 Gilbert Rozman, *Urban Networks in Q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1973), pp. 204, 214; 及 David Buck, *Urban Change in China* (Madison, 1978), pp. 21~23。

③ 例如，可比较施坚雅的 "Regional Urbaniz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第 214~215 页的地图。另外注意施坚雅关于大名商人的论述，见 "Cities and the Hierarchy of Local Systems," 第 343 页，在这里，施坚雅认为国家有意画下界线，以消除这些商人的影响，他们的网络跨越了黄运。

络。随着交通线路的出现、被重新规划或消失，这个地区分裂了；黄运的北部变得趋向于其边界以外的天津、青岛和其他正在兴起的城市，而黄运的南部则变成了一潭闭塞的死水。作为一个整体，这个地区开始分享的仅是基于某些模糊区分的共同经历：中国国家特别明显的放任政策与异常广泛的贫困。^①

大运河是一个巨大水利系统的核心设施，这个系统的其他部分也有助于对黄运进行界定。在运河穿越的许多河流中，最难治理的是黄河。在黄河于 1852~1855 年改道后，它从这个地区的中部穿越而过；黄运大致从这两条水路的交叉地带向北和向南各延伸了 100 英里。以上定义的黄运北部和南部边界，也是黄河作为主要泛滥问题的这个地带的大致边界。尽管黄河的某些洪灾确实涉及到江苏北部，并且那里的人民有时也担心黄河会重新改向该省（1188~1852 年黄河曾流经那里），但淮河则是更大的威胁。黄运北部的人民也担心黄河会决堤，但他们也更经常地成为其他河流的受害者。但在黄运本地，所有大量的水患危险在某种程度上是黄河问题的组成部分。

黄河最容易发生水患的地区是其三角洲。就地质学而言，这个地区始于距海 400 英里、靠近开封、京汉铁路和黄运西部边界线。^② 三角洲前面的 200 英里属于黄运地区。那段延伸的

① 黄运异常的贫困持续到了今天，除了一个于 20 世纪 80 年代发现了石油的很小地区（接近濮阳）。如可参见 E. B. Vermeer, "Income Differentials in Rural China," *China Quarterly* 89 (March 1982), pp. 26~27 的地图，它用圆点标出 1977、1978 和 1979 年人均从农业集体获得的收入低于 50 元的县；这些中国本土所有圆点的大约 1/5 部分在黄运地区，而另外的一些则在这个地区的正南部和东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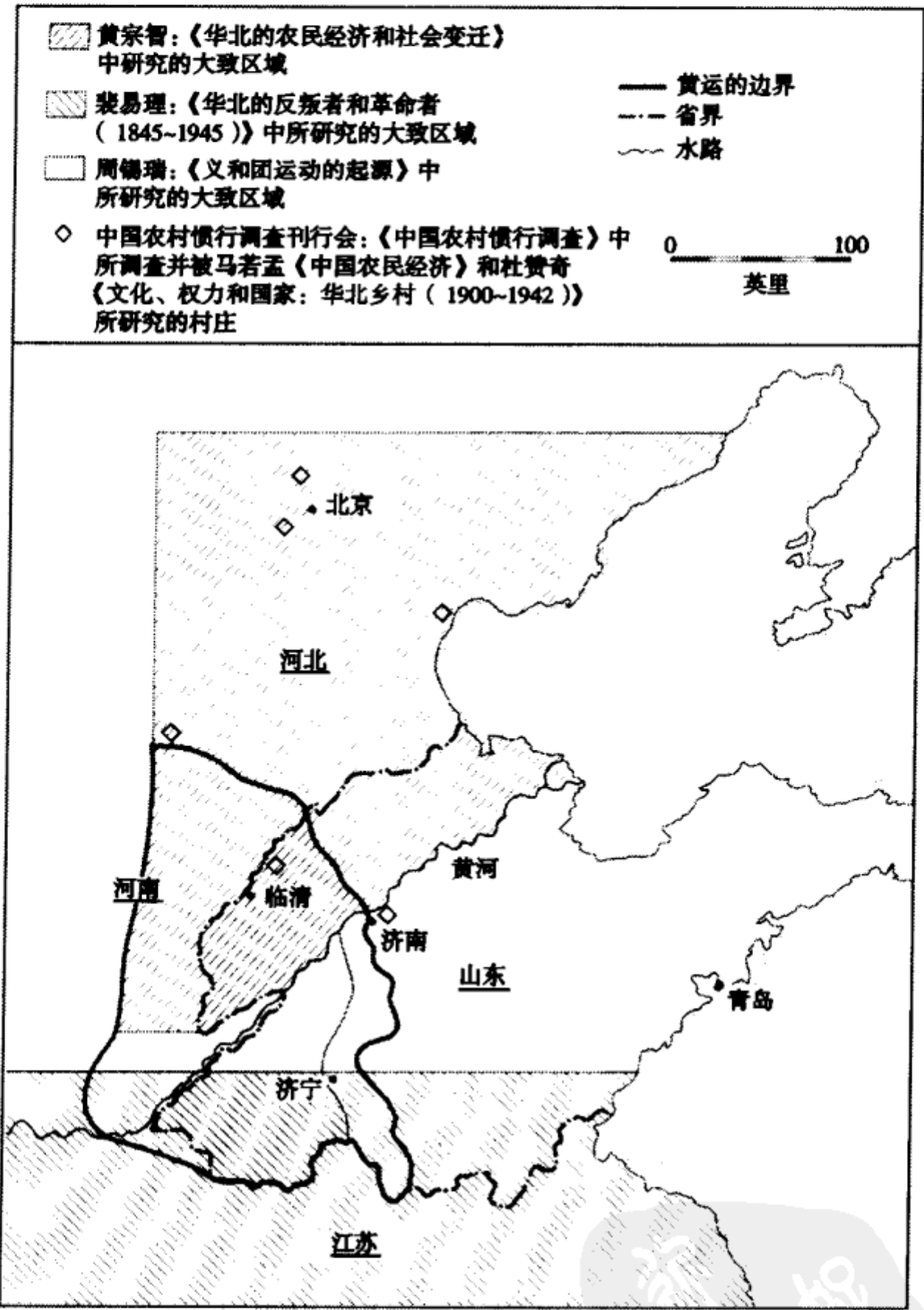
② John Ripley Freeman, "Flood Problems i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 May 1922, p. 1122.

部分不同于黄河尾段的 200 英里，主要是因为它在更远的下游河岸没有便捷的采石场。这种差别本来不一定是关键性的差异，但人为的决策使它变成了这样：始于 1891 年的制度方面的变革有效地阻止了黄运输入修堤的石料，并在许多方面使它成了黄河最不受重视和最危险的部分。

黄运也可以被置于一张社会学和历史编纂学的地图上。它始于裴易理所研究的淮北地区的北边，并向北延伸，与黄宗智、马若孟、杜赞奇及其他人所探索的地区的西南部相交叠（见地图 2）。它也从主题上沟通了这些地区。我们对中央政府的忽略、长期的不稳定和环境危机的强调，重拾了裴易理对淮北的阐述，而我们也注意到了马若孟、黄宗智和杜赞奇描述的持续商品化及 20 世纪当地的国家构建。

交错于黄运部分的这些地区丰富的历史研究，有助于阐明这个区域内部差异的意义。黄运北部和南部——大致上以黄河为界——不同的社会结构，决定性地形成了其对晚清和民国时期新威胁和新机遇的反应。黄运的北部有着较为稀疏的人口、不太精细（但却更加商品化）的农作、相对平均的财富分配、弱小的乡村精英、松散的村落社区及影响力几乎全都囿于本地区的居民。黄运南部有着较为密集的人口和每亩（1/6 英亩）较高的作物产量，但人均产出却较低。财富的分配更加不平均，乡村精英非常强大；村落类似于独立王国。黄运的南部，特别是济宁，经常产生有着全省或全国性影响的都市士绅和商人；不过，一般情况下，这些同样的都市精英无法影响其直接腹地中强大的乡村精英。结果，在从旧网络中获取资源来资助像治水这样的传统事务时，黄运南部略好于黄运的北部；但它被证明了对融入到新网络及融入到管理和经济的合理原则方面则远具抵抗性。

黄运北部和南部的某些社会差异，在其研究的区域极类



地图 2 黄运与其他学者研究区域的关系

似于黄运的著作中得到了论述：周锡瑞对义和团运动（1895~1900）的研究认为，这些地区产生两种极不相同类

型的“拳民”^①。我至少在两个方面基于他的分析建立了自己的观点。第一，增加了对这些地区之间都市差异的叙述，并观察这些都市差异是如何从更广阔的世界中折射影响的。然后我再论述 1900 年以后周锡瑞提出的同样的乡村差异，它们形成了当地对许许多多重要趋向和由都市发起的行动——从引进新的作物品种到地方水利工程——的反应，这在经历许多事件时是一致的，并因此产生两种明显的发展模式。因而，黄运使我们在相对“可渗透”（黄运北部）和“不可渗透”（黄运南部）的社区中来比较同样事件的结果（常用的“开放”和“封闭的”社区的术语使我觉得不尽适用于黄运或 20 世纪；理由将于第 2 章阐述）。

对这个地区的研究还需要对帝国主义在华北的影响有一种新的态度。黄运的帝国主义的影响不同于那些已经受到更多关注的两类地区的经历。一方面，对于那些地区，我们有着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的调查；这些地方通常靠近现代交通线。基于这些调查的研究往往强调国家和国际市场对乡村的渗透，即便这些努力被证明是半途而废的。^② 另一方面，裴易理所研究的淮北及拉尔夫·萨克斯顿所研究的太行山地区几乎不受条约口岸经济的影响；帝国主义在这些遥远地区的主要影响，大概是进一步转移了一个无论如何从未对它们予以较多关注的国家政府的注意力。但是，在黄运，沿海发展的经济推动及成为一个统治松散地区的代价，在实际经历中合到了一起。

① Joseph Esherick,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② Ramon H. Myers, *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 (Cambridge, Mass., 1970); Prasenjit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 ~ 1942* (Stanford, 1988); Philip Huang,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1985), 是许多基于南满铁路会社调查资料的重要研究中的出类拔萃之作，本书会不断地予以参考。因为这是一项基于不同类型的非常容易接触的村庄的研究，但显示了同样的倾向，见 Sidney Gamble, *North China Villages* (Berkeley, 1963)。

结果，黄运的经历也可以归结为关于中国区域单位的性质和意义的连续争论。现在，有两种假设风行一时。一种是由施坚雅提出的假设，认为在数世纪里，中国由8个地文学上的大区（加上东北）所构成，每一个区域大体上自给自足；在核心与边缘之间有它自己的劳动力内部分界。^① 这些区域被一种共同的文化和民族国家松散地联在一起；而后者自1916年以后则尤其软弱。但其他学者所提出的另一种假设则认为，即使在许多巨大的、很难运送大宗商品的地区也存在着一个民族的市场和经济。吴承明、彭泽益和罗威廉认为，到18世纪，这样的一种经济的框架是可以看得出的。托马斯·罗斯基、洛伦·勃兰特和其他学者对20世纪做了集中研究，并认为，尽管政治上四分五裂，但中国仍被超越大区的民族和国际的市场联系到了一起。另外，改善了的交通和运输使得工人、商人和投资者可以前往他们认为有机会的地方，改变了劳动力的地区分割。^②

① 施坚雅对其假设的最早论述，见“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 1~3 (Nov. 1964~May 1965), pp. 3~44, 195~228, 363~399。后来与我的观点相关的文章是施坚雅的“Cities and the Hierarchy,” pp. 275~351。

② 见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北京，1985年）及《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内市场》，《历史研究》第168期（1984年4月），第110~121页。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中国史研究》第1期（1981年），第43~60页；William Rowe,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Stanford, 1984)；关于20世纪的研究，见Loren Brandt, “Chinese Agriculture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1870s~1930s: A Reassessment,”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2: 2 (April 1985), pp. 168~193；Thomas Gottschaung, “Migration from North China to Manchuria: An Economic History, 1891~1942”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2)；Thomas G. Rawski,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Berkeley, 1989)；以及许许多多的其他研究。对施坚雅模型批评的观点，见Ramon H. Myers和Barbara N. Sands, “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5: 4 (Aug. 1986), pp. 721~744。

当然，这种争议无法用另一个区域研究、特别是一项完全包含在施坚雅学派所说的一个大区之中的研究来评定。按施坚雅的理解，黄运也不是一个空间上的单位：一个相互依赖、大体上自给自足的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其天然的边界为大多数社会现象提供了一种不变的分析单位。相反，它是由一个由公用的基础设施、生态和社会性的问题所界定的。这些问题在同一个地方，并非全都有开始、结束或高潮。这些问题也随着时间而发生巨大的改变；黄河和运河的交叉之处本身直到19世纪50年代以前还不属这个区域。一个被这样一种共同经历所描述的地区边界，本质上比那些要么是地文学上的大区、要么是一个民族国家更不精确和更不长久。但正是由于这种方法凸显了一个地区及更大单位的变迁关系，它既可以阐明清末和民国的大区、也可阐明民族市场的分析。

1850年以前，由于黄运依赖于远距离的、运河承担的贸易，并由于其后那种贸易的大量丧失，它既不适合于自给自足式大区的模型，也不适合于不断增长的全国性融合的模式。与20世纪的黄运相关的新市场，本来是可以成为全国性、甚或世界性的，但它们仍然远未达到这一步；而当大区的核心和边缘之间的一个劳动力界线的概念，阐明了黄运在更大范围的政治经济中的地位时，它也引出了一个难题：基于我们所强调的标准，不同的地区显示出更加“像核心一样”。对核心—边缘模型某些可能的改变以及我们定义空间单位的方法在结语中将予以阐述。

时 限

1937年日本入侵华北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个合理的下限；但上限却没有这么清楚。我们所阐述的内容大多始于19世纪

50年代，与黄河改道、条约口岸的开放、对东北移民控制的松弛以及太平天国战争——它改变了国家对税收宽裕的长江下游地区的关系——同步。对于像生态恶化这样的课题，一个静止的较长的时限有其优势；对较早阶段的扼要论述，归入到它们看上去很重要的地方。尽管如此，所有这里论述过的趋向在1890年以后都极大地加快了速度，而在1900年以后则更加如此。因而，面对着一个变得越来越棘手的课题，我重点研究1890年以后的事，而把以前的事作为背景。

一长串急速的事件在许多方面说明黄运在1890年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891年，清廷改革了黄河治理体制，把这个地区的大部分负担转移到当地人的身上。1901~1902年，清廷停止经大运河的漕运，也把这条河道留给了当地人。1897年，德国士兵来到山东；铁路也接踵而至。1896年，山东省政府开始改革金融和通货；大约到1900年，它引进了最终遍及黄运北部地区的新棉种并开始植树造林。其间，马关（1895年）和庚子（1900年）赔款浇灭了北京解决开支巨大的地方难题的热情。尽管如此，这些事件也加深了中国被“瓜分”的恐惧，并因此为“现代化”和国家构建的奋斗提供了新的动力。

国家、市场及其在黄运的融合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关注“融合”：在最通常的意义上，是一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的联系。本书前半部分着重研究黄运内部地区与外部经济中心之间的联系；后半部分则着重政治的网络。全书侧重于这两种类型的融合之间以及黄运内部和把黄运融入到更大网络中的融合之间的关系——强化与冲突。尽管这些关系各不相同，但它们的差异并非无穷尽的、或偶发的。由

于本书转向研究代表地方与超地方的网络之间、政治与经济的融合之间以及旧的与新的网络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案例，它将阐明国家构建、市场形成和帝国主义在华北的区域性影响。

前两章关注黄运与新的经济网络的融合。第一章分析了这个地区参与以沿海城市为中心的信用和货币市场的范围和（特别是）局限。第二章论述了新引进的棉花品种的推广（并再次论述其局限）；这种作物给黄运农民带来了较高的收益，主要是因为它适应了天津、青岛、上海和大阪机器棉纺厂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黄运北部地区比其南部地区融入到这些更大市场中的程度要高得多，它的大部分居民的生计因此改善了不少。这些在融合中形成的差异，地理方面的因素——像土壤类型或与可通航河流的距离——要远远小于政治和社会结构中的反差。当黄运北部松散的社区极易被外来者所渗透的时候，黄运南部的强大村落和乡村精英进行了更多的抵制；他们甚至阻止当地自己的都市精英进行可以颠覆乡村权力结构的变革。当地社会中的这些差异，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各种各样的变革代理者，在黄运北部比在南部要做得好。

前两章中的叙述被发展但不均衡的市场融合所驱动。尽管如此，帝国主义——这种发展中的大部分由它所推动——也促进了另一种趋向：政治上的分化。如同市场融合一样，这并不是一个直线型的趋向：许多不断融合的迹象出现在中华帝国国家的崩溃之中。为了维持本书对社会和经济史的注重，我忽略了某些所谓的“民族构建”——试图建立一种公认的公民身份、共同的信仰和象征及对一个抽象民族实体的信念——而是侧重于“国家构建”，特别是获取和配置资源以实现政府目标的体制的创立。

关于中国国家构建的著作，包括了对 20 世纪初期截然相反的两种叙述。有些学者强调中国旧的政治体制的衰败，其他

学者则强调增强了某些国力的“现代”制度的创立。^①对黄运经历的研究，通过凸显国家目标中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不同区域所产生的巨大的不同影响以及国家的成功和失败之间的关系，来阐明这些问题。具体说来，它揭示了国家对国际竞争的新的关注，是如何影响它从其一项重大的传统任务——资助和/或监督生态问题的处理，特别是因生计和社会再生产其生态基础变得脆弱的地区（包括黄运）——中退出的。

在第3~5章中，生态、国家及以前国家所支持的网络的崩溃占据了核心部分。第3章是关于采伐林木及黄运20世纪的燃料危机，它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把这些问题与前两章的那些问题联系了起来。它先是论述了采伐林木和普遍的生态恶化，作为市场失败的一个案例，被人口增长所进一步加剧。它然后描述了经政府维持的大运河所输入的木材，是如何帮助稳定黄运脆弱的生态的。当这项贸易枯竭后，黄运的燃料短缺更加恶化。这一章然后转向20世纪国家的植树造林规划；尽管这些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但它们无助于像黄运这样相对闭塞的地区，它们有着最为棘手的问题。相反，它们被引向了较为开通的地区，通过在东北“浪费”硬通货和用外国的木材来解决当地的匮乏。

因此，采伐林木为我们提供了第一个案例，在这个案例

① “衰败”派的著名例子包括 Chuzo Ichiko, “The Role of the Gentry: An Hypothesis,” in *China in Revolution*, ed. Mary C. Wright (New Haven, 1968), pp. 297 ~ 317, 以及 John K. Fairbank, “Introduction: The Old Order,”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ed. John K. Fairbank, Vol. 10, pt. 1, pp. 1 ~ 34。关于雏形的“国家构建”的著作包括 Susan Mann, *Local Merchants and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1750 ~ 1950* (Stanford, 1987), 及 Steven MacKinnon, *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1980)。其他例子，包括基于这些基本观点的其他重要变种，将在正文中与其最相关的地方予以讨论。

中，旧的网络和势力的瓦解，比新网络的建立对黄运影响更大。它还凸显了政府新的重商主义的优先考量，它取代了国内的供给，因为木材进口比增加那些过于闭塞、以至于无法进口的地区的燃料供给更加重要。本研究开始阐述国家新的方案、它对旧方案的弃置以及隐含在其新的优先考量中区域“类别”之间的关系。这些主题在这一章的最后部分被进一步阐述，这一部分论述了黄运通过促使国家修建一条经过该地区的铁路来对继续留在华北核心——及保留至关重要的资源的使用权——所作的尝试。

第4、5两章进一步阐述了新的经世方略的区域性影响。在这里，市场的构建基本上没有了，我们研究的是对黄运影响最大的国家事务——治水——的失败。第4章分析了国家对内地黄河和运河治理的放弃，特别是在1891年以后。它强调这种放弃不是不能适应特殊情况的政府“崩溃”的结果。而是受到强劲而又猛烈压力下的国家把它的资源用到了其他设施上和地区中。

国家的某些新的责任为人所熟知：沿海的军工厂、新军和对外国人的赔款。它们还包括在靠近铁道的交叉地带、重要城市和一些沿海地区（包括黄河河口），这些大水患似乎容易为进一步的外国入侵提供借口的地方，改善河流的治理。国家在这些地区花费巨大，并引进极大地减少了水患的技术革新。与此同时，黄运的治水退步了。国家撤走了资金和监督。规模很小、资金贫乏和互不协调的组织，担负起了责任，重拾使用当地特有材料的技术——对工程不受监督的组织者来说，并因此而有利可图——但与清朝全盛时期所用的方法相比，却是事倍功半。简言之，晚清的改革和开支的削减既没有产生、也没有解决华北的治水问题：相反，它们把这些问题作了重新分布，使黄运成为华北受水患影响最重的地区。

第5章继续从一个更加地方化的角度来进行论述。首先，它考察了水利衰败给黄运带来的经济成本。到1920年，这些成本至少占这个地区收入的9%（并可能超过20%）。因此，在这个可能是独特的个案中，帝国主义及新的经世方略对黄运的间接影响，远远超过了这个地区从融入到世界经济中获取的回报。计算这个数量也延续了本书前面对拾荒和打柴的描述：把非市场化（并且通常是非货币化的）的物品和事务放到我们的研究中，用这样一种方法来捕捉它们与政治经济的其他部分的关系，并提供足够多的量度，来看它们是如何改变对乡村生活水准方面——仅以市场为中介的工资、物价、收入和消费为基础——变化趋势的计算的。^①

这一章然后转向民国三个时期对修复黄运水利系统的尝试，集中研究两个重新提出的主题。第一个是关于更大范围的政治经济是如何限制了黄运获得迫切需要的外部资源的。第二

① 如，Loren Brandt, *Commerci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entral and Eastern China, 1870-1937* (Cambridge, Eng., 1989), pp. 106-137, 及 Rawski, *Economic Growth*, pp. 285-329, 他们对生活水准改善的推论，主要基于工资资料和（在 Rawski 的研究中）增加的棉货消费。黄宗智尖锐地批评了这种方法，但没有做出直接研究农民消费些什么的尝试，仅是断言：与西方剧烈的变革相比，中国农村生活水准的变迁是如此的无关轻重，以致为了他的目的，他们可以被说成是自1350年至20世纪70年代一直是在维持生计（Huang,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 [Stanford, 1990], esp. pp. 137-143）。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当黄宗智极大地关注不计酬的家内劳动时，认为这类劳动通常在其报酬远远低于工资劳动者的所得时得到补偿，他认为仅有不计酬劳动是为市场生产商品（如棉花和生丝）。我自己对农民获得的某些非市场物品（燃料）和服务（水患治理）的数量进行直接估算的尝试，当然无法接近非商品经济活动的完整数目；但我想，这已足以说明黄与罗斯基关于20世纪初期经济的描述均不适用于黄运。

个是缺乏把较大的（国家是怎样看待它们的）利害关系、广阔的网络以及充足的基层影响相联合来经营必需的工程的乡村士绅。其间，黄运南部拥有一群组织良好的都市精英，他们极大地介入了被更加褊狭的领袖——他们反对任何可能危及其地方控制的措施——所控制的公共工程、乡村土地、水以及劳动力事务中。国家可以极其容易地渗入到黄运北部松散的村庄中，但却发现几乎找不到有影响的人物与之合作；并且，在这个地区几乎无人能够有效地强迫国家拿出更多的资源。结果，这两个地区产生了不同类型的治水活动、不同种类的弊病和不同模式的群众抵制。

第5章后面的结论，总结了本书关于黄运的主要发现，并为我们对中国的国家、帝国主义和经济发展的理解提供了一些启示。它还在我们观察中国的核心、边缘和区域体系的方法上提出了一些创新之处。

政治经济与中国的发展

从根本上说，这是一部政治经济方面的著作，一种在最近研究中国的英文著作中基本上见不到的类型。早期研究中国现代部门诞生的著作，多数集中于重要的国营企业，并必然地集中于国家的政策方面，但它并没有试图对整个政治经济进行系统的叙述。^① 早期研究中国农业部门的著作（其中以陈翰笙和

① 如可参见 Albert Feuerwerker,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Sheng Hsuna-huai (1844 ~ 1916) and Mandarin Enterprise* (Cambridge, Mass., 1958); Ellsworth Carlson, *The Kaiping Mines, 1877 ~ 1912* (Cambridge, Mass., 1957); 以及 Stanley Spector, *Li Hung-chang and the Huai Army* (Seattle, 1964) 的部分章节, 及 Samuel Chu, *Reformer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1965)。

R. H. 托尼等人为代表) 中, 通常充斥着军阀掠夺的生动轶闻, 但却——除了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中的一章外——几乎不费什么功夫来研究政治是如何的重要或不重要。^①

因为新社会史与新经济史均进入中国研究的领域中, 新的宏观层面的经济综合出现了, 在这种综合中, 国家基本上缺位了。像托马斯·罗斯基和洛伦·勃兰特这样的经济学家, 从核心是新古典角度进行的研究, 勾勒出了一个经济增长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持续的商品化、世界市场和新技术推动了 20 世纪早期的经济腾飞。在这个框架中, 没有一个角色——甚至国家也不是——具有重大的关系^② (实际上, 罗斯基早期的贡献之一是对当时普遍被人接受的、认为军阀割据状态破坏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中国经济的观点进行了挑战^③)。深受 A. K. 恰亚诺夫影响的黄宗智, 从一种折衷角度进行的研究, 提供了一幅包括制度因素——农村阶级结构, 特别是农民家庭——在内的宏观层面的图画, 在农业和人口统计学的内部动力驱动着的叙述中, 却在总体上把国家、外国人和非农民作为相对无关紧要的因素。^④

作为对比, 本书充满了非农民、特别是官员和地方精英的

① Myers, *Peasant Economy*; Chen Hanseng, *Landlord and Peasant in China* (New York, 1936); Richard Henry Tawney, *Land and Labor in China* (1932; reprinted Armonk, N. Y., 1966) .

② Rawski, *Economic growth*, esp. pp. 9~32; Brandt, *Commercialization* .

③ 这种观点最早见 Rawski, *Economic growth*, pp. 32~48。早期的批评, 见 James Sheridan, "Chinese Warlords: Tigers or Pussycats?" Jerome Ch'en, "Local Government Finance in Republican China"; 及 Diana Lary, "Violence, Fear, and Insecurity: The Mood of Republican China," 均见 *Republican China* 10: 2 (April 1985), pp. 35~41, 42~54, 55~63。

④ Huang, *Peasant Economy*. Huang, *Peasant Family*, esp. pp. 115~117, 123~143, 152~156。

活动。正如上文扼要指出的那样，我认为国家对农村经济具有巨大的影响：操纵货币环境并影响当地的利率；积极地引荐一些新的作物；帮助某些地区，而不是其他人，解决资源危机；并把大规模的治理水患问题从某些社区转移到其他地区。并且，我认为这些参与并非主要是由贪欲、无知和官员特有的本性所决定的，而是由一种其本身与经济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系统的逻辑所决定的：它的两个核心原则是需要获得更多的税收来为国家构建的进程添加燃料，并且需要减少外债及其引发的政治压力。尽管向着这些目标的努力有时采用了怪异和可怕的形式——特别是自国家权力通常被分割及由于不平等条约排除了关税作为经济民族主义的手段以后——这种潜在的逻辑似乎一目了然。

我认为，强大的非官员的经济行为也通常根据政治经济得到了最好的解释。例如，在推广新的棉花品种时，不论地方精英合作与否，与他们是怎样考虑商品化将影响他们的政治地位——相对于地方政府和他们贫困的农民“主顾”——并与他们的利益在地方上是如何的唯我独尊具有重大关系。其他的研究者有时也注意到地方生态和经济潜力影响着地方精英的水平；黄宗智提出的华北土地不能单独地资助参与帝国科举考试的想法，是一个重要的例子。^① 尽管如此，这些见解被提出后，迄今为止，并没有随之分析地方精英的目标、水平、资源和选择是如何反过来形成关键的变量的：他们的社区的未来对国家和他们获得国家分配的资源的重要性；他们愿意承担削弱他们地方政治权力的风险以获取更大场合中的有效的财富；外人推动变革以取得在当地的立足点的能力；以及不同群体抵制私人堤坝的毁坏、被迫提供无偿劳动的能力，等

^① Huang, *Peasant Economy*, pp. 178~179.

等。在这里，这些联系变得极为重要，社会和经济之间的联系确实更加息息相关：因此，举例来说，对于我的叙述而言，生态和基层结构并不仅仅是一种最初的“背景”，而且也是这种叙述的结果。

因此，政治经济不仅在最近把被忽视的变量重新引入到我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阐述中，而且开辟了对整个常规性新层级的研究：在许多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范畴中的结果的协方差，有赖于国家的政治地理计量中地区性社会结构和位置的差异。在我们的案例中，它解释了为什么黄运的北部和南部产生了大量的贯穿所有重要问题的相反结果。黄运北部展现了成功的农业革新、新的信用的推广及贸易规划，对于军阀和其他外人勒索的特殊弱点、财政上的软弱但却时常对当地政府产生惊人的影响、一种国家资助的基层结构几乎完全的丧失以及由下而上的反叛。黄运南部则典型地展示了有限的农业革新、针对掠夺者更大程度的“封闭”、精于勒索但却拙于控制的地方政府、稍大的接近国家资助的基础设施的权力以及强大的交叉阶层、以村庄为基础对致力于统一规划的抵制。

因此，这里主题的类别，远远地超出单纯地展现一种在黄运社会和经济变迁的广阔范畴中的尝试。它还是一种说明甚至是一个简单的政治经济模型也可以揭示无可置疑的规律性以及说明在看上去各不相干的市场、制度和问题的发展途径中的关系的尝试；并且，它一方面立足于现存的社会和生态变化中的规律，而另一方面则立足于来自国际经济和国家制度的压力。

治水与国家的构建：理论透析

我们关于 20 世纪初期国家构建的失败、帝国主义的恶劣影响和旧网络崩溃的观点，主要来自于对治水的个案研究。就

本书仅是一项对靠近大运河与黄河交会处地区的研究而言，这种选择毋须辩解。但由于已经做出了更广泛的论断，我对这种强调提供另外的理由，来结束这篇导言。具体说来，研究治水对围绕大部分关于国家构建的著述最心仪的论题——税收、征募、执法的标准化以及（特别是在 20 世纪的第三世界中）推动工业化——所进行的国家构建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

国家的构建和工业化对许多评价国家的回顾性研究方法——从“现代化”理论到“依附”及“世界体系”理论——是至关重要的；它们也被大多数 20 世纪早期的中国精英（他们把这些努力视为中国幸存的惟一希望）所重视。最近的研究表明，20 世纪早期的中国国家在聚积现代权力的主要资源方面，做得远远好于以前大多数史学家所认识到的程度。从县到中央，政府收入在各个层面上获得了飞跃。至少在某些地区，政府还极大地增加了它对地方社区的渗透。

最近的研究还表明，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特别在工业增长方面，做得远远好于我们以前所认识的那样。例如，在 20 世纪前期的中国，金融和交通——在德怀特·帕金斯提出的中国国家未能发挥必要的现代作用的想法中，这是两个关键部门——实际上极具活力，一般现代部门的增长非常之快。^① 本书第 2 章甚至展示了政府成功地推动了农业和工业中协同增效的变革。那里论述的使种植者和沿海纱厂同样受益的新的棉花品种，既需要一种重要的农业推广的努力，也需要新的强制措

① Dwight Perkins, "Government as an Obstacle to Industrialization: The Case of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7: 4 (Dec. 1967), pp. 478 ~ 492; 对阶段性成果的研究，见 Rawski, *Economic Growth*; Brandt, *Commercialization*。

施来防止拾荒者运用其基于地方习俗的权利来危及新的作物。新棉的种植，至少在黄运地区证明了国家为了经济发展在影响基层社会方面具有惊人的能力。

政府的主要失败似乎一直是在其传统使命方面——维护公共秩序和治水、救荒、军事防御——并一直集中在特定的内地区域。由于它们对本来就已贫困的地区和通常对主要是货币经济以外，以及纳入国民生产总值（GNP）统计以外的那些活动（如拾柴）打击最重，这些失败可能对长期增长率的影响不大。不过，它们对大众福利和人民生活影响极大。最有可能的是，在“普通”人的眼中，它们对政府合法地位的损害，远远超过了它在现代使命中所获得的有限的成功。可能没有什么农民会太多地关注工业化；甚至极少有人会认为政府收入的增加和对乡村的渗透对他们来说是好事。农民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程度上变得关注强大的国家防务，是有争议的^①，但对于1937年以前的农民来说，这不可能是一种重中之重之事；实际上，很少有人希望更加有效的征募活动。

与之相比，防治“自然”灾害可能更加接近大多数农民想要政府去做的那些事。并且，正是那些在中国新的治国战略中无关轻重的区域，农民成群结队地抛弃了政府，许多人最终拥护共产主义革命。因此，我们对传统使命的强调，凸显了对那些留下极少叙述——关于他们是如何经历20世纪早期的国家构建的——人民和地区予以特别大的关注的课题，并有助于我们平衡对由核心地区的精英和外国人所撰写的关于中国努力加

^① Chalmers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Stanford, 1962), and Donald Gillin, “‘Peasant Nationalism’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3: 2 (February 1964), pp. 269~289, 代表了最新的见解到演变成一大批的著述。

人到“发达”世界的资料的偏重；它甚至可能有助于解释 20 世纪中期中国所选择的新方向。

对治水的重视，也使我们把一向受到重视的课题——国家是如何榨取劳动和资源——的新材料，与对一个极其乏人问津的问题——1850 年以后国家是如何作为一个服务的提供者来发挥作用的——的分析合并起来。^① 进言之，阻止水患——不像建军或甚至像建工厂那样——是某种地方社区可能并确实经常自己尝试的事情。这些地方的努力，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基线，来测量国家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比那些没有它——我们可能称之为行政整合——而进行的努力更有效。在某些情况下，当保留所有以命令进行征募的问题时，紧急状态下的国家构建产生了丧失（一个大国比一个孤立社区所具有的那种）行政优势的体制；结果，与被那些新经世派——及受其影响的历史学家——斥之为“浪费”的^②、清朝在实际事务中曾经做出的那

① 最近 10 年已见到了把盛清时的国家作为一个服务的提供者来研究的雏形著作，见 Pierre Etienne Will (*Bureaucracy and Famin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1990]); Peter Perdue (*Exhausting the Earth: State and Peasant in Hunan, 1500 ~ 1850* [Cambridge, 1987]); R. Bin Wong and Pierre Etienne Will (*Nourish the People: China's State Civilian Granary System, 1650 ~ 1850* [Ann Arbor, 1991]) 及其他人的著述。尽管研究如此之深，但我们几乎没有见到关于 19 世纪的材料，并且几乎没有人研究 20 世纪；我们对 19 世纪中期以后赈灾、治水等的叙述，则集中在私人活动（例如，Mary Rankin's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 ~ 1911* [Stanford, 1986] 与 Rowe's *Hankow*）及外国人方面。

② Hu Ch'ang-t'u, "The Yellow River Administration in the Ch'ing Dynast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4: 4 (Aug. 1955), 主要依靠 19 世纪“经世”思想家魏源的著述；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军机处的奏折，见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八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第 44 ~ 45 箱，及武同举编《再叙行水金鉴》（台北，1966 年）第 10 卷，第 4142 ~ 4146 页、4176 ~ 4178 页。

些事相比，这种体制使用了更多的资源，为大众福利却做得更少。最好的例子是在国家把其注意力转移到别处后，黄运治理黄河的方法。在官僚规范外的非正式、预算外的组织产生了；这种体制使政府的开支减少，但却用去了当地巨额的非货币性资源，然而收效甚微。

这些事例也阐明了杜赞奇所说的“国家的内卷化”^①：国家榨取更多的资源、政府薪金（特别在地方层面上）支出不断膨胀，而没有向能够承担更多义务、有着更多尽职的人员或更独立于公民社会的方向有所“突破”。杜赞奇的许多见解被我们的发现所证实。但是，一旦我们把国家作为一个服务的提供者来观察以及观察它是如何解决新旧使命之间、核心与腹地区域之间的显著差异时，它的模型就需要进行重大的修正。当他用低水平的、政府雇用的“企业经纪人”这样一种新阶级和政府能力的衰退来阐述所有遍及华北的更大的榨取时，我的证据显示，这可能是介于两种鲜明发展模式之间的常规画面。一方面，更多的榨取已事实上对核心区域的公共事务作出了重要的改善。另一方面，腹地越来越为国家所忽视，并越来越缺乏更大范围行政整合的机会，这些机会存在于那些正经历着更大范围的市场整合的地区；腹地既承受更大的榨取（大部分是来自传统的权力拥有者）、又承受着剧烈的服务衰退之苦。

因此，尽管明显地分为“现代化”和“依附”说的理论家们经常地论述帝国主义最坏的政治遗产是它使20世纪的中国（或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成为一个无力推动发展的国家，但承

① Prasenjit Duara, "State Involution: A Study of Local Finances in North China, 1911~1935,"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9: 1 (Jan. 1987), pp. 132~161.

认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来发展某些现代部门和区域、并转向观察在外国的压力下所采用的国策是如何故意挤兑其他政策和地理上的区域，可能更加准确。因此，当把更多的重点放在黄运本就存在的社会结构与国家旧使命的失败上，来理解“依附”与“世界体系”中的分歧时，也采用了这两种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见解：不同于认为某些国家（或地区）已经“现代化了”，而其他国家（或地区）则没有，我们必须记住富裕和贫困地区都是现代世界的组成部分，一个地区的飞速发展可能造成其他地区的停滞或恶化。

因此，对现代化建设中像治水这种传统事务演变的强调，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经济增长却没有减少穷困这种矛盾的现象——一种对后来的政治事件具有重大意义的矛盾现象。通过把传统与现代的使命并排放在一起，我希望提供一种既不轻视像国家和市场构建这样长期变迁、也不轻视对生活在那时的人民福利和远景的叙述，并避免对全球的成败作无益的断言。这种评价在西方关于“现代化”和“依附”的著述及在吸收了中国“王朝循环”论的著作中非常普遍；后一个模型通常意味着国家的职能进行与它所有的使命和领土相一致的变化。^①更确切地说，1850年以后的治水很值得研究，尽管它影响到各个

① Gilbert Rozman, e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New York, 1981);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New York, 1976), vol. 1; Frances Moulder, *Japan, China, and Modern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Eng., 1977); 关于循环论的观点，可参见 John K. Fairbank, Edwin O. Reischauer, and Albert M. Craig, *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oston, 1973), p. 435; Ichiko, "Role of the Gentry," pp. 297~316。施坚雅开拓性地指出了不同区域中各自的循环，但这些循环主要是经济方面而非政治方面：见 "Presidential Address: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4: 2 (Feb. 1985), pp. 271~292。

方面，但基本上仍然无人问津。^①

对水利的强调最终回复到了国家构建与市场构建的相互依存关系上来。治水对于政府两个更加宽泛的使命——防止“自然”灾害和生态退化及为了交通而维持基础设施——是关键性的，这些使命基本上无法单独通过市场来完成，并且，它们还给经济的融合设置了限制。研究为什么属于基础设施的交通通常最好由国家而非用对使用者收费的方式来维持的著述汗牛充栋^②；落后或昂贵的交通显然限制了市场融合。抑制环境的退化也通常需要非市场手段，像针对造成整体问题的许许多多个人讨巧行为的规章制度^③（例如，在黄运，砍伐公地上的树木非常普遍）。由于“自然”灾害的增加，环境问题可能不是在空间上、就是在时间上限制了融合，从而使资源的移动更加困难，并使把资源投入到工程中以获取未来收益的做法更具风险。

最后，就一种不太严格的“给市场设置限制”的意义而言，黄运灾难频度的增加抵消了与更广大的世界进行贸易的新机遇所带来的福利利益，并最终损害了为更大的市场而促进生产的政府。从这种最宽泛的意义来说，在新的政治经济中，边缘地区丧失的服务却可能有助于为另一种类型的治国战略设置了舞台。

① 关于清代及其后黄河治理的屈指可数的著述包括 Hu Ch'ang-t'u, "Yellow River Administration," pp. 505~513;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黄河水利史述要》（北京，1984），这是一个覆盖了 2500 年的概述；及 Charle Greer, *Water Manage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of China* (Austin, 1979)，该书着重于 1949 年以后的发展。Randall Dodgen 正在撰写的著作最终可能会提供一个必要的补充。

② 这个观点的总结，见 Donald N. McCloskey, *The Applied Theory of Price* (New York, 1985), pp. 199~200。

③ 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这个问题的标准看法，见 Donald N. McCloskey, *The Applied Theory of Price*，第 331~341 页。

目 录

导 言	1
区域	5
时限	13
国家、市场及其在黄运的融合	14
政治经济与中国的发展	19
治水与国家的构建：理论透析	22
 第一章 地方利益阐述：信贷和货币市场中的政治势力和	
地方模式	1
山东的地区性信贷市场	6
根深蒂固的地方经济差异	12
信用市场及其他地方经济界线	13
区域性的货币市场	16
经济地理的政治：当地的公共财政	22

经济地理的政治：超地方的权威和政治自卫 25

经济地理的政治：私人利益 28

割裂的市场及其分布：强大的势力 30

割裂的市场及其分布：普通百姓 36

割裂的市场和区域经济形态 39

结语：割裂的市场与国家构建 48

第二章 社区、强制和棉花：农业改良和社会分层 52

新的农作物品种 56

拾荒与生存 68

看青活动与“棉业公会” 76

区域变化与地方领袖 92

渗透性、开放性和社会经济的变迁 109

第三章 生态危机和“自强”逻辑 116

市场、国家和生态 116

封闭、燃料短缺和森林砍伐 120

燃料短缺与“自强”逻辑 138

当地的努力：植树造林及其不满 143

生态、交通和边缘化 149

第四章 任其自便？	161
中央政府的退出	162
中央政府的退出：新的侧重、新的紧缩与 错失的机会	175
轻视的加剧：地方瘫痪的社会和政治基础	180
草秸与石头：落后技术的循环	193
黄运的黄河治理	212
水患的重新分布	221
第五章 灾害的应对	233
水利衰败的经济成本	234
士绅与外国人	244
国家的分裂与水利治理：军阀时代	261
官府、乡村头面人物与地方反抗	265
工程师与士兵	284
结论 黄运、中国与世界	299
附一 鲁西北和鲁西南各县名称	320
附二 水利衰退造成的农业损失	322

附三 黄运水利失修所导致的额外交通成本·····	330
征引文献·····	334
译名对照表·····	365
译后记·····	368



第一章 地方利益阐述：信贷和货币 市场中的政治势力和 地方模式

直到最近，除了两个极端方面——条约口岸高度发达的金融业和乡村的高利贷者——以外，史学家们很少思考中国的信用市场。更近的著作清楚地说明了我们必须更细致地观察各种情况下的资本市场。跨区域的资本市场对更富裕、更贫穷的地区及经济变迁的关系至关重要。理解更具地方性的信用市场，是观察人们在不同的经济地位中实际选择的核心部分，并因而成为对地方经济不是从数量上、就是从质量上进行评价的关键。

本章分析了资本市场、当地的利率和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重点研究处于山东的黄运部分。并且，由于许许多多的货币在山东不同的范围内流通，对超地方的资本市场的研究导出了对国内货币市场的分析。货币和资本市场最终备受当地政府财政的影响，对 20 世纪早期中国的国家构建和市场形成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种第三组的问题。

山东三个区域性的资本市场——北部沿海、核心地区（包括黄运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及西南部地区（主要是黄运的南

部)——无一恰好沿着黄运的边界；这并不奇怪，因为黄运并非一个功能上整合的区域。尽管如此，这块交叉的区域图式至少在四个方面有助于我们对黄运的理解。

第一，它把黄运置于更大的华北经济及省与国家行政的背景之中。本章的大部分是试图把握沿海与内地——这在沿着黄运东部的边界津浦线上会合——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二，它概括了本书论述的对各种经济和政治整合均有巨大影响的资金运转的局限。第三，它指出，除了那些地文学上的大区或全国性的市场模型外，还需要一个解释华北 20 世纪早期经济网络范围的模型。

最后，可能是最为重要的，它研究了在黄运内部关键的分界线。内地的西北部包括了黄运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其西南部地区，包括了黄运南部的大部分。^① 黄运的这两部分地区面临着大体相同的挑战：一种以沿海为中心的经济的兴起及在内地国家从水利和其他重要服务中的退出。但它们不同的社会结构导致了极不相同的反应。黄运北部极易为外来者渗透，并成为牢牢连接新的以沿海为中心的经济的边缘。与之相比，黄运南部变得更加闭塞，部分原因是当地的掌权者对融入更大的网络中进行了多方面抵制。黄运北部发展成了核心地区资本和货币市场的组成部分、而黄运南部最终还是一个狭小的固步自封的地区，这有力地阐明了上述不同的趋向。

有两组与中国资本市场有关的问题需要特别加以关注。第一，如果有些地区没有产生某些地区发生过的增长，我们需要

① 黄运的直隶部分显然分成属于山东的中心区域及属于西南部的地区。由于资料不足——特别是下面用来估计山东和直隶利率的粮价报告带来的问题——使这里不可能分析黄运的河南部分。

解释为什么资金没有以相对较低的利率从繁荣地区向更为“落后的”地区流动，这些地区的借贷需要更加高昂的价格。研究战前中国的著述大多是同一类型的，认为农村地区基本上没有得到东北、上海和其他繁荣地区的推动。^① 这种著作明确或含蓄地认为经济最“发达”地区产生的资金很少被投资到内地地区。这类广为人知的投资事例确实罕见，但我们零散的证据无法建立一个一般的图像，更不用说去解释它了。

另外，有些学者近来已经指出存在着一个扩大了全国性的资本市场，在这个市场中，资金确实从沿海城市向内地流动。^② 这种推论基于三个方面：①投资者寻求他们所能发现的最高回报，并且，变动着的环境（如电报的出现）使人们更为容易地了解远方的机会；②显然，在中国不同地区之间抹平利率，范围很窄；及③如果没有这类投资，城乡贸易（如上海，其售出远大于购进）的失调将导致农村地区的资金短缺和通货紧缩，给都市和农村之间的价格造成分化，但这种分化至今尚未看到。

第二组问题涉及地方信用市场。由于华北与南方相比佃农极少，所以，在北方，经济剥削和压迫的大部分论点一直以信

① Rhoads Murphey, *The Treaty Ports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What Went Wrong?* (Ann Arbor, 1970); Fei Xiaotong (Fei Hsiao-t'ung), *China's Gentry: Essays on Rural-Urban Relations* (Chicago, 1968); 及 Victor Lippit,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in China," *Modern China* 4: 3 (July 1978), 例如，仅赞成通商口岸经济在整体上对中国经济几乎没有促进的观点。Moulder 认为西方从中国耗尽了资本 (*Modern World Economy*, pp.118~119)。对 20 世纪一个单独的省确切地估计市场融合的罕见的努力，是 Barbara N. Sand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Market Integration in Shanxi Province, China, 1928~1945."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85)。

② 如见 Rawski, *Economic Growth*。

用和市场为中心。^① 在这里，关于资本市场是如何运转的观点也是有争论的。

一方面，大量的轶闻显示出资金贷出方诋毁当地的垄断者们。另有人认为当地的信用市场未必是被债权人所把持，而他们不过是提供了极昂贵的信贷，部分原因是他们只能利用很狭窄的当地积蓄。这种观点也认为当地缺乏信用流动。但是，另外的两种观点认为，在当地，资金确实是流动的。首先，最近的一些著作使用了累计数据加较少的轶闻来论述：在沿海城市（而最终则是国外）可以获得更为廉价的信用，确实“流向”了许多农村地区，使得农民可以进入一个竞争性的信用市场。另一种观点认为，在鸦片战争前，存入地方典当的政府资金提供了外部资金，对农村的承借者同样有益，在上述观点中，这种益处被归因于 20 世纪通商口岸的资金。^② 这里的论述是基于县和州的资料，而由于信用市场即使在较低的水平上也经常被分割，我们的画面是不完整的。^③ 尽管如此，

① 对北方租佃率不同的观点见 Myers, *Peasant Economy*, pp. 217~227; Joseph Esherick, "Number Games: A Note on Land Distribution in Pre-Revolutionary China," *Modern China* 7: 4 (Oct. 1981), pp. 387~411; 及 Randall Stross, "Number Games Rejected: The Misleading Allure of Tenancy Estimates," *Republican China* 10: 3 (June 1985), pp. 1~17。尽管如此，没有人认为北方的大多数人是佃农。

② 把地方的债权人视为剥削的垄断者的观点见 Tawney, *Land and Labor*, pp. 58~63, 特别是 60~61 页。由于地方贷款市场对当地资金限制从而变得昂贵的观点，见 Thomas Wiens, *The Micro-Economics of Peasant Economy: China, 1920~1940* (New York, 1982), pp. 123~155。关于全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见 Rawski, *Economic Growth*, pp. 145~155。见关于清初典当的补贴和规章，见潘敏德《中国近代典当业之研究（1644~1937）》（硕士论文，“国立”台湾师范大学，1983 年），特别是第 39~65 页。

③ 如在高密县，据报告在北部地区流行的利率是每月 2.5%，东部和西部地区为 3%，南部地区为 5%~6%。见《山东高密潍县之农村借贷》，《工商半月刊》第 6 卷第 4 号（1934 年 2 月 15 日），第 49 页。

这是理解这些对中国革命前的经济动力十分关键的问题的必要步骤。

由于本章的分析有时是技术性的，把它的主要结论先列出来可能是有益的。它们是：

(1) 该省包括三个明显的区域性资本市场。最贫困市场（山东西南部）中的月利息约高于最繁荣地区（山东北部沿海地区，这里面对东北，并包括两个通商口岸）1.5%，约高于中部或中心地区0.6%。约占据山东3400万人口1/5的北部沿海基本上不可能像有人所说的那样，通商口岸的经济是“大象身上的蚊蝇”^①。尽管如此，大约有着同样人口的闭塞的西南部，基本上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落后地区的“钱袋”，而构成中心地带的该省3/5人口，与北部沿海相比，更没有显著地融入到“全国性的”资金市场中。

(2) 这些利率差异在1900~1911年与20世纪30年代之间，基本上没有变化。

(3) 这些延续的差异不能用地理因素来解释。相反，他们基本上导源于政治上强势人物限制资金进出其县境的能力。这种控制资金流动的势力使得他们掌握了当地银铜兑换的比率，而在获得更廉价的信贷和白银——在更加繁荣的地区可以得到——时却受到了其他人的限制。

(4) 这些通货操纵不仅使有政治背景的个人获利；它们也是某些县政府公共资金的关键来源。

(5) 尽管县政府从阻截通货流动中获得了极大的利益，但省里的官员们也被夹在了可以觉察到的山东融入到一种更大范围的经济中所形成的优势和劣势之间。

(6) 这些人为的障碍不仅在贫困地区造成了贷款和储备资

^① Murphey, *Treaty Ports*, p. 31.

产的利率高于其他地区，而且越过这些障碍的政治上相关的能力使它们从通货贸易中获得的利益，远比那些不是在纯粹的地方商业、就是从全国和国际市场的那些商品中获得的利益要多。

(7) 资本和通货市场上的限制对内地具有重要、且基本上是有害的影响，尤其是对山东西南部地区。尽管如此，在北部沿海和其他地区之间的价格分化并未显现出来，这是由于中心县份输出了足够的经济作物以避免银钱耗竭，而没有什么输出的西南部，则几乎不购买什么进口物资，并通过输出寄钱或带钱回家的劳力来平衡其收支。当 1931 年日本侵占了东北并阻止劳动力的迁徙时，西南部地区经历了一个有别于更加广为人知的、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的通货紧缩。

(8) 在超地方性市场的发展中，政治和社会因素在形成地方参与时起着关键的作用。对市场融合的限制也阻滞了政府在地区之间转移资源的企图。这些困难极大地影响了地方与更高层次的政府之间的关系。

山东的地区性信贷市场

我们找到了许许多多山东特定时间和地区的利率。但大部分不能用在系统的比较中，这是因为它们忽略了是谁被收取了特定的利率、有什么担保、利息是如何付给的等方面的资料。不过，有一份 1933 年对各县各种各样贷出者的贷款“平均”和“最高”利率的调查。^① 对 1900～1911 年，我们可以使用山东各州每月的粮价来估计利率，就像麦克罗斯奇和纳什对中

①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 5 编，第 91～97 页；对这个数据的讨论，见博士论文，“附录 B”。

世纪的英格兰所做的研究那样。^① 这种方法假定在时间上保存谷物并在几个月后卖掉它，将与立即出售谷物和保存货币的收益恰好一致；如果有差异，人们将转向更加有利可图的活动，直到这种差异被抹平。^② 因此，平均起来，在收获后谷物价格的增值代表了可靠的利率近似值加上其他的仓储成本（如腐烂、鼠咬和偷窃的损失）。

这种方法涉及分别观察一个月或几个月的成对谷价（见表1-1）。

去掉收获月份造成的或收获月份里——此时，价格代表了新谷的涌入，而不论上一年度留下多么少的谷物所造成的价值增长——的成对谷价，在11个州中，每一个地区的每6种谷物，都以可靠的资料留下了50~60对价格。在10个州中，不同的谷物造成的结果相当接近。这种相似基本上可以证明这种潜在资料的可靠性；特殊的因素解释了其他不成对的结果。^③ 我们并非确切地知道存储谷物的价格增值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利息、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其他仓储成本，但其他成本在各地

① Donald N. McCloskey and John Nash, "Corn at Interest: The Extent and Cost of Grain Storage in Medieval Englan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 1 (March 1984), pp. 174~187, esp. 178~183. 在这里使用的谷价来自于从在这个月里每个州汇总的每6种谷物最高和最低价格的月度报告，现藏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由于技术原因——这在博士论文第463页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这里的分析仅根据最高价格。关于数据基础的进一步讨论，见博士论文第397~398页。

② 即使农民也显然在现金与谷物之间来回倒腾他们的资财，以保护其免受物价波动的影响，并寻求更好的利润。如见《大清历朝实录》（高宗〔乾隆〕朝）第286卷，第24下~25上页（第4154~4155页）中汤斌的奏折。我感谢潘敏德让我注意到了这个例子。

③ 见博士论文，第1章，注10。

区是相同的。^① 因此，地区性的差异应该反映了相关的利率。我们现在就来检验这个结果。

表 1-1 储谷的月平均利润 (1900 年 10 月~1911 年 12 月)

	小麦	高粱	大豆(2 种)		粟	玉米	所有谷物 平 均
北部沿海	0.40	0.43	0.75	0.52	0.29	0.06	0.41
青 州	0.62	0.44	0.63	0.94	0.53	0.28	0.57
莱 州	0.49	0.60	2.25	0.89	-0.07	-0.06	0.68
登 州	0.16	0.43	0.13	0.03	0.48	-0.10	0.19
武 定	0.32	0.25	-0.02	0.23	0.24	0.13	0.19
西南地区	1.85	1.86	2.30	1.83	2.21	1.86	1.99
曹 州 ^a	1.57	1.73	2.12	1.81	2.39	2.07	1.95
兖 州 ^b	2.22	1.99	2.47	1.85	2.02	1.65	2.03
中心地区	1.48	1.43	1.43	1.39	1.54	1.32	1.43
济 南	1.48	1.45	1.56	1.07	1.39	1.19	1.36
泰 安 ^b	1.49	1.73	1.55	1.36	1.93	1.37	1.57
临 清 ^a	1.53	1.29	1.08	1.35	1.33	1.53	1.35
东 昌 ^a	1.96	1.54	1.67	1.64	1.98	1.62	1.74
沂 州	0.92	1.15	1.31	1.51	1.05	1.05	1.17

说明：由于资料问题，济宁（西南部）和胶州（中心地区）被略去。直隶地区的数据（基于五种不同的谷物）在正文中予以讨论。关于差量/集中趋势的计量和基于这些数据的进一步资料及所用的方法，见彭慕兰《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900~1937）》（耶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以下简称“博士学位论文”。——译者注）“附录 A”。

a 全部处于黄运的地区。
b 部分处于黄运的地区。

① 该省不同地区中，在可以获得的储存设备的种类方面没有什么差异；因此，如果该省任何地区存在更大的腐烂问题，这本应是在更加潮湿的沿海地区。西南地区的土匪比其他地区要更加严重，但就我所观察的数百例犯罪报告中，储存的谷物几乎从来都不是一个目标（谷物在运往市场的路上有时会成为其目标）。

结果说明了三种地区性的类别（见地图 3）。首先，由莱州、登州、青州和武定州构成的“北部沿海地区”，覆盖了山东的北部沿海，包括通商口岸烟台和威海卫，拥有大约 675 万人口。这个地区也隔渤海湾与东北相望，并具有进入那个繁荣地区的非凡优势。^① 由于与东北和中国本土的沿海经济有着强有力的联系，山东北部沿海地区可以相对容易地获得金属货



地图 3 清末和民国时期山东区域性资金市场

资料来源：越村卫一：《中国大陆分省地图》，东京，1972，第 19 页。

① 某些时候，东北的统治者采用了多种货币政策，这使外贸极大地复杂化了（这些政策类似于本章阐述的山东地方政策；但是，东北当局似乎更加成功）。如见 Tsao Lien-en, “The Currency System in Manchuria,”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and Bulletin* 6: 4 (April 1930), pp. 389~390, and Eduard Kann, “Copper Banknotes in China,”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5: 1 (July 1929), pp. 551~561。由于与东北商人的乡土情结，某些山东和河北的商帮也拥有进入东北的特殊权利。

币（下文将要讨论）及特别低廉的利率。在那里存储谷物获得的平均收益要低于月息0.5%。处于另一个极端的是第二类地区——西南地区的兖州和曹州，这里的收益平均为每月2%。（西南部地区第三个州济宁的数据有缺陷^①）这个地区拥有大约640万人口。

其余的州，范围从沂州（1.2%）到东昌（1.7%，且邻近曹州，以这个数字，它的最靠西南部的各县可以令人信服地被加以分类），平均为1.4%。其西部第三个地区，主要是黄运北部的山东部分。由于是最大的地区，拥有2100万人口，这个地区呈现出最不均衡的图像，但它似乎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资本市场。另外，这些州显然与其他两种类型的地区分割开来，并且，它们相互之间进行的贸易远远超过与另外地区的贸易。在参与对外贸易方面，它们远远超过了西南地区，与渤海湾沿岸的州相比，它们与华北的区域性经济联系得更紧密（与东北联系较少）。^②我把这个区域叫做“中心地区”，既是因为它构成了这个省的大部分，也因为除了青岛港外，它是在济南省政府政治统治下的最牢固的地区。

在直隶省的邻州，从1903~1911年的谷价中发现了相同

① 从技术上看，济宁与临清是“独立的区”，而不是州。尽管如此，为了我们的目的，这类地区像小州一样运作，而我用了一个单独的术语。

关于济宁的资料存在着许多问题。除了不同谷物利率离谱的差异外，最令人惊奇之处是没有任何年度的收获循环。不像大多数地区的谷价，济宁的价格并不总是在该年任何特定的时间达到其每年的高峰或低谷。由于储藏是有成本的，紧接在收获后的谷价并不比一年中其他时间要低，这就令人费解。

② 关于贸易，见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2编，第156~201页；关于北部沿海和东北的相互依赖，如见Gottschang, "Migration," pp. 78~81。沂州是一个中心地区的州，它与第三种区域性的经济——长江下游地区——有着广泛的联系。

的模式。^① 在邻近山东西南部的大名，存储 5 种不同谷物的利润每月平均超过了 2%。作为中心地区西北边界、并包括黄运部分地区的沂州和广平，平均利率约为每月 1%。同样控制着山东西北部大量贸易的直隶最大港口天津，平均利率也为 1%。与东北很接近（既通过陆路、也通过水路）的沿海州遵化，是直隶最像山东北部沿海的地区；其平均利率略低于 0.8%。

这种对山东统计结果的差量计算，证实了区域性的模式。除了莱州外，所有的州都显示出了很近的集束性的结果，说明在这些州中，市场确实使储存不同谷物的回报相互接近，并说明了从当地这些谷物市场中进出是极为容易的。就这些谷物是一种人们可以储藏的资产的随机样本而言，这个结果表明对于任何假定的州，在这些年里，那个州里所有的资产中，任何特定资产的平均利润有 2/3 的概率是平均利润在每月 0.2% 以内。^②

与之相比，如果我们不知道谷物被储存到了哪个州，就不能预测储存任何特定谷物的利润。因为人们以 2/3 的概率仅能对一种谷物做出在 0.6%（从中间起，不是向上方就是向下方）以内的预测；平均而言，人们只能得出每月 0.7% 以内的结论。当利润为月平均 1.6% 的时候，限定一个 1.4% 幅度的范围（在这里面利润将可能下降）并没有太大的用处。换言之，在储蓄方面，每个州内部运营中的市场的概念，具有预测的力量，但在任何特定谷物的储存方面（通常极少储蓄），一个全省范围的市场概念则没有这种力量。最后，这里采用的区域性分类仅是每个区域内任何假定的谷物——与那些在一个设

① 见博士论文，第 1 章，注 15。

② 关于数据，见博士论文“附录 A”；关于这种特定的数据设定的困难的讨论，见博士论文，第 464 页，注 16。

定的州中所有谷物一样具有密切的集束性——所产生出的计算结果中的一种。^① 总之，单独的州显示出强劲的市场融合，尽管该省作为一个整体没有显示出这种情形；并且，尽管每个区域内部的州与州之间存在着差异，但它们比那些区域与区域之间存在的差异要小得多。

根深蒂固的地方经济差异

这种模式持续了许多年。一份 1933 年的全省调查提供了各种贷出者收取的“最高”和“普通”的利率。在这些利率中，为商店——许多商店也起着钱庄一样的作用——提供的“普通”利率，似乎是最为可靠的。北部沿海地区商店的平均利率为 1.9%；西南部地区为 3.5%；中心地区的商铺为 2.5%。如果我们使用来自个人借款的数据，西南部地区就会显得与中心地区区别不大；尽管如此，获得一幅由商店收取的利率的精确图像，很可能比获得零散的贷出者收取利率的精确图像更容易。在中心地区，青岛附近的利率略低于其他地区；但这个区域产生的任何貌似有理的亚区之间的差异，都比三个基本区域之间的那些差异要小得多。这里的总体地理模式明白无误地与 1900～1911 年的模式一样。^②

1933 年的利率本身高于为 1900～1911 年推导出的一些利率。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利率的上升，例如，对通货膨胀的展望可能已经改变。更为重要的是，1900～1911 年的数字代表了人们未曾离开自己的家院，仅是把谷物存放到来所获得的

① 见博士论文，“附录 A”。

② 这方面更多的资料及早期马若孟（在某种程度上，他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对它们的应用，见博士论文，“附录 B”。

利益。结果，为这些年度推导出的利率应该仅是反映了对风险——是源于某人自己的财产或市场崩溃（只有在外部大规模的运输突然出现时才有可能发生）的损失风险，而不是借款者拖欠的风险——的最小补偿。它们也将无法反映出在贷出者和可能绝望的借贷者之间议价能力的任何差异。因此，它们应该与绝对最安全的借款利润相似。我们有限的证据证实了这一点。在莱州（北部沿海），最安全的借款利率为每月 0.4%；在济南（中心地区），商会向它们自己的会员企业提供的贷款利率为 0.6%，而我所见到的西南部地区最低的利率是 1.5%。^① 与之相比，1933 年的利率肯定包括大量的风险贴费。为着当前的目的，1900~1911 年的“安全”借款可以与 1933 年的“普通”借款比较；导致利率的差异，问题并不在于绝对的水平、而是相似的地理形式。另外，其他资料证实了这些区别，并导出了对它们的解释。

信用市场及其他地方经济界线

北部沿海在经济上与山东其他地区分割开来是显而易见的。该省最东北端主要通过山脉与山东其余部分分开，难以进行大规模的产品贸易。尽管如此，这个地区生产的粮食不到它所需的一半；其余部分要通过渤海湾从东北运入。甚至在这种旅行遭到禁止的时候，许多人仍从这里前往东北。在 19 世纪禁令被解除后，移民的数量直线上升，该地区向东北边疆输送了最多的移民。进言之，大量的北部沿海人民不是在东北从事季节性的工作，就是在那里花上几年时间才回家。在那时，从

^① 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第 4 卷，第 1156、1125 页；《山东全省财政说明书》（济南，1913 年），第 28 页。

多方面来看，这个地区是东北、而非山东其余地区的一个经济附属体。^① 当青岛成为山东半岛南部的一个重要港口后，这条界线仍然更加明显：烟台继续与东北进行繁忙的贸易，但已不再从山东任何地区（除了北部沿海）进出货物。^②

尽管如此，我们的统计勾勒出了一个比这个半岛最靠东北部地区的更大的北部沿海地区。它向西延伸到包括所有渤海湾沿岸的地区，包括靠近黄河河口的地区，从这里与山东中部和西部的交通变得极为容易。利率和贸易模式等说明了这个更广阔的定义：对 1900~1911 年粮价走势的基本分析显示出了这个地区内部显著的相关性，但在这 4 个州与山东其他地区之间则绝对没有。^③ 对北部沿海一个更宽泛的定义也似乎符合经济上的逻辑：如果可以得到渤海湾提供的更好的经济机遇，处于渤海湾西面的人民应该愿意加入进来，而不管他们还能否与中心地区进行贸易。代之以另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更多的中心地区的人没有参与进来；我们应能看出，答案与政治经济方面的关联比与地文方面的关联更大。

对北部沿海更宽泛的定义，也被 1911 年从一个靠近北部

① Gottschaung, "Migration," pp. 77~81.

② 关于开放青岛对烟台的影响，见王守中《清末山东收回路矿利权运动》，《中国地方史志论丛》（北京，1984 年），第 259~261 页；Gottschaung, "Migration," pp. 91~92, 163；《山东杂志》第 76 期（宣统二年十月三十日），第 18 上页。

③ 这些相关性是基于用来计算本章利率的同一组谷价。当试图在北部沿海的一个州和该省其他地区的一个州之间的价格建立相互联系（几乎没有发生相互关系的事例）时所获得的结果，与那些从在两个不是全都位于北部沿海地区、就是全都不在北部沿海地区的州的价格走势之间建立相互关系（通常具有某些相互关系，并经常是一种强有力的关系）时所得到的结果之间，存在着非常鲜明的差异。尽管如此，小型的样本和严重的自相关问题限制了这些结果的用途。

沿海地区中部的重要金融中心黄县移出的资金利率表所证实。^① 这项资料所列出的 10 个目的地跨越了 4 个州，它们属于我们对北部沿海扩大了的定义的部分。最远的新城，离黄县 153 英里，但离山东中部重要的周村贸易中心仅有极为平坦的 10 英里路，离省会济南有 75 英里的坦途。不过，外国人控制下的青岛是惟一不在我们所说的北部沿海的目的地。有着这样一种最适中成本——对最昂贵的目的地，运费低于 0.5%——的网络，将会突然终止其他重要贸易中心的功能，有力地说明了这些贸易区的边界是由社会或政治因素、而不是由严格的地理因素所设定；就像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那样，问题确实如此。

各种研究者们业已勾勒出了一个明确的与山东其他部分有着松散联系的西南部地区。但对它的界线是有争议的。^② 分歧集中在济宁和兖州是否构成了一个单独的地区，或者应该被归类到西南部的曹州；这两个州在农业方面非常像曹州，但又拥有更大的城镇、更好的交通、更繁荣的商业、较少的匪患和更为强大的士绅。在我们的分析案例中，兖州与曹州利率的相似性，支持了对这个区域更广的定义。还有，就像我们后面应该看到的那样，济宁无疑是曹州和其他山东西南部地区的经济首府。在 1933 年的统计数据中，曹州、兖州和济宁也拥有一个共同的贸易轮廓：它们所消费的现代部门的商品在该省排名最后，它们的输出也最少，尽管它们是山东省内离东北最远的地区，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来自东北打工者的汇款。^③

① 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第 4 卷，第 1145～1147 页。

② Esherick, *Boxer Uprising*, pp. 12～14；孙敬之：《华北的经济地理》（北京，1958 年），第 132～134 页。

③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 2 编，第 151～201 页；东亚学所：《山东湖沼群地帯の地域調査》（东京，1940 年），报告之 14，C 级，第 158-D 号，第 130～131 页。

在这里，还值得注意的是，绝对没有不能克服的地理障碍把这个区域与该省其他地区分割开来。从1912年开始，济宁和兖州也通过铁路与济南连接到一起。另外，当代的著述通常以文化因素，如“落后”——其严重的匪患和暴力——而不是以任何物质上的差异或障碍来区分西南部地区。^① 这类定义既证实了地图上、也证实了学者中的分歧所揭示的：它的边界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产物，并不得进一步永久化。

区域性的货币市场

当我们转向货币市场时，市场界线的政治基础变得更加清晰。像全国所有地区一样，山东在这段时期中使用数不清的银币、铜元、铜钱和纸币，在它们之间并无固定的兑换率。^② 其他地区，银和以银命名的纸币越来越居主导地位^③，但在山东，铜币仍然十分重要；结果，铜—银市场也变得非常重要起来。

根据1933年的一项研究，农民仅在中国20%的地区出售商品以获得铜币、并仅仅在30%的地区用铜币购买商品。但在山东，在12个被调查地区的5个中，铜币被用于农业销售，

① 用英文写成的山东地理概览，见 Esherick, *Boxer Uprising*, pp. 11~20；更为详细的介绍见侯仁之《序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北京，1940年），第137~216页。关于铁路连接，见中国交通部交通史委员会《交通史》（南京，1937年），第3531~3535页。关于该地区的“落后”，如见《山东民众教育月刊》第5卷第4期（1934年5月），第85~88页。

② 李贵勤：《清末币制改革及其失败原因的浅谈》，《经济史》第2期（1984年），第129~130页，对作为清末的背景做了概述；到1919年，据《北华捷报》（1919年10月18日，第172页）统计，自1912年以来，有115种新造的货币和各种数不清的纸币。

③ Leonard Hsu, *Silver and Prices in China* (Shanghai, 1935), pp. 68, 75.

并且在4个地方，它是农民所能得到的惟一的货币。在13个地区中，有8个地区农民用铜币购物。但是，在14个地区中，仅有1个地区可以用铜币来结账。人们通常借回的是铜币，但不得不用银来归还。大宗物品通常用银来报价，而税收则一直用银来缴付。^①

结果，银和铜之间的比价既对政府也对私人财政极为关键。如果存在着一个统一的全省资金市场，不同县份的银/铜比价本应互相靠拢，或者至少遵循着平行的途径，就像人们在银子极其昂贵的地方从其他地方借银子、兑换它，然后，把铜币用在一个更加有利的地方来换回银子。相反，如果越过县界的货币流动受到了限制，或是兑换率能够被任意地设定和执行，由此产生的货币问题将会阻碍资本市场的融合。

如表1-1所示，兑换率在县与县之间的变化幅度极大，且其走势通常远离平行线。^② 尽管天津和北京有时与上海的比价略有差异，但上海的比价可能被视为“官”价。^③ 烟台和其他北部沿海地区开出的行情紧随着上海的比价^④，证实了这个地区的成员是处于“全国的”（或更适当地说，是“沿海的”）

① Leonard Hsu, *Silver and Prices in China*, pp. 68, 75, 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第4卷，第260~261页。

② 用来制作表1-1的兑换率取自地名辞典、报纸（主要是《北华捷报》）、《统计月报》、各种各样的中外报道，以及一家大商业公司的一例记录，在海山重印《玉堂春秋——济宁市玉堂酱园简史》，《济宁市史料》第1期（1983年），第48~78页。完整的征引目录和用数据对问题进行扼要的讨论，可见博士论文第402~403页。

③ 如见《统计月报》，1929年12月，第25页；1930年12月，第52页。

④ Hsu, *Silver*, p. 85；青岛守备军民政部铁道部：《东北山东（渤海山东沿岸诸港、潍县芝罘间都市）》，《调查资料》第17辑（青岛，1919年），第54页（杨家沟）、第148页（掖县）、第252页（龙口）、第286页（黄县）、第317页（蓬莱）。

经济中。尽管如此，中部和西南地区显示了更加不同的走势。

即使在中心区域内部，在附近的县——如济南和泰安——之间也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在临清和清平这两个相邻的中心地区的县（均位于黄运北部），20世纪20年代早期，其比价差别多达33%。尽管如此，1926年以后，差距在0%~7%之间摆动，仅略高于在这两个地区之间运送铜币的成本。^①除了济南，中心地区中的比价差距极少超过20%，而且，明显的相反走势并不能持续太久。

另外，直到1927年，中心地区（仍不包括济南）的走势与烟台和上海的那些走势相比，差异并不大。但此后，沿海的比价变得稳定起来，而山东中心地区的比价却一路攀升。到1933~1934年，在清平和临清（这是仅有的、有资料可用的两个县）的银子所兑换的铜币大约多于在上海所兑铜币的75%。在大多数情况下，1928年这段时间比以前更加稳定。^②尽管如此，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由于是政府及其支持者们造成了货币市场糟糕的融合，1928年以后，伴随着政治的更加稳定，沿海与中心地区之间的比价发生分化，也就不那么令

① 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第4卷，第234页，登州挑伙根据挑运不同的设备、重量和每个人一天所能走的距离索要一天的费用；由于这里的挑伙组织得很好，这些费用可能比平均费用要稍高一些。一贯（1000文）铜钱的重量可以从自1922年在济南的美国领事所写的一篇关于山东铜币贸易的报道中推导出来，这篇被引用在Frederic Lee, *Currency, Banking, and Finance in China* (Washington, 1926)的书中；这个数字与隐含在《北华捷报》1917年10月27日第216页的那些数字吻合。

② 《清平县志》（1936年），“经济”第25上~下页；《临清县志》（1934年），“经济”第22下~24上页；由于在上海铜币和银元的兑换率走势来自《统计月报》1930年12月第51页，上海的数据是通过合并每年的指数及把它与从Leonard Hsu所著的*Silver and Prices in China*第85页为所选的日期所确定的绝对数字合并而得。不论这两套数据是否是同样的日期，但它们是极其吻合的。

人奇怪了。

某些证据显示，1928年以后，山东政府更加有力的控制，把某些沿海地区拖出了沿海经济，而把它们拖进到了中心地区中。一份来自1928年龙口（一个通向北部沿海西部地区的小港口）的行情表非常接近于来自济南和青岛的行情，高于临清和清平行情的7%~10%，但高于上海行情的27%。^① 利率资料还说明，1928年以后，随着山东政府变得强大（并与东北的政治联系越来越少^②），某些北部沿海地区的西部边缘重新被吸入到中心地区；1933年利率最高的5个北部沿海县全都处于这个地区的西部边缘，与中心地区最为接近。^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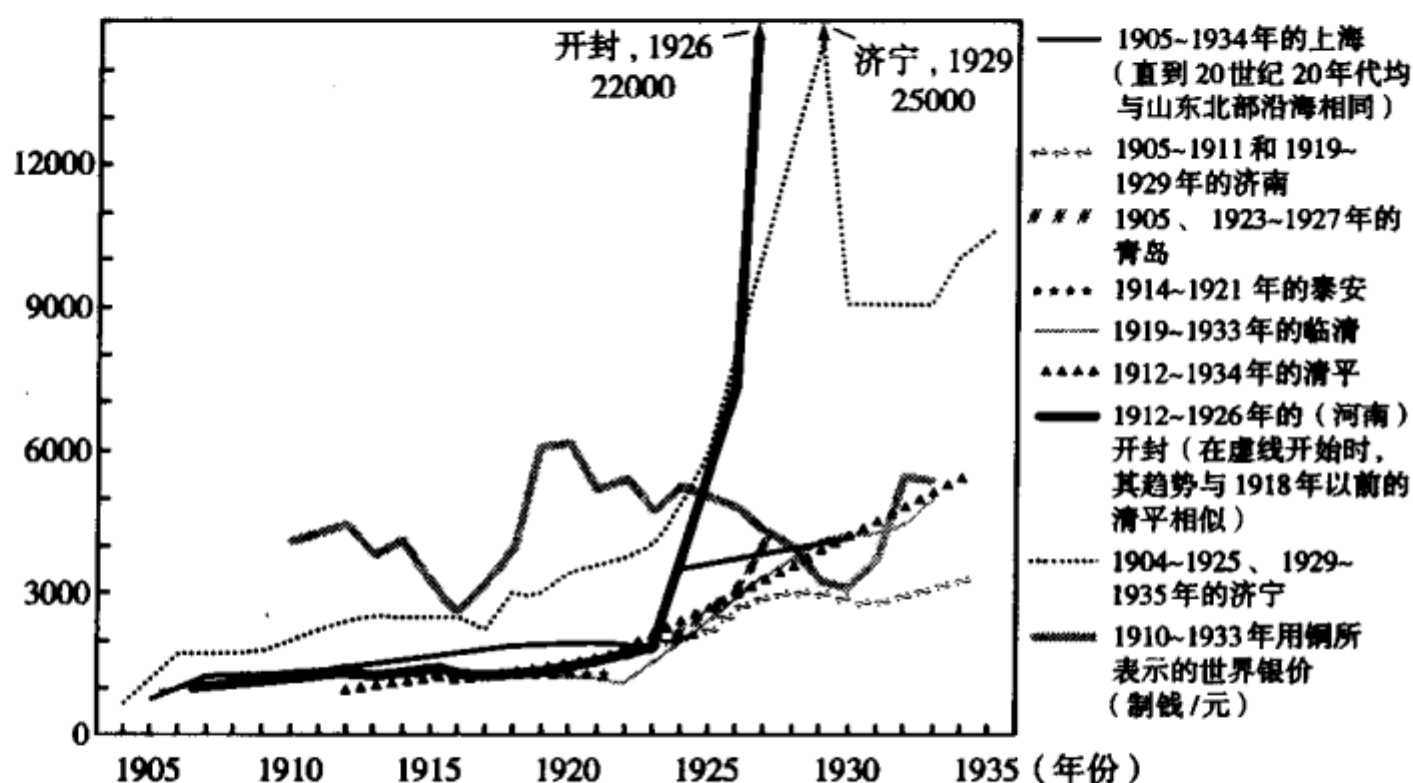
尽管如此，北部沿海最大的港口、并与东北靠得最近的烟台避开了省政府的控制，并依然是沿海经济的组成部分。即使在1934年，在日本占领东北3年之后，从烟台装运到东北的非法银币，数量大到了迫使政府印制更多的钞票；这种套利交易使得烟台的银—铜比价处于大连比价的8%以内^④，比沿海与中心地区之间的差距要小得多。因此，当该省的国家构建扩展了中心地区时，北部沿海的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独立状态。

① 引自美国国家档案馆的 *Records of Former German and Japanese Embassies and Consulates, 1890 ~ 1945*（缩微胶片 RG242T ~ 179；以下简称 *Records*）第5盘，文件号 4618834 中的 *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 13: 3 (July 21, 1928)（无页码）。

② 关于山东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和中期，领导层对东北靠山和对招收东北的山东东北部移民的部队的依赖，见李恒珍等《我们所知道的张宗昌》，《文史资料选辑》（济南版）第13期（1982年），第1~2、12~19、27、36~39页；王翰鸣：《张宗昌兴败纪略》，见杜春和、林斌生、丘权政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册（北京，1981年），第333~337、346、348页。

③ 见博士论文“附录B”。

④ 引自1934年12月7日的 *Qingdao Times* 见 *Records*，第5盘，文件号 4619093。



但真正惊人的差异是在中心地区与西南部地区的比价之间。我们最完整的一套兑换率方面的资料是关于西南地区的商业中心济宁的^①，它与这个省的其他任何地区都不相同。济宁的银价在 1904 年处于正常状态，但此后开始猛涨。到 1909 年，那里银与铜币的比价高出济南 40%、高出上海 60%；到 1914 年，济宁的比价大致相当于泰安（中心地区）和上海的两倍；到 1921 年几乎达到 3 倍；在 1929 年，是临清和清平比价的近 6 倍，大约是上海比价的 8 倍；而在 1933 年，大致相当于清平的 2 倍、上海的 3 倍。

运输成本无法解释这些差异。不仅是因为 1912 年以后济

① 大多数兑换率来自海山《玉堂春秋——济宁市玉堂酱园简史》，《济宁市史料》第 1 期（1983 年），第 48～78 页，这里对它们的重述来自这家工厂的内部档案。详情见博士论文“附录 C”。

宁到泰安的铁路线只有 65 英里；即使用挑伏和手推车来运送铜币（每 18 英里大约需费硬币价值的 1%）、用马来驮运银子（每 155 英里的运费为总价的 0.4%）^①，人们也显然可以通过在山东不同的地点之间运送硬币而获取厚利。信息问题也不能解释这个现象。清末的资料揭示了在济南、潍县和烟台存在着活跃的货币交换市场，它们公开发布可以利用的每日价格行情^②；民国初年济宁的市场也是这样。到此时，其他商业信息通常被电报发送到甚至是极为遥远的县份。^③

用军阀割据和暴力行为来解释也不恰当。如同我们所见到的那样，省政府急于把该省更多的地方归入到中心货币区中，正是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阶段的几个月里，同一个政府控制了济南和济宁。^④当然不曾有与之相抗衡的中心对西南部地区行使拉力，如同日本和奉天的那些中心对北部沿海施加的拉力一样。并且，当西南部的某些地区以动荡不靖——大概可以解释

① 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第 4 卷，第 234、1145~1147 页。

② 《山东全省财政说明书》，第 28 页；青岛守备军民政部铁道部：《东北山东（渤海山东沿岸诸港、潍县芝罘间都市）》，《调查资料》第 17 辑，第 462~465 页；*North China Herald*, Nov. 22, 1907, p. 455。

③ 济宁的情况，见青岛民政部铁道部《调查资料》第 3 辑（青岛，1918 年），第 88 页。在山东（济宁）修建的第一条电报线路是在 1881 年〔见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台北，1982 年），第 49 页〕，到 20 世纪 30 年代，全省大约有 70 家电报局（见中国交通部邮政总局，*Postal Atlas of China*〔南京，1933 年〕）。任何特定的县中第一封电报开始的日期通常被记录在这部工具书。

④ 关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情况，见万光炜《民国初年山东政党活动的内幕与省议会的丑闻》，《文史资料选辑》（济南版）第 5 辑（1978 年），第 32~42 页，及邵绰然《田中玉把持山东省议会选举的丑闻》，《文史资料选辑》（济南版）第 5 辑（1978 年），第 43~50 页。吕伟俊：《韩复榘》（济南，1985 年）刻画了 20 世纪 30 年代的省与地方的关系，并在第 72~73 页刻画了在此期间的数月里不同的人统治了济南和济宁。

高风险的贴水或解释产生货币运动的障碍——而声名狼藉之时，这些情况并未出现在济宁及其直接的周边中^①，而我们那些离谱的利率和比价资料，则大量出自这里。因为套利可以慢慢地消除这些差异，这里所有的情况正好是合理的；而这种情形没有发生，则可以用秩序的力量、而不是非秩序的力量得以最好的解释。

经济地理的政治：当地的公共财政

由于许多县政府禁止某些甚至非常小额的货币（通常是银币，有时是铜币）的“输出”，兑换率的差异得以持续下去。^②这种禁令既阻止了套利交易，也阻止了跨县贷借：如果很难从某县获得“硬通货”，那么，向这里输送资金就变得毫无吸引力。县政府设置的障碍保护了当地某些钱铺的利益和——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自己的收入。尽管农民手中通常仅有铜币，但税收仍然用银子来交纳。^③在19世纪，用于纳税的兑换比价变化幅度极大；在许多地方，其比率几乎为每两银子兑6000文京钱（按这里使用的单位，每个银元超过2100文制钱）。^④然而，19世纪90年代，沿海城市中的市场兑换率比前

① Esherick, *Boxer Uprising*, pp. 12~13.

② 如见 *North China Herald*, Nov. 10, 1905, p. 304, 及 Nov. 15, 1907, p. 394.

③ 对山东情况的英文概括可见 John Schrecker, *Imperialism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Germany in Shantung* (Cambridge, Mass., 1971), pp. 213~216.

④ 造成这些技术延伸对清廷和山东政府非常重要的19世纪晚期的形势和某些财政压力，见 Esherick, *Boxer Uprising*, 第170~172页的总结；关于20世纪早期的情况，见宣统元年九月二十五日巡抚孙宝琦的奏折，见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会议政务处档案，案卷号4802，全宗号573。

述的比率低一半；在 1896 年，山东巡抚试图把纳税用的铜银比率定为 4800：1，但这仍然约高于天津价格的两倍。^① 如果县政府在征税时能够执行这些高比率，然后再按市场兑换率来处置它们收取的铜币，就可以把它们实际收入翻一番。由于 1905 年以后银与铜的比价上涨，县政府通过阻止私自兑换而获得的利益有所下降，但这些利益仍然非常可观。

尽管高昂的兑换率被强加到了所有的直接税上，国家和省里的收入并未增加。各县征收了所有的税，并把固定数量的银子转送到省城。^② 通过操纵铜—银比价而获得的所有利润，全都落入了地方政府、不法的收税人（他们负责交上固定的税收份额，尽其所能地多收，并把差额装入自己的囊中）和/或当地的钱铺手中。山东巡抚甚至在 1903 年抱怨说，因为治理黄河需支付铜币，该省的收入由于用固定的银子来计量而承受了污蚀；他还认为地方上强加的换算率造成了抗税，并极大地阻碍了省里对亟须新税的征收。尽管 1901 年省政府下令税收必须按照市场兑换比价来计算^③，但各县仍继续通过限制货币的流动来设置并执行它们自己的“市场比价”。

因为对货币流动的限制还引发了内地各县周期性的货币短缺，发行当地的硬币或纸钞就成为十分有利可图的事了。当军阀时代（1916～1928）各种各样的省和“国家”政府印

① Esherick, *Boxer Uprising*, p. 171; 亦见注 48 所引的奏折。

② 如见 *North China Herald*, Nov. 15, 1907, p. 394; Schrecker, *Imperialism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Germany in Shantung*, pp. 213～214, 注意到了靠近青岛地区这种同样的现象。

③ 见武同举《再叙行水金鉴》第 10 卷，第 3748 页；《济宁直隶州续志》（1927 年）第 4 卷，第 14 上～下页；*North China Herald*, March 18, 1904, p. 575；《恩县志》（1909 年）第 4 卷，第 4 上页；宣统元年九月二十五日的奏折，见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会议政务处档案；《山东杂志》第 62 期（宣统二年六月十日），第 11 上～下页。

制废纸般的纸币为世人尽知之时^①，来自山东分会的劝业报告揭示了一场反对当地政府和商人发行的钞票——通常以铜命名，却没有任何支撑——升值的持续斗争^②（尽管某些军阀在枪口下发行其钞票，但当地的商人必须获准来发行另外的货币，以便让他们的钞票最初被人接受，而其后他们则通过套印以自肥）。这个问题在山东西部地区尤其尖锐，而在西南部及靠近直隶/河北和河南的地区则最为突出。在靠近沿海的地区，德国、日本、英国和（1917年以前）俄国的各种银币和纸钞涌入进来，填补所有的真空，几乎没有给当地的货币留下什么空间。^③

在银/铜兑换比价高得离谱的西南部贸易中心济宁，就存在一种最糟糕的“当地货币”问题。在1928年短暂地接管了该县的激进分子，显然没有处死地主或雇主，该市几名商会的领袖及1名著名的农村商人则由于他们——得到政府的允许——发行几近废纸的“利济钱票”而被捕。^④ 这起当地的故事始于1924年，在废纸般的省钞流入之前。用当

① 关于山东的事例，见 *North China Herald*, May 29, 1926, p. 390; July 2, 1927, pp. 1, 4; Oct. 8, 1927, p. 50。

② 如可参见《山东劝业汇刊》第4期（1921年1月），“各县实业状况”之十七“单县”；《山东劝业汇刊》第7期（1922年5月），“各县劝业报告”第32~33页（菏泽）；《山东劝业汇刊》第11期（1923年2月），“各县成绩报告”第20页（菏泽）；《山东劝业汇刊》第13期（1923年1月），“公牒”第41页（堂邑），第45页（临清）。关于冀西南的情况，可参见徐圃琪、张守谦《大名邢台两县视察概要》，《河北月刊》第1卷第3期（1933年3月），第4页。

③ 参见《山东杂志》第78期（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日），第14下~15上页；*North China Herald*, Jan. 30, 1909, p. 250。

④ 见唐承涛《祸国殃民的“利济钱票”》，《济宁市史料》第1期（1983年），第89~91页。

地以铜命名的钞票付给工人的酬金是该市罕见的大罢工中的一个起因。^①

经济地理的政治：超地方的 权威和政治自卫

滥铸钱币或滥印钞票、或人为的兑换比价中的潜在利润，给县——有时是省——政府以强烈的刺激，来限制越出其边界的货币流动。尽管如此，当地和省试图把它们的地盘封锁起来免受市场力量的影响，并非是愤激的行为。实际上，关于山东20世纪早期经济发展的著述，几乎全部是重商主义的语调。人们热衷于增长，这是因为它将有助于保护中国的独立，而不是因为它将促进个人的福利。^② 尽管按照相对的优势，许多政府的进口替代和出口激励项目收到了效果，但它们通常被认为是从外国人那里再次要求让步或是获得其他“自强的”目标——这个目标将肯定不会与同沿海经济完全成形的融合相协调——以作为逃避亏欠的方法。^③

这种对民族主义者的政治目标的强调，在20世纪早期中

① 吴国桂：《玉堂星火——济宁市玉堂酱园工运概况》，《山东工运史资料》第16期（1985年2月10日），第13页。工人们提出的用常规的银元而不用铜币付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

② 参见肥容在《山东杂志》第88期（宣统三年4月30日）上发表的无标题文章，第7下～8上页；竞生：《山东人民之负担》，《山东杂志》第89期（宣统三年5月15日），第8上～9下页，及《山东杂志》第90期（宣统三年5月30日），第7上～8下页；《农商公报》第1卷第5期（1914年12月），“政事”，第14页；林茂泉（20世纪20年代山东劝业会会长）：《文集》，无出版信息，1926年[?]，第2上～下、71上页。

③ 林茂泉：《文集》，第1上～7下页。North China Herald, March 4, 1922, pp. 576, 585, 提供了基于同样逻辑而做出的真正投资的事例。

国知识分子运动中起到了极好的作用。即使是 20 世纪早期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通常也把个人本能的解放视为中国在其独立斗争中的强国之路，而不是从本质上把它视为一种结果。^① 自利与干预货币流动的真正动机的混合物，在省政府阻止铜币输出山东的企图得到了展示。

即使在清末，作为金属的铜币有时也比作为钱币更有价值，这就导致了中国人和外国人均大量购买铜币并将其熔化掉。从 1904 年开始，中央政府试图通过稍微降低其铜币的成色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当省和地方铸币厂照此铸制的时候，形势很快失去了控制。^② 在鲁东胶济铁路沿线，德国银币很快成为标准货币，而俄国银币在山东北部沿海成为一种通用的货币；政府担心外国会控制其资金供应。^③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上的铜价（作为金属）急剧攀升。作为此时在山东的外国人群占主导地位的日本商人，更加踊跃地大量购买铜币以用于输出和熔化。由于此时日本人控制着青岛，因而，他们发现规避省府的限制比以前更加容易，而这项贸易很快在胶济铁路的沿线盛行起来。据驻济南的美国领事说，1915~1919 年之间，山东“几乎掠光了所有的铜币”，价值 2200 万美元的铜币被输出到了国外。^④ 这些从山东出口的钱币约等于所有中国铜币铸造厂年铸造量的 12% 或是在 1899 年的货币恐慌中全国

① 参见 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Mass., 1964), 及 Joseph Levenson,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1953)。

② 李贵勤：《清末币制改革及其失败原因的浅谈》，《经济史》1984 年第 2 期，第 129~137 页；参见中国近代货币史委员会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下册（上海，1965 年），第 958~961、970~975、984~985 页。

③ *North China Herald*, Jan. 30, 1909, p. 250; 《山东杂志》第 78 期（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日），第 14 下~15 上页。

④ Eduard Kann, *The Currencies of China* (上海，1926 年)，第 408 页。

漏损的总数。^① 外国对铜币的需求，把它们的价值进一步提升到了许多地方当局设置的标准之上，对县财政来说，使得限制变得极其重要。

省和中央政府既越来越担心这项贸易的象征意义——这些铜的某些部分被用来制造日本的子弹壳——也担心它会造成日本对这条铁路沿线资金供应的控制^②（失去对资金供应的控制，不仅有损于省政府的影响，而且也有损于它的收入——铸币是极为有利可图的事，而印纸币则更加有利可图^③）。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对这种套利行为的不满消失了，但从 1928 年开始，随着日本人经常地出现在远至泰安的内地地区，不满再次变得普遍起来。^④

尽管省属项目经常受到县与县之间限制货币流动的影响，但省政府仍颁发了许多限制硬币离开该省的命令，包括一项货币“出境通行证”制度；1930 年大部分铜币的出口遭到了禁止。^⑤ 20 世纪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省级层面上的国家构建者们被夹在了期望拥有一种全省统一的货币及不想在与更大国际市场的融合中造成分裂的愿望之间；与此同时，他们以加倍的努力来控制货币输出，他们（徒劳地）下令所有的县要执行由

① Lee, *Currency*, pp. 32~33; Kann, *The Currencies of China*, p. 525.

② 李贵勤：《清末币制改革及其失败原因的浅谈》，《经济史》1984 年第 2 期，第 134、131 页。

③ 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机关代号》（二）中的报告，1929 年 6 月，第 19 页，案卷号 110。

④ Kann, *The Currencies of China*, p. 526; *North China Herald*, Nov. 10, 1905, p. 304.

⑤ *Records*, reel 5, documents 4619097~134；特别是 4619130（转引自 *China Sphere*, Aug. 15, 1928）对内地贸易的范围的叙述；亦可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机关代号》（二）中的报告，1929 年 6 月，第 19 页，案卷号 110。

济南设置的对钞券兑换的比价。^①

我们几乎不了解货币的限制是如何操作的，但兑换比价的持久差异说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即使在1933年，某些相互接近的县仍然标出极为不同的比价。^②对美国在上海的公司来说，银一铜的兑换是一大难题，这些公司在全省把货物和银两预付给零售商，然后，零售商再以铜币返还；他们经常称无法获得银两来偿还，并经常从他们的还款中扣除货币造成的损失。^③当县政府不可能滴水不漏守住其边界时，在火车站和其他检查站，人们因货币受到了盘查^④；把守住铁路和水路可以控制住最大规模和最有利可图的套利途径（邮局汇款并不常见，且由于其使用政府机构，很容易被监控^⑤）。在济宁和附近中心地区比价的差异，远远超过了甚至用手推车运送铜币的成本，更不用说通过铁路装运了。

经济地理的政治：私人利益

尽管如此，士兵通常免于检查^⑥，而在更高的层面上，那

① Lee, *Currency*, p. 52; 后来对同样现象的重复叙述，见《山东财政公报》第6卷第4期（1935年1月），“命令”，第10~12页；吕伟俊：《韩复榘统治下的山东金融》，《山东史志资料》总第8辑（1985年），第58页。

② *Records*, reel 5, documents 4168841, 1927年12月1日 *Chefoo Daily News* 的复本。

③ 《寿光县志》（1934年）卷11，第12上~下页；《山东政俗视察记》，第362、371、832页。

④ Lee, *Currency*, p. 56.

⑤ *North China Herald*, Nov. 10, 1905, p. 304; Nov. 15, 1907, p. 394.

⑥ Clifton O'Neal Carey, "Narrative Account of Experiences in China," p. 8, 见 Clifton O'Neal Carey 文件中标为 "Letters, Sept. ~ Dec., 1919," 的那袋, Bentley Historical Librar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North China Herald*, Sept. 27, 1907, p. 720.

些有着政治背景的人，可以通过规避这些限制而老练地获利。一条货币是如何越过县际而流动的线索，也许可以从以前黄县货币运送公司提供的其他服务中搜寻到：护送鸦片，这需要广泛的官方关系、贿赂或足以藐视国家的武装力量。^① 据报道，在靠近鲁西南的河南开封，包括省财库人员在内的官员，他们避开了货币出境的限制；有人向汉口运出了满满一火车皮的铜币用于兑换。^②

一个发生在鲁西南范县极富有启发性的套取货币的故事，涉及了地位更低的参与者。1917年，大水灾使华北数以百万计的人一贫如洗。《北华捷报》向靠近最初的溃堤之处鲁豫直边界地区的西南部派出了一名记者。在这里，他发现日本商人对每斤（1斤=1.3磅）铜币付款0.155元，回到沿海地区的价值则约为0.167元。^③ 这项贸易此前就进入其他地区，但此时涨高了的大水使它得以向银两售价更高的上游进一步延伸。日本人正向该地区作第四次往返，

假如当地人有足够的空闲，来把他们的〔银〕元运往上游或内地，并把所有可以获得的〔铜〕币带到这个装运地点……去年，这位〔负责兑换〕的饶舌的〔村里〕头面人物说，这项贸易并没有进入到上游如此远的地区，并且官方阻止把铜币运给下游的收购者们，但今年收购者们自己来了，并“买通了一条公开的路”〔向官员们行贿〕，以

① *North China Herald*, July 29, 1916, p. 189, 叙述了靠近鲁西南开封的这种情形。

② 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第4卷，第1145页。

③ *North China Herald*, Oct. 27, 1917, p. 216；源于此处的重量对价值的变化率，被旨自美国驻济南领事的 Lee, *Currency*, 第32页中的数字所证实。

至于一切都变得容易了，而在水下泡了3个月的贫困的乡村地区，由于铜币贸易，现在正在恢复（强调部分是作者加上去的）^①。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几点。第一，在这个村子里的人们知道有这样的谋利机会，但通常被排除了。第二，官方的禁止及反面的贿赂决定了谁能够参与套购货币。第三，即使通过正式的政府得到这种机会以后，商人们也并不与单独的农民打交道，而是与把“他的”人民组织成工作团队的一个乡村头面人物打交道。第四，交易中的内地一方获得了最大的利益。如果日本人用0.155元购买的铜币在沿海真的价值0.167元，那么，减去其成本，商人们在范县与沿海之间所赚的净利不到8%。不过，那些把铜币带到更远的内地（用脚）的农民，约花费他们1000文的每枚银元，可以卖得1400文铜钱^②，在减去其成本（主要是他们的时间问题）前，利润为40%。另外，他们的40%的利润构成中，可能要少于那些官员及其亲信们在“正常年份”——当参与被更加严厉限制的时候——的所得。限制货币流动的地方官员，维护着一小撮受宠的地方贸易商——而不是带入银子的外面的商人们——的厚利。

割裂的市场及其分布：强大的势力

松散融合的货币和资金市场对财富的分配具有各种各样的影响。高昂的利率损害了腹地的债务人。在腹地县份银与铜人

^① *North China Herald*, Oct, 27, 1917, p. 216.

^② *North China Herald*, Oct. 27, 1917, p. 216.

为的高比价，把私人手中的财富重新送进了当地政府的腰包。高昂的兑换率损害了那些用铜来付账、但至少要用银子（或以银标名的价格）来买几样东西的人，并使得用银付账的人获利。最后，对货币流动的限制，使那些有关系绕过那些限制或行使当地货币的人——以损害其他所有人为前提——获得了利益。不过，确定是什么样的人参与到了这些群体中，是非常困难的，而把他们的利益进行量化则仍然难上加难。

高利率显然对腹地的债权人比对债务人有利。除了银行和典当，某些商店也是重要的放债者。在中心地区和北部沿海地带，经济作物——特别是棉花和花生——的收购者们同样是重要的贷款来源^①，但这些情形在西南部地区似乎一直很少见到。在济宁，那些兼作借贷机构的店铺，是那些出售现代商品——机制的线和纱、棉布、煤油、火柴和香烟——的商店。^②由于它们经常从那些处于资金利率较低地区的供应商那里获得信贷，它们可能属于高昂的本地借款利息的主要受益者。^③有趣的是，1942年的一份调查认为，棉纱和其他“洋”货的销售者已成为济宁的商业中坚，并记下了他们与谷物、皮革和羊毛商——当地产品的出口商，由于无法获得进口商相对便宜的信贷，反过来，作为贷出者，对当地的农民来说变得极其无关

① 参见《山东劝业汇刊》第12期（1923年3月），“公牒”第30页（关于鲁西北的一般情况）。

② 北京大学附设农村经济研究所：《山东省济宁县城を中心よせる農産物流通に関する一考察》（北京，1942），第94～100页。

③ 关于各种现代商品的供应者为其在济宁地区的代理人提供的信贷（既有现金也有商品），参见英美烟公司代理人 Frank H. Canaday 在 1925 年 5 月 20 日从济南写给 A. Bassett 信中的话，见哈佛—燕京图书馆 Frank H. Canaday 文件，第 17 卷，第 92、96 页；甚至其在济宁的代理人是“该市最富裕的人”，也提供这样的信贷（第 15 卷，1923 年 8 月 20 和 26 日的信）。

紧要——之间的一场尖锐的冲突。^①

这份调查没有描述这次冲突令人感到遗憾，但它却着实注意到了许多进口商也是当地的官员，而粮商则不是，与出口商不同的进口商与济宁两家现代银行的分支机构有着大量的业务往来。它还注意到济宁所有的出口公司规模很小，且大都很新。^② 在现代商品输入以前的日子里，济宁许多重要家族已经参与到了出口贸易中，而这些家族在 20 世纪并未消失。并且，它们似乎已经离开其旧的行业而转入到了更加有利可图的行业中，或把这类传统的经营活动和资产转移到了像济南或甚至像上海这样更大的都市中心。^③ 因此，尽管来自济宁的某些全国知名人物仍然参与该地区的出口业务，但进口商在当地政治中居于优势地位。

那时，济宁的这些进口商们似乎是有着政治背景的寡头卖方垄断者们的典型，他们可以获得我们正在研究的廉价信贷。另外，早期的史料也说明济宁是这类勾结的合适的中心。我们将会一再述及济宁顶级商人与官员之间的这种相互勾结的关系，但在这里作一介绍是很合适的。

远在晚明时，济宁的大商人与官员之间就有着密切的关系，部分原因是基于征收运输税和查禁“走私”（逃避这些税收）方面的合作。^④ 在大运河贸易处于高峰时期，济宁和临清

① 北京大學附設農村經濟研究所：《山東省濟寧縣城を中心よせる農産物流通に關する一考察》，第 12～13、10、31 页。

② 北京大學附設農村經濟研究所：《山東省濟寧縣城を中心よせる農産物流通に關する一考察》，第 26～27、68～70 页。

③ 参见 David Buck, *Urban Change*, pp. 28～29, 105, 139。亦见海山重印《玉堂春秋——济宁市玉堂酱园简史》（一），《济宁市史料》第 1 期（1983 年），第 64～65 页。

④ 见景甦、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改版后的证据；最初版本由 Endymion Wilkinson 节译为 *Landlord and Labor in Late imperial China*，这将是本书此后征引的书，但页码将参考修改版），第 27 页。

(鲁西北/黄运北部的主要港口)的重要性大致相埒；不过 18 和 20 世纪政府对逃避关税的抱怨，所说的使用陆路交通和边路的商人是从临清而不是从济宁偷漏。^① 还有部分原因是地理因素^②，但它也是能永久独立存在的：商人与政府之间的紧密勾结在济宁成了规范，而不像临清的捉迷藏游戏。另外，济宁相互勾结的商人和官员们对源于或进入该市腹地的商业处于近乎垄断的地位。本章基于西南地区通过济宁与外界进行的大部分贸易所描述的这种操纵，确如其所作的那样。^③ 临清没有形成这样的垄断，既是由于其地理因素，也是由于缺乏极为密切的官商勾结。当济宁的大片腹地仅能达到这个港口之时，临清的大片腹地也能延伸到大运河上的德州，或在 1902 年以前延伸到聊城。而当 20 世纪的济宁成为鲁西南大多数地区最近便的火车站（它是从济南向西支线的终点）时，临清却从未建立起一个火车站。

由一个家族所拥有的济宁最古老和最大的企业——玉堂酱园——也很能说明问题，这个家族自 18 世纪以来一直有人做官，19 世纪末，在清朝廷中还有位成员。^④ 尽管这家酱园在

① 雍正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田文镜的奏折，见国立故宫博物院文献编辑委员会《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台北，1978 年）第 11 册，第 649～651 页；亦见 Madeline Zelin, *The Magistrate's Tael* (Berkeley, 1984), p. 209, 是另一次同类型的抱怨。

② 卫河和大运河对临清的季节性影响（如，低水位和结冰）促进了陆路搬运业——它可能轻易地适应对进口税的逃避——的增长。参见 *North China Herald*, Nov. 2, 1906, p. 252, 及《临清县志》（1934 年）卷 7, 第 21 下～22 上页。

③ 关于济宁居鲁西南贸易的统治地位，参见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 2 编，第 124 页、151～202 页。

④ 海山重印《玉堂春秋——济宁市玉堂酱园简史》，《济宁市史料》第 1 期（1983 年），第 55～56 页。

1776 年就已创立起来，但在 1875 年以后才首次大规模地参与金融活动，那时通商口岸的发展已开始为这里所讨论的套利活动提供了可能性。在这个阶段中，这家酱园从外商手中贷款购买了几家典当，并与当地被允许开始发行它们自己钱票的钱铺建立了关系；这些新业务比它们原来食品加工业的发展要快得多。^①除了拥有大部分玉堂股份的这个官僚家族外，济宁的许多其他官员也把他们的教育信托基金投入到这家酱园中。^②另外，济宁最大的慈善机构，其首脑人物包括该市最重要的商人和士绅家族，把 80% 以上的捐款及该市主要典当和商号的款项存入到这家酱园中，而把不到 20% 的捐款用来投资土地。这并不仅仅是熟悉和方便的问题：由于这家公司对存入的资金所付的年息在 8% ~ 12% 之间（月息为 0.67% ~ 1%），因此这些存款在借贷利率大大超过月息 2% 时，这是该市的士绅们一项极为有利的自营业务。^③对从沿海、甚至是从中心地区获得廉价资金的把持，同样提供了广阔的赢利区域。

尽管这些许多有着官方背景的商人是进口商，他们这些活动场面必须与中国列宁主义的评论者所说的“买办”区别开来。^④

① 海山重印《玉堂春秋——济宁市玉堂酱园简史》，《济宁市史料》第 1 期（1983 年），第 48、56、58 页；第 2 部分见《济宁市史料》第 2 期（1984 年），第 99 页。

② 海山重印《玉堂春秋——济宁市玉堂酱园简史》，《济宁市史料》第 1 期（1983 年），第 56 页。

③ 《济宁直隶州续志》卷 5，第 10 下~11 上、13 下、21 下页。

④ 这个观点的一般来源是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 年）之类的文章，见《毛泽东选集》（北京，1971 年），第 11 页；例如，广为人知的历史著作见 Harold Isa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1951), 第 6~7、10 页；Marie-Claire Bergère, “The Role of the Bourgeoisie,” in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ed. Mary C. Wright (New Haven, 1968), 第 236~237 页。

他们所卖的货物，通常仅因为是机制品和被运入到该地区这个意义上才属是“洋货”；许多货物是在青岛、天津或济南生产的。一些像玉堂这样既输入又输出货物的企业，其净余额无以得知。^①所有这些企业提供的最货真价实的外国款项是来自通商口岸的现代银行和供应商们（有时是直接地，更常见的是随着干涉的步伐）给它们的信贷。尽管如此，问题并不在于它们把这种有用的产品运到了内地，而在于它们像一家卡特尔一样，以一种比县际信贷交易不被限制时可以获得利率要高的价格，提供较少量的贷款。并且，因为存在着前文所述的货币套利，当地对外借贷的渠道，不是将要成为或是事实上的外部借贷者，这样的渠道从那里几乎不能获利。与它们打交道的通商口岸企业自然不会觉得这些人是有用的。^②

当然，其他人也受到这种利率的影响。一个极具战略意义的群体——农村收税人，在鲁西南，他们主要是衙吏和村中头面人物——也从控制外来信贷的流动中获得利益；他们经常因纳税人需缴款而给他们借钱，并且，他们通常是真正的铜币征收者。^③我们尚不清楚这些收税人自己是从何人处——如果是所有人的话——贷借的。尽管如此，如果他们是与有着政治背景的商人和官员勾结起来以强制执行人为的货币比价的话，他们向那些人借贷，并很可能以让其分享套利利润的利率借给他们，也就顺理成章了。

① 海山重印《玉堂春秋——济宁市玉堂酱园简史》，（二）《济宁市史料》第2期（1983年），第91~92页。

② Lee, *Currency*, p. 56.

③ 见光绪二十八年一月三十日监察御史高熙喆的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八年，第28~29箱。

割裂的市场及其分布：普通百姓

我们现在来看更大的群体，大多数农民、劳动者和没有特权的商人是纯借入者——并因此是限制资金移动的受损者。不过，某些家境殷实的农民和商人是净贷出者。如果他们不能从当地那些接近其他地方能够借到的高利率、并知道巨大的广阔市场中获利时，任何净贷出者都从高利率中有所获益。这不仅仅适用于现金借贷：那些毋须在收获时期就立即卖出其谷物的农民，可以进行储存，并赚取该地区高昂的利率。我所知道的惟一一项对鲁西南一个村庄（该村靠近济宁）的研究，说明该村 8 个最富裕的家庭（占 1/50）与其他农民相比，更多的是在收获后数月出售他们的粮食，以获得略高于平均价格的利润，但证据很难找到。^①

由于政府过分地榨取，被榨者们是很容易确定的：纳税人。获益者是当地的政府、征税人和银钱兑换者，而不是更高级别的政府。尽管如此，他们获利的技巧和范围尚不清楚。大多数地方政府的支出是本地的，而那些通过操纵兑换比价来征收额外铜币的人，不得不把它定成更现实的比价以实现其利润。至少鲁西南的一些县在当地获取银子似乎是很困难的事。^② 因此，地方政府要么不得不把它们铜币装运到其他地方来交换它，要么对于那些在当地从事收购的人，强行把铜币的价格定得高于政府计算税收时所定的比价；它们很可能把这两种策略混合起来使用。

① 北京大學附設農村經濟研究所：《山東省濟寧縣城を中心よせる農産物流通に関する一考察》，第 86、92 页。

② *North China Herald*, Nov. 15, 1907, p. 394.

在某些情况下，受惠的钱铺或商店从操纵兑换比价中获得了益处，尽管它们为这种特权向当地的官员们支付了钱财。在另一方面，政府试图强迫本地的钱铺以一种使政府获取所有利润的比价来兑换其资金。^① 由于后来的某些问题导致了钱铺成功的罢工^②，商人们似乎具有巨大的讨价还价势力，但这个地区依旧昏暗不明。地方政府与征税人对所获利益的分成则更加模糊不清，因为征税尽管很普遍，但却是不合法的。

这些收益对地方政府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即便他们的精确范围仍不清楚。这种重要性的一种衡量，是甚至在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本可以用银来纳税时，地方政府也牢牢地抓住货币兑换的机会不放。鲁西南的几个县明确说明了其百姓并没有逃脱要求用银计税、用铜币纳税所造成的这些榨取。^③

因此，人们所嫌取的货币对于其作为纳税人来说，并无差异。但它却着实决定了他们在进行私人交易时，从银子过高的定价中是得益还是受损。由卜凯进行的一项显然没有完成的调查指出，在山东的12个地区中，有5个地区的农民在售出他们的商品时，被付以铜币，而在4个地区仅接受铜币，但我们并不知道它们是哪些地区。这些地区最可能是那些种植高粱、

① 在1907年11月15日的《北华捷报》第393~394页中所描述的那种情形将是一个案例，在这里，政府本身也很难获得银子。德国观察家把这种制度视为在青岛附近实行，也说明了地方上对铜币的收购没有波及到济南附近。参见Schrecker, *Imperialism*, 第213页转引的征税者及其获益亲信的话，但县级地方官仅是得到了固定的银子。总的说来，可参见山东省议会对钱铺的决定，见《山东杂志》第62期（宣统二年六月十日），第11上~11下页。

② 见《山东杂志》第77期（宣统元年10月1日），第14下页。（这里与上一注脚所引的《山东杂志》第62期相比，至少有一处期数或出版年月有误。——译者注）

③ *North China Herald*, Nov. 15, 1907, pp. 393~394.

粟和其他作物的地方，仅存在着接受铜币的地方性市场。像花生、棉花和小麦之类注定要卖到都市或沿海市场的作物，似乎通常是用银来支付的。^① 有时使用什么样的货币就是一个争论的话题。而各种各样的资料间接地说明了都市中的商人，特别是在1904和1935年的币制改革期间，把价值无几的货币付给鲁西地区的农村百姓时，农民们并不总是缺乏信息和还价的能力。^② 当铜币在开封（在河南，不在黄运范围内，但仍然靠近鲁西南）创新低时，许多农民拒绝出售他们的粮食，除非付银子，这给本已饥荒的城市施加了沉重的压力。^③

小商小贩们，特别是劳动者们，依赖于所赚取的铜币。不论是都市还是乡村的搬运伙和日工们，基本上总是被付以铜币。^④ 鲁西南极少的工厂工人被付以铜币，或者，更糟糕的是，被付以在商店中要大大打折的以铜命名的纸券。^⑤ 尽管如此，这些人基本上不缴纳直接税，因此与那些被付以铜币的农民相比，他们受到的损害可能要小一些。

把银子定价过高，可能对那些投资购买资本货物的人的影响，远过于投资日常消费商品的人。像香烟或面粉之类小额出

① “输出”作物的价格几乎全部以银报价，但付款并非总是以铜币来结算。参见《北华捷报》1916年11月11日，第307页，泰安的花生以铜币来报价，但仅仅1个月以后（《北华捷报》1916年12月23日，第635页），解释说参照卖出去的数量巨大的花生，那里的银价相对要便宜。假设存在着兑换比价的差额，沿海购买者可能向腹地的生产者支付银子。

② *North China Herald*, Dec. 28, 1929, p. 507; 山东巡抚杨士骧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二月十六日的奏折，见“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三十三年，第49～50箱。

③ *North China Herald*, Sept 9, 1916, p. 512.

④ 关于搬运伙的酬金，见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第4卷，第234、250、260页；关于工厂工人和建筑业中日工们的酬金见 *Records*, reel 37, pp. 4660213～219, 4660230。

⑤ 吴国桂：《玉堂星火》，第13页。

售的商品，通常以铜币出售；像土地或牲畜之类的大宗交易，以银来定价（一个明显的例外——有份资料显示济宁的地价是用铜币来定的——再次凸显了鲁西南的特殊性）。^① 不过，即使对这种普遍性来说，也有一些例外。例如，政府对盐的垄断就需要银子。20世纪30年代济宁的一首民谣，取笑一个傻瓜不知道铜元（铜币中的一种）既不能买盐、又不能买粮，而只好用来听当地的戏曲（即被浪费掉了）。^② 而在兑换比价最离谱的地方——主要是在西南部地区——所有这些影响是最为强烈的。

割裂的市场和区域经济形态

这些极不完整的市场使得中心地区、尤其是西南部地区，与其本应让资金更加容易地流动时相比，资金更加稀缺，并更加昂贵。因此，即便这些区域中的某些项目像北部沿海那些进行得很顺利的项目那样得到了资金，但它们却从未得以施行。在所有的可能性中，中心地区那些本可以产生出口的项目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而那些本应在当地盈利的项目则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西南部，所有项目均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与西南部不同，中心地区通过青岛有它自己与国际经济的通道。不过那个港口一直被一个企图垄断其外贸的列强所把持

① 如面粉以铜币来定价，见《北华捷报》1911年5月20日，第484页；1915年1月20日，第56页；1918年7月13日，第82页；1923年7月14日，第93页；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第4卷，第260～261页、315～316页；关于香烟的定价，见F. H. Canaday Papers, vols, 12, 15, 17各处（Canaday记录了他所到各镇的铜币波动情况）。关于牲口的定价，见《北华捷报》1914年7月18日，第235页。一个用铜币来对土地报价的例子，见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第4卷，第315页。

② 董汰生编《山东歌谣集》（济南，1933年），第35页。

(先是德国，后是日本)，而信贷和银两均没有烟台、威海卫或上海那么便宜。^① 这个地区的西北部与天津也有联系。^② 中心地区向东北送出了某些货物和人口，但与北部沿海相比，却得到了较少的汇款；这些汇款在北部沿海和直隶的同类地区似乎把利率推到了特别低的水平。

某些外部资金的重大渗透，确实到达了中心地区，并有助于该地区的经济。我们将要在下一章来阐述这些渗透中的一种：改良棉种，这是在青岛和天津纱厂的资助下引进的，后来成了一种依靠它们的资助人经常预付营运资金的作物。^③ 我们几乎没有关于这类贷款利息的资料；有时这些收购者/供应者建立了地方的垄断，很可能让他们对预订的庄稼剥夺得过多。有一个地区，已经根基稳固的日本购买者，他们曾对当地的棉花预付了部分资金，甚至企图用鸦片而不是用钱物来支付余款。^④ 某些根基稳固的烟叶收购者也是可诅咒的债权人。^⑤ 但总的来看，外部

① 关于青岛的利率，见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5编，第90页；《胶澳县志》（1928年），“食货”第85～88页。

② 例如，关于天津在鲁西北棉花（该地区最多的作物）和花生贸易中的枢纽地位，见程守中《山东考察报告书》（济南，可能刊于1934年），第6～18页。

③ 《工商半月刊》第6卷第3期（1934年2月1日），第108页；《农业周报》第2卷第48期（1933年11月27日），第766～767页；《农业周报》第5卷第27期（1926年7月16日），第581页；《山东劝业汇刊》第4期（1921年1月），“公牍”第1～5页；松崎雄二郎《北支经济开发论：山东省の再认识》（青岛，1941年），第478～479页；满铁：《山东の棉产物》（天津，1942年），第47～54页；神户正雄编《远东经济研究》（东京，1942年）第1册，第118～120页。

④ 《山东实业公报》第3期（1931年9月），“训令”第27页。

⑤ 如可参见 Sherman Cochran, *Big Business in China: Sino-Foreign Rivalry in the Cigarette Industry, 1890~1930* (Cambridge, Mass., 1980) 第144页中所叙述的田群权 (Tian Qunquan) 的事例。

资金的流动，意味着这些农民们获得了较为便宜的信贷，并且，要确实好于那些为更加封闭的市场而种植的农民们。

经济作物的种植使得中心地区避免了西南部地区那种频繁的银币短缺。就像 1933 年的情形那样，大多数中心县份在其境外卖出的货物比它们从其外面所购买的多；因此它们本应留有足够的银币来纳税和偿还那些确实存在的各种跨县贷款。我们没有理由期待中心地区的通货紧缩或与北部沿海地区明显不同的物价分流，与我们将要见到的西南部地区形成对比。

另外，中心地区与北部沿海之间持久稳固的利率差异，是该地区从沿海和东北发展中所获得的有限利益的强大显示器。中心地区与沿海的半融合可以被比作当代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无数项目，为将要到来的外国投资者提供的回报，高得足以令人垂涎，但由于以本地货币结算的利润无法被转换或移交，投资者们主要对那些生产出口商品的项目感兴趣。同样，20 世纪早期的中心地区获得的外部贷款，是用于像改良棉花这种为了输出的项目，而不是用于可能赚更多的钱——但仅是当地的——的项目。

山东省和地方政府通常听起来像重商主义者，它们强调作为经济目标的支付平衡和“独立性”。由于这些目标与他们的关系似乎比确实提高本地消费水平的关系更大，他们本可以满足于没有外面的贷款进入中心地区，除了那些资助输出，因而减少了、而非增加了该地区债务的贷款。尽管如此，这种情形并没有极大地提高这个区域的增长或福利。新资金的渗透受到中心地区特有的输出范围——基于一种有限的和脆弱的交通网络——的限制。^① 进出这个地区的资金流动，与比资金本身更

① 如见 *North China Herald*, June 10, 1916, p. 571; “Shantung Groundnut Trade,” *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 9: 29 (Sept. 11, 1926), p. 157。

难储存和移动的商品流动相比，仍然更具依赖性。^①

西南地区受到的损害要多得多。即使在这里，一些外部的资金也流入了进来。两家济宁的工厂部分地得到了外来者的资助，尽管这是源于特殊政治条件的非同寻常的情形。^②而且我们将不奢望来自其他地区的投资者因嫁娶丧葬之类的事，来为鲁西南单独的农民发放许多零散的借款。^③即使没有货币限制，获得借款人的信息以及还款操作上的困难，也本应让远方的借出者们望而却步。这种人所不欲之事在像菏泽和单县这样的混乱地区，将显得特别的真实。尽管如此，济宁及其直接的外围地区还不是特别的不稳定或是土匪充斥的地区；^④它们的信贷和货币问题与西南部的那些地区一样，这是由于它们具有相同的政府政策。

西南地区最惊人之处——除了利率和兑换比价的差异本身——是生产和市场缺乏外部的信贷，甚至由那些来自较低利率地区的公司所收购的农作物也缺乏这样的信贷。如前所述，在山东的中心地区，那些种植棉花、花生和烟草的人经常从那些购买这些农作物的人那里获得贷款。这些购买者通常依次从

① 1929~1936年，山西省市场物价与重量的比率，以“沙”(sands)来计算，这应该与同时代的山东不会相差太大，(疑有漏——译者注)“调查”第64页。某些商品(棉花、煤油和食用油)实际上比每单位重量的铜币所具有的价值更贵，但大多数农产品的价值相对较低，而所有商品都远没有银子的价值高。

② 这种情形在博士论文第1章，注129中做了详细的讨论。

③ 这些属于全华北农民借贷最普遍的原因，在我所了解的对鲁西南的乡村研究中，它们被用来作为农民急需现金的主要原因；见北京大学附设农村经济研究所《山东省济宁县城を中心よせる農産物流通に関する一考察》，第93页。

④ 如，参见 Rolf Tiedemann, “The Persistence of Banditry: Incidents in Border Districts of the North China Plain,” *Modern China* 8: 4 (Oct. 1982), p. 397.

他们向其出售这些作物的更大的商人那里得到资助，并以此类推，形成一条向后通向通商口岸和远方的链条。^① 在紧挨着鲁西南的苏北，小麦种植者们从依赖银行贷款的商人那里得到资助，其资金的源头是在上海。^② 尽管鲁西南比该省其他余地区的输出要少，但大量的小麦、大豆及其他产品，从该地区的其余地区汇集到济宁，并被装运到济南和沿海口岸。^③ 即使在军阀混战和土匪横行的最坏年月，这项贸易似乎也一直没有中断；因此，即便风险因素在更为遥远的西南地区影响了零散的借贷，它们在这里则不成为问题。

尽管如此，一份由农工商部在 1921 年所作的报告中提到，金融是济宁一件尤为严重的问题，是一个正在阻止这个地区增加其农业出口的问题。^④ 20 年后，一份关于济宁及其附近村庄的调查明确地叙述了在各个层次的贸易中，对生产和购销的贷款是来自“下面”而非“上面”。被调查的村中农民通常向其村中的同伴借款。^⑤ 贫困农民把村中的小麦和豆子运到最近的集镇上，或者偶尔也直接运到济宁。其他村民为其行程提供基本的资助；在这位售卖者回来后，产品的所有者就拿到了钱。对济宁市场的描述，强调了这些小班子返回其村庄的心情是多么的迫切；这种急切的心情弱化了他们的讨价能力，而这又可能

① 如，参见“The Peanut Trade of Tsingtao”，*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 11: 348 (Oct. 22, 1927)，pp. 213~214。

② 如，见陈伯庄《小麦及面粉》（上海，1936 年），第 52 页。

③ 北京大学附设农村经济研究所：《山东省济宁县城を中心よせる農産物流通に関する一考察》，第 4~8、47 页。

④ 《农商公报》第 85 期（1921 年 8 月），“政事”，第 57 页。

⑤ 北京大学附设农村经济研究所：《山东省济宁县城を中心よせる農産物流通に関する一考察》，第 13、106 页；这种模式被 John L. Buck, *Land Use in China: Statistical Volumes* (New York, 1982) 第 404 页中的数据所证实。

是部分地出于那些迫切需要现金来偿债纳税的生产者们的压力。这些小班子很少向济宁的粮店借款，并不对农作物预先放款。^①

其他潜在的资金来源也不能缓解西南地区农民对当地（主要是村中的）信贷的依赖。济宁的粮食和大豆/花生油企业非常的小；在32家趸售的油类购买者中仅有3家、而37家粮食购买者中仅有1家的资本达到1000元。^②他们是获得和分发大额信贷的贫穷候选者，而他们并不能从济宁的两家现代银行中得到借款。^③不到庄稼收获完，那些购买西南地区农作物的泰安、济南和其他商人是不会到济宁来的；在那时候，他们确实从现代银行的分支机构那里借得了款项，但这对他们来说已经太晚了，以至于无法把这些款项作为信贷发放给生产者们。^④即使在他们的农作物被企业加工、这本该是借到更加便宜的资金的时候，西南地区的农民和当地的商人，也缺乏获得比从当地借来的款项更便宜的信贷来改善金融的机会。^⑤

由于即使是经济作物的生产者也无法吸收便宜的信贷，鲁西南承受着频繁而又严重的银荒打击。这个地区所做出的反应，部分地是通过凑合着使用比该省其他地区要少的现代部门的产品。据1933年对全省的统计，西南诸县所“输入”的外

① 北京大學附設農村經濟研究所：《山東省濟寧縣城を中心よせる農産物流通に關する一考察》，第33～40页。

② 北京大學附設農村經濟研究所：《山東省濟寧縣城を中心よせる農産物流通に關する一考察》，第26～27、68～69页。

③ 北京大學附設農村經濟研究所：《山東省濟寧縣城を中心よせる農産物流通に關する一考察》，第13页。

④ 北京大學附設農村經濟研究所：《山東省濟寧縣城を中心よせる農産物流通に關する一考察》，第68页。

⑤ 北京大學附設農村經濟研究所：《山東省濟寧縣城を中心よせる農産物流通に關する一考察》，第47～48、65～72页。

来商品远比该省其他地区要少得多：^①西南部的 17 个县（人口达 5338260 人，输入 10673020 元）人均均为 2 元，与之相对的中心地区的西北部（黄运的北部）同样遥远的 18 个县中（人口 3388396 人，输入为 19498900 元）人均均为 5.75 元。事实上，大多数西南县份的输入如此之少，以至于它们拥有不算太少的贸易顺差。不过，大部分这类顺差的关键所在是与济宁一道运营的大量顺差；而尽管济宁重新输出了它从西南其他地区所输入的大部分商品，但到目前为止，它在山东所有县份中有着最大的逆差。因此，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西南地区承受着大量的贸易逆差。^②

由于贸易逆差、纳税及几乎没有外来的信贷，西南地区极大地依赖于一种不同的输出——劳动力，特别是去东北的劳力。尽管山东或河北部分（这两省共占东北移民的 95%）离东北都并不远，但鲁西南地区每年要向那里送出成千上万的人。^③ 1934 年，一项对西南 16 个县的研究估计，由于日本侵占东北而中止移民之后，它们每年损失的汇款达 400 万元；^④ 大约与此同时，寄向山东和河北全部 215 个县的东北汇款估计达 3000 万元。^⑤ 一份资料显示，因东北的封锁，仅济宁每年就损失 300 万元。^⑥ 1931 年以前，这些东北汇款遮

①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 2 编，第 151~201 页。

②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 2 编，第 165~189 页，列出各县的数据，济宁的数据在第 167 页。

③ 关于估计数字，见东亚学所《山东湖沼群地帯の地域调查》，“报告”之 14，c 级，第 158-D 号，第 127~129 页基于 1933 年的数据。

④ 《鲁西各县农村经济现状》，《农村经济》第 1 卷第 11 期（1934 年 9 月 1 日），第 75 页。

⑤ Gottschaung, "Migration," pp. 137~138.

⑥ 《鲁西各县农村经济现状》，《农村经济》第 1 卷第 11 期（1934 年 9 月 1 日），第 76 页。

掩了预料之中的融合极差的货币和信贷市场的影响。通常说来，在出现贸易逆差的地区和那些有顺差的地区之间将会出现价格的两极分化，除非资金通过对贫穷地区的净投资流动而进行再循环。因此，没有出现这种两极分化，就意味着存在着融合了的资本和货币市场，但这里的情形与这一观点截然相反。无论如何，这里的情况由于一个不同的原因——1931年以前，来自东北打工者们的汇款弥补了山东大多数县份所拥有的贸易逆差，至少在我们中把它作为税收中的因素来考虑以前——物价的两极分化没有出现。^① 因此，与通货紧缩或物价分化不同的是，1931年以前西南部的货币问题在高昂的利息、相当的节俭和大量短期及永久性的移民中体现了出来。

政治和财政战略可能一直迫使西南地区的人民过着没有煤油灯和机织布的生活，并使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到东北而不是在家乡附近打工。并且，就像我们在下一章应该见到的那样，西南地区乡村精英们受政治激励的行为，有时还阻止了输出的增长。^② 不过，这种经常被当地和省政府的官员们所阐明的类似于重商主义的目标，只有在东北保持开放的时候才是适宜的。在对资金供应保持足够的控制以操纵兑换比价和利率时，地方政府及其盟友通常获得足够多的银子来完成对更高级别的政府所承担的使命。

这种精致的平衡在1931年以后崩溃了。1931~1934年之间，上海小麦——鲁西南最多的作物及主要的输出品——的价

①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2编，第156~201页列有贸易数据；亦见《鲁西各县农村经济现状》，《农村经济》第1卷第11期（1934年9月1日），第75~77页。

② 这样的一个事例——西南地区乡村头面人物不愿配合该省其他地区非常成功的新棉种的推广——在第2章中做了讨论。

格下跌了 40%。^① 鲁西南的情况更加糟糕。1934 年西南地区报告物价走势的 13 个县中，1 个县报告小麦和土地的价格下跌了 50%；4 个县报告下跌了 60%；1 个县下跌了 75%；而 7 个县报告下跌了 80%。^② 济宁银钱的价格（以铜币来计，它可以作为所有用铜币买卖的货物的代表）也显示出在西南部与其他地区之间出现了价格的分化。在从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令人炫目的高度退下后，价格在 1930~1933 年稳定下来，但然后又飞涨起来，在以后的两年里，济宁比我们拥有资料的其他任何地区涨得都要快。另外，这种价格分化发生在那些年里省政府在西南地区影响最强大的时候。^③

至少，在东北汇款枯竭的 3 年后，银荒开始了，在西南地区为信贷和硬币支付的高利率并没有引进外来的资金。因此，这个地区的相对“独立性”成了极为虚弱的经济孤立。与之相比，北部沿海县份——它们在 1933 年也有商业贸易逆差，甚至在传统上从东北获得了更多的汇款——在东北被封锁后，却似乎并没有出现硬通货的短缺；^④ 即使处于世界范围的萧条时

① 吴承明：《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内市场》，《历史研究》第 168 期（1984 年 4 月），第 115 页。在清末，作为西南地区的输出物，鸦片可能近似于小麦，但到 20 世纪 20 年代，这类市场的大部分让给了在日本人保护下所输入的吗啡和海洛因。吕伟俊：《韩复榘》，第 211 页。见美国北京代表团在 1919 年 1 月 24 日和 4 月 29 日给国务卿的信，加上 *Peking Leader* (Dec. 21, 1918), *North China Daily News* (Dec. 17, 1918) 及 *Chinese Affairs of China*, 1910~1929, reel 114 的文章复本；访问记录，聊城、德州和临清，1985 年 11 月。

② 《鲁西各县农村经济现状》，《农村经济》第 1 卷第 11 期（1934 年 9 月 1 日），第 75~77 页。

③ 此时政府在鲁西南地区的主动行为包括万福河上的一项巨大的治河工程，一项当地政府改革的大规模实验（它有自己的刊物《山东省县政建设实验区公报》），及梁漱溟的菏泽项目（第 2 章中做了扼要的论述）。如见吕伟俊《韩复榘》，第 222~237 页。

④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 10 编，第 189~201 页。

期，这个区域对更大市场的继续参与，似乎引入了足够多的资金来填补这个差额。

结语：割裂的市场与国家构建

这些政府行为的经济效果反过来影响到了国家本身。山东的地方和省里的官员们等通常强调减少输入而增加输出作为经济目标。极少有人去关注仅是在当地流通的商品。这种对贸易平衡的强调将在全书中显著地表现出来，影响了关于农业、林业、交通、治水和其他事务的政策。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官员们的经济倾向性具有很深的地方主义的色彩：省政府和许多县政府均试图把它们管辖范围变成在经济上有用的单位，它们可以于此控制像货币之类的东西而不会受到更加广阔的市场的干预。

许多政府的政策目标是更大的经济融合。在像道路建设之类的某些事务上，做了重要的先期工作。^① 20世纪20年代，县机构在停用所有由商人发行的地方钞券上对劝业会让步，但它们确实企图集中发行权，通常是在县商会中。^② 在20世纪30年代，省政府确实认真地尝试清除地方纸币，但至少在鲁西地区收效甚微。^③ 尽管如此，这些努力的目标通常是对那种

① 县际公路建设的报告可见《山东政俗视察记》。

② 如，参见《山东劝业汇刊》第4期（1921年1月），“各县实业状况”第17页（单县）；第7期（1922年5月），“各县劝业报告”第32～33页（菏泽）；第11期（1923年2月），“各县政绩报告”第20页（菏泽）；第13期（1923年4月），“公牍”第41页（堂邑）、第45页（临清）。

③ 罗子为：《邹平私钞面面观》，《乡村建设旬刊》第4卷第29期（1935年7月），第26～31页；《山东财政公报》第6卷第3期（1934年12月），“命令”第41页；《山东省县政建设实验区公报》第14期（1935年11月27日），第6～7页；第23期（1935年12月15日），第3页（原文未标页码——译者注）。

特定的政府层面的集中控制；控制没有被设想通向更大的政治单位或更广阔的市场。山东政府同时做出的在省内统一货币兑换标准及限制货币输出的努力，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板。

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些活动并没有为山东的经济增长带来最好的结果，特别是在最贫困的地区更是如此。但政府是如何影响自身的呢？

这个问题将在贯穿本书的不同的表象中重现出来。尽管如此，某些通常的框架值得在此一提。省政府在保护其货币事务中的特权来对抗更广阔的市场方面获得了一些成功。当它无法控制在烟台或胶济铁路沿线地区与外界的货币交易（该省两个最富裕的地区）时，它在该省其余地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因而保护了它自身的自治和收入。尽管如此，沿山东其他铁路线，在泰安出现的日本铜币收购者及政府在 1928 年以后对这些活动警告的增加，说明该省对资金市场的控制，即使在中心地区也一直是有所争执的。^①

其间，许多县政府即使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也能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它们以此来增加地方上的收入，而不是增加省或国家的收入。甚至中心地区的邹平县也置许多省里的规定于不顾，直到它成为一个由外人来建设的模范县后，才禁止当地的纸币，并采用标准的兑换比价。^② 1935 年全国的货币改革在战前来得太短促，以至于我们无法评价它在山东的成效，但在 1937 年，该省的中心地区与沿海的货币及资本市场仍旧仅保持

① *Records*, reel 5, documents 4619097 ~ 134, esp. 4619130 (引自 *China Sphere*, Aug. 15, 1928), 叙述了向内地的贸易扩张；亦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机关代号》(二)中的报告，1929 年 6 月，第 19 页，案卷号 110。

② 罗子为：《邹平私钞面面观》，《乡村建设旬刊》第 4 卷第 29 期（1935 年 7 月），第 26 ~ 31 页。

着有限的通路，而西南地区也一如既往地不是与沿海地区就是与中心地区的经济体系保持着松散的联系。由于不愿意接受与更大市场的融合，该省也无法对其自身的制度进行全面的整合。

这种失败似乎并没有极大地降低省政府的收入。政府从更大的增长中所获得的回报，本应是慢慢到来的。西南地区不像是一个增加了更多收入的地区：它很贫困，当地的税收太高，而省的控制漏洞百出。^① 尽管如此，省政府不能简单地置黄运、甚至置黄运南部地区于不顾。如果在当地不加以控制的话，该地区两个最大的难题——黄河（它在山东的 250 英里中的前 80 英里穿越了西南地区）和极其猖獗的土匪——很快就会波及该省的其他地区。在解决这些问题时，西南地区封闭的经济反过来困扰着省里的官员们。第 4 和第 5 章将详细地讨论治水问题。公共秩序的问题贯穿了全书。在本书中，我们将要看到较低层次的政府中财政——及某种程度上的货币——力量集中的效果。

总之，20 世纪早期山东国家构建的一个关键部分——寻找更多的收入——干扰了市场的融合。这与现代欧洲的早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欧洲，国家和市场的构建通常是相互促进的，而市场的融合使得国家收入的获得和流动变得更加容易。^②

① 鲁西南依然是该省最贫穷的地区；如，见山东省农业区划委员会《山东省综合农业区划》（济南，1982 年），第 215～216 页中的数据。20 世纪 30 年代，省政府在西南地区的软弱势力确实导致了大量的行政改革，但在日本入侵前，并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立足；如，参见徐树人《我在乡村建设派的活动与见闻》，《文史资料选辑》（济南版）第 2 辑（1982 年），第 50～68 页，对这些改革的叙述，强调他们与省夺取对西南地区的控制有关。

② 如见 Charles Tilly,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tate-Making," in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ed. Charles Tilly (Princeton, 1975), pp. 17, 30～31, 52～57。

一个关键的区别是：在欧洲，不论是政府收入的数量、还是中央政府对收入的控制均在增加；在黄运，榨取的收入增加了，但获利的却主要是地方政府。因此，对山东信贷市场融合的政治控制，不仅限制了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它们还迫使西南地区的地方政府极大地依赖于像徭役劳动之类的非货币形式的榨取和建筑材料之类的实物捐献。因此，对资金流动的限制，阻碍了一种可以轻易地转移和交换资源——从而实现孤立的地方形态所无法做到的事情——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发展。

不过，如果把这些问题全部归罪于所涉及的政府，这可能过于简单。20 世纪早期的中国政府并没有花费这个国家收入中特别大的部分，^① 而进一步的市场融合和经济增长，肯定需要某些政府提供的各种公共产品（社会稳定、治水，等等）比在没有各级政府在某些地方找到额外收入的情况下所提供的公共产品要多得多。某些地方官员本应赞成这里所讨论的方法，因为这些办法对他们本人及其盟友来说是有利可图的，而他们可能也觉得这些方法比许多选择具有更小的破坏性，并可能已把它们看成反对外国经济势力以保卫中国权威非常重要的方面。最后，有助于挑衅这些措施的外国的政治威胁（及占领东北，也打断了货币流动），与同沿海经济联系是如此有益的激励总是形影相随的。

① 对这个阶段政府在国民生产总值所占份额的估计差别很大，但大部分认为是占这个地区 3%~5% 的部分。如，见 Huang, *Peasant Economy*, pp. 280~284。

第二章 社区、强制和棉花：农业改良和社会分层

1890 年以后，黄运的农业专业化发展极快，但却极不平衡。这些变化是 1890~1937 年遍及华北许多地区的“绿色革命”缩影的构成部分。如同后来更大的绿色革命一样，这种变革极大地增加了农业的收入，但却具有模糊的、有时是不同的社会效果。^① 因此，至少在黄运，它的实行需要越来越大的强制力量。组织强制力量、传播新的知识、提供混合子种的可靠供给及其他类似的使命，给国家和地方精英带来了重大的挑战。不过，到最后，在黄运许多地区——特别是其北半部分——出现的组织，成功地解决了上述所有问题。由于第 1 章所阐述的国家对资金市场融合的竭力阻碍，以及后 3 章所阐述的它对生态问题的无效管理，国家找到了新颖而有效地促进农业变革的方法是很令人惊奇的。

国家和私人对黄运农业与世界市场联接的努力结果，对

① 关于绿色革命社会范畴方面的资料，可参见 James C.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New Haven, 1985); Francine Frankel, *India's Green Revolution: Economic Gains and political Costs* (Princeton, 1971), 特别是第 8~10、191~195 页。

农村社会结构的依赖，远远大于对像土质或交通成本这些狭隘经济因素的依赖。相关的社会差异与第1章所阐述的贸易组织中的差异相对应，但这是处于乡村而非县级的层面。就像它的城市一样，黄运北部的村庄与黄运南部的那些村庄相比，被控制得极不紧密，且更容易被外人所“渗透”。结果，对这些农业改良的阐述，介绍了本书其余部分的一个重新提出的话题。尽管黄运南部的都市精英比北部的那些精英们更强大且结合得更紧密，但他们并不能把人所不欲的变革强加给黄运南部的乡村精英们——他们也比北部的乡村精英更为强大。

本研究还以一种其他大多数研究中国的著作所未用过的方法，突出了社会和政治因素对经济选择的影响。关于对中国农民种植和劳动力分配的研究，可以分为人们所说的“单一逻辑”和“多重逻辑”论。“单一逻辑”论的支持者们（马若孟、托马斯·罗斯基、洛伦·勃兰特）认为尽管不同的农民拥有不同的资源，但他们全都按同样的方法——作为古典经济学所说的深受局限的利润最大化者——来决定如何使用这些资源。^①“多重逻辑”论的支持者们（景甦和罗仑、陈翰笙、黄宗智）对许多其他观点不予赞同，但赞成不同的阶级按照根本不同的逻辑来决定其行为。例如，黄宗智认为，那些经营大的“经营性农场”的人是利润的最大化者，但那些更近似于谋生的农民们则不是。某些人对从其小农场中获取可靠的收入是如此的绝望，以至于他们从事着“自我开发”，在这类劳动获得的边际

① 如“单一逻辑学派”见 Myers, *Peasants Economy*; Wiens, *Micro-Economics*; Rawski, *Economic Growth*; 及 Brandt, *Commercialization*. 如“多重逻辑”论，见景甦、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Huang, *Peasants Economy*, 及 Chen Hangseng, *Landlord and Peasant*.

收入已然极大地低于现行的报酬以后，仍把多余时间投入进来。其他人则孤注一掷地种植高风险、高利润的作物来寻求从过于狭小的地块中竭力维持生计。^① 其他多重逻辑的构想极为丰富；把它们联合在一起的是一个根据其在现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而发生相应变化的家庭经济动机。

本章讨论的内容并不包括几近充足的微观层面的资料，来证实或讨论黄宗智认为许多贫困农民按照不同于新古典企业的理性来耕作的结论。不过，它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对这里的讨论都有影响，并为它增加了另一种尺度。第一，我们将会看到贫困农民采取了群体行动来执行限制其他农民尽最大努力的标准。在黄运南部地区，他们取得了成功；在黄运北部地区，他们失败了，但却仅是由于一场由国家促动的高压活动。第二，一旦这些活动成功了，有争执的新棉种就开始在黄运北部各种规模的农地中种植起来；而更为贫困的农民可能承受不同的风险，他们并没有从本质上反对市场参与的迹象。第三，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我们的研究显示，在心中可能带着除了利润最大化以外的目的耕作的人，并不仅仅是穷人。^② 黄运南部的乡村精英关注新棉种可能损害其社会和政治地位的各种不同途径，对那些推行这种新品种的人不予合作，即便这种合作可能会增加其农场的收益。而通过采取这种措施，黄运南部的乡村精英有力地塑造了其邻居在其中活动的环境。

因此，本章坚持在研究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著作中通常采

① Huang, *Peasants Economy*, p. 162.

② 这个观点具有方法学与实质上的含意。另外，它意味着勃兰特没有看到农地规模与劳动力密集之间强大的反面影响，这未必能驳倒黄宗智“多重逻辑”的构想。见 Brandt, *Commercialization*, pp. 144~145。

用的观点，跳出现存的关于“单一”对“多重”逻辑的争论。总的说来，它提醒我们，不论特定群体或家庭的经济逻辑是否因其社会地位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均可能有赖于他们生于斯的社区类型；因此，这个问题需要基于把社会结构本身作为一种变量来分析的特定背景的研究。^① 黄运南部村庄具有决定保留其政治主导地位的强大的精英；黄运北部村庄则没有。结果，黄运北部和南部的贫农、甚至是中农面临着不同的机遇和威胁。并由于地方精英变化着的力量和目标影响了农民的“经济”战略，我们能够预见到某些结果将要一起发生。我们将要看到，20世纪20、30和40年代，新棉种在旧的乡村精英逃避其责任的地方、而不是在那些根深蒂固的乡村头面人物逃脱了军阀和日本人的剥夺所造成的损害的地方获得了推广，这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本章首先叙述了新棉种所带来的机遇。其次，它阐述了这些新作物是如何更为普遍地干预了拾荒模式及赤贫者的谋生策略的。再次，它考察了用来推广这些新作物和保护其免遭拾荒者破坏的“棉业公会”，并把这些新的组织与旧的看青办法进行对比。更次，它分析了为什么新棉种在黄运北部推广开来、而在黄运南部则不能推广的社会原因。最后，它考察了这件事对华北乡村社会变迁更广阔的含意。

① 精英活动和社会结构影响社区其他成员遵从市场“理性”程度的观点的例证，在全世界和政治范畴中可以找到。关于两种极不相同的历史叙述，见 Clifford Geertz,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Berkeley, 1963) 及 T. H. Aston 和 C. H. E. Philpin, *The Brenner Debate: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Cambridge, Eng., 1985) 中的论文。当代发展著作中的几个事例，在 Milton Esman 和 Norman Uphoff, *Local Organizations: Intermediaries in Rural Development* (Ithaca, 1984), 第116~117页中有简要的评述。

新的农作物品种

中国个别官员早就在推广他们认为让其辖区获益的作物；到 1900 年前后，新的农工商部开始了更加系统的努力。^①私人团体也非常活跃。19 世纪 70 年代，传教士们已经开始推广新作物品种，部分地为某些土地上的鸦片种植提供另外的选择。^②加工农产品的新工业，特别是棉纺和香烟工厂，经常到农村中去，企图扩展其所需的农作物供应。^③在与黄运关系最大的事件——棉花——中，1918 年以后，国家的努力与中国和英国工厂主们的那些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与日商工厂类似的活动展开了竞争。^④

政府通常推广厂用而非食用农作物。^⑤这有许多原因。在

-
- ① 关于引进棉作物品种的传统活动，参见 Francesca Bray, ed., *Agriculture*, vol. 6, pt. 2 of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ed. Joseph Needham (Cambridge, Eng., 1984), pp. 598~600; 及 Ho Ping-ti,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Mass., 1959), pp. 178~183; 关于新活动的资料，见山东巡抚的咨，宣统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寄出，卷 110，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农工商部农务司、会议政务处档案；神户正雄：《远东经济研究》第 1 册，第 77~78 页；程守中《山东考察报告书》，第 13~18 页。
- ② 林茂泉：《文集》，第 6 上、80 上页。Helen S. Coan Nevius, *The Life of John Livingston Nevius* (New York, 1985), pp. 421~431.
- ③ 松崎雄二郎：《北支經濟開發論：山東省の再認識》，第 478~479 页关于棉花的内容。至于烟草，则见 Cochran, *Big Business*, 第 22~27、141~145、160 页及 281 页的注 119。
- ④ 中国人的活动将是本章大部分内容中的话题。对日本人活动的扼要叙述，见满铁《山東の棉産物》第 4、6、28 页；亦见松崎雄二郎《北支經濟開發論：山東省の再認識》，第 478~479 页。
- ⑤ 见清末会议政务处的记录；1914~1926 年《农商公报》中述及的国家政府内容；1921~1925 年《山东劝业汇刊》述及的山东省政府内容；H. H. Love papers, Olin Library, Cornell University, 关于 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初的内容。

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中，消费者获得了农业生产力进步所带来的大部分利润，^① 而厂用作物的购买者们远比千百万分散的食物消费者们组织得更好，来鼓励增加经济作物的生产（并获取其利润）。另外，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即使在做出精密细致努力的地方，小麦的生产也几乎没有进展。^② 其时，华北小麦品种似乎并不明显地逊色于其他地方可以获得的那些品种。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在做了多得多的研究之时，在中国对洋麦和高粱品种的试验，比对其他作物所作的研究，产生了更小的收益。^③

可能最为重要的是，由于自身的原因，政府官员对增加农村收入，与“国家自强”相比，怀着极小的兴趣。尤为重要是，那意味着改良农作物不是可以被用来替代进口，就是被用来推动出口工业。^④ 种植新棉可以一箭双雕：它们是作为一种

① 如，可见对 Hayami Yujiro, *A Century of Agricultural Growth in Japan* (Minneapolis, 1975)，特别是第139~140页对20世纪早期日本农业研究投入中，对来自农业技术变革中的利益分配效果的讨论。

② Theodore Schultz,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New Haven, 1964), p. 22. 尽管进行了大量的投入，但1910~1912年及1917~1919年，美国农业生产力仅增加了6%；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有巨大的盈利。

③ 1930年1月15日，T. H. Shen 致 Charles A. Stanley 的信，见 box no. 1, folder no. 16, H. H. Love papers 及1930年7月26日至8月19日 T. H. Shen 和 R. G. Wiggins 在华北旅行中所写的报告，box no. 13, folder no. 40, H. H. Love papers；金陵大学农林学院，*Bulletin*，第27期（1932年6月），第4页及第30期（1933年3月），第4页。这些研究报告说，工作开展多年及经多次失败后，小麦和高粱的实验品种当时每英亩的产出，与农民在受控制的条件下正在使用的品种相比，高出10%~15%；这与早期棉花改良中所取得的成就相比，要小得多。

④ 《农商公报》第1卷第5期（1914年12月），“政事”第14页；林茂泉：《文集》，第71上页；《山东杂志》第90期（宣统三年五月三十日），第7上~下页。

进口的替代品被引进的，但由于它们在中国种植的成本低于美国 20%，它们也具有出口的潜力。^① 当为了对特定的形势做出反应，其他各种农作物被短暂地改良时，^② 清朝和民国官员们一直最喜欢的两样东西就是棉花和蚕桑（用于生产生丝）。^③ 他们改良另一种初级产品——木材——的努力也突出了进口替代和国家自强，而不是像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在南京对中国农业推广的主要努力，在华北地方性的努力以及后来在陕西的努力，均着重于能够增加中国贸易盈余的农作物，并因此希望有助于保卫它的独立性；^④ 农村的生活水平受到的关注实质上要少得多。

到目前为止，黄运最为重要的新作物是北美棉种的引种。这些品种具有几个优点。其较长的纤维，比中国本地棉花更适合机械纺纱。由于中国现代棉纺织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蓬勃发展起

① 神户正雄：《远东经济研究》第 1 册，第 142 页。

② 《农商公报》第 3 卷第 2 期（1916 年 9 月），“政事”第 15～23 页；“近闻”第 1 页。

③ 宣统元年二月二十九日的咨，卷 110，及光绪三十年九月十三日的咨，卷 120，农工商部农务司、会议政务处档案；《农商公报》第 2 卷第 2 期（1915 年 9 月），“选载”第 31 页；《山东劝业汇刊》第 10 期（1923 年 1 月），“论述”第 1 页；由知识分子且未必是在政府中所表达的类似观点，见《山东杂志》第 90 期（宣统三年五月三十日），第 7 上～7 下页；严光耀、孙伯才、周承澎〔引者有误，应为“周承澍”，下同——译者注〕：《调查山东之农业状况》，《科学》第 4 卷第 5 期（1919 年 1 月），第 465、471 页；《山东劝业汇刊》对几乎每个县都重复了这三个优点，如见第 5 期（1921 年 7 月），“各县实业状况”第 8～21、19～21 页。

④ 关于南京金陵大学对农业推广所做的工作，特别参见了 Randall Stross, *The Stubborn Earth: American Agriculturalists on Chinese Soil, 1898-1937* (Berkeley, 1986), pp.92-160; 关于陕西的情况，见 E. B. Vermee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ovincial China: The Central Shaa'xi Since 1930* (Cambridge, Eng., 1988), pp.250-252, 290-296, 325-335。

来，每磅新棉的售价约高于土种棉的 20%。^① 新棉还可以在遍及黄河下游地区的沙地上种植。^②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品种每亩的棉产量也高于中国的品种。^③ 当新种不是与实验性种植的纯中国品种相比，而是与大多数农民使用的不同子种的混杂品相比时，产出的收益甚至要更大些；许多农艺学家认为，他们最重要的任务是让农民习惯于在整个田地里种植棉种场中清一色的棉花品种——不管什么品种——以代替他们有啥种啥。^④

总的说来，这些优势就是这些，即使在 1934 年——棉价最糟的一年——菏泽（南部）的乡村重建者们也估计这种作物每英亩下一次最多可产出 4 倍的利润。^⑤ 其他人的估计存在着

① 林茂泉：《文集》，第 65 下页；《山东劝业汇刊》第 10 期（1923 年 1 月），“专件”第 1 页。

② 林茂泉：《文集》，第 5 上、28 下、64 上、65 下页；松崎雄二郎：《北支經濟開發論：山東省の再認識》，第 478～479 页；今井駿：《抗日根據地の形成過程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思潮》第 108 期（1971 年 6 月），第 25 页；《振兴山东实业》，《山东杂志》第 92 期（宣统三年六月三十日），第 6 下页。

③ 林茂泉：《文集》，第 64 下～65 上页中有一张关于山东不同县份产出差异的详细图表；胡长准：《山东之棉业》，《山东文献》第 1 卷第 3 期（1975 年 12 月），第 22 页中说，这种棉种最终在山东的大部分地区获得了种植，产量比本国的棉种约高出 30%。在任济民的《菏泽县推广美棉议与民生议》，《乡村建设旬刊》第 3 卷第 18～19 期（1934 年 2 月），第 14～15 页中及满铁《山東の棉産物》，第 2 页（也报告说增加了 33%）中可以见到更多的资料。

④ Randall Stross, *The Stubborn Earth: American Agriculturalists on Chinese Soil, 1898～1937*, pp.124～127; M. L. Darling, *The Punjab Peasant in Prosperity and Debt* (Oxford, 1947), p. 151.

⑤ 《乡村建设旬刊》第 3 卷第 18～19 期（1934 年 2 月），第 14～15 页。由于本章强调鲁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差异，县名后将标出（北部）或（南部）。鲁西北包括黄运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与第 1 章中所叙述的“中心”资本市场的西部地区相对应；鲁西南包括黄运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并与“西南地区”资本市场相对应。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县名，见附录 A。

不同的差异，但全都同意只要是在可以种植棉花的地方，美棉就是最有利可图的作物。^① 新棉在 19 世纪 90 年代由传教士积极推广；自 1905 年起，它得到了国家、省和县及天津、青岛棉纺厂的推广和资助。其间，棉纺厂停止向仅种植土棉的县派出采购人员；像烟草一样，种子的散发和作物的收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②

不过，新棉种仅是断断续续地被接受的。在鲁西北和直隶的西南部，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县政府更加积极地参与此事时，它们才获得进展；但后来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它们成了占优势地位的作物。^③ 在鲁西南，新品种一直未能推广开来；而由于城市工厂的采购人员从这个地区销声匿迹，种植者不是被迫把棉花卖给每况愈下的本地市场，就是转向利润较低的作物，通常是高粱或小麦。总的说来，尽管做了积极的推广，战前山东仅有 40%、而直隶/河北有 70% 的棉田种植了新品种。^④

-
- ① 滿鐵：《山東の棉産物》，第 47～54 页；林茂泉：《文集》，第 71 上页；Leonard G. Ting, *Recent Developments in China's Cotton Industry* (上海，1936 年)，第 14 页；神户正雄：《远东经济研究》第 1 册，第 118～120 页。关于棉价对粮价（主要替代）的走势，见吴承明《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内市场》，《历史研究》第 168 期（1984 年 4 月），第 115、121 页。
- ② 参进程守中《山东考察报告书》，第 13～18 页。关于烟种的分发，见 Hsu Ying-sui, "Tobacco Marketing in Eastern Shandong," reprinted in *Agrarian China: Source Materials from Chinese Authors* (London, 1939), p.172。
- ③ 见博士论文“附录 D”中的数据，今井駿：《抗日根據地の形成過程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思潮》第 108 期（1971 年 6 月），第 25～27 页描述了冀西南同样的现象。
- ④ 土井章、殿生文男著，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务部资料课编《北支事情综览》（大连，1936 年），第 262 页；滿鐵：《山東の棉産物》，第 17～18 页中列出西北 10 个县的数据，算出的结果是 81%；据说这些数据来自临清商会。引自《棉业特刊》第 14～15 页关于 1930～1932 年的数据，对同样县份的计算，结果仅为 56%。亦见《河北棉产录报》第 7 期（1936 年 8 月 1 日），第 6 页。

1920年以后鲁西北和冀西南向美棉的转换，与同时代的旁遮普向同样品种的转换有着类似的步伐。反过来，旁遮普的农民对关于各种棉花品种的产出和价格的新信息所做出的反应，与美国南部的农民大致相同。^①因此，尽管存在着军阀割据及其他打击施加的所有障碍，但黄运北部棉农对新选择的反应，似乎与世界上所有的其他人一样（尽管如此，有人可能期望黄运北部对新棉的采用超过旁遮普的速度，这是因为在黄运洋棉与土棉之间净利润率的差异可能更大^②）。因此，推广的努力在鲁西北取得了如此好的成就、而在西南却彻底失败，这就更加令人惊讶了。这种分化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即已明显，但到1928年北伐战争及军阀割据的崩溃以后，变得更为显著；此后山东相对稳定状态的确立，创造了一种改良的机遇，这个机遇被西北而非西南地区所把握。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在山东各地，土棉的种植均在缩

① Raj Krishna, "Farm Supply Response in the Punjab (India-Pakistan): A Case Study of Cotton"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1), 第1、9页中列有这项对比所需的数据；美国南部的情形，见第24页。

② 当美棉在山东的售价至少每单位高于华棉20%时（林茂泉：《文集》，第65下页），自1922~1941年这20年中，其中的18年在旁遮普的差额是14%或更少，而一般是5%〔Raj Krishna, "Farm Supply Response in the Punjab (India-Pakistan): A Case Study of Cotton", 第95页〕。净利润率中的差异则更难确定，这是因为统计成本的方法各异，但Krishna提供数据的旁遮普两个地区，这些年在净利润率中的平均差异大致在16%~25%，即使考虑到所有貌似有理的成本差异，也远低于华北物价和产出差额的混合结果。在Krishna给出的38项调查中，一年最大的净利润差异略低于100%（在一个地区的同一年度中）（第104页）。1922年山东各县及1934年菏泽的数据显示远大得多的差异。参见林茂泉《文集》，第88下~100上页及《乡村建设旬刊》第3卷第18~19期（1934年2月），第14~15页。

小，这可能是由于军阀割据造成的；西南地区的种植比西北部下降得更快。^① 1928年以后，棉田面积在全山东有所反弹；到1932年，西南地区再次出产了大约45%的棉花，与西北地区在风调雨顺年景中——大概像1911年那样——的产量相埒。^② 尽管如此，此时棉花的总产量包括两种大不相同的产品，而西南地区在新的更加有利可图的棉产品中所占的比重大大地落后了。1932年，西南地区的棉田全部从20世纪20年代的困难中恢复过来，总产量已经达到了以前的水平。不过，美棉的比重仍低于20%；在1933年遭受水灾的年景，这个比重下降到3%。与之相比，在前述两个相同的年度中，鲁西北和鲁北其他地区棉产量中的55%和30%部分是赚取硬通货的利润更高的美棉。^③

鲁西南未能参与到棉花市场最有利可图和增长最快的部分中，最终也影响到了它的总输出。一旦和平促使它从20世纪20年代中恢复过来，西南地区的输出量就停滞不前了（排除了由于比20世纪20年代中期少得多的灾难对统计结果造成的轻微影响），而鲁西北地区又跃居到了领先地位。两组不同的数据算出1932年鲁西南的产量约相当于鲁西北的半数（47.2%和44.2%），而我们获得的这两组数据算出1934～1937年鲁西南的产量仅及鲁西北产量的1/3（33.5%

① 见博士论文“附录D”中的1922和1926～1929年的数据及对1930年数字的注释；亦见程守中《山东考察报告书》，第19～20页。

② 见博士论文“附录D”。

③ 《河北棉产录报》第7期（1936年8月1日），第6页；博士论文“附录D”中的关于我们作为标本的县的1932年出产数据——西南地区占17.2%，西北地区占57%——证实了这一点。关于美棉而非华棉在该地区的外面能够销售出去并赚取硬通货的资料，见《乡村建设旬刊》第3卷第18～19期（1934年2月），第15页。

或 34.7%)。^① 另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西北地区的领先优势仍在扩大；如果我们把 1936~1937 年单独拿出来分析，那么，鲁西南地区的产量已经跌落到鲁西北 29% 的水平。^② 这 10 年的末期，日本人关于机纺棉的一项研究，仅提及了山东两个主要区域——北部和西北部——的存在，而不是传统的三个棉区。^③ 实际上，鲁西北美棉的推广，是那个长期被视为比鲁西南更贫困的地区为什么在 20 世纪 30 年代能拥有更高的人均收入的一个重要原因。^④

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种奇特的模式呢？鲁西南曾经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棉产区。^⑤ 它包括适合新品种的大片的地区，而这些地区受到了山东劝业所（以下简称“劝业所”）和中外棉纺

① 据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复印的资料，在博士论文“附录 D”做了分析，算出 1934~1937 年鲁西南的总产量为鲁西北产量的 33.5%，为这些年度中样本县的 34.7%。《河北棉产录报》第 7 期（1936 年 8 月 1 日），第 6 页采用了略有不同的样本（包括所有重要产区的县份），算出 1932 年鲁西南的产量相当于鲁西北产量的 44.2%，而那一年原来样本县的产量相当于原来西北地区样本县的 47.2%。

② 见博士论文“附录 D”中 1934~1937 年样本县的数据；1934~1935 年的比率是 392950:898200，或是 44%，1936~1937 年是 474960:1621970，或是 29%。

③ 满铁：《山東の棉産物》把西南地区作为该省第三个棉区提及了一次（第 2 页），说那里没有推广美棉的活动和成就，但却极为详细地描述了北部和西北部地区的推广活动；其他像《山东考察报告书》之类对山东棉花的一般调查，也在述及厂用棉花的供应地时没有提及西南地区。

④ 见博士论文“附录 E”。

⑤ 关于鲁西南作为传统棉区的看法，见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289~1937 年）》（北京，1963 年），第 75 页（例如，定陶早在明中期就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棉区，亦见 Huang, *Peasant Economy*, p. 118）；亦见《乡村建设旬刊》第 3 卷第 18~19 期（1934 年 2 月），第 13 页及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 1038，案卷号 2034，第 10 页（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

织厂的重视。^① 劝业所的工作人员及天津和青岛纱厂的代理人甚至到达了西南地区最偏远的县份，来散发免费的种子，并推广这种作物；20世纪30年代，上海纱厂（与鲁西南而非鲁西北有铁路和运河的联系）新棉短缺，并抱怨山东没有出产足够的新棉。^② 诚然，新棉比土棉开花要晚，因而更难适合一年两熟制。不过，西南地区的两熟制仅比西北地区略高一点；这两个地区占优势的耕作制度是两年三熟制。^③ 另外，两熟制要远远多于山东任何地区的江苏，实际上却引入了新的棉种。^④ 对鲁西北和鲁西南而言，主要纱厂的运费基本相同，而即使是西南地区最偏远和土匪最猖獗的县份，也把小麦卖到了都市的面粉厂中。

来自各个年度和各种资料最重要的数据比较，均显示西南地区的农民本应从美棉中获得比他们当时所种的作物更多的益处。^⑤ 即使在新品种被改良以前，在我们拥有数据的西南地区22个县中，它们在其中18县每亩的经济价值要超过本国的棉花（有两个县的价值相等）。其中有13个县每亩的溢价等于或多于50%，平均增加的收入达33%。在同样的收入来源中，基本上

① 参见《山东劝业汇刊》第12期，“公牒”第36页关于天津纱厂在西南地区偏远县份散发种子的内容；《山东劝业汇刊》每期都有劝业会在西南地区活动的一些内容。

② 《山东实业公报》第4期（1931年10月），第37页；《农业周报》第3卷第7期（1934年2月23日），第158页。

③ 比较指数来自北京大学附设农村经济研究所《山东省济宁县城よを中心よせる農産物流通に關する一考察》，第18页。

④ Ting, *Recent Developments*, pp.13~18.

⑤ 《乡村建设旬刊》第3卷第18~19期（1934年2月），第14~15页；土井章、殿生文男著，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务部资料课编《北支事情综览》，第261页；《山东劝业汇刊》第28期（1924年8月），“实业公牒”第26页；林茂泉：《文集》，第65上~下页。

与西北部 11 个县 (36%) 相同。^① 劝业所代理人所推荐的惟一额外的投入是增加一层腐草，但肯定不足以抵消这些收益。^② 另外，新棉还可以种植在其利润仍然普遍低于土棉的那些作物所在的土地上，并且甚至可以在某些废地上种植。改良者和工厂的代理者们在西北和西南地区均竭力传播这些知识。

西南地区新棉种的失败源于该地区特定社会背景中两个突出的特征。首先，这些混合品种退化得极快：因此，连续的好收成需要从海外到纱厂代理者到省试验站不断地输入新种；从那些棉种站到县仓库、试验站和子种场；并从县劝业所到农民手中。农民们不得不信赖那些在下一年能够准时到来并负担得起的新种；如果他们从一年的收成中省下种子，他们就会极想在下一年使用它们。^③ 对杂种的使用，将会在一个特定的地区造成新棉种退化好几年：那些被发育不良的庄稼所困扰的农民不会热衷于做试验。不过，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至少在黄运北部地区，这个难题已被解决；类似并可能甚至更严重的难题——它曾困扰过早期旁遮普的植棉活动——到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被克服了。^④ 这些组织上和后勤上的挑战在黄运南部某

① 林茂泉：《文集》，第 88 下～100 上页。

② 《山东劝业汇刊》第 7 期（1922 年 5 月），“公牍”第 18 页。

③ 松崎雄二郎：《北支經濟開發論：山東省の再認識》，第 478～479 页；滿鐵：《山東の棉産物》，第 35 页；《工商半月刊》第 6 卷第 7 期（1934 年 4 月 1 日），第 47 页。亦见《工商半月刊》第 6 卷第 23 期（1934 年 12 月 1 日），第 154～156 页；《河北棉产录报》第 41 期（1938 年 8 月 1 日），第 29 页；《河北棉产录报》第 16 期（1936 年 12 月 16 日），第 18 页；《河北棉产录报》第 12 期（1936 年 10 月 16 日），第 13 页。

④ 《工商半月刊》第 6 卷第 7 期（1934 年 4 月 1 日），第 47 页；关于旁遮普的情况，那里的种子问题非常严重，在 23 个年度中，其中 7 个年度（且其中 12 个年度是在一个地区），每个灌溉区国内棉花的产出高于美棉，见 Raj Krishna, “Farm Supply Response in the Punjab (India-Pakistan): A Case Study of Cotton”, pp. 70～73。

些更加封闭和更加混乱的地区可能特别难以解决，当地的土匪经常使旅行和交通充满危险，不过，我们对这一点尚缺乏证据。

这些新网络不失败的可能性使某些人更受威胁。如果棉花真的推广开来，棉种的供应者——不论是纱厂还是其延伸的代理机构——对农民将变得非常重要。黄运北部似乎没有什么人担心此事，除非纱厂是为日本人所拥有。但在黄运南部，转向美棉的前景意味着这个地区中根深蒂固的乡村头面人物——他们在北部地区没有相对应的人物——可能很快就会有了令其头痛的新对手。

西南地区乡村头面人物的冷漠是该地区社会背景中一种特别严重的障碍。只有他们才能够保护那些来自县城或更远的地方、带着种子、小册子和展品的人——或其听众——的安全。另外，西南地区秩序混乱的名声，大致意味着那里的新棉需要特别有力的促动。尽管现有的犯罪报告说土匪很少抢劫运往集市途中的大宗农产品，但这种制约可能已经被预先列入没有公布的保护费中。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安排这类保护的强大靠山的意愿，对所有有意投资新经济作物的农民来说就显得至为关键。

另外，交通中断的可能性必然会增加各阶层种植必要时可以用来食用的作物的愿望。诚然，对食物生产的重视，符合西南乡村精英们的政治目标，他们在当地的势力，部分地基于他们保护人民及在动乱时期储积粮食的能力^①，就像在青黄不接时向贫困交加的人提供粮食借贷一样。手上掌握粮食来维持当地政治统治的优越感，有时使其他地方的乡村精英们对盈利性

^① 如见 Elizabeth J.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1980), pp.89~93.

经济作物带来的机遇熟视无睹；^① 保护者们这种偏爱食物胜过盈利的心态，在像鲁西南这类土匪猖獗的地区中可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尽管如此，来自官员们推广棉花的报告，着重于精英们帮助其解决一种不同的“混乱”——来自赤手空拳的贫困者的反对——的必要性上。就像我们不久将要看到的那样，新棉种极大地激起了贫困者的反对。在鲁西北，这些反对被新成立的“棉业公会”所镇压。在西南地区，那里的贫困者特别的多，而稳定的中层农民尤其之少，如果没有乡村精英们全心全意的支持，棉业公会几乎没有成功的希望。我们将首先来考察这种阶级冲突的问题，然后再转向其他方面，研究在这些方面中，西南地区社会结构给由外来者带到其村庄中的新棉种和其他改良所造成的特殊障碍。

贫困者对美棉的抗拒源于这种新作物看似无伤大雅的特征：它们需要比土棉多花 2~4 周成熟。^② 因此，在鲁西地区结束收割的传统日子里，新品种尚未成熟，并与收割后允许拾荒者进入田中拾取任何剩余物的当地惯例相冲突。^③ 20 世纪

① 如见 Norman Owen, "Abaca in Kabikolan: Prosperity without Progress," in *Philippine Social History: Global Trade and Local Transformations*, ed. Alfred McCoy and Eduard de Jesus (Honolulu, 1982), pp. 191~216, esp. 207~208.

② 《山东劝业汇刊》第 7 期（1922 年 5 月），“各县劝业报告”第 22 页；《山东劝业汇刊》第 11 期（1923 年 2 月），“各县成绩报告”第 18 页。滿鐵：《山東の棉産物》，第 28 页。

③ 《山东劝业汇刊》第 7 期（1922 年 5 月），“各县劝业报告”第 22~23、30 页；《山东劝业汇刊》第 9 期（1922 年 12 月），“各县成绩报告”第 25 页；《山东劝业汇刊》第 10 期（1923 年 1 月），“各县实业状况”第 1~2 页；《山东劝业汇刊》第 11 期（1923 年 2 月），“各县成绩报告”第 18~19 页；《山东劝业汇刊》第 12 期（1923 年 3 月），“公牍”第 38、40 页，“各县成绩报告”第 27 页；《山东劝业汇刊》第 16 期（1923 年（转下页注）

20年代，这个问题延迟了鲁西北地区新品种的推广，并至少迟至1934年，还继续困扰着鲁西南的新棉推广者们^①（这个问题在河南和河北似乎不太严重，但缺乏资料证实^②）。研究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可以阐明政治和经济融合与黄运乡村社会结构的相互依赖。

拾荒与生存

对鲁西南的穷人来说，拾荒极其重要。这个地区存在着严重的燃料短缺，对此，我们将在第3章进行详细的论述。因此，每当秋收到来之时（10月底或11月初），人们仅有很少的时间来为冬天收集足够的燃料。^③即使一位找到了充足供应地的高效拾柴者，在田中也需要16~25天才能拾到足够的残秸碎叶以满足一个五口之家一年的燃料需求（根据我们所使用

（接第67页注③）7月），“公牍”第41页；《山东劝业汇刊》第22期（1924年3月），“公牍”第1、16页；《山东劝业汇刊》第28期（1924年8月），“实业公牍”第26页；亦见杨汝南编《农谚和农歌》（北京，1932年），第38页，列出来自“黄河下游”地区的谚语中都说“十月寒露霜降来，地里只留落花生。”和“立冬（14天以后）小雪农事闲，拿得米棉换洋钱。”在黄运略东一点的齐河，1933年对拾荒者开放棉田的日子，仍然是公共节日的标志，《齐河县志》（1933年）卷12，第5上页。

① 《乡村建设旬刊》第3卷第18期〔原文如此，其他地方均写为18~19期。——译者注〕（1934年2月），第13~19页。

② 我尚未找到关于在黄运的河南和河北部分引入美棉的足够资料，所以这个结论肯定是假设性的；不过，来自这两省的资料几乎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一份河南报告中作为重大挑战来描述的一件罕见的事例，见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河南省棉产改进所工作总报告》（1936年），第145页。当20世纪30年代这些品种被引进到陕西时，安全因素同样是一个难题。见 Vermeer, *Economic Development*, p.200。

③ 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北支经济调查所：《北支农村概况调查报告》（东京，1940年），第200页；Arthur Sm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ondon, 1900), p.22。

的“最低需求”的估计数)。^①实际上，燃料是如此的稀缺和昂贵，以至于一名真正设法尽其身体所能以拾取最多柴草的妇女，在一天中可以赚到与一名男性煤炭工人的日工资相当的实物，而比她作为一名农业工人所挣得的要多得多。^②

尽管如此，那些较迟开始拾荒（或是被拒绝进入到未被拾过的田中）的人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来找到足够的供应地。更糟的是，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由于整个黄运并没有大致充足的可燃材料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他们也许压根就找不到它们。进言之，到了冬天还继续拾草，意味着更多地暴露在冷天里，而即便仍然能够找到供应地，这种暴露也使得拾草基本上得不偿失；黄运许许多多的谚语和民歌建议人们只要有一点可能，在冬天中就不要外出。^③最后，燃料很难买到；市场发育得很不完善，在华北其他地区提供的燃料少于总需求的20%。^④简言之，一个有效的拾荒季节对贫困家庭的生计是至关重要的，而拾草的成功则有赖于早早地被允许进入到好

① 关于最低燃料需求，见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sian Energy Problems* (New York, 1982), pp.114, 360; 及 Vaclav Smil, *The Bad Earth: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in China* (Armonk, N.Y., 1983), p. 150。关于在黄运北部拾草人每日的能力，见北支那開發株式會社調查局《魯西棉作地帶の一農村莊における農村勞動力調査報告》（北京，1943年），第92页。拾草和要求在第3章及博士论文“附录F”中有更为详细的论述。

② 在任何地方，每百斤干草的价格为1~1.66元（详见第3章），一天可拾到30斤草（北支那開發株式會社調查局《魯西棉作地帶の一農村莊における農村勞動力調査報告》，第92页），合0.3~0.5元。华北任何地方煤炭工人每日所得的工资为0.22~0.55元（Rawski, *Economic Growth*, 319），而即使在农忙季节，女性农业工人每日约得0.3或0.4元。

③ 如见，董汰生编《山东歌谣集》，第27页。

④ John L. Buck, *Chinese Farm Economy: A Study of 2866 Farms in Seventeen Localities and Seven Provinces in China* (Chicago, 1930), p.399.

田中。

棉花残留物基本上被用作燃料，而其他残秸剩叶还被用来喂养牲口，或是在特别艰难的时候供人食用。^① 拾荒者还可以捡走收割者所遗留或丢掉的所有农产品；太小的棉絮不能用来纺纱，但用作棉胎仍是有用的。只要所雇的收割者包括拾荒者本人或其配偶，就会有許多办法来获得田主一些额外的东西。^②

黄运的穷困、燃料短缺和执法的软弱，意味着拾荒长期以来一直以一种非同寻常的规模在进行着。在 17 世纪，来自德州（北部）地区的一些农民远到济宁（南部）——相距 125 英里——来拾荒。^③ 1896 年，传教士明恩溥报道说，某些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的妇女，外出 10 多天，仅是为了拾棉。^④

但大部分人在靠近家的地方拾荒。作为一种收割后的行为，通常以群体形式进行活动的穷人对其他人的作物拥有部分的所有权，这与裴易理所说的另外一种“掠夺式的生存策略”有某些相似之处；^⑤ 并由于伴有偷盗行为，特别是穷人经常发现值得走长路去寻找更多或更令其动心的目标。但拾荒者与土匪不同，在其他地方拾荒时，他们不会面对着其邻居的道德压力。穷人被普遍认为具有一种从事某些拾荒活动的权力，而这种权力首先在其家乡村子里被普遍认同。实际上，20 世纪 20 年代当美棉的推广者们想阻止“抢棉”时，他们不得不请求县

① 滿鐵：《山東の棉産物》，第 39 页。

② 如见 Gamble, *North China Villages*, pp.235 ~ 236;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p.82。

③ Esherick, *Boxer Uprising*, p.27.

④ Arthur Smith, *Village Life in China* (New York, 1899), p. 167.

⑤ 见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各页。

官们宣布这种行为是非法的。^①

尽管如此，这可能不至于让人联想到带有公认的生存权的20世纪前“道德经济”的形象。拾荒引发的冲突司空见惯，而许多村庄所作的详细规定——具体到了什么人、什么时间可以拾荒，可以拾多长时间，甚至规定了收割者必须在田里所留秸秆茬口的高度——说明对拾荒活动的限制缺乏任何宽容的共识。^② 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接近清末时，许多村庄对拾荒活动设置了新的限制，并且，国家鼓励成立看青组织来执行这些限制（并防范真正的盗贼）。由于远远没有成为永久性的“习俗”问题，拾荒的规定被拾荒者们和有产者们频繁地更改和不断地检验。

即使在新品种之前，对棉花残絮和断梗剩叶的争夺也非常激烈。明恩溥在19世纪90年代写道，棉花是拾荒者最眼热的作物，因而也最难守护；不过，他举出的一个家庭企图从他们的田里彻底赶走拾荒者的事例，涉及棉花的仅有一例。^③ 习以为常的偷盗甚至使一些农民对新品种望而却步：

尽管安徽的农民对美棉的花蕾感到吃惊，并且全都相信它们具有更大的产量和更高的价值，但由于害怕将会遭到其较不幸的邻居们的偷窃，他们仍不愿种植它们。一项暗中的调查揭示了这样一种事实：在这个地区的一些地方，小偷小摸是如此盛行，棉花会在夜里被人从田中摘

① 《山东劝业汇刊》第22期（1923年3月），“公牍”第16页；《山东劝业汇刊》第10期（1923年1月），“各县实业状况”第1页。

② Arthur Smith, *Village Life in China*, pp. 166 ~ 167; Gamble, *North China Villages*, pp. 71, 236.

③ Arthur Smith, *Village Life in China*, pp. 163, 166 ~ 168.

光，除非农民自己把它们采走。^①

因此，即使是土棉，对于那些提前向其下手的拾荒者和小偷们也特别具有诱惑力；新棉则更加如此。但对所有被迫等到其迟迟到来的收割日的人，新棉提供的是价值极小的残剩物。1934年，菏泽（南部）称赞美棉具有较高利润率的报告，对“主产品”——收获物——和对拾荒者在收获后所能得到的各种作物的“副产品”，均（用元）算出其价值。这种比较很有意义：^②

表 2-1 各种作物及“副产品”的价值

	主要农作物	剩余物		主要农作物	剩余物
美 棉	15.60	1.00	粟	3.60	2.40
小 麦	5.39	1.38	高 粱	3.00	3.00
大 豆	3.84	1.00			

另外，尽管新棉种比其他大部分作物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但这些需求更加均匀地分散在整个季节里，因此农民可以使用更少的雇佣劳动；具体说来，收割所需的劳动力，每亩无论如

① George Smith, "Improving China's Cotton," *China Weekly Recorder*, Dec. 12, 1923, p. 128.

② 《乡村建设旬刊》第 3 卷第 18~19 期（1934 年 2 月），第 14~15 页。满铁：《山東の棉産物》，第 47~54 页中成本与收获的数据通常相似，但缺乏剩余物方面的资料。不巧的是，关于中国棉花精确可比的数据无法找到，但其他资料显示，美棉主产品的价值通常比土棉的主产品高 50%。剩余物方面的可比数据没有找到，但由于美棉的株距比中国棉略大（作为补偿，美棉每株有着更多和更大的花蕾），看起来美棉每亩出产了更少或至少是相当的棉秸；这些棉秸，是主要的剩余物，被用作燃料。

何要比上表所列的其他作物所需的劳动力要少 28%~44%。^① 有份调查也发现，由于担心偷窃，使得种植美棉的家庭，为了这种特别的庄稼，更多地使用自家的女性和儿童，而不是雇用其他人^②（这种担心，至少在她们有家庭成员而非雇工相伴的情况下，显然消除了反对“娇贵的”妇女下田的道德谴责）。由于那些最依赖拾荒为生的人通常也是那些最需要打工赚钱的人——并由于收割通常提供了开始提前拾荒的机会——新棉种给他们的生计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让劝业所的官员们沮丧的是，整个鲁西地区的拾荒者拒绝放弃其传统的拾荒日。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清平（北部）、濮州（南部）、菏泽（南部）、邱县（北部）、临清（北部）、冠城（北部）、武城（北部）、夏津（北部）、堂邑（北部）和巨野（南部）均报告说美棉遭到了在这种庄稼完全成熟前冲到田中的人们的破坏；另一份报告说，一般说来，在人们冲到田中时，仅有 60%~70% 的花蕾盛开，在鲁西许多地区，这种行为威胁到了新作物的前景。^③ 那些成了抢棉牺牲品的农民，不仅失去了一季庄稼，而且在下一年里再不愿种植美棉了。其他

① 《乡村建设旬刊》第 3 卷第 18~19 期（1934 年 2 月），第 14~15 页。关于山东潍县发生的类似现象，见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3:2, p. 660。

② 北支那開發株式會社調查局：《魯西棉作地帶の一農村莊における農村勞動力調査報告》，第 51 页。

③ 《山东劝业汇刊》第 7 期（1922 年 5 月），“各县劝业报告”第 22~23、30 页；第 9 期（1922 年 12 月），“各县成绩报告”第 25 页；第 10 期（1923 年 1 月），“各县实业状况”第 1~2 页；第 11 期（1923 年 2 月），“各县成绩报告”第 18~19 页；第 12 期（1923 年 3 月），“公牍”第 36、38、40 页；“各县成绩报告”第 27 页；第 16 期（1923 年 7 月），“公牍”第 41 页；第 22 期（1924 年 3 月），“公牍”第 1、16 页；第 28 期（1924 年 9 月），“实业公牍”第 26 页；这些参考资料的倒数第二项第 1 页（即《山东劝业汇刊》22 期（1924 年 3 月），“公牍”第 1 页。——译者注）列出的数据也为 60%~70%。

人则可能会理智地认识到：一个甚至不能保护其庄稼免遭拾荒者的那点力量掠抢的组织，基本上不可能被指望来保证种子及庄稼本身的安全抵达及不误农时。许多县劝业所的报告把改善安全保障以防范抢棉列为新棉推广成功的首要条件。^①

乍看之下，报告抢棉事件的西北县份要更多些，似乎意味着那里的问题比西南地区更严重。不过，这些报告写于1922~1925年之间；就1922年来说，西南地区报告抢棉的3个县中，菏泽和巨野在整个西南地区种植美棉的总地亩中占有88%的比重。在这个时期，西南地区做出这类报告的第三个县濮州的数据则没有找到；并且直到1930年才找到其他关于西南地区美棉种植的全面数字，在那一年，美棉在整个西南地区农作物中所占的比重基本上同样的小。^②那时，抢棉活动似乎在鲁西所有种植美棉的地方都出现了；这恰恰是我们记录的覆盖面显得残缺不全。

尽管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开始时均出现了相似的抢棉问题，但它们在防范这类事件时却有着不同的进展。到1930年，在鲁西北，抢棉已被控制住，^③并不再是在这个地区中推广美棉的障碍。但在鲁西南地区，却没有一份报告说在制止这种习俗方面取得了任何进步。1934年，乡村建设组织仍然试图在菏泽（南部）推广美棉，并报告说抢棉依然是一个主要障碍；

① 《山东劝业汇刊》第7期（1922年5月），“各县劝业报告”第22页；第10期（1923年1月），“各县实业状况”第2页；第11期（1923年2月），“各县成绩报告”第18页；第12期（1923年3月），“公牍”第36、38、40页；第22期（1924年3月），“公牍”第15~16页；第28期（1924年9月），“实业公牍”第26页。

② 见博士论文，“附录D”，第406~419页。

③ 《鲁北十县农业调查报告》，《山东农矿公报》第13期（1930年1月），第34页。

他们写道：农民“不敢抵制”这种活动，因而，将不得不创办特殊组织与这种行为进行斗争。^①

抢棉——及其所引发的冲突——远不是贫农超出了有产者认为可以接受的拾荒限度的普通事件。在拾荒被认为演变成偷窃的早期大部分案例中，均涉及个别人在偷偷地行事。明恩溥报道说，在19世纪90年代的山东，对某个在棉田边上采摘的人，一个农民通常仅是喊一声“谁呀”来让他走开。^②西德尼·甘布尔在20世纪30年代对华北24个村庄的调查，详细叙述了看青与拾荒和偷窃之间的冲突，但这些事件中却几乎没有对拾荒制度公开挑战的事例，至于记录成群结队地来进行挑战的事例就更少了。^③一位来自黄运稍南一点的河南鹿邑的记者报道说，在19世纪末，超出种植者认为可以忍受的拾荒行为的人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家庭的看青被全村规模的巡逻所取代。不过，即使在这里，这位记者也把这种挑衅归结为“狡猾”妇女的行为；这似乎与公开的群众性的挑战大相径庭。^④

与之相比，来自20世纪20和30年代的报道注意到，抢棉者是以既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的团队形式而来的，^⑤并注意到有时达数十人、甚或数百人一起涌到田中。^⑥而运用广泛组

① 《乡村建设旬刊》第3卷第18~19期（1934年2月），第13页；《山东劝业汇刊》第9期（1922年12月），“各县实业状况”第25页。

② Arthur Smith, *Village Life in China*, p.163.

③ Gamble, *North China Villages*, 特别是第87~96、301页。

④ 转引自 Hsiao Kung-ch'un,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1960), p.288.

⑤ 《山东劝业汇刊》第22期（1924年3月），“各县劝业报告”第15页；《河北棉产录报》第12期（1936年10月16日），第13页；Arthur Smith, *Village Life in China*, 第167、276页全面地描述了妇女在摘棉和拾荒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⑥ 《山东劝业汇刊》第10期（1923年1月），“各县实业状况”第2页。

织起来的武装来防范抢棉者，可能通常在道德上难以操作；但如果没有这类武装又不可能抵挡他们。

如果 20 世纪 20 年代的抢棉行为越出了扩大拾荒活动的“正常”尝试，而它仍然类似于多被说成是一种“习俗”的旧的行为，并通常与“偷盗”区别开来。拾荒日期本身的许多权力就源于传统。不过，新棉种带来的高茬口及抢棉行为的挑战，激起了新型的安全保障的努力。我们现在就来阐述它们。

看青活动与“棉业公会”

在 19 与 20 世纪之交的华北许多村庄，兴起了看青组织，以取代以家庭为基础的看青。晚清政府鼓励这种组织的发展，希望通过对偷盗的阻止可以使有产者缴纳更高的税收。^① 在这些看青组织中，有许多转向了限制拾荒活动；例如，1900 年以后，当更多的税收和行政负担被分摊到以村为基础的单位时，一些直隶的村庄开始禁止外来者拾荒。^② 在 20 世纪早期的动荡岁月里，有组织的村庄看青活动似乎逐渐增多。^③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应该过高地估计它的力量，尤其是在黄运这个地区。

首先，村庄看青活动远不是普遍性的。到 19 世纪 90 年

① Myers, *Peasant Economy*, p.261.

② Prasenjit Duara, "Power in Rural Society: North China Villages, 1900~1945," (哈佛大学 1983 年度博士论文), pp.254~256. Duara,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a North China Village in Late Imperial and Republican Times," *Stone Lion Review*, no. 5 (Spring 1980), p. 50; Myers, *Peasant Economy*, pp.260~261.

③ Gamble, *North China Villages*, p. 77; Prasenjit Duara, "Power in Rural Society: North China Villages, 1900~1945," p.162.

代，这项活动在有些县被很好地组织起来，但在其他县则仍然闻所未闻。^① 在我们所找到的 1900～1908 年之间源于土地或金钱争端而引发的 53 起黄运凶杀报告中，其中 9 起涉及看青。在这 9 起中，7 起看青活动仍然由家庭来做；第 8 起中，一名村庄看青者企图从他自己的家中逃避分配的任务。^② 斑驳混杂的家庭和社区看青活动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30 年代。^③

另外，有组织的看青活动通常局限在谷物方面。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人们有很好的理由使他们的看青任务变短，这意味着仅保护他自己的庄稼。^④ 在冀西南属于黄运一个县的束鹿，20 世纪 30 年代的村庄看青组织都不包括棉花，棉花被认为是最难看护的庄稼^⑤（果园、瓜田和花生也被略去了^⑥）。

“普通的”村庄看青活动也通常混合着对拾荒者和村中穷人的让步。通过禁止外人拾荒，一个村子保护并安抚了自己的穷人。至少鲁西北一个看青组织走出了更远的一步，禁止外人在村里收割时进来找活做；^⑦ 对此，没有留下什么理由，但这项禁约有效地为贫穷的村民保留了活计及残秸剩叶。

看青活动本身提供的活计，仅局限于村中自己的成员。即使在有看青的村子里，也很少让所有村民到田中站岗。取而代

① Arthur Smith, *Village Life in China*, p.163.

② 相关的案例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刑部山东司和河南司档案中，标名为“土地房屋、钱财债务案卷”，案卷号 475 16～19、475 16～21。涉及看青的 9 个案件分别是 15603、15672、15652、15657、15666、15714 号（山东的案件）；13795、13800、14379 号（河南案件）。15603 号案是一名不想离家的村民的叙述。

③ Gamble, *North China Villages*, pp.69～70.

④ Gamble, *North China Villages*, pp.74, 78.

⑤ Gamble, *North China Villages*, pp.279.

⑥ Arthur Smith, *Village Life in China*, pp.162, 276.

⑦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 4 册，第 14 页。

之的是，他们经常凑钱来雇用较穷的村民。^① 因此，那些因拾荒和偷盗限制变得严密而受到损失的一些人，获得了额外的工钱收入；事实上，许多观察者确切地指出，那些从事偷盗的人是最容易被雇用的。^② 通过雇用具有武术兴趣的年轻人，看青组织还可以使村子团结起来；周锡瑞指出，这类雇用为早就在集镇或公路上倾向于追求这种兴趣的年轻人提供了热衷于“地方英雄主义”以代替“游侠行为”的机会。^③

除了一种社区关系外，看青组织有理由对穷人和不稳定分子做出这些让步。看青是艰苦而又难受的事，它使个人和社区均受到困扰。一夜又一夜地睡在田中，人们经常会病倒。^④ 在直隶西南部的一个村子里，1920年鸦片瘾在农民们中间蔓延开来，那时由于受到邻近地区庄稼歉收的压力，该村农民投入了特别多的时间来保护他们丰收的庄稼，使用鸦片来提神。^⑤ 1924年在临清（北部）劝业所的一位官员担心抢棉者将猖獗起来，因为延长看青的折磨实在太大了。^⑥ 同样的晚清凶杀档案中，记载了5起看青者打死闯入者、6起看青者被打死的事件。有两人是被盗贼打死；有两人死于谁应该去看的争端中；一位家境很好的人（他的家在这个地区中可能是在一所有围墙的院子里）被人从他用来看青的草棚中绑架；而在一个案件

① 如见 Gamble, *North China Villages*, p.69;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p. 82; 关于较早的明确地把看青与救贫联在一起的方案，见 Philip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 1970), p. 33。

② 如见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p.82

③ Esherick, *Boxer Uprising*, p.65.

④ Arthur Smith, *Village Life in China*, p. 168.

⑤ 郭异之：《破产声中的一个冀南农村》，见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上海，1935年），第514页。

⑥ 《山东劝业汇刊》第22期（1924年3月），“公牋”第16页。

中，一名带有无关怨隙的杀人者寻到了一名他知道是独自一人且极好下手的看青者。^①

另3起凶杀源于男人离开妻子或女儿独自去看青时所招致的事件。当“家庭问题”导致凶杀出现时，只有长期的辛劳——有5起——才是男人不在的更普遍的原因。^② 这类样本显然太少，不能作为依据。尽管如此，许多学者指出，贫穷男性农民的长期辛劳使他们更加无法控制对其妻子的觊觎，并因此形成了一成不变的贫困农民“散漫的”说法，进一步使他们边缘化。^③ 如果性关系导致的凶杀经常发生在男人看青时，那么，它也可能困扰着家庭，并使“尊贵的”男人希望免于这项事务。

总之，即使担心庄稼贼的农民也知道谨慎通常占据勇猛的大半部分。如果较轻的费用能够让潜在的盗贼变成有偿的看青者，并减少人们在田中过夜的数量，这种报酬就非常有意义。另外，由于人们被雇作看青者时，经常需要一位有身份的“保人”^④，这些活计可以常年用来引导更好的行为（特别是对年轻人和穷人）。最后，农民不得不继续与潜在的从事看青活计来“赚钱”的盗贼、而且甚至还要与偷窃时真正被抓住的人生活在一起。^⑤ 在这种情况下，对那些被抓获者的惩罚趋向于从

① 分别见 14379、15672、15652、15657、15666 号案；13795、13800 号案；15603、15714 号案；16683 号案；及 15638 号案。

② 见 16902、16907、16911 号案；16913、16917、16945、16951 及 14845 号案。

③ Victor Nee, "Toward a Social Anthropolog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11: 3 (July-Sept. 1979), pp. 42~43; Huang, *Peasant Economy*, p.256, 从其他地方转引的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④ Gamble, *North China Villages*, p.82.

⑤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p.83; Arthur Smith, *Village Life in China*, p.163.

轻发落：通常是小额的罚金，偶尔会打一顿（通常是对外面的人），或者，甚至仅仅是教训一通。^①

20世纪30年代，阳谷（南部）和滋阳（南部）县的孩子们所玩的一种叫做“打高粱苗”的捉人游戏，反应了明恩溥在40年前所描写的那种常见的拾荒冲突。在这种游戏中，有时有好几位“看青者”，但仅有1名“拾荒者”（在这些游戏中，有几个人一度被当作逃跑或开小差的士兵来追逐）。在追逐开始前，看青者们问：“你在干什么？”而站在他们背后的拾荒者用一个专指收割后的剩余物的词（“苗”）诚实地做出回答。看青者再问：“你为何还在这里？”拾荒者答：“我害怕。”看青者们然后挖苦地回答：“我们将拿盏灯来送你”，这清楚地说明这种虚构的事件发生在夜间。当然，孩子们的游戏毋须精确地反应成人的世界。还有，模仿的有礼貌的对话及提到的单独行窃者和具体的庄稼剩余物，说明这种游戏模仿了一种有限冲突的场面。另外，这种游戏对那些被抓住的人没有采取“惩罚”；在其他追逐游戏中，他们被迫轮流坐“牢”、被辱或被打。^②

因此，当有组织的村庄看青活动体现了一种本已严重的冲突激化时^③，这种激化仅是恰巧发生在某些村庄，并仍然远未导致阶级的战争。对盗窃者的罚金收入通常花在全村的烧香和

① Gamble, *North China Villages*, pp.87 ~ 96, 296, 301; Arthur Smith, *Village Life in China*, pp.163, 168;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4册，第430页。

② 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山东民间娱乐》（济南，1933年）第1册，第17、20~21、23、64、77、80~81、84~87页。

③ Arthur Smith, *Village Life in China*, pp.164, 168; Gamble, *North China Villages*, pp.77, 85; 一般见旗田巍著《中国村落と共同体理论》（东京，1973年）。

戏剧上，这也非常重要^①：在这里，看青组织也把强迫、让步和“村庄团结”的姿态混合在了一起。

20 世纪 20 年代抢棉者更具对抗性的策略引发了许许多多不同的反应。省劝业所命令各县建立一个“棉业公会”，分支机构尽可能多设。这些组织将散发美国棉种和推广资料、指导讲座、检查庄稼、收集收割后的种子（以免其被重新播种）并颁发奖品；但它们主要任务是保护棉花，防止被抢。所有有案可稽的分会都是多村组织的，尽管有个分会仅有 18 名成员。每个分会所包括村庄的数量，有力地说明了它们是建立在县以下管理单位的基础之上的，它们比那些作为标准购销区域的“自然”单位要大得多。在理论上，它们全都可以被县官或县劝业所的领袖所召集，尽管这种情形可能罕见。不过有份报告把棉业公会与附近的红枪会区别开来，指出它们的组织要好得多^②——而红枪会迄今为止是给人印象最深的以村为基础的联合防御组织。

在其他方面，棉业公会也与所有其他以村为基础的保卫布置不同。县劝业所的领袖及其下属们全都是该县精英分子非常年轻的后代（通常不足 30 岁）；他们全都在山东其他地区的现

① Gamble, *North China Villages*, p. 85; Arthur Smith, *Village Life in China*, p. 168.

② 《山东劝业汇刊》第 4 期（1921 年 1 月），“公牍”第 1～6 页；第 7 期（1922 年 5 月），“各县劝业报告”第 23～24、33 页；第 13 期（1923 年 4 月），“各县成绩报告”第 1～8 页；第 16 期（1923 年 7 月），“公牍”第 44 页；给县官授予的权力，参见《山东劝业汇刊》第 9 期（1922 年 10 月）〔应为 1922 年 12 月。——译者注〕，“公牍”第 22 页；第 15 期（1923 年 6 月），“各县成绩报告”第 42 页；关于与红枪会的比较，见《鲁北十县农业调查报告》，《山东农矿公报》第 13 期（1930 年 1 月），第 22 页。

代技术学校受过教育，但却在他们自己的县供职。^①他们对有财政资助——尽管数量不大^②——及有技术和组织资源、装备及合法权威的棉花、森林和蚕桑组织的领导，体现了他们的权力向下面村庄的延伸，而不是一种由村庄采取的主动行为。在这种意义上，这类组织完全不同于以前的看青组织。事实上，它们更像当时由江西的县精英中激进的年轻成员——当他们受到教育回到家乡并寻求建立自己的政治基础时——所组织的改良主义者学校和“农民协会”。^③

在山东的一些县中，这些改良主义的政治倡导者们加入到了拥有传教士——黄运南部地区乡村头面人物的老对头和带着庞大规划的外部精英——的力量中。事实上，中国最早的农业教育集会——1922年在黄运东部的临沂举行——具有一部舞台剧的特征，这幕戏剧标志着这种联合及其价值与那些赞成它们的大多数乡村头面人物的价值可以相差到什么地步。在这幕剧中，农民们对他们的土棉所售的低价忧心忡忡，求助于“烧香拜佛”。他们被一名美国传教士（演他自己）从这条死胡同中搭救出来；他指导他们到县农业官员（演他自己）那里，这

① 《山东劝业汇刊》第6期（1922年1月），“附录”。

② 关于县劝业所推广棉花的资金，见林茂泉《文集》，第77下～78上页。这些县中，几乎没有哪个县花费了300元以上的公共资金；三项最大的开支中的两项来自西南地区定陶和滕县两县，但这里的美棉却没有成绩。棉业公会本身的收入更难固定，但直到它们已非常成功，开始承包来自棉花经纪业务的税收时，它们才不依赖于每位会员支付的通常仅有1～2元的会费及商人偶尔的捐献。濮县是一个拥有极其能干的劝业所的边境县，20世纪20年代早期，它通过一个“农会”来做推广棉花工作，在1922年花费了340元，见《山东劝业汇刊》第12期（1923年3月），“公牍”第37页。

③ 见 Stephen Averill, “Party, Society, and Local Elite in the Jiangxi Communist Movemen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6: 2 (May 1987), 第279～303页，特别是282～285、299页。

位官员给他们提供了美国棉种，解决了他们的难处。^① 大部分县劝业所的领袖不需要这类联合；在黄运现存的劝业所报告中，没有提到过传教士们。还有，一位劝业所的领袖发自内心地对流行信仰的正面攻击，提醒我们：这些立足于县城和由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人指导的联合会，在多大程度上是改良主义潮流——它来自村庄外面且不能轻易地立足于村庄的传统、制度或领袖——的构成部分。

就像我们应该看到的那样，棉业公会并不依赖于村庄的团结，且并不采用村庄看青者用来增加社区团结的措施。棉业公会也更像相对富裕的组织。例如，在夏津（北部），会员必须拥有 10 亩以上的美棉。^② 在一个户均面积少于 18 亩的县，^③ 这样一种要求就排除了穷人，除非他们孤注一掷地把他们一大半土地押在美棉上，而当时该县仅有 13% 的农田在种植这种高风险、高回报的作物。^④

假如 1922 年夏津种植美棉的地亩数被均匀地分成 10 亩一块，那么，大约有 5000 户符合加入的条件；由于由非会员所种植的任何晚熟的棉花可能是抢棉者容易下手的猎物，所有符合条件的家庭均有着强烈的动机来加入。但在 1923 年，夏津 12 家最老的分会有会员 850 名；这个数字说明这个县“20 余家”分会的会员不到 2000 名。^⑤ 因此，如果不是棉业公会排

① “China's First Agricultural Institute,” *China Weekly Recorder*, May 12, 1923, p.382.

② 《山东劝业汇刊》第 16 期（1923 年 7 月），“公牒”第 42 页。

③ . 据 John L. Buck, “A Statistical View of Shantung,”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1: 1 (Jan. 1927), 第 41 页中的数据。

④ 见博士论文，“附录 D”中关于棉花的数据及 John L. Buck, “A Statistical View of Shantung,”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1: 1 (Jan. 1927), 第 41 页中的总英亩数。

⑤ 《山东劝业汇刊》第 16 期（1923 年 7 月），“公牒”第 44~46 页。

斥了大量拥有小块美棉的农民——这种排斥可能使他们坚持种植这种作物确实很有风险——就是那些成为会员的农民，每人拥有超过25亩的地块，仅种植这一样作物。这样的地亩几乎不可能使棉业公会的会员成为巨头，但他们很可能属于夏津较为富裕的人，像鲁西北其他地区一样，夏津几乎没有什么地主。^① 该省1929年的一份报告指出，临清（北部）超过半数的棉业公会员有弹仓式步枪^②，很少有农民能买得起这件家具。菏泽（南部）仅要求种植5亩地美棉的家庭参加棉业公会的分会，但由于大部分菏泽农民拥有的田地比那些更北的农民要小得多，这种较低的要求可能正好排除了同样多的人。^③ 还有一些线索表明，许多县的公会希望其成员能够识字。^④ 山东省政府最终改变了这些排斥性的条件所规划的方案，试图把所有植棉者吸纳到新的棉业合作中，但此后不久就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⑤

① 该地区通常的土地分配调查见 Esherick, *Boxer Uprising* (esp. 24, 206); Huang, *Peasant Economy*, 及 Myers, *Peasant Economy*, pp.49, 71, 106, 154, 201。

② 《鲁北十县农业调查报告》，《山东农矿公报》第13期（1930年1月），第21页。

③ 《山东劝业汇刊》第7期（1922年5月），“各县劝业报告”第35页。

④ 许多棉业公会的规定中说所有会员必须“有知识”〔如《山东劝业汇刊》第16期（1923年7月），“公牒”第41页〕，但尚不清楚这是否是仅指如何种植美棉的知识，还是也指更加一般的事情。根据该省对这些组织的指导方针〔《山东劝业汇刊》第4期（1921年1月），“公牒”第4页〕，会员必须填写关于他们的种植方法和结果的“详细报告”，如果他们不填写规范的表格，可能被罚款并被未来的种子供应者所拒绝。当然，一位不识字的会员可能会得到帮助。对小册子极大的依赖也非常有意思，尽管不少组织也主办讲座和演示，但一些组织的报告中说，印刷小册子是他们的推广事务。

⑤ 《河北棉产录报》第12期（1936年10月16日），第13~14页。

棉业公会也打断了村中看青组织通过雇用一些穷人从而转化他们的实务。当会员确实支付了应付款项，不用说，报酬被发放了。除了会长和两名副会长，这些组织中仅有的职位，是“检查员”。连同他们的安全保卫责任一起，检查员们有着保存记录和质量把关的任务，这需要文化知识；他们被从“绅民”中选拔出来并得到县长的确认。^① 因此，检查员肯定比村庄看青组织雇用的看守人员的地位要高得多。即便有些人不是这样，这些职位也不能被乡村头面人物用来抚慰自己的穷人；不论后台有多硬，也要受到较高层面的控制。

1943年，高唐（北部）一个66%的田地种植棉花的村庄（县棉花改良协会会长的家乡，对它的棉业公会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成功的地区）调查表明，棉花安全保卫仍然打上了20世纪20年代棉业公会的印记。当村庄凑钱并向完成了劳役和保卫任务的人支付报酬时，它对棉花保卫的处置截然不同。拥有5亩以下棉田的农户全都没有包括在内；其他人则根据他们棉田的大小来确定值夜的数量；花钱顶替的事几乎从未使用过。把棉花保卫任务分摊到村里拥有田地的数量上，这一规定的运用，恰恰说明了这样一种由固定的中农和那些高于他们的人（见表2-2）所做的工作有多大。^②

一些落在了最富裕家庭身上的沉重负担，可能由它们的长工来承担；这些人甚至可能被列入这种家庭的一部分，因此就没有被视为“支付了代役金”。不过，包括这些工作在内的由私人雇佣的长工所承担的任务，与作为一个整体的村庄雇用其穷人来做这项特殊的工作大不相同，而它也不具有“收买”那

① 《山东劝业汇刊》第7期（1922年5月），“各县劝业报告”第33、35页。

② 北支那開發株式會調查局：《魯西棉作地帶の一農村莊における農村勞動力調査報告》，第47、51、52、104～107、117页。

些被禁止拾荒的人的相同效果。再也没有这种方法与“普通”村庄看青安排所形成的对比更鲜明的了。

表 2-2 高唐县祁寨看棉任务分配

拥有田地数量分类 (棉田亩数)	占村庄户数的 比重(%)	承担看棉工作的 比重(%)	合 计	
			人 口	任 务
0~4	17.7	0.0	17.7	0.0
5~14	28.8	15.3	46.5	15.3
15~24	33.1	35.1	79.6	50.4
25~34	9.3	14.9	88.9	65.3
34 以上	11.0	34.7	99.9	100.0

棉业公会会员可以通过看棉来赚钱。例如，茌平（北部）向抓住一名违规拾荒的人，支付这名拾荒者罚金的 30%。这个组织分发的其他奖赏是给那些种植 20、40 或 100 亩美棉的人，这甚至排除了大部分中农；总体而言，这个组织支出的费用显然不是花在社会稳定或增强社区的力量上。^① 棉业公会所分得的向早期拾荒活动“罚没的重金”，用在了一般的开支上（小册子、种子，等等）；^② 与之相比，村庄看青组织把他们所得到的罚金花在了戏剧、烧香或其他使整个村庄团结在一起——至少是表面上——的事情上。

① 《山东劝业汇刊》第 9 期（1922 年 10 月）[应为 1922 年 12 月——译者注]，“公牋”第 22 页。

② 没有资料明确地说明这一点，但许多这样的组织没有其他明显的资金来源，或者，仅有的资金明显不敷其开支。棉业公会的所有报告中也没有提到标志着看青季节结束的全村规模的宴席，这在“正常的”、以村为基础的看青组织中是非常普遍的（如，见 Gamble, *NorthChina Villages*, 第 74 页）。

棉业公会面对拾荒者使用了比村庄看青组织曾经采用的多得多的强制。有些演变成了巨大的联合体：1929年，临清（北部）的棉业公会称，仅在该县的东部地区，就有2000多名会员和1000多条现代枪支（非常有意义的是，棉业公会在该县的西部地区很弱，这里由红枪会掌握安全事务）^①。即使是单独的分会通常也拥有令人吃惊的武装。^②大部分县级公会的规章还具体规定了县警察和自卫队在收获时节将配合它们工作；有些公会中还加入了县林业队，在省劝业所的要求下，20世纪20年代早期还创建了一支领饷的武装力量。县林业公会（将在第3章论述）在需要时也会来帮忙；这些机构是按照与棉业公会类似的路线组建起来的，但通常甚至更不具有平等意识，与传统观念更不相容，并且更加依赖武力。这种由相对富裕的人掌握的非同一般的武力，使县劝业所的报告可以宣布“消除了”、而不仅仅是控制住了抢棉活动。^③

棉业公会还拥有一种非暴力的、不可预测并且极为进步的

① 《鲁北十县农业调查报告》，《山东农矿公报》第13期（1930年1月），第21~22页；但孟达《张故上将自忠家世及临清风光》，《山东文献》第1卷第1期（1975年6月），第75~76页中列出的临清保卫组织所能获得的金属枪支的总数为8000支。

② 例如，见《山东劝业汇刊》第16期（1923年7月），“公牍”第44页中一些较大分会的会员数；今井骏：《抗日根據地の形成過程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思潮》第108期（1971年6月），第38~39页既概述了冀西南地区自卫队和警察开支、也概述了与棉花和花生种植的增长有关的武器装备的急剧增加，尽管他没有具体地说到抢棉问题，但那里的条件极为相似。

③ 《山东劝业汇刊》第9期（1922年12月），“公牍”第22页；第16期（1923年7月），“公牍”，第41页；第12期（1923年3月），“公牍”，第38页；第22期（1924年3月），“公牍”，第16页；《河北棉产录报》第12期（1936年10月16日），第13页。

武器：试验站及其下属机构。这些县级站从当地种植的美棉中收集棉籽，领取由省里从国外购买的或地区性的实验站培育的种子，并进行示范演示及充当育种农场。它们也试图培育出更能适应本地的品种；许多人特别重视培育能早一点成熟的品系^①（地方上的试验，既需要解决土壤的特殊性问题，也需要减少对经费不足的省劝业所网络的依赖）^②。一旦在传统的拾荒日以前成熟的品种被培育出来，这个问题就得到了解决：拾荒者没有越出他们基于年历规定的权利。^③在棉业公会营造的氛围里，只有一方敢于做出前所未有的主张。另外，尽管这些站点是棉花改良的中心——或者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它们似乎没有一处曾经受到过攻击。这样的攻击可能会迟滞新的棉花品种，但它可能会使冲突升级，对此，拾荒者并不希望国家再进行干预。

遗憾的是，对这些冲突，我们仅有些零散的资料。不过，

① 如见胡长准《山东之棉业》，《山东文献》第1卷第3期（1975年12月），第22页；宣统元年（1909）山东省巡抚的报告，见农工商部会议政务处，文件110；《农商公报》第2卷第3期（1915年10月），“报告”，第47页；《农商公报》第2卷第6期（1919年1月），“调查”第2页；《工商半月刊》第6卷第23期（1934年12月1日），第154～156页；《河北棉产录报》第12期（1936年10月16日），第13页；《河北棉产录报》第16期（1936年12月16日），第18页；《河北棉产录报》第41期（1938年8月1日），第29页。

② 尽管省里在临清、济南、齐东和掖县（比我们所说的“西南”地区略东一点）资助了更大规模的研究中心，但大多数县搞了一些自己的研究工作。关于该省网络的种子分配范围（其本身也并不打算够用），见满铁《山东の棉产物》，第6页；不存在一个县的种子不能在其他县种植的问题，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038，案卷号2034，第11上～下页；并见《山东劝业汇刊》各期关于该省坚持每县自己做一些棉花试验的内容。

③ 《乡村建设旬刊》第3卷第18～19期（1934年2月），第13页。

很明显，在西北许多县份中，棉业公会的巡逻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有些县最终还获得了稍微早熟的棉花。^①我所知道的鲁西北地区把抢棉作为一件严重问题来对待的最近的资料是来自1930年，并且，资料中说保卫工作正在越来越发挥作用。^②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为鲁北和鲁西北服务的临清、济南和齐东棉种站现存的报告中，仅提到过一次抢棉^③，而在这个地区，1930年以后的其他许多报告中，一点都找不到。我们反而得知，一旦抢棉问题被解决了，鲁北的农民“相互之间争先恐后地抢夺棉种”；到20世纪30年代，在鲁北，各阶层的农民都有一些种植新品种棉花的田地，而棉花总产量达到了创记录的水平。^④这并不令人惊讶。在1913~1920年大发展时期，棉价比麦价上扬了40%，而在1929~1933年，由于世界经济大萧条本身的结果，棉价下落了不到13%。^⑤进言之，由于棉花市场的运作比粮食市场的运作更有效率，农民们在棉花最终的

① 《山东劝业汇刊》第9期（1922年12月），“各县成绩报告”第25页；《山东劝业汇刊》第10期（1923年1月），“专件”第1页；《山东劝业汇刊》第12期（1923年3月），“各县成绩报告”第27页；Ting, *Recent Developments*, pp.13~14, 17~18。

② 《鲁北十县农业调查报告》，《山东农矿公报》第13期（1930年1月），第34页。

③ 《河北棉产录报》第12期（1936年10月16日），第13页，这次事件是非常罕见的。另外，单个人的小偷小摸行为仍然是一个问题；在高唐县祁寨，农民们不在较远的偏僻田地上种棉，因为他们无法保护它们。北支那開發株式會社調查局：《魯西棉作地帶の一農村莊における農村勞動力調査報告》，第73页。

④ 《乡村建设旬刊》第3卷第18~19期（1934年2月），第13~14页；关于收入数据，见博士论文，“附录D”。

⑤ 数据来自吴承明《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内市场》，《历史研究》第168期（1984年4月），第115、121页中的不同作物的价格变化资料，亦见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5编，第180~182页。

销售价格中所占的比额更高。^① 尽管如此，对于这类风险有着足够的利润来予以补偿，特别是如果一位农民还留些田地种植较为安全的庄稼时。由于美棉所需的劳动是如此的密集，这种新的经济作物甚至可能使拥有小块田地的农民所获得的益处（就像我们所看到那样，尽管对无地的农民无益），要多于先种植它们的更为富裕的农民。

与之相比，我们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仍然在鲁西南地区推广美棉的人那里看到的叙述，依然把抢棉作为他们的主要难题来描述。^② 美棉仍然比其他作物的风险要大：它们需要更多的肥料，因此需要更多的贷款，而这就使得人们依赖其他人来获得种子及依赖市场来购买粮食。^③ 非常重要的是，在菏泽乡村建设派（一个非官方的集中在一个县的坚定的外来者组织）的报告中，经常抱怨他们几乎没有得到当地头面人物的合作。一般说来，20世纪30年代相对稳定的收入，使得劝业所官员的接任者——山东建设厅——承担了横跨数县的基础工程：结果，他们把大部分农业变革的推动工作留给了当地的组织。在西北地区，当地许多这样的组织到那时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日据时期，高唐的棉花改良协会仍

① 吴承明：《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内市场》，《历史研究》第168期（1984年4月），第114页。更有效的网络意味着更低的成本，如果在商人中存在着竞争，这将使农民获益。当许多不同的组织参与到一个过程不同的阶段中时，不一定使之效率变差，把棉花从田中到纱厂相对直接的路线与小麦更加迂回的路线进行对比是很有价值的，如见麦叔度《河北省小麦之搬运》，《社会科学杂志》第1卷第1期（1930年3月），第73～107页中的描述，以及后来日本人在北京大学附设农村经济研究所《山东省济宁县城を中心よせる農産物流通に關する一考察》对济宁市场运作的研究。

② 对这些问题的一般总结，建立在冀西南经验的基础上，见今井駿《抗日根據地の形成過程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思潮》第108期（1971年6月），第22～40页。

③ 《乡村建设旬刊》第3卷第18～19期（1934年2月），第13页。

在组织村级的工程。不过在西南地区，相应的组织从来没有站稳过脚跟；大多数在组建后很快就消失了。菏泽的报告中说，必须创办组织来解决抢棉问题，甚至没有提到 20 世纪 20 年代在那里创建的棉业公会。在西南地区，如果没有坚定的和强有力的本地靠山，新棉种就不会推广开来，并且，这个地区失去了进入棉花市场的通道。

1914~1922 年之间，在棉花大发展的早期阶段，西南地区棉田面积实际上比西北地区的面积增长得快——11.7% 对 5.6%。不过，这个地区的美棉面积仅有 352 顷（不到该地区棉田面积的 5%），与之相比，西北地区的美棉面积达 3970 顷（为该地区棉田面积的 15%）（1914 年美国品种在两个地区均无关紧要）。向美国品种的转换，使得西北地区每英亩的产量增加了 23.1%，与之相比，革新较少的西南地区，每英亩的产量增加了 4.7%；西北地区的总产量增加了 30%，而西南地区增加了 17%。^① 由于 20 世纪 20 和 30 年代这些地区之间用来种植美棉的田亩面积的差异在扩大，棉花购买者们集中到了西北地区和黄运东部的某些地区。1921 年，日本的纱厂主们非常热衷于从西南地区购棉，以至于他们请求一家日本银行规划资助那里的一项重要土地开垦工程（见第 5 章），以确保新田将被用来种植棉花；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人已经不再把鲁西南作为棉花的供应地。^② 20 世纪 30 年代，鲁西北

① 原始数据见博士论文，“附录 D”。

② 关于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日本纱厂的积极性，见 1921 年 6 月 1 日日本产业银行小野副总裁致美国国际有限公司查利斯·斯通的信，见美国国务院《国务院有关中国国内问题的档案（1910~1929 年）》（以下称 Department of State），reel 216，document 3424，第 199 页。与之相比，在满铁《山東の棉産物》中，后来对山东获取和推广机用棉的活动叙述中，西南地区只被简单地提到过一次，在 1940 年日本军队对鲁西南的调查《山東湖沼群地帯の地域調査》中，机用棉仅被作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作物。

和冀西南地区从军阀的压榨下恢复过来，产量达到了创记录的水平，美棉品种曾经构成了该项作物最大的比重。但由于鲁西南的出产仍然是土棉，它们没有外部市场，结果一旦它们恢复到战前（1922年）水平时，就再也没有更进一步的增长。^①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由于安全已经不成为什么问题，在20世纪，鲁西南棉田的比重比以前更加接近西北地区的水平；所种植的是清一色的高产工业用棉。^② 由于许多非经济因素已经影响到了1949年以后的种植模式，这种变化并不能单独地证明：如果当初安全问题被解决了，西南地区可能业已加入到了棉花的大发展中；另外，这种证据并不能帮助我们吧抢棉与诸如明火执仗之类可能有影响的其他安全问题区别开来。不过，1949年以后的走向是另一件证据，它支持了那些把拾荒者与棉业公会之间的斗争视为一种主要因素的当代学者。

区域变化与地方领袖

初看之下，黄运南部棉业公会的失败似乎并不令人惊讶。

① 关于山东棉花生产总的增长趋势，见博士论文，“附录D”；关于产量所达到的新高度，如见 Ting, *Recent Development*, 第13~14页。

② 据山东省农业区划委员会《山东省综合农业区划》，第215页，鲁西南地区所有种植棉花田地的比重大约为18.5%，而鲁西北为25%。这一比率为1.35:1，与之相比，20世纪30年代的比率接近2:1。（见博士论文，“附录D”列出的产量比率为2.56:1〔面积数字没有找到〕，而西北地区有高出1.27倍的土地；可耕田的总数字见 John L. Buck, “A Statistical View of Shantung,”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1:1 [Jan. 1927], 第33~47页。）1932年是西南地区生产非常好的一年，而与西南样本县拥有基本相同面积的西北样本县（11555818:11038082亩），种植棉花的田地面积要高出1.72倍（见博士论文，“附录E”）。不过，1982年的研究中所描述的两个地区的界线与这里所说的界线是两码事。

毕竟，鲁西南一直拥有山东大部分的土匪、食盐走私和鸦片种植（尽管西北地区有差堪比拟的死角，但在那里，新棉仍然得以种植）。^① 劝业所在西南的失败似乎仅是那个以混乱著称的地区的又一个例证。

不过，再看之下，却发现了许多预示着相反结果的原因。人口更加稠密的西南地区的农民们，自古以来就有着更高的产量，本来应该更能感受到最大限度地提高每亩收入的压力。^② 他们还拥有好得多的灌溉条件，这是种植良种棉的一个主要优势。即便新品种在某种程度上比土棉更加耐旱，^③ 但如果春雨不足，西北地区的农民们却不得不改种其他作物，而西南地区的农民将不会受到这么大的影响^④（当 20 世纪 30 年代同样的棉种被引进到陕西时，它们在那些拥有灌溉设施的地方、而不是其他地方立住了脚）^⑤。西南地区的水患比西北地区要多，^⑥ 但这种水患实际上可能帮助了劝业所。甚至在由于上一年的歉收、人们自己没有种子的情况下，也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有利于引入新种子的外来者；^⑦ 这种情形还把老品种与新品种的混合降到最小程度。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西南地区的信贷更

① 地图上临清附近的地区，见 Tiedemann, "Banditry," p. 397。

② Esherick, *Boxer Uprising*, 12~14; Huang, *Peasant Economy*, p. 63.

③ 林茂泉：《文集》，第 66 上页。

④ 灌溉和新品种棉花（这在第一遍施肥时需要有水）的种植之间的关系，在 Raj Krishna, "Farm Supply Response in the Punjab (India-Pakistan): A Case Study of Cotton", 第 1、10 页对印度的背景分析中做了解释；关于黄运的同样现象，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 1038，案卷号 2034，第 27 下页，这份档案叙述了河北宁津农民由于灌溉不完善，放弃了棉花生产。

⑤ 见 Vermeer, *Economic Development*, p. 332。

⑥ 见第 4 章。

⑦ 《河北棉产录报》第 4 期（1936 年 6 月 16 日），第 8 页。

为昂贵，但棉纺织厂可能非常愿意对美棉这样的作物先行放款。

鲁西南的社会结构似乎也比西北的社会更有利于棉花的推广。济宁对西南地区贸易和商业的控制，远比临清或聊城对西北地区的贸易和商业的控制要多得多，而且这个地区强大的精英阶层有力地支持新棉的推广。他们中的一些人，包括一度出任国务总理的潘复（对他更多的叙述见第3和第5章）和靳云鹏，在济南的纱厂中占有股份，为了这家纱厂，潘曾经“恳请过政界和军界的所有人”；这家纱厂创办于1915年，它的确切意图是当其他领域被外商捷足先登之时，它能在这一行业中站稳脚跟。^① 潘复曾在晚清时代担任过该省劝业所的首任会长，尽管较为弱小，但劝业所本身曾经试图推广美棉。他还极大地参与了使济宁成为一个对外贸易方面的开放城市、让铁路修到济宁并推动地区性出口的活动中，甚至为1914年巴拿马国际商品博览会组织了一个展览。^②

因此，西南地区精英中的佼佼者从他们家乡的美棉推广中可以获得许多利益。与济宁的高层领袖们缺乏广泛联系的县精英中的一些成员，可能担心纱厂借款的增加将损害第1章中所描述的那些货币操纵勾当；尽管如此，尚无资料证明这种担心影响了县级层面的棉花推广活动。西南地区的县劝业所似乎一直和西北地区的劝业所同样活跃，而且，支持它们的地区都市

① 关于潘复所组织的棉纺织厂，见《农商公报》第2卷第2期（1915年9月），“选载”第31页。关于他使济宁成为重要出口地的另一项活动，见《农商公报》第8卷第1期（1921年8月），“政事”第56～58页。他所参与的、推动了这个地区铁路和水路交通发展的活动，分别见第3和第5章的论述。

② 《农商公报》第2卷第2期（1915年9月），“选载”第31页及后来对这里的论述。

精英们，要比西北地区的任何都市精英都要强大得多。

另外，西南地区的乡村社会比西北地区分化得更明显，^①而且，人们可能已经预想到，不管什么因素维持着这种更大的不平等，都将更加容易地引进带有不平等结果的新作物。更具体地说，就像周锡瑞在其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中所阐述的那样，西南地区的村庄头面人物对其村庄的控制远远要比西北地区的头面人物控制得彻底，尽管西南地区村际的暴力甚为猖獗。有些人把这个地区描述得特别“封建”；西南地区的许多村庄由一个或几个控制着堡垒、粮仓和其他保卫设施的家族所统治。^②

鲁西南的租佃率在华北（尽管不是整个国家）是很高的；地主是当地的居民，而佃农负有非农作的义务。与之相比，鲁

① 对这两个地区条件的一般性比较研究，见 Esherick, *Boxer Uprising*, 第 12~14、17~19 页。不过，指出他对这些地区的定义与我的定义之间的两个关键的差异是很重要的。首先，周锡瑞把济宁与他的“西南地区”分开。据孙敬之《华北的经济地理》，并据在我看来似乎是鲁西南的经济和政治活动的模式，我把它们作为一个地区来研究。其次，周锡瑞的“西北地区”延伸过了铁路线（直到义和团之后才修建）以东到黄河的入海口（对比山东半岛而言，它仍然属于“西部”）。由于我的兴趣在曾经与大运河有着紧密联系的地区及铁路的发展对这个地区中某些县的影响，我没有把我的区域延伸到东部很远的地方。所研究的区域界线和时段的差异（而非解释上的分歧），也解释了在周锡瑞与我的南北比较研究之间一个表面上的差异。在 1855 年至 19 世纪 90 年代早期之间，由于黄河最容易发生溃患的部分是它的最后 100 英里，周锡瑞对西北地区的定义使他得出了西北地区比西南地区更容易受灾。就像第 4 章将要阐述的那样，在 20 世纪，大部分水患发生在山东的上游部分；因此，即便我把我的“西北地区”或“黄运北部地区”延伸到与周锡瑞的一样，1900 年之后西南地区比西北地区更易受灾的特征，也不可能改变。见博士论文，“附录 E”。

② Esherick, *Boxer Uprising*, pp. 23, 162; 天野元之助：《山东农业经济论》（大连，1936 年）。

西北在该省中的租佃率最低；那里的西北部村庄中确实有着很高的租佃率，地主通常是不居住在村中的资金贷出者，而双方都没有非经济性的义务。西南部村庄更像是同姓的单位，而且在它们中几乎没有“外姓”。^① 总之，当黄运的大部分村庄与华东和华南地区非常普遍的、更具市镇趋向的村庄相比，^② 显得相对“封闭”时，黄运内部的差异仍然极大：西南部的村庄通常比西北部村庄更加军事化、更加“封闭”，并且被更加紧密地控制着。

如果强大的精英们利用其控制来使其土地的收益更高，这种模式本来似乎意味着在西南地区存在着一个制止拾荒活动的成功基础。周锡瑞指出的 19 世纪 90 年代西南地区大刀会和西北地区义和拳之间的反差——义和拳拥有无数的低级领袖，并且既要避免乡村精英们、也要避免政府的控制，大刀会由当地的精英们领导，并在国家强迫那些精英们退出的时候瓦解了——似乎是一个有益的类比。^③ 至于西南地区的鸦片种植和食盐走私，这些非法行径既不损害普通的村民，也不损害村庄的精英们；因此，它们的长盛不衰几乎没有告诉我们有关当地头面人物制止抢棉的能力或愿望。

但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鲁西南从来就没有把抢棉活动控制住，而西北地区的棉业公会就做到了。这种反差进一步印证了前面的结论：与早期的看青组织不同，棉业公会与村庄的团结是背道、而非同向而行的。周锡瑞所描述的西南地区的微观地理——坐落着有围墙的村庄，因此，它们横跨在管辖权

① Esherick, *Boxer Uprising*, pp.12 ~ 13, 19, 23, 24, 27; Myers, *Peasant Economy*, pp.90~93, 107~111.

② 如见 John L. Buck, *Land Use*, 第 343 页中每年花在赶集上的平均天数。

③ Esherick, *Boxer Uprising*, p. 319.

的界线上^①——生动地说明了强大的村庄精英，甚至在匪患和混乱的高峰期，也很想阻挠县政府的控制。而棉业公会得到了根基在县城的精英们的支持，代表了县级层面的权力向乡村地区的延伸。^②

就像他们与政府在镇压大刀会时非常成功的合作所显示的那样，西南部的乡村精英们可以听从官僚的调度，如果他们想这样做的话；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县和乡村力量的联合，可以建立起比在西北地区更为有力的控制。^③ 菏泽（南部）的规定——有着比夏津（北部）较低的财产标准，并有着对村庄头面人物的“管理”角色的规定——说明县里曾做过某些尝试来调整和利用该地区强大的村庄势力。^④ 省府在20世纪30年代为推广美棉所进行的新合作的指导方针也是如此，那时推广美棉的任务在西北地区已基本结束，而在西南地区则举步维艰。^⑤

尽管如此，乡村头面人物在推广良种棉时，并没有他们当初不得来帮助结束大刀会暴乱时所具有的相同理由。作为经常为了农民纳税而提前借出钱款的包税人（见第1章），他们具有不让像纱厂代理人这种新的贷出者渗入进来的动机。不过，社会和政治动机则可能是关键因素。

西南乡村中的头面人物曾不情愿地加入到政府对大刀会的镇压中，这是因为他们确信，如果不这样做，愈演愈烈的反基

① Esherick, *Boxer Uprising*, pp.20, 27, 99.

② 《山东劝业汇刊》第6期（1922年1月），“附录”；林茂泉：《文集》，第40下～42上页。

③ Esherick, *Boxer Uprising*, pp.107, 146～148, 161, 224, 234, 319.

④ 《山东劝业汇刊》第7期（1922年5月），“各县劝业报告”第33～35页。

⑤ 《河北棉产录报》第7期（1936年8月1日），第9～10页；第12期（1936年10月16日），第13～14页。关于20世纪30年代西北地区的美棉与西南地区的棉作物比重上的巨大差异，见博士论文，“附录D”和《河北棉产录报》第7期（1936年8月1日），第6页。

督教事件将导致更加有力的干涉（有可能是清廷，但更可能是外国），并使他们进一步丧失对当地社会的控制；由传教士造成的对那种控制的腐蚀，曾导致了乡村精英们在开始时支持大刀会。^① 与之相比，让良种棉失败，可能牺牲了乡村头面人物某些潜在的收入，但这并不会威胁到他们对当地社会的操纵。不过，在这件事上与政府进行合作，则确实会造成这样的威胁，并可能导致对当地精英统治的进一步侵害。在 20 世纪华北的许多村庄中，看青组织变成了村中最重要的政治机构，经常取代了软弱的寺庙组织。^② 因此，即便棉业公会曾经纯粹是一个基于村外的新的安全体系，它们仍然可能会给许多乡村领袖造成担心的理由。

不过，这种公会也造成了其他可能的威胁。在美棉确实被推广开来的地方，它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社会。农民们变得依赖于村子外面的人以获取种子。有些人需要贷款，这些款项通常来自纱厂的代理机构。在路上，他们需要安全的通道来运输其农产品，而这种通道——与在一个当地的堡垒中为其粮食提供的安全储藏不同——必须在区或县级层面上来组织。^③ 越来越多的棉花交易也意味着要征收新的商业税，这就增强了那些与纱厂有联系的人的势力，并增强了那些与许可征收商业税的县政府有联系的人及县政府本身的势力。^④ 通常情况下，提供

① Esherick, *Boxer Uprising*, pp. 87~89, 121.

② Prasenjit Duara, "Power in Rural Society: North China Villages, 1900~1945," pp. 159, 162; Gamble, *North China Villages*, pp. 2~4.

③ 关于地方上堡垒的重要性，见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第 89~93 页。

④ 如，见今井駿《抗日根據地の形成過程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思潮》第 108 期（1971 年 6 月），第 36 页；关于豫东北和冀西南棉花贸易和棉花税征收的社会学方面的长篇讨论，见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机关代号 2：案卷号 124、3082、3083 和 3084，对 1931~1935 年间存放的腐败案件审判的追踪。

种子、供应信贷、组织农作物保护、收购农产品（以之作为贷款的担保）、轧棉籽（以此来控制种子供应）、确保农产品符合纱厂的质量标准并负责向县政府提前支付销售税，都由同一个组织来做。^① 山东省政府在日本侵略前夜推行的棉花合作，被明确地授予控制所有这些事务的权利。^② 即使在同一个组织没有承担这些全部事务的地方，它们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实际上，为什么山东的官员们如此警惕地看待日本纱厂直接散发种子和收购农产品的原因，就是他们担心日本人对棉花交易税的控制。^③ 20 世纪 30 年代晚期，河北省的官员们抱怨：由于乡村精英们担心新的信贷和购销安排（以及可能的征税安排，这是由于棉花的销售税在河北特别重要）威胁其在当地的地位，他们反对省里的棉花改良活动。^④ 20 世纪 20 和 30 年代鲁西南地区的乡村精英们显然也看到了同样的威胁，并做出了同样的反应。

① 如见 Guy Alitto, *The Last Confucian* (Berkeley, 1979), 第 256~257 页中关于它在邹平是如何运作的叙述；《工商半月刊》第 6 卷第 3 期（1934 年 2 月 1 日），第 108 页；《农业周报》第 2 卷第 48 期（1933 年 11 月 27 日），第 766~767 页；《农业周报》第 5 卷第 27 期（1926 [应为 1936——译者注] 年 7 月 16 日，106 页），第 581 页；《山东劝业汇刊》第 4 期（1921 年 1 月），“公牒”，第 1~5 页；松崎雄二郎：《北支經濟開發論：山東省の再認識》，第 478~479 页。

② 《河北棉产录报》第 12 期（1936 年 10 月 16 日），第 13 页。

③ 见《山东实业公报》第 3 期（1931 年 8 月），第 27~28 页中的一个例子。

④ 《河北棉产录报》第 15 期（1936 年 12 月 1 日），第 8 页；关于商业税在河北所起特别大的作用，如见朱炳南、严仁赓《中国之营业税》，《社会学杂志》第 6 卷第 3 期（1935 年 9 月），第 343~463 页，特别是 367~370、373~376、400~402、405~407、413 页；冯华德：《河北省县财政支出分析》，见方显廷编《中国经济研究》（长沙，1938 年）下册，第 1039~1055 页；冯华德：《河北省牙税性质之演变》，见方显廷编《中国经济研究》下册，第 1067~1079 页。

另外，从棉花和其他贸易的增长中获得额外收入的县政府，扩大了它们的活动。县政府获得了更多的资金后最常见的扩充举措是增加警察。县警察对像西南地区的那些乡村精英们来说，并不纯粹是福音；这些精英们的权力通常来自对其砖墙保护的建筑物的控制，而且他们通常——并非总是自愿的——与非法的土地开垦者、鸦片的种植和走私者及土匪有联系。与此同时，在西南地区把某些粮田改种新棉的村子里，所有乡村领袖可能均已发现他们当地的堡垒在不能被用来装满当地出产的粮食的时候，其作用——不是用来对付土匪、就是用来对付政府——变得更小了。总之，县劝业所既体现了黄运乡村中的国家构建、也体现了市场构建的剖面，这种地位注定给黄运南部的乡村精英带来令其不快的变化。

因此，如果帮助推广美棉，乡村领袖们只能赚到钱财，但却有同时失去钱财和权力的危险；在他们帮助镇压大刀会时，他们曾抢先避免了打击，这种打击可能会消除他们在其中活动的政治空间。在黄运北部，并没有强大的乡村精英来与传教士们竞争或镇压义和拳；因而，那里也就没有这种担心县和商人权力的扩张、或担心村庄失去对看青控制的精英们。

另外，在20世纪20年代，当棉业公会大规模的活动开始时，乡村精英们还有其他的难处。由于不可能获得这个阶段军阀掠夺、随意的附加税和其他盘剥的精确数字，关于其宏观经济意义看法上的分歧就不足为怪了。^① 非常清楚的是，这些盘剥造成了极大的紧张，至少改变了许多村庄正规的政治领导。

① 对特殊情况下中国经济方面军阀割据的重要性和一般情况下军阀割据状态的影响的争论，见 *Republican China* 第10卷第2期（1985年4月）上 Jerome Chen, Diana Lary 和 James Sheridan 的文章，以及 Thomas Rawski, *China's Republican Economy: An Introduction* (Toronto, 1978)。

早在1922年，省劝业所在解释它不愿依靠村庄头面人物来组织植树活动时，认为这是由于乡村头面人物与为其村民们代言相比，更经常地是在摊派附加税，他们普遍受到人们的憎恨。^① 华北许多村庄的头面人物逃避其责任；在一些村子里，仅有当地的地痞（或他们雇用的爪牙）愿意当村长。^② 而这种问题的严重性和它所出现的时机因地而异，更高的要求使村子里的领导更加困难，这种现象非常普遍。

在黄运北部，20世纪20年代，旧的乡村精英——在任何情况下，从未强大到接近黄运南部的程度——几乎全都在逃避职责，或者在此以后，像上面要求的那样，退出了控制。^③ 这种逃避显然标志着他们所有给劝业所和棉业公会的渗透造成假设性的障碍的终结，在这个意义上，劝业所和棉业公会甚至可能从军阀割据的混乱状态中获得了益处。

在西南地区，需求甚至更高。1935年，西南地区有11个县的土地附加税超过了土地正税，而西北地区仅有两个县——均在其南部边界上——是这样。^④ 不过，西南地区的许多乡村精英似乎安之若素，显然是有条不紊地为完成这些更大的榨取进行奔忙。我尚未发现西南地区的村庄像某些西北地区的村庄一样受到“炮弹的震荡”^⑤——即军事榨取摧毁了它们的整个社会结构——的证据。在日据时期，济宁地区是屈指可数的超

① 《山东劝业汇刊》第7期（1922年5月），“论述”第4页；还有植树方面有关保卫任务的同样看法，见林茂泉《文集》，第42下页。

② 如见 Gamble, *North China Villages*, pp.294~295, 及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pp.192~193, 218~230。Huang, *Peasant Economy*, pp.228~229, 看出了早就开始的这种趋势。

③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pp.219~223; Gamble, *North China Villages*, pp.294~295.

④ 《山东财政公报》第6卷第7期（1935年4月），“专载”第11页。

⑤ 关于这一词语，见 Huang, *Peasant Economy*, 第46、313、320页。

出日本粮食需求配额的县之一，并且它比西北地区所受的恐吓要少得多。^① 一项调查甚至发现，在日本人的统治下，靠近济宁村庄里的家畜总数在增加，而西北地区受到影响的村庄里的牲口总数却被毁灭殆尽。^② 尽管没有找到详细的资料，但这种模式似乎说明西南地区的乡村精英们与占领者们达成了一种妥协，并在后来能够从农民身上进行巨大的盘剥，而这需要不引起足够有效的反抗来招致日军的报复性攻击。总之，西南地区的乡村精英不仅比西北地区的乡村精英拥有更大的维持下去的力量；而且他们显然希望维持下去。

除了已经说过的鲁西南社会中的“封建”方面，西南乡村头面人物希望维持下去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所担当的田赋征收者的角色。1859年济宁地区（包括鱼台、嘉祥、金乡和济宁县）的地方志写道，过去明朝的里长（大约100户家庭的收税头领，是1712年以后在这个国家大部分地区被废除的制度的构成部分）与衙役们相勾结，在他们名义上被取代很久以后，仍在这个地区控制着收税事务；而且，在这部方志称这项制度最终被改革后，20世纪30年代，拥有同样名称的人仍在操纵着田赋。^③ 当18世纪的一名税制改革者田文镜抱怨山东几乎没有打破乡村豪强在明朝时所获得的收税权力时，他引用了鲁东

① Myers, *Peasant Economy*, p. 283; 北京大學附設農村經濟研究所：《山東省濟寧縣城を中心よせる農産物流通に關する一考察》，第104～112页。

② 关于济宁附近的增加情况，見北京大學附設農村經濟研究所《山東省濟寧縣城を中心よせる農産物流通に關する一考察》，第110页；关于军阀战争时期西北地区的牲口损失情况，見 *North China Herald*, Dec. 28, 1929, p. 507；关于1937年以后西南地区的改进，見北京大學附設農村經濟研究所《山東省濟寧縣城を中心よせる農産物流通に關する一考察》，第104、109～110页。

③ 《济宁直隶州志》（1859年）卷3，第19上～下、20下～22上页。

和鲁西南的一些县作为例证，但却没有提到鲁西北的县。^① 1902年，一名监察御史抱怨，在征收田赋时，“乡村头面人物”和衙役门的勾结，在山东尤其严重；他没有提到具体的县，但在他另一封大约同时寄出的奏折中，他所处的位置略偏于济宁的东南部。^② 我所见到的晚清和民国的档案很少有涉及田赋的材料，但3篇关于田赋征收者所造成的弊端的报告是来自菏泽和范县，这两县均处于西南部；范县的一份档案中说，田赋征收者是一名乡村头面人物。^③ 迟至20世纪30年代，在鲁西南地区，“里长”一词仍然被用来称呼乡村头面人物，但在鲁西北地区则没有这些称呼。^④

即使是典型的商业税盐税，在向西南地区的许多农民征收时，也要经过其乡村头面人物。清朝末年，菏泽（南部）和寿张（南部）的人民不得不根据他们拥有的土地亩数来购买大量的官盐。^⑤ 由于乡村头面人物在决定什么样的土地要登记、并

① 雍正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奏折，见《雍正朱批奏折补录》（台北，1965年），第3311~3333页；通常见 Zelin, *Magistrate's Tael*, pp.149~152, 及“Hou-hao Kuei-kung”（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1979年度博士论文），第189~197页。

②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一月三十日的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八年，第51~55及32~35箱；也见第64~68箱中光绪二十八年（1902）夏未标日期的片。

③ 刑部山东司档案，案件号15604；《山东财政公报》第5卷第3期（1933年12月），“公牒”第3、10~12页。

④ 《山东河务特刊》第2期（1930年1月），“公牒”第15页；《山东河务特刊》第6期（1934年1月），“公牒”第2页；《山东河务特刊》第8期（1936年1月），“公牒”第2页；《济宁直隶州续志》卷4，第1上页；《山东劝业汇刊》第7期（1922年5月），“各县劝业报告”第33页。

⑤ 《山东杂志》第79期（宣统二年〔1910〕十一月三十日），第14下页关于菏泽方面的情况；《山东杂志》第62期（宣统二年〔1910〕六月十日），第16上页关于寿州方面的情况。

且以谁的名字登记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他们可能也控制着这种税的征收范围。^① 与之相比，在黄运北部，政府使用基于行政中心的机动盐务管理人员来打击食盐走私者，显然是设想这种活动将确保官方产品的购买。这些普遍受人憎恨的盐务巡查人员在回忆录和文学作品中被刻画成“地痞”、“流氓”或“光棍”，并被刻画成行政镇或集镇上的走狗；没有人提到鲁西北、豫东北或冀西南的乡村精英参与了对盐务的强化管理。^② 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西南地区才开始使用一些流动管理人员。^③

西南乡村精英们在各种税收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是他

-
- ① 对村庄头面人物在土地登记和征收土地税方面的作用的扼要论述，见第5章。至少在寿州的事例中，根据土地配额来分摊盐税，显然涉及了这种情况，即把所设置的配额加在一起，比县里的总配额要高，按这种方法，包括地方官在内的征税者侵吞了其中的差额。
- ② 关于鲁西北的盐务管理者及其对他们的反抗，如见李士钊《记高唐谷官屯暴动的领导人》，《文史资料选辑》（济南版）第10辑（1981年），第47~49页。关于这些冲突的小说版，用类似的词汇来描绘这些管理者，是《杀盐巡》，小说宣称刻画了光绪末年夏津附近一名真正腐败的盐务巡查员的谋杀者；它被收录到《山东民间小说》（济南，1984年），第258~268页中。由于不像山东的那些专卖档案，长芦食盐专卖的档案可以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找到，我们对直隶西南边界上的事件有着更加详细的资料。这些档案清晰地说明了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巡查人员对私盐的拦截（如见光绪三十年十月六日中聚生商号的禀，文件231中特别详细的叙述，以及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十一日钰昌茂商号专门解决鲁冀边界贸易问题的禀）；曾发生进村搜捕以试图摧毁非法盐井的事，但在卷帙浩繁的关于直隶西南部走私问题的文件中，除了通过试图改良盐碱地并让人们在上面种植庄稼外，没有提到任何通过村中的头面人物来分摊配额、或在村中确立任何永久性影响的尝试。
- ③ 《山东杂志》第79期（宣统二年〔1910〕十一月三十日），第15上页；Alexander Armstrong, *Shantung* (Shanghai, 1891), p. 126。关于被引进到黄运南部的巡查员，见《山东省县政建设实验区公报》第28期（1935年12月25日），第16页。

们得以维持下去的主要力量源泉；牟利的机会有助于解释在整个 20 世纪 20、30 和 40 年代的困难岁月中，为什么他们中的许多人希望继续留任（或至少选作名义上的村长）。与之相比，在黄运北部，即使那些在村中确实有着强大根基的组织也并不依靠那种单位来获取收入。在黄运的河南和河北部分，即使是红枪会——一种独立的村庄自卫单位的联合组织，在其他地方（包括黄运南部）依赖每个村级分会拥有的土地为基础所分摊的捐献——也转向了商业税：它们创出了一种向棉花趸售贸易征收的税，这种税在红枪会被镇压后由县政府接了过去。^①

当我们在第 4 和第 5 章中来观察治水时，我们将看到在黄运南部的乡村头面人物至少到抗日战争时依然非常的强大。鲁西南的乡村领袖们（不是单个地就是整体地）对土地开垦、水坝修建（既属于非正式但合法的、也属于非法的类型）及为控制水患而对劳役和附加税征收的范围保持较强的控制。例如，1933 年，在菏泽（南部）的乡村建设派为了一个地区的紧急堤坝工程自己动员了不到 200 人之后，它宣布了每 50 亩地出一名劳动力的配额制，对没有完成配额的村长进行罚款。不几天就征来了 1300 名劳动力。如果这 1300 名劳动力代表了那些已经被动员后的另外人数——对此，文中没有说明——那么，与这个地区中 1493 名的配额是恰巧相符的。如果不是，这个数字就是完成了配额数的 87%。^②

① 关于红枪会，通常见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第 198~203 页；关于红枪会在冀西南征收棉花贸易税的起源（这显然也影响到河南东北部的许多棉花贸易），见 1934 年 12 月 12 日向财政部的呼吁书，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行政院秘书处文告选，机关代号 2：案卷号 3084，文件号 22121。

② 《乡村建设旬刊》第 4 卷第 14 期（1935 年 1 月），第 10、19 页。

尽管如此，乡村精英们在治水活动中的不断成功，主要问题不是需要敷衍了事（例如，无视要求毁掉非法堤坝的命令），就是在面对明显的威胁时需要零星的劳动力动员。如果他们承担制止抢棉方面的任务，西南地区的乡村领袖们可能将不得不进行更久、更艰巨和更分散的动员。实际上，假如西南地区存在着两极分化的阶级结构，那么，镇压抢棉可能需要精英们做出更大的努力，他们缺乏西北地区加入到棉业公会中的稳定的中农和富农这样的广泛基础。尽管新棉有着经济上的收益，但西南地区的乡村精英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却几乎没有什么热情来付诸具体的努力。成功的政治后果可能让他们付出了代价而让都市的纱厂和县里的国家构建者们获益，但同时却会激怒他们的许多村民主顾。而且，如果精英们试图从新棉中获利的话，他们也会变得依赖于外来者们。相反，如果西南地区的乡村精英们由于不能制止抢棉或是在推广新棉等别的方面惹恼了纱厂的代理者们——从农业学校回来的毕业生——并且，偶尔也会惹恼传教士，这种行为（或不作为）可能会导致紧张的扩大，但它可能不会威胁到他们的地位；完不成其他突然变难的任务（如征税批标）则有可能会危及其地位。因此，至少与劝业所的不合作是理所当然的。考虑到黄运南部的社会结构，不合作更足以确保新棉的失败；即使在更加平均的西北地区，家境好的农民也曾不得不率先加入改良和强制性的组织。

在我们研究的整个阶段中，西南地区的乡村精英们一直强大得足以与国家保持一定的距离；关于治河工程的章节将提供大量的事例。而且，只要税收没有被扣留，国家很少倾向于压制这种情形。即使在1905～1913年的禁毒运动中——人们知道西南地区的许多乡村头面人物容忍或保护着鸦片——国家对这个地区也仅是轻轻地敲打了一下。在鲁西南地区，禁烟的努

力极大地依赖于里长来确定罚金，严格地限制着从县城来到农村地区的检查人员的数量和权威，以免他们“引发暴行”。^①恩县（北部）禁烟活动的报告没有提到这些防备，而高唐（北部）执行问题的报告则强调了有势力的鸦片商（不是种植者）与县里官员的关系。^②

20 世纪在中国产生的、私人组织的、受过都市教育的各种浪潮中的改革者们也发现黄运南部的农村地区特别冷漠。在清朝末年，有着“现代”观念和举止的学校教师被人动手逐出了曹县（南部）和菏泽（南部）。^③后来的组织做得也并不好。例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在菏泽（南部）从未建立起村级的“教育中心”，而这在邹平（在黄运北部略东一点）则是其计划的核心。这种失败部分地归结于那些经营邹平与那些经营菏泽的人之间的意见分歧；不过，这些改革者们显然发现西南地区的村庄更难渗透。^④菏泽的干部抱怨村里的头面人物和地主几乎不可能进行合作，而在可以取得进展之前，将不得不选出新的村长；他们指出，为了找到愿意“合作”的人，必须深入到村庄通常的领导层以下。在邹平，外来者极易在村庄中站稳脚跟。菏泽的组织还发现，在菏泽的村民们与当地的集镇之间极少有什么中介的联系，并存在着许多文化反差：相互之间的敌意很深，而村民们甚至很少参加那些镇里的活动（诸如赌博之类），他们喜欢在他们自己

① 《山东杂志》第 26 期（宣统二年一月三十日），第 19 上～下页。

② 《山东杂志》第 92 期（宣统三年六月三十日），第 31 上～下页；《山东杂志》第 93 期（宣统三年七月十五日），第 32 下页；《顺天时报》宣统三年六月二十七日（不分页）。

③ 《山东杂志》第 91 期（宣统三年六月十五日），第 31 上～32 下页；《山东杂志》第 92 期（宣统三年六月三十日），第 30 下页。

④ Guy Alitto, *The Last Confucian*, pp.265～266.

的村子里活动。^①

早期中共的组织者们也发现鲁西南地区的村庄特别难以渗透。在中共的都市活动阶段，他们似乎在济宁（南部）比在聊城——他们在西北部最大的根据地——更加强大。在这两个城市中，许多早期的新党员是师范学校的学生。像这些回到家乡当教师的新党员对中共后来在鲁西南的农村活动极为关键，^②很像他们在更加成功的江西活动中的作用；并且尽管这些学生通常比省城毕业回来成为县劝业所官员的学生们的地位要低，但在这两种事情之间存在着非常有趣的对应。尽管激进的师范生在济宁可能比聊城更多，但除了在一个边界县极北边缘的一个地区外，1937年以前所有中共在农村活动的故事全都发生

① 《乡村建设旬刊》第5卷第3期（1935年9月），第3~4页；《乡村建设旬刊》第4卷第28期（1935年5月），第18~20页；《乡村建设旬刊》第6卷第2期（1936年9月），第1~5页；《乡村建设旬刊》第4卷第14期（1935年1月），第15~16、18页。

② 如见吴国桂《玉堂星火——济宁市玉堂酱园工运概况》，《山东工运史资料》第16期（1985年2月10日），第12~17页，特别见第13页；《玉堂星火》，见《济宁市史料》第1期（1983年），第40~51页；《山东工运史资料》第6期（1982年12月10日），第33、37、39~40页；刘南云：《忆党在济宁市的早期活动》，《济宁市史料》第1期（1983年），第5~17页，说明在济宁，中共在罢工及学生示威和学生组织中均起着重要的作用。与之相比，在城市活动阶段，北部地区组织的响应和计划似乎更加有限：王瑞征执笔《尉迟修职同志在临清的革命活动回忆》，《聊城地区党史资料》第10期（1984年），第3~10页；李士钊：《解占波同志事略》，《聊城地区党史资料》第10期（1984年），第61~65页；《党在德州地区早期活动的几件大事》，《德州史志通讯》第2期（1986年），第24~26页；谢鑫鹤：《聊城师范学生的革命风潮》及徐运北《鲁西北党的建设片断回忆》，均见聊城地区行政公署出版办公室编《光岳春秋：山东革命斗争回忆丛刊》（济南，1981年），第1~3页，叙述了许多在聊城和临清有限的和流产的城市活动。

在西北地区。^①

渗透性、开放性和社会经济的变迁

一个村庄的“渗透性”不要与这个村庄的“开放性”相混淆；“渗透性”就是让外部组织的代理人能够相对轻易地渗入进来，“开放性”这个词通常用来指那些村民离村相对频繁并与更加广阔的世界建立了联系的村庄。施坚雅对稳定时期中国村庄开放性的经典论述，强调指出当大部分向上流动的机遇要求离开村庄时——至少短暂地从事某些购销活动和经常长期在都市工作、科举考试，等等——那些寻求这些途径的人仍然被视为村里的居民。另外，某位成功地爬上了社会阶梯的人最终会把财富和商品带回到他的家乡来，他和他的亲属将在那里享受这些成功的果实。不过，当一个王朝处于衰落时，外界的机遇将会变少，国家和/或它无法控制的那些人将变得更具掠夺

① 仲中明：《阳谷坡里暴动回忆》，见聊城地区行政公署出版办公室编《光岳春秋：山东革命斗争回忆丛刊》，第27～35页；李士钊：《赵一征烈士传略》，《山东党史资料》第2期（1981年），第167～177页；《近代鲁西北地区农民斗争史略》，《聊城地方史志》第2期（1983年7月），第11～15期；李士钊：《记高唐谷官屯暴动的领导人》，《文史资料选辑》（济南版）第10辑（1981年），第43～60；《杜步舟同志忆中共金南特卫队的几件大事》，《德州史志通讯》第1期（1984年），第17～19页；徐运北：《徐庄党支部的早期活动》，聊城地区行政公署出版办公室编《光岳春秋：山东革命斗争回忆丛刊》，第54～64页，特别是55页注意到了像范县和濮县这样远在南部的某些农村组织；不过，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些组织活动是由其兄弟是乡长的一名党员在一个与其同姓的村中所干的。因此，在乡村头面人物之间（即使他们中的一位有着激进方案）比外人对他们的挑战更可能存在着冲突。也见 David Paulson, “War and Revolution in North China: The Shandong Base Area”（斯坦福大学1982年度博士学位论文），第26～36页。

性，而村庄将趋向于“封闭”。^①

尽管如此，在一个把人送出去寻求升迁途径——并可能有助于形成源于权力中心的变革——的特定社区，与它对外来者的接受并被外来者所改变的本身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的关系。另外，进入一个社区来增加他们自己财富的人，仅一小部分有极大的潜力来干所有扰乱当地精英们的权力或极大地改变主人社区的生活的事情。因此，那些确实抱有破坏性变革目标的人在一个特定地区行使职责时的便捷——显示了它的“渗透性”——必须与该地区的“开放性”区别开来。

这种区别似乎被黄运的事例所证实。黄运北部的村庄可能并不比黄运南部的那些村庄开放，但它们却确实更具渗透性。黄宗智曾经令人信服地指出，华北中农的离村时间最少，这是因为他们并不富得足以参加集镇上的许多事务或娱乐，并且也不太穷，以至于他们必须离家打工。^② 由于鲁西北村庄比鲁西南村庄的阶级分化要小，^③ 那种认为西北部地区离开其村子的平均人口要更少的观点至少表面上有些道理。尽管如此，许多靠近运河的农业县，不论是在黄运的北部，还是在其南部，有着与这条水路联系在一起的悠久的临时外出打工的传统；^④ 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确认是否黄运北部或南部的人在地理上更具流动性。

就像黄宗智一再指出的那样，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把

① G. William Skinner, "Chinese Peasants and the Closed Community: An Open and Shut Cas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3: 3 (1971), pp. 270~281; 特别是第 273~275 页。

② Huang, *Peasant Economy*, pp. 222~223, 308~310.

③ Esherick, *Boxer Uprising*, pp. 17, 25, 103, 206.

④ 如见 Susan Naquin, *Shantung Rebellion* (New Haven, 1981), pp. 11, 18, 21~22.

到集镇上赶集（或去其他地方）与接受外来的影响等量齐观——人们经常去那些地方，除了他们同村的人，不与任何人谈话。^① 清朝末年，曹州（南部）提供了一个外出旅行如何在事实上可能强化村庄的封闭的事例：1907 年的一份报告称，那里准备走远些的人，总把一群带刀的邻居汇集起来一道走。^② 相反，位于鲁西北棉花产区中心的恩县后夏寨村显示了呆在家中的倾向未必会给外来者造成障碍。该村占据绝对优势的中农人口认为他们自己“高于”长年的打工者，并因此从 80 多英里以外的泰安引进人口。^③ 最后，20 世纪 50～70 年代在农村地区的中国人，他们可能比过去更不可能太多地离开自己的村庄并与那些来自其他村庄的人融合^④，但受外来机构的影响远远超过他们所有的前人，这也提醒我们：一个村庄给外界组织者（它们是国家、公司、宗教或其他东西的代理者）提供的可渗透性与其居民地理上的流动性是有区别的。

黄运的许多农民能够接受送上门的农业改良，但如果他们出去寻找合适的改良则大概是非常困难、且非常昂贵的（即便是整村共同担负这种风险事业）。因此，即使在不需要由县里发起的新的强制和种子分配的地方，可渗透性对农业变革来说可能比开放性更加重要。^⑤ 这个事实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由传教

① Huang, *Peasant Economy*, p. 221.

② 《山东杂志》第 2 期（光绪三十四年一月十五日），“民风”第 1 页。对 19 世纪法国的某些农村移民组织的研究，早就提出了在某种程度上有些相似的看法。如见 Martin Nadaud, *Mémoire de Leonard, Ancien Garçon on Maçon* (Paris, 1948), pp. 13～14, 69～78（特别是第 74 页），81～82, 101。

③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 4 册，第 178 页。

④ Huang, *Peasant Economy*, p. 308.

⑤ 即使最善于接受新事物的农民出去做像寻找改良之类的事，也几乎没有什么意义的观点，来自 Schultz,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第 169 页。

士而非国家引进的良种花生在西北地区也比西南地区推广得要快。^① 有人甚至会认为西南部地区的农民比西北部地区的农民更倾向于到东北打工（尽管旅行的费用可能更高），部分原因就是西南地区村庄的“不可渗透性”所致^②，这阻止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并因此使穷人们更难在家乡附近发现新的机遇。

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黄运南部村庄可能更有利于抓住某些送上门来的机遇。例如，有人想到了第1章中提到的范县的村长把“他的”村民们编成小组，临时加入到现金贸易中；这些小组与来自一个结合得更加松散的社区的利润追求者相比，也许可以更好地维护保持高利润所必需的同一价格。不过，大多数更有前景的新机遇与更可渗透的社会结构是更为谐调的。因此，如同他们的村庄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几近惟一的“掮客”一样，村庄首领们保持其地位的愿望和权力，是决定黄运不同类型的村庄被纳入到新网络中程度的关键变量。在这些意义上，传教士、义和拳、纱厂代理者、乡村改良者及早期的共产主义活动家们均发现鲁西北比鲁西南更加容易渗透。

在促进变迁方面，特别重要的之所以是可渗透性而非开放性，部分在于我们所研究的这个阶段的功能。例如，1949年以来，在没有得到国家支持的外部组织者们一直极为罕见并极其软弱之时，国家甚至对最不可渗透的村庄也能发挥巨大的影响；因此，开放性可能是把许多变化引入到村庄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① 见博士论文，“附录E”。

② 数据很难获得，但所有对20世纪30年代西南地区贫困的叙述，均把东北的封锁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而对西北地区问题的叙述则说得很简略或根本没有涉及。详见第1章。相反，20年以前，有人发现了更多的关于西北地区人民到别处打工的资料；如见 *North China Herald*, Nov. 16, 1912, p. 433. 鲁西南特别依赖于由东北移民汇回的硬通货，是由于其有限的出口所致，见第1章的论述。

之中的惟一的地方因素。盛清时期的国家从未像中共那样深入地渗透到乡村中，而各种非国家的组织者们（宗教派别、商人，等等）比它们在 1949 年以后大部分的时间里都要强大；还有，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地人（即其开放性）不同程度的流动，特别是通过在政府供职，对盛清时期比对我们这个时期更为重要，而可渗透性中的差异在那时的影响则要小得多。

尽管如此，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混合着通常与王朝的兴盛联系在一起的经济机遇，以及与王朝的衰落联系在一起的异常的掠夺式环境。在此期间，许多知名的组织者们想把村庄并入到各种新的网络中。与此同时，几乎没有外部的、甚至是国家的代理者强大到能够使自己对他们所选择的任何村庄保持连续的影响。最后，这个阶段严重的混乱促使许多村庄想方设法把外来者赶出去，就像施坚雅的开放和封闭姿态的循环模型所指出的那样。结果，对这个时期来说，在解释不同类型的村庄与更广阔的世界关系中的变化时，把可渗透性而非开放性置于最重要的地位可能不无道理。

于是，在最后，社会和政治因素基本上解释了为什么农业改良在鲁西北而非鲁西南地区得以进行下去。在 20 世纪之交，西北地区在大多数方面比西南地区更加“落后”：它的人口更多地从事农作，每英亩的产量更低，它的城市更小（就像我们在第 5 章将要见到的那样）且在衰落而不是维持原状。它可以利用的交通绝不好于西南地区。^① 而在西南地区因匪患比西北

① 从临清到天津的路程比从西南部的运河去上海要便宜，但一般说来，西南部比西北部去济南和青岛更容易。而西南地区一些县到济宁的距离，比西北地区的任何地方到交通线的距离都要远，尽管小麦每磅远没有棉花值钱，但它们确实在想办法通过济宁输出像小麦之类的产品。关于 20 世纪早期中国许多标准商品的价格与重量的比率，见 Sands, “Investigation,” 第 64 页；关于 20 世纪 30 年代实际上有输出的各县名单，见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 2 编，各处。

地区更加臭名昭著之时，在一些官员看来，在关键的 20 世纪 20 年代，这两个地区在这个问题上差堪比拟。^① 另外，在义和团起义期间，是西北地区不久就出现了无法控制的混乱。不过，这种失控是西北地区推广棉花新品种成功的关键：它缺乏统治性的乡村精英，并因此给外来的组织者们——在这里，既有那些带来新品种的人，也有那些建立棉业公会的人——提供了更大的可渗透性。这些组织者们进行了看得见的、有时很残酷的干预，把黄运和沿海纳入到了一个融合得更好的农业市场中。

经济和政治的融合从来都不是完全分开的、自愿的或无代价的。其代价也未必局限于像抢棉被制止那样的“过渡性”阶段。鲁西北将再一次极大地承受其可渗透的苦果，就像它在基督教与义和团的冲突中一样。20 世纪 20、30 和 40 年代，黄运北部的许多村庄在其未能满足入侵者的要求时，一再受到了可怕的暴力蹂躏；组织得更加严密的西南部村庄似乎做得更好，尽管它们为相对的平静付出了重大的代价。^② 即使在稳定时期，可渗透性也存在着危险，这是因为那些进入者常常会居于统治地位，就像不可渗透村庄中的精英们那样。例如，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那些已把自己确立为信贷和种子重要供应源的日本棉花采购者，开始用鸦片来向农民偿付部分的秋后欠

① 《山东省县政建设实验区公报》第 12 期（1935 年 11 月 23 日），第 11 页；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电报，行政院于 1930 年 11 月 29 日收到，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机关代号 2：案卷号 183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直皖战争》（南京，1980 年），第 275 页。

② 见北京大学附设农村经济研究所《山东省济宁县城を中心よせる農産物流通に關する一考察》，第 104～112 页；Myers, *Peasant Economy*, 第 283 页，关于日据时期鲁西南地区相对稳定的论述；西北地区的情况，见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pp.219～223。

款。^① 而且，尽管其他因素要更重要的多，但黄运北部高度地集中于棉花种植，对 1920 和 1928 年的饥荒几乎不可能有所帮助，在这两场饥荒中，黄运的北部比南部所受的打击更大。^② 不过，总的说来，与西南地区的村庄从它们的不可渗透性中所得到的益处相比，西北地区的村庄从它们的可渗透性中所获得的益处要多得多。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会见到行政管理网络中软弱的整合，与不能更彻底地和更大的商业网络相联接相比，甚至让黄运的村庄——特别是南部的那些村庄——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尽管如此，那些行政管理网络中的密切合作，也许甚至比新品种棉花更能威胁到传统的安排。

① 《山东实业公报》第 3 期（1931 年 9 月），“训令”第 27 页。

② *North China Herald*, Oct. 2, 1920, p. 24; *North China Herald*, Nov. 24, 1928, p. 301.

第三章 生态危机和 “自强”逻辑

第2章论述的政府对良种棉的推广，是其发展黄运——或至少是黄运北部——经济最成功的活动。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即使是那种成功也导致了出乎意料的问题。政府其他农村发展的大部分努力涉及应对华北的生态问题。这些努力则远没有那么成功。

市场、国家和生态

黄运越发深重的生态危机，部分原因是由于它受到了特殊的打击，这类打击包括黄河的改道、大运河的淤塞以及无法得到这个地区曾经通过长途贸易获得的木材和石头。但是，这些困难也有着更加系统的根由。在交通问题使黄运通过市场来解决像获得充足的木材供应这类问题的前景暗淡之时，关于经济发展的新观念在官员们中间变得甚为流行；这些观念导致他们轻视、甚或牺牲像黄运这样的地区。直到19世纪，明清的治国方略曾一直资助这个地区的生态稳定化，在那些私人经济无法做到的地区，曾极大地使用了国家的资源来保证其再生产；但新的治国方略加剧了地区的差异。本章

着重从毁林方面分析清末与民国时期中国国家对重商主义的偏重如何从根本上增加了黄运的生态问题。第4和第5章将着重论述治水问题。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许多地区承受着严重的环境恶化问题，但黄运的问题则尤为突出。中国大部分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往往是其最繁华的地区；一穷二白的黄运则是一个例外。它包括山东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而山东又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省之一；该地区的河南和河北部分也相对稠密。^① 全中国的人口在盛清时飞速增长，给我们这个时期的生态问题种下了根苗。^② 不过，马尔萨斯学派所说的压力，并不能单独地解释为什么19世纪中期以后的生态问题极大地恶化起来：经过了1850~1880年这个阶段的战争、水患和旱灾之后，黄运的人口直到1949年以后才明显地超过它在19世纪40年代的数字。^③

除了人口的压力以外，黄运还存在着3个严重的生态问题。其一，它与过去的主要原材料供应地失去了联系，且没有找到新的供应地。其二，使市场解决变得困难起来的同样

①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Decennial Report, 1912~1921》，第189页；東亞學所：《山東湖沼群地帯の地域調査》，第127~130页；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5编，第35~60页。

② 对何时——如果有的话——中国人口已超出了“马尔萨斯”极限的研究，已足以理智地集中到了食物供给的问题上。一般说来，人们已认定粮食生产与人口增长保持同步，但某些迹象显示，在19世纪早期，人口的密度可能已经达到了“自然的”极限。见 Ho Ping-ti,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Cambridge, Mass., 1959), esp. pp. 183~195, 229; 及 Dwight Perki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 (Chicago, 1969), esp. pp. 25, 27, 29。

③ 如见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第11页；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1编，第35页。

的孤立，还使黄运被政府赋予了一种次优地位，政府最关心的是威胁到它们同其他政府竞争的能力的问题。因此，像植树造林那种可以充当一种进口替代的保护活动被置于了优先地位，否则的话，那个地区就要进口木材。另外，国家希望通过增加当地的供应，使之毋需进口的木材，并不局限于美国、加拿大或俄国的进口。就像我们在第1章看到的那样，省政府也担心它们自己的支出平衡、货币流动和自主性；结果，省政府也把华北沿海地区对东北木材的大量采购视为“进口”，而用当地的生产来代替（在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对国民政府来说，这个地区还变成了“外人的地盘”）。另一方面，像黄运这样的地区，由于没有良好的交通来进口像木材之类的大宗货物，并没有进口来替代，而国家对它们的问题则几乎不予关注。其三，黄运本身没有可以限制人们从生态上极为关键的村外地区（河堤、山坡、荒地和以前的林地上）榨取资源的组织。

前两个问题对那些既缺乏现代交通、又缺乏可航行的河流的地区则尤为突出。第三个问题比较广泛，但在黄运则特别严重，它的部分地区尤其混乱。当然，在一个当地所出产的燃料供应是其所获得的仅有的燃料的地区，劫掠正在生长的树木是一个尤其严重的问题。

恶劣的交通、不明的产权以及普遍的动荡加剧了黄运的生态危机，并封死了市场解决之路。我们将通过分析那种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及观察毁林的范围——由市场失败所引起的一个特别严重的环境问题——来开始我们的论述。

本章的第2、3节将考察为什么政府补救性的努力对黄运并无帮助：原因是多种客观困难合到了一起、当地政府的能力有限及政府高度的重商主义倾向。按照省里的要求，当地政府组建了很像前一章所述的棉业公会的“林业公会”；林业公会

开展了巨大而又零散的植树活动，并偶尔严厉地惩治“树贼”。不过，它们无法运用并不丰富的资源坚持不懈地给树苗以照应和保护。由于树木比棉作物更为分散，成长的期限也更长，因而，使用由那些对生长中的树木拥有产权的人充当义务巡守人员（一种在保护新品种棉花中所使用的方法的延伸）的方法，根本不适用于保护树木。

其间，更高级别的政府对黄运的毁林漠不关心。这个地区特别尖锐的燃料短缺（从其燃料的价格远比那些更容易获得燃料的地区要高这一事实中可以明显看出来），意味着这个地区成功的植树造林将极大改善其总福利。尽管如此，根据省和中央政府通过减少进口或鼓励出口来改善其支出平衡的主要经济目标，发生在这样一个——与沿海地区并不紧密的交通联系，已经堵死了输入像燃料这样的大宗商品——地区的一切并无太大的关系。国家所进行的努力确切地集中到了那些可以使用硬通货来通过市场解决其生态危机的地区。

事实上，缓解黄运燃料危机最快捷并可能是最好的方法（改善交通）也许确实妨碍了政府的某些目标，这是由于它可能会使输入的增加超过输出。本章的最后部分将要考察政府的侧重点及交通方面的政治，来解释为什么黄运没有获得它必需的基础设施。

这里所强调的模式（地方政府无力从时空方面转移资源；县级以上重商主义的官员们给黄运的次优地位，甚至当资源用在那里时，可能会为人们提供比沿海地区更多的福利；及国家无法渗透到黄运南部的村庄中）将在最后两章中以更大的篇幅再次论述。这些部分将对生态退化的叙述扩大到治水、特别是黄河治理方面。这3章一起描述了国家从有助于再生产黄运经济的生态基础——尽管是无效的、且以牺牲中国南方地区的税收和漕贡的承担者们为巨大代价——在外国

的压力下，向放弃黄运而把财力集中于更容易改变及通常更富裕的地区的转变。

封闭、燃料短缺和森林砍伐

在水利系统处于鼎盛时期，黄运从其他地方获得了大量有用的原材料——那些因人口过于稠密而无法自给自足的材料。19世纪中期大运河与黄河运输的同时衰落，意味着破坏生态的结果，使黄运再也无法进行这种贸易了。

这些材料之一就是石头，它对修筑堤坝是绝对不可或缺的。第4章将更详细地考察这个问题。在这里，有两点值得加以注意。第一，19世纪30和40年代黄河改道以前的财政问题，使得清政府试图把河务工程的运输费用经济化；这项政策对靠近黄河的黄运部分地区最终起着灾难性的影响。^① 第二，尽管特别重要，但石头问题仅是一种单独的试图削减政府工程运输费用（包括向京师运送漕粮的费用）的更加常见的尝试。^②

① 这种经济化的最重要的例证是把漕粮折为现金的方案，这在19世纪20年代初变得更加频繁和坚决。在修堤物资运输方面的节约计划，是道光年间（1821~1850）改革方案的常见主题。这种变化的效果——用当地材料替代石头来修筑黄运地区的黄河大堤——详见第4章。尽管如此，这些担心并不限于财政危机的时代；山东早在18世纪20年代就在修堤时减少对柳树枝的使用，以节约运输费用。对那里所取得的不同河流的治理物资的总结，可见《山东通志》（1915年）卷124，第3442~3444页。也见 Kate Leonard, "Grand Canal Grain Transport Management," *Modern Asian Studies* 22: 4 (1988): pp. 665~699。

② 见第4章；James Polachek, "Gentry Hegemony in Soochow," in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Frederic Wakeman and Carolyn Grant (Berkeley, 1975), esp. pp. 223~224, 226~227, 252~253。

政府不再通过命令对地区性劳动力进行划分，在沿海或沿着可通航河流两岸的地区不会带来什么问题。在那里，水路基本上毋须维持，并在轮船出现后很快变得繁忙起来，使私人贸易能维持或扩大融合的益处。但在其他地方，私人团体却并没有来治理薄弱环节。像在黄运这样的地区，由于没有了曾经通过贸易获得的原料，稠密的人口被迫凑合着生活，像在修筑黄河堤坝中使用秸秆之类的劣质替代品，可能要导致灾难的发生。

当所涉及的商品比石头具有更多的用途时，甚至更大的问题跟着发生了。黄运与更广阔的世界有限的经济融合方面一个至关重要的例子是木材贸易、或是它的缺乏。当 19 世纪中期中国许多地方在开发更远距离的木材供应地时，黄运的外来木材以及对外部木材的获得途径却越来越少，并且看出其本地的供应在迅速萎缩。

这种衰落具有包括严重的燃料短缺在内的不同凡响。即使是对仍然存在于 20 世纪 30 年代鲁西南地区总人均燃料供应（包括麦秆、野草，等等）方面所有有疑问的数据最大胆的估计，也仅占当今研究者们所认为的最低限度的“生存”所需燃料的 27%，这里所述的“生存”，包括做饭、烧水和备作饲料的柴草，但不包括取暖（除非作为做饭的副产品）或照明。^①占最低限度 27% 的供应，比同时代孟加拉国特别贫穷的地区

① 数据见博士学位论文，“附录 F”。这些最低限度燃料供应的估计数来自 Smil, *The Bad Earth*, 第 150 页及亚洲发展银行: *Asian Energy Problem*, 第 114 页。也见 Smil, *Energy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Armonk, N.Y., 1988), 第 47~48 页。显然，许多人仍然生活在“生存限度”以下；燃料匮乏不像粮食匮乏那样具有直接和必然的影响。不过，生活在这些水准以下的人们所不得不放弃的东西——熟食、开水，等等——确实明显地影响健康，并在几乎所有的地方都肯定被地视为“必需品”。

所能获得的燃料供应（36%）要略低，孟加拉国这个地区人口的密度相当于20世纪30年代山东人口密度的3倍，而这里的燃料短缺仅与非洲萨赫勒*和其他这样的一些地区差堪比拟。^①鲁西北比鲁西南仅略好一些，能够提供的燃料供应占最低限度的31%。^②

燃料短缺导致了巨大的痛苦，使得负责拾柴和烧饭的妇女儿童花费了不计其数的额外劳动，并且还引发了社会冲突。^③我们尚不清楚什么样的个人节俭措施是最为普遍的，但所有可能的选择——在一些寒冷的日子里不生火，凑合着过，在冬天尽量不离开炕（一种集床、灶和坐具于一体的混合物），^④少吃熟食——都涉及严重的煎熬和健康冒险。

用经济术语来估测燃料危机则更加困难。由于购销的燃料相对较少（据卜凯的统计，这部分燃料在华北燃料总数中占19%^⑤）；结果，这部分在市场上销售的少量燃料，价格极不稳定，成了人们对他们自己所拾集的燃料价值的糟糕的衡量标准。但如果我们把柴草的市场价格（一种粗劣的燃料及建筑材料）作为燃料价值的大致衡量标准，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一些

* “萨赫勒”在阿拉伯语中意为“沙漠边缘”，指撒哈拉沙漠南沿的一条宽广的半沙漠地带，跨乍得、冈比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塞内加尔和布基纳法索等国境。——译者注。

①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sian Energy Problem*, p. 116; Smil, *Energy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pp. 52~53. 孟加拉地区的面积为55126平方英里（与略低于60000平方英里的山东形成对比——见山东省农业区划委员会《山东省综合农业区划》，第1页），1991年有人口11000万。

② 数据见博士学位论文，“附录F”，特别是第433页。

③ 关于燃料拾集，可见Arthur Sm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 22; 1918年12月16日克利夫顿·奥尼尔·凯里（从东阿附近发出）以及1919年5月18日（从德州附近发出）的信，见克利夫顿·奥尼尔·凯里档案。

④ 如见董汰生编《山东歌谣集》，第27页。

⑤ John L. Buck, *Chinese Farm Economy*, p. 392.

估计数字。^① 我们来做一些公认可疑的推论：由于 19 世纪 40 年代黄运仍然有着可观的森林，大多数农民应该能够得到足够的燃料来满足生存需要，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下降到不及这种水平的 1/3，说明了实物收入的损失与其他地方相似，即一个五口之家损失的幅度在 3.4~8.8 元之间；在这种幅度内的地区，基于我们所用的那些柴草的价格及我们采用的那些人们对生存所必需的燃料的估计，得出的结果在下降。换句话说，这种损失的非现金收入加在一起，所得出的下降是黄运北部一个平均的五口之家农业总收入（我们略微有些高估了）的 1.8%~4.7%，是黄运南部一个平均的五口之家农业总收入的 2.9%~7.5%。

当我们把它们与离黄运不远的地区的实际消费数字（其中至少包括一些用作照明和冬天取暖的燃料）相比较时，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估计数字极为保守。我们可以从离黄运北部大约 120 英里的一个模范试验区定县得到相当详细的数据。定县家庭的预算（其中包括实物收入）实际上排除了我们对黄运的损失所估计的低结果。在更易受影响和某种程度上更加繁荣的社区，自己拾集和购买的燃料支出加在一起，在最贫穷的家庭组中达 13.8 元，在最富裕的家庭组中达 24.0 元；这两项数字占这些家庭组总收入的 8.3% 和 5.3%。^② 卜凯对华北地区所计算的平均数据是燃料的价值为 21 元或占总消费的 11%。^③

① 对于这些统计数据所依赖的燃料供应和需求的估计，可见博士学位论文，“附录 F”，第 431~432 页；农业产量的估计来自博士学位论文，“附录 E”。在这里，物价是有疑问的价值测量方法，部分原因是由于那里自动的消费很高并可能相当牢固，在总的供应或需求中的小变化将对市场上的小部分作物的价格带来更大的波动。

② Sidney Gamble, *Ting Hsien: A North China Rural Community* (Palo Alto, 1954), pp. 108, 118.

③ John L. Buck, *Chinese Farm Economy*, p. 399.

与之相比，我们对黄运的计算结果，把黄运一个家庭的生存所必需的燃料的价格特别俭省地定为 5.9~15.0 元之间。定县绝不比黄运的大部分地区要冷，那里的燃料则更充足，因而更便宜，并且，人们最低限度地维持着取暖和照明；^① 因此，燃料供应充足的黄运地区的真正支出似乎不可能少于定县每户平均 19.6 元的开支。如果我们假设当黄运还拥有森林时，其居民所消费的燃料与 20 世纪 30 年代定县的家庭所消费的燃料相当，那么，由于燃料供应的消失，实物收入的损失将显得更大：占黄运北部普通的五口之家总收入的 7.3%，而要占黄运南部普通的五口之家总收入的 11.3% 这样大的比重。与之相比，即使是我们从“仅用于做饭”的能源预算中（分别占黄运北部及南部总收入的 4.7% 和 7.5%）所估计的收入损失的高结果，似乎也是非常谨慎的。

黄运北部地区收入损失的数字比种植美棉的家庭所获得的“平均”收入要少；因此，如果这样的一户人家能够找到可以购买的燃料，其家庭成员就可以免于这个地区的燃料匮乏之苦。^② 有些这样的人家，像定县的家境较好的家庭一样，甚至开始购买一些煤油，这是一种可用作许多用途的极好的燃料。另外，花在用来补偿拾柴收入损失的金钱可能接近于定县一个普通家庭每年的衣类开支。^③ 而假如存在着全面的燃料匮乏，许多家庭、特别是在黄运北部最不容易受影响的地区，显然不会能拾集或购买到足够的燃料。

其间，南部地区 7.5% 的数字意味着一项重大的损失，且

① Sidney Gamble, *Ting Hsien: A North China Rural Community*, p.109.

② 北支那開發株式會社調查局：《魯西棉作地帯の一農村における勞動力調査報告》，第 91 页提到在黄运北部的高唐县，一些棉农因不能拾集到足够的燃料，便购买燃料来进行补充；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家都够用。

③ Sidney Gamble, *Ting Hsien: A North China Rural Community*, p.118.

没有任何新的政治经济可以提供相弥补的收益。这些损失的许多收入以前是由妇女和儿童挣来的，他们绝不可能找到相似的新机遇了。^① 更小的家庭无法按比例削减燃料开支，因此，对它们甚至可能是更重的打击。^② 就像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那样，燃料危机不过是冰山的一角；在新的政治经济中黄运治水的式微造成了远大得多的损失。

当然，由燃料危机造成的损害并非直接的痛苦；人们绝望的反应恶化了长期的环境问题。由于农民们不但很快就用完了木材，而且很快就用完了其作物的糠秕及周围土地上的树枝、树根和杂草，他们被迫燃烧畜粪（一种效果极差的燃料，且是一种绝对必需的肥料）。在许多地区挖掘仅在地表以下的泥炭，是另一种常见的补充燃料供给的方法。尽管保护措施非常严格，但由于农民砍伐小树苗作燃料，植树造林仍然遭到了破坏。木材短缺使山东的坑道很难支撑住，因此，阻碍了煤矿的发展，而煤矿本可以稍微缓解一下燃料问题。^③ 光山秃岭再加打柴和捡拾其他植物，加剧了土壤流失和水患，减少了未来的收成及农作物的剩余物。水患的增多也增加了土壤中的盐分，给农业造成了持久的损害。

像许多精耕细作的农业区一样，黄运的生态问题由来已久。因此，试图明确地说出这些问题在何时达到了“关键”阶

① 关于这个地区妇女的工资，见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1编，第62～69页。

② 要维持3个人的温暖或为3个人烧饭的一炉火，不能仅用一个5口之家3/5烧火的燃料。因此，如果一个小家庭与一个大家庭具有相同的人均收入，那么，燃料将在支出中占据更大的比重。

③ 通常见 Smil, *The Bad Earth*, pp. 149～153; Smil, *Biomass Energies* (New York, 1983), pp. 340, 343; 严光耀、孙伯才、周承澍：《调查山东之农业状况》，《科学》第4卷第5期（1919年1月），第471～472页；《农商公报》第8卷第3期（1921年10月），“选载”第17页。

段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不过，弄清楚这样的一个阶段，对于分析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理解黄运的“自然”和“社会”因素之间更加普遍的关系却不无益处。尽管一些证据是较早时期的，但我认为 19 世纪中期是最为关键的阶段。

在鲁西南，早在 17 世纪时，大运河就造成了影响当地经济的生态问题；有位学者指出，这些问题解释了鲁西地区在山东举人功名的获得者中所占份额的稳定下降。^①17 世纪的历史和地理学家顾炎武指出：明朝为了向京师运送漕米，通过其运河工程隔断了许多河道；换句话说，运河使这个地区河流的排水不畅，造成了淤积物的增加。^②这不仅加剧了涝灾和水患的危险，而且给这个地区的土壤中增加了更多的盐分。黄运在今天仍然承受着排水不畅、渍涝及盐碱地之苦。^③

尽管如此，1853 年以前大运河造成的问题甚至不能与黄河改道后所发生的事情相比。并且，在 19 世纪 50 年代以前，即使从生态的角度，大运河造成的所有问题都因运河给黄运带来的有益的输入品及政府的关注而得到了更多的补偿。

20 世纪黄运极低的产量和最大的盐碱问题是出自鲁西北及毗邻的河北部分；直到 1853 年，黄河有好几个世纪没有流经这个地区，而与运河有关的水患，尽管很频繁，但却很小。^④到了 1855 年以后、特别是 1890 年以后，黄运北部的地

① Esherick, *Boxer Uprising*, pp. 31~34.

② Esherick, *Boxer Uprising*, pp. 32~33.

③ 如见《山东省综合农业区划》，第 45、154、157 页。

④ 关于低产和盐碱问题见《山东省综合农业区划》，第 45~46 页；Esherick, *Boxer Uprising*, pp. 11~14, 31~34。关于寿张县的情况，如见 Naquin, *Shantung Rebellion*, pp. 12~14；在寿张的北部和东部地区，问题可能不太普遍，并且即使这些问题真的出现时，也不会太严重。

区经历了严重的水患。在那时，排水问题还在急剧地恶化。即使在 1853 年以前，大运河也使当地的河流与大海交汇处的流速变缓。尽管如此，在水流更强及河床更高的黄河到达并阻塞了各种小河和大运河本身的流动后，排水成了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19 世纪，在遥远的西北地区的发展也改变了黄河沉淀物的性质，因此，水患沉积了比以前少得多的含有土壤的淤泥及多得多的无用沙土。^①

由于人们侵占河堤并砍伐树木，许许多多小河的排水也变得缓慢起来。这个问题至少部分地是衰落的政治控制的结果。19 世纪中期，黄运的“不良统治”变得非常严重，这既是因为清朝正变得越来越弱，也是因为清朝开始对黄河、大运河以及靠近这些河流的地区开始予以较少的关注所致。尽管山东最靠西南部的地区有着数世纪之久的“野蛮”名声，但仅是到 1844 年以后，那里有案可稽的战乱的数量才极大地超过该省其他地区（即使由于全省发生的事件的数量有所上升）。^② 正如第 4 章将要说明的那样，19 世纪 90 年代黄运内部所集中的山东水患问题，实际上来得还要晚一些。

另外，一个地区的居民所获得的举人功名的数量，并不是其繁荣（及由推论而来的其生态基础）何时开始衰落的一项非常灵敏的指数。这项统计数字代表了当地居民——如不同于那些临清和聊城的“客商”，他们的孩子将在别的地方参加科举考试——某些全部财富的混合、财富的集中及对那种财富的控制。比如，即使在临清成为华北无可争议的最富裕的城市之一

① 见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p.19。

② 这些统计数据在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第 102～112 页被列为表格。

时，这里也没有产生多少较高功名的获得者。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还可以解释即便西北地区在人均收入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西南地区在举人的功名方面总是超过西北地区，并在民国时期产生了远重要得多的领袖人物。^① 另外，许多资料显示，临清和东昌的经济是在 19 世纪中期或后期达到了高峰时期，但其举人的数量很早就开始减退。^② 我们尚不清楚为什么鲁西、特别是鲁西北地区甚至产生了更少的国家精英，但似乎并不是单纯的农业生态衰退的结果。认为政治和社会问题在这个地区引发了特别严重的生态问题的看法，至少看上去同样的正确：当地的精英既没有对极易崩溃的资源组织成功的保护和进行维持，也没有为了政府的目标争相进行很好的经营，且这种趋势在不断恶化。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甚至黄河的改道也极大地受到了政治的影响：清廷并未尝试把这条河弄回到它的旧河床中，部分原因是由于江苏的利益集团强于山东的利益集团。^③

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在大运河运行良好的时候，由大运河造成的生态变迁引发了黄运的经济和政治的衰落。最

① 关于人均收入，见博士学位论文“附录 E”；关于功名获得者的产生情况，见 Esherick, *Boxer Uprising*, 第 11~12、31 页；关于民国时期鲁西南著名的领袖人物，见夏莲居《山东独立前后》，《文史资料选辑》（济南版）第 12 辑（1981 年），第 22、29、40 页；邵绰然：《田中玉把持山东议会选举的丑闻》，《文史资料选辑》（济南版）第 5 辑（1978 年），第 43~44 页，并特别参见万光炜《民国初年山东政党活动的内幕与省议会的丑闻》，《文史资料选辑》（济南版）第 5 辑（1978 年），第 33~40 页。

② 杨正泰：《明清临清的盛衰与地理条件的变化》，《历史地理》第 3 期（1983 年），第 117 页，对临清的商业高峰期有所论述；关于举人的数量，见 Esherick, *Boxer Uprising*, 第 11~12、31 页。

③ Esherick, *Boxer Uprising*, p. 14; James Polachek, “Gentry Hegemony in Soochow,” in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Frederic Wakeman and Carolyn Grant, 各页；也见第 175、179~181 页。

近的研究表明，直到 18 世纪后期，这种损害仍然相对很轻；甚至在黄河大改道发生之前，也并不是周期性的灾害，而是在 1/4 世纪里基本上没有什么水灾。^① 1850 年以前不断恶化的“灾害”基本上是财政方面的：黄河的治理正成为极为费钱的事，并且，是大运河与漕运、而不是地方福利为那些开支提供了合理的依据。^② 因而，就像我们将在下文见到的那样，大运河不仅给黄运带来了所必需的木材和石头，而且把国家巨大的治水活动吸引过来，避免了大规模的生态破坏。与大运河作为一种牺牲苏北和山东来向北京供粮的生态负担的画面相反（这与那些为了供应马德里、柏林和其他较近的周围地区无法提供粮食供应的首都的情形极为相像，需要剥夺巨大的区域），明清的经世方略似乎更像是减轻了黄淮交汇地区的生态压力。如果有某些地区被牺牲的话，那么，这些地区应该是江南和其他富裕的南方地区，这些地区为运河承担的漕运体制付出了代价。

这种认为大运河基本上是有益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传统看法的一种回归。不过，这种看法与最近学者们的观点也非常吻合，这种观点强调明清的国家在市场无法自行运转时，在重要的功能方面对经济进行干预，并因此把它的努力更多地集中于“落后”地区——例如，帮助发展西北地区的粮食贸易，并

① 见 Randall Dodgen, “Hydraulic Evolution and Dynastic Decline: The Yellow River Conservancy 1796 ~ 1855,” *Late Imperial China* 12: 2 (Dec. 1991), pp. 36, 43 ~ 46, 53 ~ 54, 57。

② 见 Randall Dodgen, “Hydraulic Evolution and Dynastic Decline: The Yellow River Conservancy, 1796 ~ 1855,” *Late Imperial China* 12: 2 (Dec. 1991), pp. 36 ~ 37, 53 ~ 54, 58; 也见 Hu Ch'ang-t'u, “The Yellow River Administration in the Ch'ing Dynasty,” *Far Eastern Quarterly* 14: 4 (August 1955), pp. 505 ~ 513。

在西南边境地区扩大治水的规模，而把长江的治理及长江流域的粮食贸易主要留给私人控制。^①

有人可能会怀疑国家具有任何仁慈的动机，并认为它在大运河和黄河方面的惟一兴趣就是与同时代欧洲国家的那些兴趣相似：不惜代价地为首都提供供给。诚然，政府基本上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来消除发生在运河附近频繁的小水患这一事实，提醒我们不要把它动机过多地描上玫瑰的颜色。不过，明清朝贡体制的效果，是在400年的时间里让富裕的南方地区承担维护像黄运这样较贫穷地区的全面生态平衡的代价，这与欧洲供应战略的一般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尽管仍然并不精确，但略微更接近的相似物可能是印度莫卧尔王朝；它们之间有限的相似性说明了中国个案中地缘政治和儒家观念的作用。在那里，一个征服王朝所索取的朝贡也强迫容易榨取、灌溉良好和商业发达的南方地区来补助生态更加脆弱的北方平原，否则的话，北方平原就无法供给帝国的首都；并由于来自那些靠贡物养活的城市的资金投入到附近土地的灌溉中，这些贡物间接地使某些北方地区的精耕细作得以维持下去。但当莫卧尔王朝也出现了明清时的问题，即庞大的首都及军队离可以最好的供给它们的地区很远，它们似乎并没有帝国的仁政或维持生存农作物的类似观念——而它们作为国家也没有做出类似的努力来稳定更加遥远和真正

① 关于西北粮食贸易见寺田隆信《山西商人の商人研究：明代における商人および商業資本》（京都，1972年），特别是第5~6、101~106、120~157页。关于边境治水和灌溉的各方面情况，可见 Susan Naquin and Evelyn Rawski, *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Haven, 1987), p. 24; James Lee, *State and Society in Southwest China, 1250~1850* (Cambridge, Eng., 待刊)。

脆弱的地区，而在这些地区，市场的激励无法促使资金投向适当的地方。^①

如果不考虑促动盛清时治国方略的精确的混合动机，从逐渐主导 19 世纪晚期至 20 世纪政策制定的逻辑比较来看，它对更为贫穷地区的益处被投入到了救济中。由于财政困难的加剧，并由于中国面对着一个竞争性的民族国家的世界，它的治国方略开始着重于像效益和国力这样的目标，把它们看得高于稳定及儒家社会的重建；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的政策才开始加剧了区域性的不平等、而不是做了损害它们的事（举另外一个例子，从本质上看，国家在遥远的西北和西南地区加强拓殖和保障其生计的兴趣，无疑源于对军事的优先考虑，而不是对这些落后地区的关注。不过，只要中国担心来自中亚地区或其未被同化的少数民族的军事威胁，资金就会被投入到贫穷的地区；一旦主要的威胁成了在沿海地区及其他商业上具有吸引力地区的西方人，政府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到像奉天、天津、长江三角洲和南部沿海这些相对富裕的地区）。对中国富裕和新的竞争性地区的全面重新定向，标志着比某些特定地区“游说”的胜利更基本的东西：一种将要在未来多年里主导治国方略的新的逻辑被接受了。

交通和贸易对黄运的生态非常关键：让这样一个人口稠密的地区对像石头和木材这些关键的“内地”输入品自给自足，简直是不可能的。19 世纪中期，在中国许多地区承受着越来越重的资源压力的情况下，华北沿海地区从东北的开放中获得了缓息，19 世纪 40 年代开始开放的东北，成了鲁东、直隶和

① 如见 C. A. Bayly, *Rulers, Townsmen, and Bazaars: North India in the Age of British Expansion, 1770 ~ 1870* (Cambridge, Eng., 1983), pp. 63~64, 83~84。

其他地区主要的木材供应地^①（一个世纪以前，江南垦种过度的土壤开始得到了东北豆饼的调剂^②）。到了20世纪初，东北的木材不仅是华北沿海的支柱，而且还被输入到了远至济南这样的内地地区。到1920年，鲁东和鲁中地区的20多个地区每年各自输入的东北木材达100万元以上，足可以满足这些地区各自的3万个五口之家最低限度的燃料需求。河北沿海的许多地区依赖来自北美的木材。如果1935年一年中输入到青岛的木材全都被用作燃料，那么，它们可以满足大约1/3的山东人口的需要。^③

在19世纪90年代从沿海溯黄河向上运送货物变得极不可靠之时，山东的盐商们把他们给河务工程常规报效中的一部分用来治理小青河，使沿海至济南段可以通航。当然，除了盐，这还使其他物资的运输变得容易起来，尽管没有预期的那么多。^④不管怎样，木排从两条水路上均无法越过济南，而且，并没有其他的交通把黄运的大部分地区与东北的木材供应地联系起来。1911和1919年成立的商人团体均试图发展至濮州（黄河在此进入山东）的全程汽船航运；这两个团体均很快得到了政府的批准，但不是支持，它们均没有变得重要起来。^⑤

① Norman Shaw, *Chinese Forest Trees and Timber Supply* (London, 1914), p. 114.

② 足立啓二：《大豆流通と清代の商業的農業》，《东洋史研究》第33卷第3期（1974年），第360～389页，特别是第365～371页。

③ 进口数字，见《农商公报》第8卷第2期（1921年9月），“选载”第17页。关于木业来源更多的进口数据和论述，见興亞院技術部《北支における林産資源調査》（东京，1940年），第11、39页。

④ David Buck, *Urban Change*, p. 32.

⑤ 中国交通部交通史委员会：《交通史》（南京，1937年），第877～881页；《山东杂志》第90期（宣统三年五月三十日），第25b页。

其间，大运河的衰落把这个地区及其传统的南方木材来源地分割开来。^①一位在苏北徐州的传教士在 1908 年所描述的情形与横跨山东边界的那种情形非常相似：

不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木材，均几乎变得不可能得到了。这个地区向来依靠南方的松树作为房子的顶梁，现在这些东西只有克服极大的困难和花费极大的代价才能购买到（这是由于大运河的淤塞和厘金的盘剥）。这也迫使人们把通常当作柴禾出售的那些东西用来作为建筑的材料，因而造成了燃料市场的混乱，并给穷人们带来极大的痛苦。它还影响了用来烧砖的燃料的价格及其供应，砖头也因此变得极为昂贵。^②

这并不是运到徐州木材的初次紧缩。在 18 和 19 世纪初，从陕西沿黄河漂流下来的木材大量进入徐州的市场（并因此至少间接地影响了山东的供应）。不过，陕西森林的过度砍伐及黄河的改道在 19 世纪中期以后终结了这项贸易。^③

在 18 世纪，兖州（在济宁略东一点）仍然沿着大运河为临清的砖窑输送大量的木材。这个地区在 19 世纪中期仍然拥有大片的森林，当时在鲁东地区的供应正变得非常紧张。但在 19 世纪后期，贸易和短缺的模式发生了变化：东北及后来外国的木材为鲁东地区提供了新的选择，而从 19 世纪早期大运河及黄河木材贸易的高峰到其衰落，造成了黄运木材市场的不

① 星斌夫：《大运河》（东京，1971 年），第 203 页；1985 年 11 月对临清和聊城的访问记录。

② 引自 Norman Shaw, *Chinese Forest Trees and Timber Supply*, 第 80 页。

③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 435～436 页。

稳定。^①

我们并不知道运河承担的木材贸易失去的部分有多大。我们所获得的一点点数据似乎实在太少，以至于无法解释黄运的燃料危机。^② 不过，我们不仅需要考虑不再存在的木材贸易，而且需要考虑这个地区所必需的、不断增长的——且不像沿海地区，它从未获得的——输入。诚然，黄运与经销这些资源的更大的市场分割得如此严重——因而，它的燃料供应是如此的没有弹性——以至于在 20 世纪农作物歉收时，燃料的价格通常比粮价涨得要快。^③

黄河的到来及石头和木材运输的衰落，还给黄运的黍子及高粱秸秆的供应（农村燃料供应的关键部分，现在越来越多地

① 许檀：《明清时期的临清商业》，《中国经济史研究》第 2 期（1986 年），第 138 页；A. A. Fauvel, *La Province Chinoise du Chan-toung: Géographie et Histoire Naturelle* (Brussels, 1892), 270; Norman Shaw, *Chinese Forest Trees and Timber Supply*, p. 131; 星斌夫：《大运河》，第 202～203 页。

② 星斌夫：《大运河》，第 203 页中列出了木材的数据，但并不是它们的尺寸。如果那些木材是 Norman Shaw, *Chinese Forest Trees and Timber Supply* (第 318 页) 所描述的那种从江西（尽管不是所有的木材、但却是某些木材的最终来源地）运来典型的木材的话，那么，它们每年大约共有 7 万立方米的木材，约等于 8400 万斤的农作物秸秆，或者大致相当于鲁西南地区在留下饲料但不用作任何建筑材料、修筑堤坝或用来做饭以前所获得的秸秆数量的 10%。这项用来把木材的立方米换算成农作物秸秆的吨（或从那里换算为“斤”）的数据，来自 Smil, *Bad Earth*, 第 149～150 页。也见 Vaclav Smil and William Knowland, *Energ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The Real Energy Crisis* (Oxford, 1980), p. 363。

③ 如 *North China Herald*, 1920 年 10 月 23 日，第 230 页中报道说，糠壳令人惊讶地卖到了 50 文 1 斤，而人们吃着未经烧煮的食物、喝着不开的水并拆掉房子来做灶柴。这些糠壳的价格意味着燃料价格至少上涨了 150%，而粮食价格大致上涨了 40%。关于自动消费的产品，详见注 12。

被用来修筑堤坝及平民的建筑)增加了新的压力。^① 我们不可能准确地算出黄运的山东部分因此移作燃料供应的秸秆的磅数,但每年仅用来修筑堤坝的数量几乎肯定超过了1亿斤(1斤约等于1.33磅),并很可能超过了4亿斤。^② 这项数字仅是接近于一位能干的官僚在鲁西黄河堤坝中使用的所有生物总量(树木、农作物剩余物及人畜废弃物)中的一小部分。尽管如此,事实上,这项负担——像大部分治水负担所要求的那样——落在了黄河旁边的一个极为狭小的地区。^③

更为重要的是,秸秆的征用——即便它们在较大的范围内分摊——占了我们可能称为任意的生物储备总量(在保留饲养耕畜的关键部分后,留作燃料、肥料或作建筑材料的数量)中的更大的比重。^④ 即使是对这种数字大方的估计,也将得出20世纪30年代鲁西南居民的燃料供给少于今天中国农民平均数的1/3,而今天的中国农民仍然是公认的燃料不足。^⑤ 因此,人们至少要更多地使用不过是燃料残留物的东西(泥炭和粪便)来替代一些送去修筑黄河堤坝的秸秆。^⑥ 假如居民们用烧粪便来替代所有用于修堤的秸秆(按照一种“中等程度的估

① 关于在民用建筑中石头作为其他材料的替代品,见韩兆歧《东阿县旅行见闻记》,《山东文献》第2卷第3期(1976年12月),第153页;关于石头在堤坝建筑中的关键作用,见第4章“秸秆和石头”及博士学位论文,“附录G”。

② 见博士学位论文,“附录G”。

③ 这个问题将在下文予以详述。

④ 见博士学位论文,“附录F”和“附录G”。

⑤ 估计数见博士学位论文,“附录F”;对当代中国农村燃料供给的评论,见Smil, *The Bad Earth*, 第149~153页;王梦上:《注意解决农村能源问题》,《光明日报》1980年7月19日,第4版。

⑥ 见博士学位论文,“附录G”;对当代中国燃烧粪便的研究,见Smil, *Biomass Energies*, 第343页。

计”)，他们应该大约消耗了鲁西南地区固体废物的 11% (占这些堤坝所在的 10 个县的固体废物的 38%)，这项数字是惊人的，这些肥料的缺失是这个地区所无法承受的。^①

另外，如果农民们极度缺乏秸秆，甚至那些不烧粪便的人也越来越多地失去粪便的某些利益。1936 年的一份土壤调查发现，华北与施肥和混合肥有关的最大问题“是找出足够的有机质，以充分地吸收在肥料堆积中释放的氮。作为屋顶材料的麦秸和稻草实在太宝贵，被用来搓绳子及用作燃料，而不能被用在混合肥中。”一位在济南的美国农艺学家从印度引进了一种制作混合肥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这种方法需要木灰；因此，这种方法在黄运可能没有派上用场。^②像木材方面的问题一样，在肥料方面，黄运同样承受着没有很好地与沿海城市联系在一起的痛苦。来自天津的粪便沿着大运河被运送到远至德州的地区（大约 100 英里），但是，像木材一样，如果从陆路运输，这种廉价的肥料立即变得昂贵起来。^③如果没有输入的材料，黄运已经衰竭的土壤在整个 20 世纪早期将持续

① 见博士学位论文，“附录 G”。

② James Thorp, *Geography of the Soils of China* (Nanjing, 1936), pp.424~425 (引文见第 424 页)。关于山东获得木材的地理模式见该章的“封闭、燃料短缺和毁林”一节；关于济南外面山地上某些木材的可用性，见 Harry A. Franck, *Wandering in Northern China* (New York and London, 1923), p.269。

③ 关于从天津向德州（在大运河上）运输粪便，见《鲁北十县农业调查报告》，《山东农矿公报》第 13 期（1930 年 1 月），第 9 页。15 年前搬运费用在这个地区非常盛行时（见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第 4 卷“山东省”，第 234 页），从码头由陆路运输这种肥料，每 20 英里将使低档粪便的价格增加 2/3，较高档的粪便价格增加 1/3。由于要比增加整夜住宿的费用所行的路程走得更远，在没有机动车辆运输的情况下，这种运输将很快变得昂贵起来。

恶化下去。^①

在这个时候，不论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观察者们均注意到，即使在地，山东也没有森林了。^② 在河岸和铁路两旁有一些树木；大多数家庭的院子里有一两棵树。^③ 不过，在鲁西的旅行者们一再注意到，在西南地区村墙的外面及西北地区家庭院子（这里的村子很少有墙）的外面全都看不到树。^④ 黄运其他地区的境况也并不好。一项调查称河南是中国森林最少的省份。^⑤ 1931 年的中国海关报告称河北省仅有 1/38000 的地区还有森林。^⑥ 这项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完全可以被摘录下来提供一个概念，看看情况绝望到了何种地步。

大多数的树木是栽在墙的后面，这是因为栽在野外的树木极难保护，并且因为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因此燃料变得越来越稀缺。其间，其他的变化进一步压缩了树木能够生长的空间。寺庙道庵以前曾保留了一些树木：由于 1901 年以后新的“地方

① 《乡村建设旬刊》第 3 卷第 18～19 期（1934 年 2 月），第 15 页；John Earl Baker, *Explaining China* (London, 1927), p.246。

② Norman Shaw, *Chinese Forest Trees and Timber Supply*, p.130; Harry A. Franck, *Wandering in Northern China*, p.269; A. A. Fauvel, *La Province Chinoise du Chan-toung: Géographie et Histoire Naturelle*, p.270; 《农商公报》第 1 卷第 3 期（1914 年 10 月），“报告”第 2 页。

③ Nanji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Bulletin* 1: 3 (Jan. 1924), p. 3; Esherick, *Boxer Uprising*, p.1; 克利夫顿·奥尼尔·凯里 1919 年 5 月 18 日（从德州附近发出）的信，见克利夫顿·奥尼尔·凯里档案。

④ 如见 A. A. Fauvel, *La Province Chinoise du Chan-toung: Géographie et Histoire Naturelle*, p.270; Esherick, *Boxer Uprising*, 1; Harry A. Franck, *Wandering in Northern China*, p.269; Norman Shaw, *Chinese Forest Trees and Timber Supply*, pp.21, 130。

⑤ Norman Shaw, *Chinese Forest Trees and Timber Supply*, p.54.

⑥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 1922～1931, p. 356.

自治政府”组织——它们经常卖出树木——的建立，这些寺庵失去了许多土地。^① 通常不长其他东西的废弃河床——黄河有许多这样的河床——或现有河岸，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另一个重要的林地。但20世纪早期的花生种植热潮，突然给这些土地带来了极其有利可图的用场，在受到县里支持的林业人员与通常有着其村庄支持的种植花生的非法土地占用者之间，引发了无数的冲突。^② 尽管如此，引发这些格外紧张的改革氛围及对外联系，还激起了官方在全国范围内扩大木材资源的兴趣。

燃料短缺与“自强”逻辑

那些开始推广植树造林的国家官员们对农村的燃料危机并不特别感兴趣。他们有时也承认这种危机，但他们强调其他的意义：水土流失，木材进口的代价，或木材的缺乏阻碍像修筑铁路、电报和矿场这些“现代化”活动的道路。^③ 这些优先（它们一直持续到现在^④）源于一项我们已经注意到了的更大

① Norman Shaw, *Chinese Forest Trees and Timber Supply*, p.16; 《农商公报》第1卷第3期（1914年10月），“报告”第1页；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第15～16页。

② John L. Buck, “Cost of Growing and Marketing Peanuts in China,”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5: 3 (Sept. 1929), p. 768; 纪彬：《农村破产声中冀南一个繁荣的村庄》，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第502～503页；《山东劝业汇刊》第13期（1923年4月），“公牍”第23页。一个真实的非法占地者们为了种植花生而砍树的例子（恩县），见《鲁北十县农业调查报告》，《山东农矿公报》第13期（1930年1月），第13～14页。

③ 如见林茂泉《文集》，第5下页；严光耀、孙伯才、周承澍：《调查山东之农业状况》，《科学》第4卷第5期（1919年1月），第471～472页；《农商公报》第8卷第3期（1921年10月），“选载”第17～22页。

④ 关于最近林业政策中在农村需要方面对工业用途的优先倾向，见 Lester Ross,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China* (Bloomington, 1988), pp.82～83。

的计划：政府重视那些官方认为将最大限度地有助于中国维护其政治独立（并且，通常有助于其政府部门维持其权力）、而不是那些在经济方面最大限度地有助于百姓福利的项目。在下文中，我把这项计划称为“自强”：尽管这个标签常常被用在19世纪后期的政策上，但我认为在政府支持的发展措施的逻辑中，有着充分的连续性来证明把这个词汇扩大到20世纪早期改革派官僚们的见解上是合理的，否则这些见解就没有名字。这些见解也许可以命名为“重商主义”，这是由于除了赞成现代化外，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全力以赴地提高国家的（或有时是省的）贸易顺差及通货储备；这个目标对官员们来说，显然比增加人民可以获得的商品数量更加重要。考虑到中国在炮口之下被强加了多么巨大的债务以及这些债务是如何频繁地被用来进一步践踏中国的主权，经济上的自强被定义为提高贸易顺差也就并不令人惊讶了。

当然，其他时候及其他地方的政府也有这些担心。但20世纪早期中国的政治分裂及其关税自主权的丧失排除了许多保护主义的措施，这些措施通常是进口替代战略的组成部分。实际上，进口替代只能通过改善中国相关商品的生产或针对进口使用非关税障碍来达到。对于那些已经购买外国商品的地区，政府努力增加本国出产的木材供应是非常明确的答案；对于那些无法进口这种大量产品的地区，就没有必要进行这样的努力。

因此，这种自强的倾向为政府的林业官员们提供了强有力的理由，来把某些地区看得比其他地区要重要得多。1914年，农商部为把泰安建成山东林业工作的一个中心列出了三个理由：①必须扭转近年来开山修梯田的农民所造成的不断恶化的水土流失；②这些山岭非常接近铁路线；以及③有可能营造出

有关商人参与造林的氛围。^①

在山坡被极大侵蚀的地方植树造林，具有不减少其他任何产品的优势。由于那些拥有许多光山秃岭的地区通常靠近已开采的或潜在的矿区，这些矿区又往往接近外国人修筑的铁路线，这些优势得以相互补充。这些地区通常还与那些外国人已率先进行植树活动的地区相交叠：靠近外国人租界（主要是青岛和威海卫）的山坡及铁路沿线的地区，在那里，他们需要木材来制作枕木，并拥有保护树苗的警力。^②最后，那些容易进入并至少拥有一个雏形现代部门的地区，通常从东北或国外获得了一些供应（山东铁路上的大部分枕木由日本的木料制成；美国和俄国的木材也有进口^③）。因此，政府支持的植树造林（除了别的以外）是一种用来保护以前硬通货的进口替代措施。^④

为中国林业服务的外国顾问赞成这种倾向。例如，新的农林学院在1923年的一份报告中甚至没有提到那些与沿海分割的地区的燃料危机。另外，它对植树造林的利益的统计并没有包括消费方面的任何增长：它估计了输入到中国并可以通过植树造林来替代的木材的数量，以及有多少中国要么从外国人那

① 《农商公报》第1卷第10期（1915年3月），“政事”第9页。

② 《农商公报》第1卷第3期（1914年10月），“报告”第2页；Deutschland Reichsmarineamt, *Denkschrift Betreffend die Entwicklung des Kiautschou-Gebiets*, 1902: 12, 46, 47, 52; 1903: 38; 1904: 47; 1905: 49; 1906: 70; 1907: 58; 1908: 56; R. Rosenblith, “Forests and Timber Trade of the Chinese Empire,” *Forestry Quarterly* 10: 4 (Dec. 1912), p. 655; Norman Shaw, *Chinese Forest Trees and Timber Supply*, p. 132。

③ 关于日本进口木材在山东的重要性，如见 Norman Shaw, *Chinese Forest Trees and Timber Supply*, 第121页；关于华北沿海地区其他外国木材的来源（1937年以前），见兴亚院技术部《北支における林産資源調査》，第11、13页。

④ 如见《农商公报》第8卷第3期（1921年10月），“选载”第17~22页。

里买回来、要么可以相应地转变为储蓄数量的铁路设施。^①

孙中山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尽管带有更多的感情色彩，使用了较少的经济术语。他没有提到普遍存在的农村燃料危机以及像黄运这样的内地地区（或中国西北部地区，那里的情况甚至更糟）的严重问题。相反，他指出了林业对“民生”有两个重要意义。第一，毁林将导致水患。第二，中国沿海城市的建筑变得依赖外国的木材。这种依赖浪费了外汇——这在他看来似乎更重要——并使这些城市的人民甚至在死的时候也要依赖外国人（用外国木材做棺材）。尽管孙中山在北方从未掌握太大的权力，但他的观点说明了许多人在构思解决毁林问题的框架时，更多地是从国力、而不是从人民福利的角度来着眼。孙中山的观点似乎还影响了后来国民党的造林活动。^②

对自强利害关系的强调，使国民政府在已经有了极大的选择来缓解燃料危机的地区仍然重视林业工作：在山东，他们在济南、青州和泰安建立了林业中心。^③除了像泰安和东阿这些黄运的沿边地区——相对容易改造的地区，拥有许多光山秃岭——外，黄运的山东部分处于该省的“西部平原”地区，被视为特别难以规划，并被放在最后考虑。^④

当这种重视与第1章所述的重商主义的优先权正好吻合时，因对像黄运这样较难进入的地区的关注，人民的福利将得

① Nanji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Bulletin*, no. 2 (Dec. 1923), p. 4. 也见 R. Rosenblith, "Forests and Timber Trade of the Chinese Empire," *Forestry Quarterly* 10: 4 (Dec. 1912), pp. 656~657.

② 见吴金赞《中华民国林业发展之研究——民国元年至民国三十五年》（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82年度博士学位论文）。对孙中山观点的总结见第71~73页。

③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 1922~1931*, p. 444.

④ 《农商公报》第8卷第3期（1921年10月），“选载”第19页

以更好地改善。1920年，山东河务局在鲁西几乎付出了相当于它在黄河最靠近沿海的地区所付出的秸秆的两倍。^① 1934年，在菏泽，高粱秆每百斤的售价为1.66元；由于木材既更好烧火、也更适用于建筑，因而，木材的价钱可能至少也要相当于这些。^② 这些数据特别令人惊讶，这是因为菏泽的燃料供应大体上高于鲁西南的平均数；在清末，山东河务局把濮州和菏泽作为黄河在黄运地区的主要木料供应地。^③ 与之相比，在黄运东北边缘并靠近通向天津的铁路和运河的德州，木材的价格仅为每百斤1元。^④ 当地熬制的黑市盐价，也说明鲁西南地区的燃料成本高于德州附近的60%。^⑤

在18世纪，鲁西北地区曾从鲁西南输入木材，并且，西北地区的人曾经到西南地区去拾荒。^⑥ 20世纪30年代鲁西北地区的生物总量/能源预算（这项数据略去了输入部分，因为我们没有输入方面的数字）说明这个地区那时的燃料短缺不像西南地区那么严重，但不过是略轻些而已。^⑦ 因此，相当于西

① 《河务季报》第3期（1919年10月），第134页。

② 《乡村建设旬刊》第3卷第18~19期（1934年2月），第14~15页列出每亩高粱秸秆的价值为3元；由于每亩秸秆的重量大约为180斤，每百斤的价格约为1.66元。

③ 《山东通志》（1915年）卷124，第3442页。也见博士学位论文，“附录F”和“附录G”。

④ 《鲁北十县农业调查报告》，《山东农矿公报》第13期（1930年1月），第9页。

⑤ 关于西南地区私盐的价格，见《山东省县政建设实验区公报》第28期（1935年12月25日），第5页；关于禹城县不法产品的物价和必需材料的数量，见孙拙民《禹城县社会调查》，《农业周报》第4卷第19期（1935年5月17日），第668~669页。所需的其他物资仅是碱土和芦苇（通常取自不宜种植庄稼且通常没有开垦的河岸土地）和水。

⑥ 许檀：《明清时期的临清商业》，《中国经济史研究》第2期（1986年），第138页；Esherick, *Boxer Uprising*, p.27。

⑦ 见博士学位论文，“附录F”，特别是433页。

南地区燃料价格 5/8 的德州附近地区的燃料价格，最能反映德州与沿海的联系。一般说来，由于对燃料短缺的救济要通过口岸而来，因而，华北地区燃料的价格与机制品的价格很相像：在发达地区（这些地区与那些口岸连接在一起）要比不发达地区低廉（与之相比，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大区中，外围地区的燃料要比中心地区城市的燃料便宜，在外围地区，燃料是采拾而来的，而在中心城市，燃料则不得不通过运输而来）。不过，每磅燃料比起机制品来要廉价得多，因此，地区之间的价格差别仍然太小，以至于无法把输入的木材运到所有机制品能到达的遥远地区。^①

因此，如果注重更加封闭的地区的话，植树造林也许会在迎合人们的需要方面——以及因市场失败而发挥以前国家的弥补功能方面——走得最远。但国民政府仅注重从重商主义的角度来看可以获得最大回报的地区。在黄运，木材的增多可以改善那里的生活，但对减少该地区的进口（棉纺织品、煤油、香烟）或增加其出口（花生、大豆、棉花、牲口、劳动力）却起不了什么作用。^② 只是从长远来看（由于生态破坏的减少，节省了对水灾的救济并改善了土质），它才能转变为政府需缺的硬通货或税收；而政府对这样一种遥遥无期、可望而不可即的回报是不会有太大兴趣的。

当地的努力：植树造林及其不满

省政府也鼓励地方上的植树造林活动。从 1922 年开始，

① 关于中国 20 世纪初期各种广泛交易的产品重量与价值的比率，见 Sands, "Investigation," p.64。

② 关于山东各县进口和出口产品的名单及大致的价值，见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 2 编，第 151~201 页。

省劝业所不仅使人们可以得到树苗，而且命令各县建立一个苗圃，向那些想种树的人出售经过补贴的树苗和小树，到清明节时，组织群众在公共土地上植树，并建立了拥有县级以下分会的县林业公会。^①

林业公会最初是用来保护树木的：每份报告全都强调这项任务比植树或管树要难得多。^② 在 1918~1920 年之间，山东大多数县份每年要种植超过 5 万株的树木；有的县每年超过 50 万株。^③ 但在 1933 年的一份调查中，黄运地区的山东部分仅有两个县报告说拥有比它们在 1918~1920 年报告植树时要多的树木。^④ 菏泽的乡村建设派在 1934 年估计，所栽的树木至多有 2% 能够长大。^⑤ 这项数字是非常惊人的，因为菏泽不仅拥有 27 个林业分会和地方自卫队来保护树木，而且还拥有一支升级为“林警”、超过平均数量、24 小时日夜守护的队伍。^⑥ 许多县建立了带薪的森林巡查人员，人数在 20~30 名之间（20 世纪 30 年代，黄运大多数县拥有 50~100 名带薪的警察），但林业公会对树木的安全负有主要责任。^⑦

与看青组织相比，如果棉业公会是带有更多的强制性、较小的乡村基础和较不平等的组织的话，那么，护树在这些方面

① 《山东劝业汇刊》第 11 期（1923 年 2 月），“论述”第 1~7 页。

② 如见《山东劝业汇刊》第 4 期（1921 年 1 月），“各县实业状况”第 2 页；《山东劝业汇刊》第 5 期（1921 年 7 月），“各县实业状况”第 19~20 页；《山东劝业汇刊》第 6 期（1922 年 1 月），“公牍”第 27 页；《乡村建设旬刊》第 4 卷第 18 期（1935 年 2 月），第 12 页。

③ 《山东劝业汇刊》第 11 期（1923 年 2 月），“公牍”第 3~9 页。

④ 植树数字，见前面注 63；1933 年的数字，见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 5 编，第 384~402 页。

⑤ 《乡村建设旬刊》第 4 卷第 18 期（1935 年 2 月），第 10 页。

⑥ 《山东劝业汇刊》第 7 期（1922 年 5 月），“各县劝业报告”第 29 页。

⑦ 1933 年山东各县公安局的大致规模，见《山东政俗视察记》。

就更变本加厉了。例如，在夏津，林业公会的成员资格要求拥有两亩树木，远远超过大多数人所拥有的数量。在没有财产限定的县份则征收会员费。^①

与看青组织、或者甚至与棉业公会相比，林业公会还对打柴者划下了极为苛刻的界线。县里在给省劝业所报告中总是习以为常地把砍树者称为“匪”，或至少称为“贼”；与之相比，抢棉仅仅被称为“陋俗”，而参与者们也被视为不同于“匪”。^② 就像我们在上一章所述的那样，一般的看青组织对偷粮总是处以轻罚，而棉业公会针对抢棉则作略重一些的处罚（约1元钱）。^③ 与之相比，对损害一棵不足3年的树木是按每株1元起罚，并且，如果这棵树年代更长或是真的被砍倒，则所罚的数目升得很快。对不配合植树的处罚，从100元开始，一直加到1000元，可以用现金支付，也可以用劳动作抵（这些处罚大概是用来自付整个村庄的，尽管文告中只提到“人民”，但可能意指乡村领袖）^④。根据该省对林业公会的标准规定，那些“损害”了10棵以上树木的人将被县官处以苦役；任何放火烧了10株以上树木的人（因为有人可能会清理一块地）理论上将被判处服苦役。^⑤

认为这些更加严厉的处罚是拾柴者暴行的结果则没有任何道理（拾柴者们往往是些孩子）。相反，因高昂的代价及打柴几

① 《山东劝业汇刊》第16期（1923年7月），“公牍”第42页；《山东劝业汇刊》第15期（1923年6月），“公牍”第13页。

② 《山东劝业汇刊》第16期（1923年7月），“劝业报告”第10页。

③ 《山东劝业汇刊》第22期（1924年3月），“公牍”第16页。日据期间，恩县后夏寨村的罚金高达3~5元（见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4卷，第431页），但这似乎说明了最近的增长。

④ 《山东劝业汇刊》第29期（1924年9月），“实业公牍”第2、4页。

⑤ 《山东劝业汇刊》第29期（1924年9月），“实业公牍”第4页。

乎全都成了“非法”行为，他们似乎受到了打击。当然，通过把这种普通的行为定为“匪”并设置非常严厉的处罚，林巡队把他们自己与任何可能的群众合作进一步分割开来。在许多“早期现代”社会推行森林规章时，这种螺旋体是一种常见的模式。^① 不过，尽管问题很普遍，但解决起来则一点都不容易。

我们尚不清楚这些规章在多大程度上被执行了；在许多地方，这些规章颁布（1923年）后的混乱年月肯定让它们流于具文。另外，在一些地区，巡查者可能相当的出色；有些县称成活率超过了60%，与那些治安问题极为恶劣的县份不足10%的成活率形成了对比。^② 许多林业团体规定成活树木的50%或50%以上的价值属于它们，而不属于树木所在的土地上的主人。因此，那些植下树并在其后对这种“作物”仅提供保护的团体获得了它的50%部分，而这个地区那些常年种植庄稼的佃农的通常所得则为40%或不到此数。^③ 不过，即使

① 一般的论述，见博士学位论文，第168～179页。新英格兰的情况，见William Cronon, *Changes in the Land: Indians, Colonists, 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 (New York, 1983), pp.110～111；关于早期现代欧洲、特别是英格兰发生的同样现象的各种资料，见第196页注4。即使是欧洲相对强大的国家，在晚至19世纪时，也有这类问题；如见John M. Merriman, “The Demoiselles of the Ariège, 1829～1831,” 见John M. Merriman 编, *1830 in France*, (New York, 1975), pp.87～118。

② 《山东劝业汇刊》第12期（1923年3月），“各县成绩报告”第32页；《山东劝业汇刊》第13期（1923年4月），“公牒”第14、54页，“各县成绩报告”第8页；《山东劝业汇刊》第14期（1923年5月），“劝业消息”第8页。

③ 如见何云龙《菏泽农村的事实》，《农业周报》第4卷第14期（1935年4月12日），第489页及《鲁北十县农业调查报告》，《山东农矿公报》第13期（1930年1月），第13页；更广泛的论述，见Huang, *Peasant Economy*, 第205、209～212页。50%可能是最普遍的比率，但更高和较低的比率也不少见，也见满铁《山東の棉産物》，第55页。

按这种比率，这些团体也可以声称他们提供了一种实惠。在邓县，一株3岁小树相当于一株2岁小树价值的3倍；如果它长得更长，其价值将增得更快。^①

来看一下这些组织与第2章所论述的19世纪晚期的看青模式之间有多大的距离同样非常重要。尽管看青组织常常受到更高层次的官员们的青睐，但它们仍然牢牢地以村庄为基础、以村庄为领导并由村庄来控制：它们保护那些它们所选定的庄稼，它们选择的范围是通过它们所选定的威胁、让步和（通常很小的）处罚相结合的形式来进行的。与之相比，林业公会则并非建立在村庄基础上的正式组织，它们通常限制会员的资格，并对其保护的林木享有最大的份额。最为关键的是，由于认识到各县无法对树木提供保护，省政府指示地方政府特许成立盈利性的组织来承担这项工作。因而，政府授予这类组织以权力，既可以向村庄领袖、也可以向那些新式的、带薪的林警队——即既向正式的、也向非正式的县级以下的政府——发布命令。^② 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组织在菏泽创建的林业公会，它们全都以集镇而不是以村庄为基础，在对其成员的盈利动机的依赖及对他人的强制方面依然走得更远。^③

保护树木与保护美棉相比，比较效率明显地更加参差不

① 《山东劝业汇刊》第25期（1924年6月），“公牍”第8页。

② 《山东劝业汇刊》第11期（1923年2月），“各县成绩报告”第1页；《山东劝业汇刊》第12期（1923年3月），“各县成绩报告”第23页；《山东劝业汇刊》第13期（1923年4月），“公牍”第63页；《山东劝业汇刊》第15期（1923年6月），“公牍”第14页。

③ 见博士学位论文，第176~177页及后面的注脚对此事的进一步论述；原始资料来自《乡村建设旬刊》第4卷第18期（1935年2月），第10~11页。

一，但在这里，鲁西北地区同样显得比鲁西南地区更成功。^①其他方面仅有的成功是护卫联合林地的私人公司的那些活动。在东阿，一家由济宁投资者创办的林业公司成功地经营了好几年，但它总是不断地与附近的社区发生冲突；当地方政府在1928年北伐战争中被附近的军事冲突所削弱时，该公司的产业遭人哄抢并被纵火焚烧。^②后来新成立的县政府以“不善”之名解散了这家公司。尽管1929年省政府批准该公司“在〔国民〕党的监督下”重组，但此后它再也不像以前那么成功了，而东阿县的报告中说，1933年的森林要小于1918年。^③鲁西南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村庄封闭组织对传统的看青和护卫活动非常有用，但对这些新的安全问题则毫无助益。

尽管如此，黄运不同地区不同程度上的失败，与黄运植树造林的整体失败相比，其影响要小得多。人们对燃料的绝对需求在大部分地区引发了极其严重、通常无法控制的治安问题。而科学也无法像它曾经对棉花所做的那样，在技术上为树木提供适用的方法，使之在某些文化上有影响的日子到来之前得以成熟。最后，任何扭转黄运环境恶化的希望都落在了这个地区的外部。

① 关于西北县份的情况，见《山东劝业汇刊》第7期（1922年5月），“各县实业状况”第13页；《山东劝业汇刊》第10期（1923年1月），“各县实业状况”第4页；《山东劝业汇刊》第12期（1923年3月），“公牒”第23、32、44页；《山东劝业汇刊》第13期（1923年4月），“公牒”第14、44、54页，“各县成绩报告”第8页；《山东劝业汇刊》第14期（1923年5月），“劝业消息”第8页；关于西南地区的情况，见《山东劝业汇刊》第5期（1921年7月），“各县实业状况”第20页；《山东劝业汇刊》第22期（1924年3月），“劝业消息”第3~7、13页。

② 《山东劝业汇刊》第22期（1924年3月），“公牒”第22页；也见《农商公报》第2卷第2期（1915年9月），“政事”第13页；《东阿县志》卷7，第2上~2下页。

③ 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1932年10月报告的第13上页，机关代号2：案卷号119。

生态、交通和边缘化

这些失败使得日本人在 1936 年的一份研究中认为，要在整个华北内地改善水灾治理就需要修筑铁路：它指出，铁路是让这些地区的人民不烧所有可以延缓水土流失的东西而做其他选择的惟一途径。^① 的确，比如菏泽与德州之间的燃料差价可能会使这两地区之间的运输具有吸引力，这比牛车的运送要好得多。另外，如果黄运的更多地区能够花费硬通货来购买其他地区的燃料，那么，省和中央政府可能会对提供另外的选择更感兴趣。

黄运的水路将在后面两章中予以论述。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为什么黄运的大部分地区被置于铁路网络之外。这项研究有助于解释在自强逻辑之下，这个地区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被封闭起来并因此被边缘化了的；它还从实际运作方面阐明了那种逻辑。

沿着 1949 年以前在山东实际修筑的线路——沿黄运东部边缘的津浦路和胶济路——直到 1914 年还对该省拥有铁路特许权的德国人，最初规划了 4 条另外的线路；有两条穿越黄运的中部地区。^② 最后惟一一条与黄运有关的线路并不是当初所规划的那些。在所有这些事件中，当地的利益集团想修铁路，但更高级别的政府更关心的是不合适的团体不得修铁路，而不是修铁路本身。当地利益集团所获得的一次成功——修筑一条

① 滿鐵：《山東地方の黄河水災状況》（天津，1936 年），第 59 页。

② Vera Schmidt, *Die Deutsche Eisenbahnpolitik in Shantung* (Wiesbaden, 1976), pp. 136~140; 也见李毓澍编《中日关系史料》（台北，1976 年）第 6 册，第 14~15、43~44、134~137 页。

通向济宁的支线——恰恰是因为这条线路被许多有权势的人视为可以取代另一条对中国主权构成威胁的线路。而在那些没有这种政治因素的地方，省和中央的领袖人物通常对黄运与沿海的联系漠不关心，并反对让外国人来修铁路。

关于铁路特许权的中德协定，在清末最后 10 年里重新商谈了好几次。除了财政外，主要问题是铁路沿线的矿权、已建成的铁路的经营、1898 年德国人宣布的但在后来 10 年中并没有动工的线路规划以及津浦路的确切路线。^① 前两个问题并没有影响到黄运，这是因为这些铁路压根就没有修筑。两条规划中的铁路与我们有关：南面一条从兖州经济宁和曹州至开封的线路以及北面一条从济南经长清、茌平、彰德府、南乐、潍县和平县至顺德府（直隶）、且有一条支线拐向临清和夏津的线路。^② 这些线路本来是可以把黄运的大部分地区稳步地带入到铁路网络中的。

经过多次争论后，德国在 1913 年同意这些线路由中国人用德国的贷款来修筑，并由德国人保留采矿权。^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宣布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最后，中国政府决定宁愿不修也不与日本人一起来修筑这些线路。在以后的 25 年时间里，作为一项所有中国人的工程，这条济南至顺德府的线路上不断地发生利益纠纷，而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① 中国交通部交通史委员会：《交通史》，第 3531～3538 页；Vera Schmidt, *Die Deutsche Eisenbahnpolitik in Shantung*, pp. 138～140.

② 中国交通部交通史委员会：《交通史》，第 3533 页。关于作为中国人的一项工程，早期修筑部分南线的计划，见《东方杂志》第 1 卷第 8 期（光绪三十年八月二十五日），“交通”第 85 页。

③ 李毓澍编《中日关系史料》（台北，1976 年）第 6 册，第 135～136 页；也见 Lee En-han, *China's Quest for Railroad Autonomy, 1904～1911* (Singapore, 1977), pp. 171～172.

中则把它列为一条计划修筑的工程；但却从未动工。^① 另外，黄运北部社区所施加的要求这条线路得以修筑的压力并不太大；在仅有的这种运动中，临清和聊城的请愿者们并不同意所列出的线路。^② 正如我们很快就要见到的那样，这与黄运南部地区所发生的一切大不相同。

对南面线路的规划很快陷入到对津浦（沪）线所经路线的争论之中。德国人想把这条线路拐向鲁东地区并向曲阜修筑一条支线，这样一来他们的矿权就可以延伸到最有前景的地区。^③ 济宁一群有功名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担任着公职，还有一些人也在经商）则希望主干线能经过济宁；如果该市最低限度也不能得到一条支线，他们则为这座城市的未来担心。神通广大的潘复（关于其人，详见第5章）领导了这场诉求。^④

① 松崎雄二郎：《北支經濟開發論：山東省の再認識》，第12～13、33～36页；吴相湘编《鲁案善后月报特刊——铁路》（台北，1971年〔1923年〕），第94～95页。

② 1985年11月对临清和聊城的访问记录。

③ 袁静波：《“兗济支线”与“济宁火车站”修建小史考略》，1982年9月25日完稿，相关内容见《济宁文史资料》第1辑（1986年3月？），特别是第5页，及《山东杂志》第79期（宣统二年十一月三十日），“论述”第2上页。

④ 袁静波：《“兗济支线”与“济宁火车站”修建小史考略》，是这件事最为完整的叙述（作者的祖父袁景熙在这些事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更易找到的叙述见《济宁县志》（1929年）卷3，第56上～68上页。关于潘复的参与，见《山东杂志》第4期（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实业”第15页；《山东杂志》第5期（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五日），“专件”第1～5页；《山东杂志》第11期（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十五日），“杂录”第1～2页；《山东杂志》第44期（宣统元年十月三十日），第26下页；《山东杂志》第45期（宣统元年十一月十五日），第11下页；其他著名的参与者的名单，可见《山东杂志》第41期（宣统元年九月十五日），第24下～25上页；《山东杂志》第45期（宣统元年十一月十五日），第11上页。

这班人把路线问题提交给津浦线将要穿越的所有 4 省绅士，并把它与刚刚开始“收回路权运动”联系在一起。^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他们对拒绝德国人的采矿权的强调，远多于对这条铁路给济宁——鲁西南的枢纽并且是一个铁路和运河运输可以交汇的地方——所带来的商业利益的强调。^② 济宁的一份呈给更高级别政府的请愿书中，按照另外一种自强的观念，把济宁这样做说成是一件积极的事例：它认为商业集中于济宁而非兖州或曲阜是非常有利的，这是因为那里商业利润的进一步积累可以激发工业化。^③ 但尤为重要的是，请愿者们强调最初的线路威胁到了中国主权及其现代化所必需的资源（特别是煤）的控制。这种观点及许多绅士的关系，把这项济宁意见背后的江苏、安徽、山东和直隶的绅士和巡抚们集结到了一块。^④

这些压力最终迫使有关方面做出让步，即主干线修在两个

① 袁静波：《“兖济支线”与“济宁火车站”修建小史考略》，第 5～6 页；王守中：《清末山东收回路矿利权运动》，《中国地方史志论丛》，第 258～259 页。也见《山东杂志》第 5 期（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五日），“专件”特别是第 1、3、5 页。

② 《山东杂志》第 4 期（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实业”第 15 页；《山东杂志》第 5 期（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五日），“专件”第 1～5 页；《山东杂志》第 11 期（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十五日），“杂录”第 1～2 页；《山东杂志》第 44 期（宣统元年十月三十日），第 26 下页。《山东杂志》第 41 期（宣统元年九月十五日），第 24 下～25 上页；《山东杂志》第 45 期（宣统元年十一月十五日），第 11 上页；《山东杂志》第 79 期（宣统二年十一月三十日），第 2 下页，全都收录了公众声明中对此事的强调。关于山东都督周自齐 1913 年对北线所作的类似观点，见中国交通部交通史委员会《交通史》，第 3535 页。

③ 《山东杂志》第 45 期（宣统元年十一月十五日），第 11 上页。

④ 袁静波：《“兖济支线”与“济宁火车站”修建小史考略》，《济宁文史资料》第 1 辑（1986 年 3 月），第 6～8 页。

原来位置之间的某个地方，并向济宁修筑一条支线。^① 这条线路是兖州至开封线的第一段——在最后的报告中，这条线路仍然没完工。^②

济宁这场斗争的组织者们急于把他们的家乡与沿海经济联系起来，并非常老练地用民族主义的诉求打动了其他地区的绅士们。他们在天津、北京、开封和烟台召开了许多要人出席的会议，并沿着规划中的整个津浦路段为请愿书收集了签名。^③ 这个群体的力量不仅与临清和聊城对铁路的软弱游说、而且与任何支持兖州的公共运动的无影无踪形成了反差。这种非同寻常的团结和效率无疑较多地归因于积极的和老练的组织活动。不过，这也根源于济宁商人和政界之间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在对信贷市场的讨论中我们已看到了这一点，而当我们研究治水政治时，我们将再次看到这一点。

不论是济宁士绅的民族主义还是其唯利是图的论据，似乎均没有动员起农村的人民或济宁市那些并不完全具有绅士地位的公民，但是：这场运动从未发展起与浙江、江苏、四川和其他省的类似运动相伯仲的广泛基础。^④ 全国有影响的济宁绅士在地方上的软弱表现仍然是本书其余部分的一个重要话题。在我们对信贷的讨论、特别是在讨论为什么鲁西南地区的农

① 袁静波：《“兖济支线”与“济宁火车站”修建小史考略》，《济宁文史资料》第1辑（1986年3月），第7~8页。

② 见“Foreign Funds for Railways,” *Beijing Review* 29: 21 (May 26, 1986), p.28.

③ 《山东杂志》第4期（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实业”第15页；《山东杂志》第8期（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三十日），“杂录”第1页；《山东杂志》第11期（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十五日），“杂录”第1~2页；《山东杂志》第41期（宣统元年九月十五日），第25上页。

④ 如见王守中《清末山东收回路矿利权运动》，《中国地方史志论丛》，第262页。

作物改良计划会失败时，已粗略地涉及了更具地方倾向与更具外部倾向的士绅们之间的某些冲突。正如我们在治水事例中将要详细看到的那样，这种分歧使得像潘复这样的人物在其推动的项目比路权运动需要更多的乡村合作时，其成效要低得多。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士绅和商人们对全国士绅所做出的有效诉求基本上全部基于中国政治的需要而不是其地区的经济困境。黄运必须融入到“沿海的”政治经济中，以获得对其环境和经济难题的帮助，不论这些帮助是来自政府还是来自市场。为了获得把黄运的更多地区纳入到那个世界的基础设施，其领袖不得不根据“自强”的关系——即主权或硬通货——而非当地的福利来阐述观点。

因此，这些诉求不得不强调黄运所能出口的东西、而不是那些它需要进口的东西。我所见到的许多中国人要求改善黄运交通的呼吁中，并没有把获得亟须的进口物资作为一种预期的利益来论述，尽管外国人有时会提到这一点。并且，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没有现代的交通，棉花生产中的专业化也能进行下去。只要这个地区的出口——这与内地通常的模式不同，与它所亟须的某些进口物资相比，数量没有那么大——毋须新的基础设施来与市场贯通，经济的论据就无助于黄运。^①

黄运的匪患确实引起了更高级别的政府的注意，部分原因

① 远离主要人口中心的地区（我们称之为“边缘”），通常将成为专门生产每价值单位较大且每地区单位收入较低的产品，对这一观点的总结，见 Donald McCloskey, *The Applied Theory of Price* (New York, 1985), pp. 416~417；相反，“核心地区”则可能会生产每批价值更高的商品，并至少把它们中的某些部分卖到不生产这类产品的地方——很可能是边缘地区。

是由于它“可以输出”到那些政府有着更大利害关系的地区。^①保留下来的鲁西地区在民国时期向省和中央请求帮助镇压土匪的呼吁中，对这个地区自身困境的叙述，要少于对匪患的蔓延将给津浦路所带来的威胁的叙述。^②上级政府被他们的理由说服，接受了呼吁，并准备了保护这条铁路的方案。^③

事实上，对土匪的镇压通常为主权的保护如何能够影响公共服务的分配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可以非常有把握地肯定，在民国时期绑架外国人的土匪将会立即受到担心外国人报复的中国政府的惩罚；由于同样的原因，那些真正杀害外国人的土匪遭到了极为罕见的快速而又具有决定性的镇压。不过，对“普通”土匪和绑架活动的镇压被留给了地方政府来办理。^④像黄运这样几乎没有中国铁路网络所涉及的地区，从保

① 如见夏莲居《山东独立前后》，《文史资料选辑》（济南版）第12辑（1981年），第49页，他称在辛亥后的早期阶段，在山东对土匪的控制（并因此控制那里的驻军）被认为是控制整个山东的关键。周锡瑞（*Boxer Uprising*，第20页）也指出鲁西、特别是鲁西南地区“输出”土匪。西南地区曾发生过导致1897年德国干预（如见Esherick, *Boxer Uprising*，第110~130页）的反对传教士事件、驱逐了省长田中玉（*North China Herald*, April 5, 1924, p. 8）的临城劫车案和国内发生的对山东民国政权惟一重要的挑战（卢书文[Lu Suwen]叛乱，见*North China Herald*, Dec. 20, 1924, p. 478，及其后发生的问题）。

② 如见潘复、周自齐和其他28人未署日期（可能在1918年4月29日）的长篇呼吁书及1918年5月1日的后续呼吁书，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机关代号00：案卷号1164。

③ 见内务部经政司三号科：《批山东同乡会马龙标等》，1918年5月18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机关代号00：案卷号1164；关于后来更详细的例子，见护路的长篇计划（而鲁西南地区并没有其他的東西），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机关代号00：案卷号1166（1923年9~10月）。也见Harry A. Franck, *Wandering in Northern China*, p.303。

④ 一般的论述，见Philip Billingsley, *Banditry in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1988)。

护主权的自强逻辑中所得的益处，仅比它们从其经济逻辑中所得的益处略好些。

总之，黄运生态的衰退远不仅仅是马尔萨斯所说的那种过程。它也不是由大运河所引发的问题的结果。相反，是过去水利体制的废弃损害了黄运地区。更宽泛地说，19世纪中期以前，明清的国家战略在面对急剧的人口压力时，有助于维持黄运脆弱的生态稳定。一部分原因是这种补助只不过是这个国家根据与其他地方的国家构建者们所持的并无二致的一种逻辑，来执行自利任务——为其京城及军队供粮——的一种副产品。但一部分原因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有意识的“仁”政的结果，这种政策自觉地致力于市场的力量不足以保障生计的地方：帮助西北粮食贸易的发展、维持“常平”仓、补助陕西的挖井或推动西南地区基础设施的创建。有人强调，不论是哪一种动机，结果均是黄运通过远程贸易获得了木材，在政府维持的水路上送来了石头，并从南方的纳税人那里获得了治水的资金。

尽管如此，到19世纪中期，这一切全都改变了。面对着外部的敌人及其最富裕地区的起义，中国的国家转向了一种自强的逻辑。在那套方案中，问题的关键是一个项目是否有助于维持对中国富有竞争力的地区的控制、是否有助于中国现代部门的建设，或者从总体上减少威胁中国国家主权的债务。到20世纪，由于分化和亏空进一步恶化，这些优先倾向势头依然更加强劲。国家把它的注意力转向了关键地区、而不是落伍的地区；而随着海洋运输的兴起，黄运没有一处变得重要起来。这种变化意味着大运河对黄运资助的终结，其结果是生态的崩溃。

另外，把贸易顺差看得高于福利的重商主义逻辑意味着沿海地区可能获得替代进口的帮助，而像黄运这样的地区在获得来自东北或其他地区的必需进口物资方面，则几乎不可能得到帮助。在这种自强的逻辑中，由于不能拿出过硬的理由来使黄

运更加紧密地连接到以沿海为中心的新网络中，新的交通网从它的旁边绕了过去；因此，它变得更加封闭和边缘化。而即便考虑到那种边缘化，这个国家与以前相比，也更加没有理由关切为黄运提供其他的服务——治水、肃匪，等等——除非其问题有波及更多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之危险。

不过，相对的封闭还意味着更大的自主性，某些当地的掌权者从中获得了益处。这方面的例证在信贷和棉花案例中非常明显。在更具外向性的群体试图保护黄运与更大规模的政治经济之间的铁路联系时，这帮人基本上袖手旁观。但当问题与这个地区水利系统——由于同样的自强理由，国家正在抛弃它——有关时，从大商人到农民到职员，他们每人得到的报偿是无人过问所开垦的土地，这对他们具有重大的利害关系，他们全都影响着所发生的一切。国家对这个地区的放弃及各地不同反应的较大事例，使我们的研究得出了黄运变得边缘化的结论。



1919年临清附近的棉花播种。整个家庭全都加入进来，儿媳和孩子们在前面拉。照片为克利夫顿·奥尼尔·凯里所摄；选自密西根大学本特利历史图书馆密西根历史特藏部克利夫顿·奥尼尔·凯里档案。



1924年，山东当地林巡队的一名成员与禁止进入小树林的标识。在 *China Weekly Recorder*（1924年2月16日，第431页）为这幅照片所配的说明中说，这些标识和巡查人员比“法令”和政府的正规军“更加可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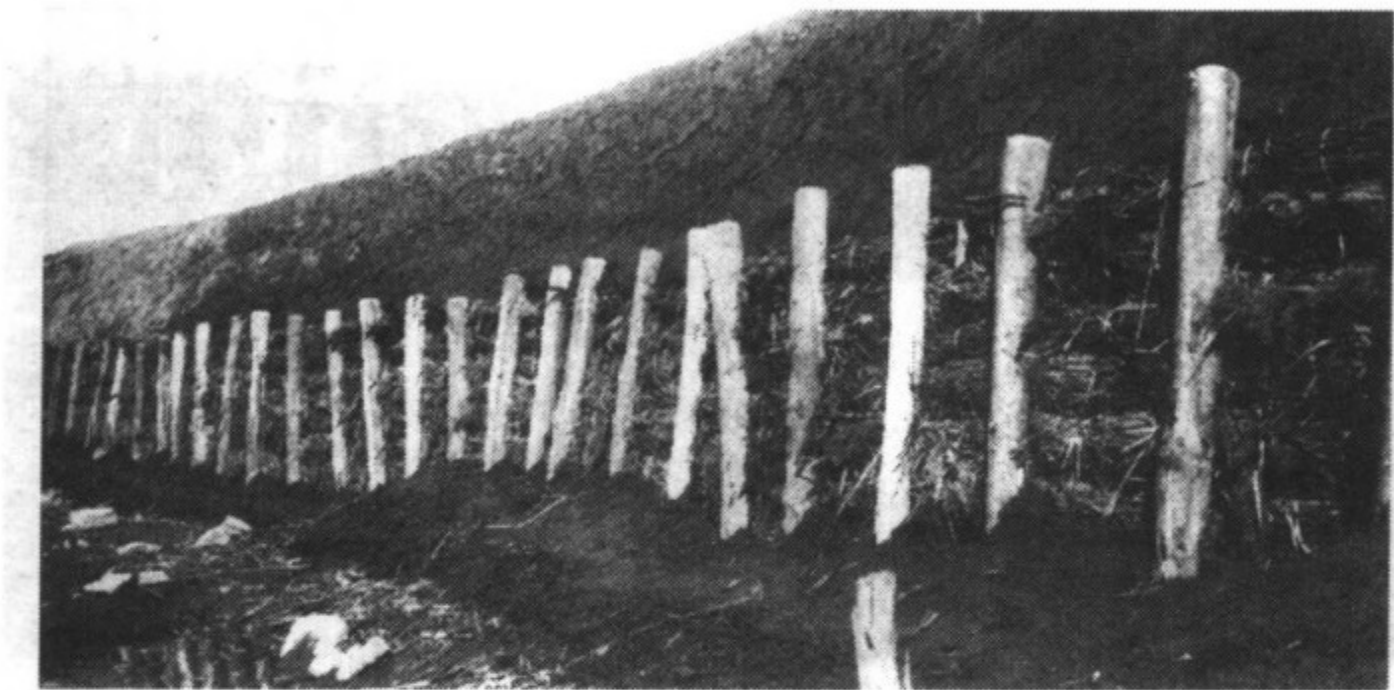
妇女和孩子们在拾柴间隙中的休息。每个人都有一只草耙和筐子；地面本身已近乎光秃。照片为克利夫顿·奥尼尔·凯里于1991所摄；选自密西根大学本特利历史图书馆密西根历史特藏部克利夫顿·奥尼尔·凯里档案。



1919年，群众聚集在济宁大运河较低的闸口上，观看来为命运多舛的大运河修复工程设计方案的美国工程师的到来。尽管缓慢且有高额费用之苦，但大运河仍然是一条从济宁远至江南的重要商业水道，并且也是周围农田主要的水灾威胁。照片为克利夫顿·奥尼尔·凯里所摄；选自密西根大学本特利历史图书馆密西根历史特藏部克利夫顿·奥尼尔·凯里档案。



1919年，大运河上运载草料的船只。1901年以后，大船无法在济宁至临清段行驶，但这一段可以行驶较小的船只，来运输像用作燃料或饲料的草料之类的大宗商品。照片为克利夫顿·奥尼尔·凯里所摄；选自密西根大学本特利历史图书馆密西根历史特藏部克利夫顿·奥尼尔·凯里档案。



1919 年用来保护大运河泥土河堤的草料和木桩。在被正确修筑和维护的情况下，这类工程会相当的有效；但即使在那种情况下，它们也无法与石头和砖头相比，而且它们对运河和黄河最危险的地方也并不适用。照片为克利夫顿·奥尼尔·凯里所摄；选自密西根大学本特利历史图书馆密西根历史特藏部克利夫顿·奥尼尔·凯里档案。



1918 年工程队在修复靠近大运河的泥土河堤。注意庞大的队伍、简单的工具及几乎看不见的树木，这些树苗可能被种植在运河沿岸，以加固河堤。照片为克利夫顿·奥尼尔·凯里所摄；选自密西根大学本特利历史图书馆密西根历史特藏部克利夫顿·奥尼尔·凯里档案。

第四章 任其自便？

华北水利设施的衰落将在以下两章中着手研究，并得出我们对黄运边缘化的看法。本章侧重于政治、社会 and 物质资源的衰落；第 5 章研究这种衰落对黄运以及对扭转它的努力的影响。因此，本章继续讨论第 3 章的中心议题：由于国家注重更具战略意义的地区，从而导致黄运“牺牲”的中国国家构建战略是如何变化的。然后，本章讨论这种在高层政策中的变化，是如何改变了影响黄运治水的地方利益结构的。这种对国家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影响及国家作为一个服务提供者的角色的研究，还将被用来提炼研究现代中国国家构建的主流方针，这种构建倾向于侧重更狭窄的国家盘剥能力。

本章首先研究造成中央政府为了削减大量的财政支出而抛开内地水利的政治实体。然后，本章叙述了这些削减的范围，并通过估算凭旧水平的资金和新近可以获得的技术本应可以做些什么来探讨这些削减的影响。后面一节说明了中央政府的退出还像国家所希望的那样确切地削弱了那些地方的利益，以弥补薄弱的环节。这在黄运北部地区尤其确切，那里与水运有关的精英们特别软弱，而中央政府对治水事务基本上全都袖手不管。接下来，本章考察黄运治水的技术问题，并解释内地水运方面衰落的利益集团是如何导致在内地治水中采用灾难性急功近利的办法的，特别

是黄运的山东部分所采用的技术，它们公认比那些更靠近沿海和在大部分河南及直隶地区所用的技术要差。它还说明，当这些技术所涉及的国家支出较低时，它们对农民而言，实际上更昂贵，在新的体制下，他们“非正式”交付的当地产品和劳动力剧增。下一节把这种技术选择，与行政问题以及特别是 20 世纪在黄运的许多地区代替了中央政府努力的治河体制中根深蒂固的腐败、并与国家构建的一般模式联系起来。

最后一节带我们绕了整整一圈，把治水中政府的侧重点与我们早先对自强和地方侧重点的论述合并起来。它说明 19 世纪末强加在水利体制上的经费削减和制度性的变化，不仅把治水（特别是黄河的治理）的负担转移到、而且把水患问题本身从靠近沿海的地区（及后来靠近铁路的地区）重新分布到济南和北京均认为较不重要的内地地区。这种变化及其后果反过来把内地的水利问题与中国在世界国家体系中变化的地位、并与不同地区已变成更大市场网络的组成部分的不同程度联系起来。第 5 章将通过考察水利衰落的结果及考察地方对这种延而不决的危机的反应来结束这种叙述。

中央政府的退出

黄运的水利问题早在 1890 年以前就已存在。尽管整个地区有大运河、黄河和运河的支流伸入进来，但它从不知道清朝法令和“水利社会”^①的理论家们所述的大规模公共工程的成熟体制。但 1890 年以后，汇集到了一起的各种新挑战及中央政府关注程度的降低，给这个地区造成了一场新的危机。

中央政府的抽身退出包括两方面。其一，政府所面临的侧

^① 如见 Karl Wittfogel, *Oriental Despotism* (New Haven, 1957)。

重点和压力改变了，而且河务资金被挪用到其他事情上：用在了19世纪60年代在长江下游地区的减税及平叛，以及用到了19世纪90年代的新军、对外赔款及北京和天津的现代化项目上。其二，19世纪90年代的“改革”对剩余的河务资金和人员不是按照减少水患、而是按照改变水患发生地的方法进行了重组：水患问题在极大程度上从更受重视的地区被重新分布到了黄运地区。

1852~1855年，黄河的河道改徙到山东境内；在此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它曾流经江苏入海。黄河本身造成了巨大的水灾治理问题。另外，它的新河道把以前大运河在山东可以利用的部分变成了技术上最困难的一段，并使对这个地区较小河流的治理变得复杂化。^① 黄运根本没有能够解决这些巨大的新难题的机构，而专注于太平军和捻军叛乱的清政府又不会来创建一个这样的机构。相反，漕粮从运河运输被移作海运。沿着黄河新河道的地区——可以说，它们的许多地方被捻军占领着——处于自生自灭状态。幸运的是，黄河改道后的前10年中，这条河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灾患。^②

许多重要人物赞成把这种过渡性的解决方式制度化。运河承担的漕运的结束，是长江下游诸省的福音，并对被认为有助于恢复那里的稳定的减税至关重要。^③ 长江流域的精英们早就

① 山东南运河疏浚事宜筹办处：《第一届报告》第1编，第2~3页；侯仁之编《序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北京，1940年），第24页。

②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编《黄河水利史述要》，第358~359页；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台北，1966年）第10卷，第4129、4143页。上述两种基本的资料均认为在1855~1879年之间发生了3次“大”水灾。

③ James Polachek, “Gentry Hegemony in Soochow,” in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Frederic Wakeman and Carolyn Grant, pp. 211~256, esp. 226~227, 253~254.

想废除变得越发昂贵的运河漕运（如，来自湖北的一个“抽样”运费从1732年的130盎司白银上升到1821年的700~800两）。现在他们有了机会。^①

其他人还觉得旧的朝贡体制很难处理。充当漕船人手的世袭营丁发现靠他们的配额越来越难以生存；而且，尽管他们可以合法装运和交易的私人货物的数量有所增加，但他们越来越转向走私、抢劫附近的村庄或逃走。当河运人员逃走时，运河岸边的县份不得不提供替代物，其代价可达数千两银子。这些问题在清道光时（1821~1850年）似乎增长得特别快。^② 尽管如此，1855年以后漕粮和运河政策的讨论并未明确地提及它们。

19世纪50和60年代长期的战争给那些力促结束运河漕运的一方增加了惯性力量。19世纪在海运问题中的进展也是如此。天津和上海的崛起，产生了赞成海运的强大的商业和政治利益集团；除了其他人以外，李鸿章就依赖于这些口岸的商业税收。^③

最后，19世纪中期朝廷转向于推进东北的发展，逐渐为京师和北方的军队建立了一条另外的粮食供应渠道。即使在清朝初年，私人对东北粮食越来越多的运输使北京比其在明朝时对漕粮的依赖要小。^④ 即使没有19世纪中期的打击，这些运

① 星斌夫：《大运河》，第223~227页。

② 星斌夫：《大运河》，第196~206、210~213页；David Kelley, "Temples and Tribute Fleets," *Modern China* 8: 3 (July 1982), pp. 361~391.

③ James Polachek, "Gentry Hegemony in Soochow," in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42~243; Spector, *Li Hung-chang*, pp. 213~216.

④ 吴建雍：《清代北京的粮食公营》，《北京历史与现实研究》（北京，1989年），第167~186页，特别是第172~173页。

人的粮食在京师的食物供应中也可能最终超过了南方的粮食，但这种替代可能不是立即发生的。事实上，那些打击极大地加快了这种转变，因为 19 世纪 50 年代朝贡的中断和东北地区外国入侵的威胁，促使清廷认识到他们必须在这块满族人的发祥地安置更多的汉族农民。^①

不过，数世纪之久的体制不会不经争论就此消失。由于在 19 世纪 60 年代中期平定了叛乱，关于将对大运河和黄河采取什么措施的争论接下来就全面展开。

一方提出把黄河逼回到它的旧河道中。这种方案有三个优点。第一，那条河道上旧的官堤，只需少量的延伸和加固就可以使用。与之相比，接受黄河的新河道，将最终承受在所有沿着这条河 300 多英里“尾部”的两岸修筑类似系列的新堤坝的负担。^② 那一河段暂时沿着“官督”“民修”的堤坝在流动。那些堤坝要小得多，且它们未花费中央政府一文钱；当地的社区修筑并维护着它们。^③ 由于黄河的新河床尚未严重地淤积起来，这些堤坝尚能管用，但到最后，接受新河道将需要中央政府出资并组织大规模的堤坝修筑。第二，这一派认为黄河的故道更加自然和稳定；他们担心不论修筑了什么样的工程，新河道两岸仍会发生无穷无尽的水患，直到黄河被逼回到其旧河床中。^④

① Robert Lee, *The Manchurian Frontier in Ch'ing History* (Cambridge, Mass., 1970), pp. 76, 116~119, 185. Lee 强调尽管太平天国战争始于东北的“转型时期”，但在 1895 年外国的人侵加剧后，移民的增长更快。

② 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第 10 卷，第 4133~4134 页；James Polachek, “Gentry Hegemony in Soochow,” in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 252。

③ 见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第 10 卷第 3939 页中的说明。

④ 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第 10 卷，第 4134 页。

最后，这一派认为让黄河回到其故道中将极大地简化大运河的控制，并将使漕运像过去一样运行起来。当淮安附近这些水道的交汇处经常发生水患时，大运河很少被排干——一种对交通更为严重的阻碍。黄河的改道，切断了过去为在黄河的新河道和东阿交界与临清之间大约 70 英里的大运河提供水源的较小河流，使得中国南北内地惟一的河道在其中段干涸了一截。最省事的权宜之计——当漕粮船队接近时，把黄河水放到这段运河中——在运河的河床中沉积了大量的淤泥，并且，长期下去还使得事情更加糟糕。这些官员认为，在它们还在升高以前，正视恢复惟一真正可用的设施的代价，将是更好的选择。^①

反对的立场——接受黄河的新河道及其对运河的影响——以李鸿章最坚决和最有力。这个立场得到了对在长江下游中心地区减税感兴趣的事实上的“休养生息”联盟以及那些与条约口岸和沿海航运的发展有着利益关系的人的支持。李鸿章认为，疏浚几近淤满的旧河床和对大堤进行修补，至少与在新河道上修筑新堤的费用同样昂贵；更加重要的是，这样的一种工程肯定会失败，将导致 1852 年灾难的重现。^②他指出，早在 1857 年，政府就应该着手沿着新河道修筑官堤。^③

新的官堤直到 1872 年在最后一次较真的恢复旧河床的运

①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编《黄河水利史述要》，第 351～352 页；也见 Arthur Hummel,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Washington, D.C., 1943～1944), 1: pp.464～471, 554～556, 2: 642～644, 723～725, 751～756, 关于这场争论中具体的参加者及其所取的立场。

②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编《黄河水利史述要》，第 353 页；也见 Harold C. Hinton, *Grain Transport via the Grand Canal, 1845～1901*, Harvard Papers on China, no. 4 (Cambridge, Mass., 1950), p. 40。

③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编《黄河水利史述要》，第 357 页。

动失败后才开始动工。即使在那时，这项工程也进展缓慢。耽搁是要付代价的；新河道已经严重地淤塞了。光绪前期（1875~1891年），黄河发生了几次非常严重的水患，特别是沿着济南至海边这条150英里的最后河段（即黄运的东部）。到1884年，沿着新河道两岸的官堤完成了。即使在那时，让黄河回到其“天然”河道的利益集团并没有消失——山东巡抚张曜在1886年重申此议，而1887年河南堤岸大溃决后为把黄河河道重新弄出山东提供了最后一次机会。李鸿章再次斥责了这种观点，而这一次它就从此无声无息了。^①

但这将置大运河于何处呢？在这些年月里，运河维持着畅通；一些贡物通过这条河流运送，但现在绝大部分改走了海路。当许多人争论海运费用较低且是供应京师更可靠的途径时，他们并没有提出放弃运河；^② 这样的一种立场可能激进得令人无法接受。这至少含蓄地置他们于一种特别的处境。运河的维持费用主要从向运河上运送的漕粮所征收的税项中支出。^③ 因此，只要运河在某种程度上保持通航，从海路运送漕粮将不会节省什么资金。总之，那些更喜欢黄河新河道的人通常把大运河问题一带而过，不是坚持更狭窄的海运问题（或是用银支付问题）以反对运河承担的漕运，就是仅仅论述黄河问题。

对于旧河道的支持者们来说，运河问题也是一个容易陷入

①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编《黄河水利史述要》，第352~353、356、357页。

② 星斌夫：《大运河》，第219、248、250页；Harold C. Hinton, *Grain Transport via the Grand Canal, 1845~1901*, 4: p. 33；光绪二十九年八月二日周馥呈递的《清单》所附的奏折，见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九年，第26箱；《清单》所标的日期为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日，不再与其奏折有关，见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三十一年，第39丙箱。

③ 星斌夫：《大运河》，第248页；《山东通志》（1915年版，1934年重印，省主席韩复榘任“主编”），第3463页。

的泥潭。当他们经常争论国家的安全要求有一条内地的河道来为京师提供供给，并指出贯穿南北的运河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时，他们却无法否认大运河、黄河及漕运管理是极为棘手、开支极为巨大的项目，且往往腐败丛生。^①即使是运河的主要受益者们也经常不满。例如，济宁的商人们非常希望附近的船闸能维持下去，但抱怨向他们收费的官员和营丁所做的工作非常糟糕，并索取高昂的“例钱”。^②正如前文指出的那样，对沿运河的县份来说，水手们会经常成为麻烦。对黄河和大运河开支的大规模削减（分别为1891和1901年）是以地方上的、通常为半私人的努力来替代，其目标为裁汰军队和相关低级官员的改革的一部分。表面上，许多人认为这些削减将因此不会损害水利的维持。有些人实际上担心这种削减会带来麻烦，但似乎没有人为旧体制作辩护。^③

到1890年，那时黄河从哪里流——或至少是那里的人将试图让它流——的问题已经解决，并且大堤也修起来了。大运河问题则被束之高阁：运河保持通行，而有一小部分漕运船队在继续使用它，但却没有对它进行大的维修。^④不过，连绵不

① 关于国家安全的争论，见下文注75；关于后来的例子，见高熙喆的奏折，光绪二十八年，第51~55箱。关于南北运河的经济利益，见监察御史高熙喆的奏折，光绪二十八年一月三十日（光绪二十八年，第51~55箱）；周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七日的奏折（光绪二十九年，第40箱）；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吴廷诤的奏折（光绪二十九年，第40箱），均见军机处录副奏折。

② 沈云龙编《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台北，1966年），第151~152、165~166页。

③ 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第10卷，第3712、4142、4177页；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七日周馥的奏折（光绪二十九年，第40箱），军机处录副奏折。

④ Harold C. Hinton, *Grain Transport via the Grand Canal, 1845~1901*, 4: p.33, 37~38, 40.

断的黄河水患及越发严重的财政问题很快促使有关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决断。

光绪后期（1891～1908年），治水预算被极大地削减，以省出资金用来偿债、赔款、修筑铁路、编练新军和发展其他“现代”项目。^①一直到1891年，黄河的开支还是被极为松散地控制着；实际上，相关的各省巡抚支出了他们认为必须花费的一切费用。^②不过，1891年，山东和河南在黄河治理方面的预算均被定为60万两，并且，山东改变了其治河体制（特别对该省最西部的地区）以把越来越少的资源集中用于它认为最需要的地方。^③巡抚们、特别是山东的巡抚，均超过了这些预算，要求官方花费更多的资金，并试图重新分配其他的收入。^④尽管如此，并没有找到可靠的资金来源，而支出则稳定地下滑；据《山东公报》估计，1894～1900年，黄河的治理费用每年为99.2万两，1900～1906年每年为67万两。^⑤河南方面的支出，在道光年间每年为150万两，清末降为42.3万两。^⑥至少在紧缩阶段的前期，兑换率的变化对黄河的治理也很不利。在1891～1903年之间，1两银子对铜钱的比价跌落了31%；由于大部分治河材料及工钱

① 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第10卷，第3860页；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四日陈夔龙的奏折，见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三十一年，第62～66箱；更广泛的论述，见本章的下一节。

② 沈云龙编《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第179页；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第10卷，第3945页。

③ 《河务季报》第1号（1919年秋），第104～105页。

④ 沈云龙编《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第205页；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第10卷，第3729、3734、3748、3806页。

⑤ 《山东公报》第106期（1812年9月17日），“文牒”第2页。

⑥ 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第10卷，第3846、3851～3853、4178页。

用铜钱支付，这等于把山东的预算从 60 万两进一步削减到 41.25 万两。^①

1901~1902 年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和预算削减。义和团起义打断了残留的漕运，甚至阻止了对更加破败的运河例行的维修。在混乱期间，人们把运河最干涸的河段占为农地。庚子赔款极大地加剧了清政府的财政困境：例如，1903 年，中国不得不支付的赔款额超过了 5000 万两。^② 漕运被废弃了；山东在大运河治理方面的预算从 16 万多两削减到 7.5 万两。^③

这些决定的宣布再次无视漕运体制资助的运河维持的途径。奏折中清楚地说明了运河必须保持通行，但却没有提出怎样来做。^④ 就像我们可以想象的那样，发生在黄运北部和南部的结局是大不相同的。鲁北的大运河——如果由地方来维修的话，其工程所需的条件太复杂——被中央政府废弃了。在鲁南，问题要小得多，当地的利益集团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而中央政府则继续帮助维持局面。

鲁南段大运河（自黄河与江苏的交界处）的资金与人员被削减了，但没有被取消，而剩下的河营与济宁运河管理机构被

① 沈云龙编《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第 204 页。

② Immanuel 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2d ed. (New York, 1975), p.496.

③ 沈云龙编《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第 237~238 页。

④ 未署日期的《清单》，可能最初附在锡良于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所上的奏折中；光绪二十八年一月十七日兵部和其他 22 名京官所上的奏折，均见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八年，第 44~45 箱；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七日周馥的奏折（光绪二十九年，第 40 箱）及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吴廷诤的奏折（光绪三十三年，第 56 箱），均见军机处录副奏折；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第 10 卷，第 3713、3717 页。

授权负责管理这截河段。^① 因此，黄运的南部地区在维持其基础设施方面仍然得到了国家的帮助。正如修筑铁路的案例一样，在新秩序中的济宁地区与其过去相比，地位已然下降；它既成了连接北方的运河、也成了连接西部的铁路的最后一站，而不再是北京与南方之间的一个站点了。不过，黄运南部地区通过其他地方资助的有形网络与中国某些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继续联在一起。

没有堪与济宁运河管理机构相比的衙门曾经被组建起来管理鲁北的运河。这个问题在所有现存的奏折中均没有提到。山东巡抚（1901～1904 年）周馥也很少提到这段运河，尽管他对这段河道具有无比的兴趣。一些对济宁商业上的重要地位及其跨地区的贸易的暗示^②，与曾经用来解释为什么改革要使南运河而不是北运河得到供给的奏折相近。就像铁路方面的事例（及第 1 章中提及的筑墙和其他地方上基础设施的事例）一样，黄运北部的精英们缺乏获得举足轻重的国家帮助其建立基础设施的力量和关系。并且，正如我们在信贷和棉花问题上所见到的那样，尽管黄运北部地区在从以沿海为中心的新经济网络中获得的益处比其南部地区更多，但这些益处被广泛地分散了，

① 沈云龙编《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第 237～241 页；未署日期的《清单》，可能最初附在锡良于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所上的奏折中；光绪二十八年一月十七日兵部和其他 22 名京官所上的奏折，均见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八年，第 44～45 箱；及高熙喆的奏折，光绪二十八年，第 51～55 箱。

② 未署日期的《清单》，可能最初附在锡良于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所上的奏折中；光绪二十八年一月十七日兵部和其他 22 名京官所上的奏折，均见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八年，第 44～45 箱；及高熙喆的奏折，光绪二十八年，第 51～55 箱；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七日周馥的奏折（光绪二十九年，第 40 箱）及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吴廷诤的奏折（光绪三十三年，第 56 箱），均见军机处录副奏折。

并没有导致大的财富集中，也没有产生较高层面的政治影响。

其间，北京继续迫切需要作更多的收缩。河南黄河河务开支削减的幅度尤其之大，主要是把资金节省下来用于庚子赔款，并且也用于资助主要在北京和天津地区的现代化项目。^①山东巡抚比河南巡抚对经费削减做了更加有力的抵制，指出其水利方面的任务尤为艰巨。^②不过，它们再也没有被恢复到光绪早年的资金水平；它们只不过是支出超出了其正式预算时，避免了被进一步的削减。他们不得不每年都要求增加额外的资金；而尽管他们有时得到了资金，但他们从来都不能依靠这些资金。^③

1905年，河南巡抚陈夔龙抱怨说，这些资金转移是用内地的血汗来资助沿海地区的发展。这种抱怨没有什么结果，但却有不少事实成分。^④从长时期来看，一些内地地区也从天津和东北设施的建设中获得了益处，并可以与所有其他人一齐从一支能够抵御外敌入侵的军队那里获得益处。不过，毫无疑

① 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第10卷，第3845～3851页。

② 光绪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周馥的奏折（光绪二十九年，第40箱）；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五日杨士骧的奏折，及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十一日杨士骧奏折所附的片（均见光绪三十二年，第37～38箱），及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六日杨士骧的奏折（光绪三十三年，第56箱）；均见军机处录副奏折；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第10卷，第3729、3733～3734、3748、3809～3810、3826、3835页。

③ 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第10卷，第3729、3733～3734、3748、3756、3806、3809、3813、3822、3835～3836页；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十一日杨士骧奏折所附的片（均见光绪三十二年，第37～38箱）。

④ 关于陈的不满，见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四日陈夔龙的奏折，见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三十一年，第62～66箱，及陈夔龙呈递日期不清、收到日期为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八日的奏折（光绪三十一年，第40箱），均见军机处录副奏折。就我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能找到的资料，对陈的奏折可能做出的答复已不存在。

问,政府的资金从以内地为中心的水利方面大量转移到了以沿海为中心的其他项目上。^①另外,正如本章最后一节所揭示的那样,那些仍然被分配给水利方面的资金,越来越多地被用在了靠近沿海的项目上。

1911年以后,河务预算在进一步缩减。20世纪20年代,山东每年在黄河方面支出的省经费为52万元(或371429两);其中38万元来自对18个沿河县份征收的附加税。^②其他90个县要求提供经费,但除了救济及大水灾间隙的修补外,没有立即被供给。^③河南(40万元)、河北/直隶(25万元)及山东加在一起,比河南一省在19世纪40年代所开支的款项还要少。^④

盘根错节的财政体制使资金短缺问题复杂起来:维护资金有着特定的、专门的来源。^⑤因此,如果一个县未能交上其捐助,即使总收入不存在亏空,工程可能也无法完成。这种问题

① 见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四日陈夔龙的奏折,见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三十一年,第62~66箱,以及未署日期的《清单》概括了1874~1905年来自其他省份(主要为山东)对东北营兵的协款,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三十一年,第45乙箱。Esherick, *Boxer Uprising*, 第170页指出,山东作为“剩余”省份对清廷的重要性,第130页引用北京表扬一个山东巡抚从黄河预算中节省资金的话,但认为那些特殊的节约来自对腐败的限制,并不会损害河务治理。

② 《山东河务特刊》第1号(1928年10月),“纪事”第3页、“公牒”第21页。1“两”大约等于1.4元,“两”是清朝时广泛采用的会计单位,但在民国时期用得较少。

③ 如见《山东河务特刊》第2号(1930年1月),“命令”第18页、“公牒”第14、31~32页;《山东河务特刊》第7号(1935年1月),“命令”第62页。

④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编《黄河水利史述要》,第367页。

⑤ 《山东河务特刊》第1号(1928年10月),“纪事”第3页、“公牒”第21页。

对水利工程来说尤为严重，在那里，所有的条件——所需的材料、具有空闲时间的农民及黄河本身的适当状况——必须在很短的时间里满足。运石头的时间选择尤为棘手，石头只能在河流解冻后运进来，这几乎在农活开始前没有空出任何时间。^①

在清朝时，通常通过借用其他地方上的资金——通常是盐务资金——及挪用其他省的经费来解决这些问题。晚清的黄河报告中提到，对这项工程进行资助的借用资金不但来自附近省份，而且来自远至浙江、江西及广东的地区。^②事实上，尽管文献中把这些资金说成是从其他省“借”来的，^③但其中的一大部分可能代表了转移的支出，“借出”省份向北京上交的款项更少，而代之以用山东、河南或直隶的资金来补偿。

民国时期的档案过于零碎，以至于无法证明这种借款停止了，但我并没有找到这样的事例，并且对于这一点非常容易理解。直到1890年，能够依靠所有黄河经费的省份得到了北京的再次拨款；而即使在此之后，清廷可能也不会让一个省给另

① 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八日张人骏的奏折（光绪二十八年，第44～45箱）；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周馥的奏折（光绪二十九年，第40箱）；光绪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张人骏的奏折（光绪二十八年，第40箱）；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九日杨士骧的片（光绪三十二年，第37～38箱），均见军机处录副奏折；《山东河务特刊》第2号（1930年1月），“公牒”第16、44～45页；《山东河务特刊》第6号（1934年1月），“布告”第1～2页。

②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三日胡廷选奏折和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袁世凯的奏折（均见光绪二十七年，第42～43箱）；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二日周馥的奏折（光绪二十九年，第40箱）；均见军机处录副奏折；国立故宫博物院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4册第161页、第15册第204页。

③ 如见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二日周馥的奏折（光绪二十九年，第40箱）；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袁世凯的奏折，见国立故宫博物院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4册，第161～162页。

一省留下一笔大额的、没有偿付的公共资金的借款，这些资金原则上全都归北京所有。^① 1916年以后，当各省通常被相互敌视的派别所控制之时，仅有可能被大水灾危害的相邻省份才会提供跨省的河务协款，这是一个小小的奇迹。

中央政府的退出：新的侧重、新的 紧缩与错失的机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中国得以与旧体制相同的代价获得本来可以极大地改善管理的新技术时，水利体制却走到了末路。在1887~1888年黄河泛滥之后，清廷首次向外国的工程师进行咨询。外国人赞同中国专家中少数派的立场：黄河的水道应该被强行缩窄，以便使水道可以挖深，并使黄河河道不再移来移去，从各个角度来击打大堤。把黄河置于这种束缚之下，需要石头砌成的大堤。^② 在像涿口（济南东部，靠近山东的黄河采石场）这样的地方，黄河在那里天然地被束缚在两道距离仅有1/3英里的石灰石壁垒之间，这里的河道被疏浚得很深，水患也最少。^③ 后来的工程师们也赞成这种基本的方法，尽管细节被不断地修改；“河道整治”在西方也非常新，而黄河成了一个早期实验室中这种新技术仿真的试验实例。^④

① 关于盛清时期哪些资金按规定属于各省（相对较少）及哪些——即便它们从未留给省里——属于北京，并不得不按其指示花费，见 Zelin, *Magistrate's Tael*, 各页。关于清末各省之间协饷的扼要数目，见 Mann, *Local Merchants*, 第109~110页。

② Freeman, "Flood Problems," pp.1141, 1154; Walter Mallory, *China: Land of Famine* (New York, 1926), 第52页；沈怡编《黄河问题讨论集》（台北，1971），第1~17页。

③ Freeman, "Flood Problems," p.1141.

④ 沈怡编《黄河问题讨论集》，各页。

我们没有对 19 世纪 90 年代河道整治所付出的代价进行直接的计算，但大致的估计则是可以做到的。在 1898 年，在咨询了外国工程师后，李鸿章估计黄河整个维修费用为 3000 万两；其中 930 万两将是立即就需要的，其余部分可在多年里慢慢地筹集。^①（这笔资金分别相当于 4200 万元和 1302 万元。此后，所有资金数将换算为 20 世纪的计账单位：元。）这项计划并不包括所有河道整治中的缩窄，但它却包括只要在交通条件允许的地方就采用石砌大堤，并在其他地方筑起砖窑，修筑砖堤。尽管相关的削减方案对黄河上段做了缩窄、石面河堤的规划，但周馥仍把山东部分的估计数削减为 3 年需用 784 万元。^②

1932 年，山东、河北和河南同意相互协作对黄河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全面维修。除了用新设备进行彻底疏浚外，这个方案还包括全面整治黄河所需要的石料工程；在需要的地方，它提倡购买汽轮并修筑窄轨铁路来运入石料。经计算，工程需要 178.8 万方石料；整个工程将在 20 年时间里开支 7662.04 万元。^③

基于这一项及其他地方的规划资料，在 1932 年的全面规划中所预计的石料工程，似乎在 19 世纪 90 年代末可以用 1750 万～2030 万元来完成。^④这并不包括疏浚费用，但这项费用无论如何都是存在的，并将随着河道变窄和变深而逐渐下降。

另外，这些数字并不包括由于削减每年一度的大堤维修工

① 沈云龙编《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第 210 页。

② 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第 10 卷，第 3822、3836、3756～3757 页。

③ 《山东河务特刊》第 4 号（1932 年 1 月），“计划”第 2～3 页。

④ 关于计算方法见博士学位论文，第 203～204 页及相关的注释。

程而导致的巨大节约。自 19 世纪 90 年代至 20 世纪 30 年代, 据所有黄河治理规划的计算, 每年所减少的治河经费, 即使不计入防治水灾的利益, 也将超过最初所投入的费用。^① (但精确地说, 在将来的建筑工程中可以节约多少则是无法知道的。^②) 正如当时许多观察家们所指出的那样, 不论基于什么考虑, 即使是防止黄河水灾造成的一部分损失, 也将值得进行大规模的维修。

对这项工程的资助则成了问题。毕竟, 可能值得做的其他大规模的建筑工程 (像进一步修筑铁路) 也没有完成。政府以及为其贷款者均不能立即承担起所有值得做的工程。不过, 与铁路方面的情形不同, 由于政府从未如此大规模地资助河务工程, 或是由于对这种工程的优点意见不一, 在这件事上并不缺乏资金。由于新一轮的紧缩被强加到了政府的水利治理上, 主要的维修没有完成。另外, 正如第 5 章将要说明的那样, 河流治理本应获得比铁路和其他现代化项目高得多的利润率。

尽管上述的开支显得庞大, 但若与 1891 年以前的治水支出相比, 它们绝不奢侈。仅河南一省在 19 世纪 30 和 40 年代每年的常规开支就达 210 万元, 而山东在 19 世纪 80 年代每年的平均数也与之相埒。^③ 通过与这一数字的比较, 在 20 年里支出不超过 2100 万元的计划 (或者甚至是李鸿章为整条河流

① 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第 10 卷, 第 3835 ~ 3836 页; Freeman, "Flood Problems," pp. 1113 ~ 1114; 《山东河务特刊》第 4 号 (1932 年 1 月), "计划" 第 3 ~ 4 页; William Tyler, "Notes on the Hoang Ho or Yellow River" (Shanghai, 1906), pp. 10 ~ 12。

② 即便我们认为政府对未来开支削减的估计数是极为准确的, 但实际节约数字将有赖于那些确切日期开支的数量, 并有赖于真正的或隐性的贷借成本。尽管如此, 不论这项工程花费中央政府多少费用, 也是值得做的。

③ 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第 10 卷, 第 4178 页; 《山东公报》第 106 号 (1912 年 9 月 17 日), "文牍" 第 2 页。

设计的 4200 万元的计划)——因为石料工程可以逐步免除最大的常规支出(修建草秸堤岸)——是非常理智的。另外,迟至 1930 年,山东河务局估计,在黄河大堤上可以用石头来替换的最恶劣的河段,15 年中每年仅需要 20 万元,在更低价格的情况下可以获得几乎相同的利益。^① 如果 1891 年以后各处民堤所用的材料接近我所估计的草秸数量,^② 仅它们的开支就比最雄心勃勃的石料工程及许多次更小的方案要大得多;花在官堤上的费用则是额外的。民国时期,直隶把它所有的黄河大堤都作为官方承担的责任,对这条河流治理得很有效果。把山东境内黄河的所有上段地区——迄今为止,最不受重视及最容易泛滥的河段——按与直隶相同的办法来对待,而每里也按相同的开支来计算的话,每年应该花费 75 万元;这样的一笔资金并不是微不足道的,但这可能仍然比草秸大堤的费用要少得多,作为整体而言,对这个省来说,也是一笔小负担;另外,这可能会使山东在黄河上的全部支出仍然远低于 100 年前河南的支出。^③ 换句话说,就黄运所取得的成就而言,省或中央政府的资金本应比地方上大得多的、非正式的开支做得更多。

在 1890 年以前,大体上每隔 20 年黄河就要作一次大的维修,通常要花费巨额的资金。早在 1815 年,仅河南睢州一地的工程就几乎花费了 560 万元,尽管那个州在 16 年前曾作过一次“大工”。1820 年,1400 多万元被花在了河南的一项大工上。1888 年,黄河在开封决堤后,仅河南一省的维修费用就花费了 1544.4 万元——所做的维修基本上无一例外地使用草

① 《山东河务特刊》第 2 号(1930 年 1 月)，“专件”第 4 页。

② 见博士学位论文，“附录 G”。

③ 见博士学位论文第 4 章，注 48 和 290 所列出的资料来源及这项统计中的数字。

秸和泥土。^① 不过，1890 年以后，像这样的大修只进行过一次：1914 年对直隶主堤的一次全面检修，花费了 420 万元，自此以后，一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这个地区未发生过大的水灾。^②

1891 年以后强加在水利体制上的新的紧缩，从花在治水方面的费用所占的比重上也明显可以看得出来。清廷的预算数字很难找到，且很难解读，但显而易见的是，花在治水方面的费用比重被极大地压缩了。有项研究——不巧的是，这项研究没有引用资料——显示中央政府的治水费用从占 1850 年以前总支出的 12%，在 1850~1900 年之间下降到 3%，在 1905 年再降为 1.38%。^③

甚至在沿黄河各省的省内，侧重点的变化也是非常明显的。1855 年，山东提出增加资金以解决黄河改道的影响，指出该省大运河和黄河的开支“仅”占山东财政收入的 10%~20%，清廷拒绝了这项要求。^④ 到 1911 年，山东对河务工程的预算已缩减到 93.8 万元——低于该省赋税收入的 7%，并且不到该省每年捐助庚子赔款的一半。^⑤ 假如山东付给赔款的费用中的一半被用来补充河务工程款，大的维修本来是可以完成的，^⑥ 而山东运用到河务工程预算的比重，可能仍然偏向于

① 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第 10 卷，第 4178 页。

② 徐世光：《濮阳河上记》（无出版社名，1915 年），“后序”，第 1 下页；侯仁之编《序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第 151 页。

③ 興亞院技術部：《北支における林産資源調査》，第 100 页。

④ 引自咸丰五年四月十二日山东南运河管理者的诉状（名字已模糊），见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山东巡抚档案（尚未编号）。

⑤ 《山东杂志》第 88 期（宣统三年四月三十日），第 7 上、8 上页；《山东杂志》第 89 期（宣统三年五月十五日），第 23 下页。

⑥ 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第 10 卷，第 3756 页。周馥把李鸿章的计划一定程度上按比例做了缩减，每年需要 80 万两，但仅需要 3 年。

清廷在 1855 年认为是合理范围内的较低的一端。

自 1855 年以来，水利问题不断恶化，但并没有变得不可收拾。变化最大的是国家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兴趣，以及面对这些问题，它为了治水而使用其收入的程度。“国家的发展”、军事力量的增强、抵制外国的控制及避免亏欠代替了以前对生计和再生产的侧重，而黄运被放到了后面。另外，国家经费的缺乏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国家的放弃还削弱了当地维护水利的利益集团；这种因素与其他因素使黄运即使想将就一下都不可能。

轻视的加剧：地方瘫痪的社会和政治基础

（一）1902 年以后的水利：制度的孤儿及财政困境

一旦清廷更多地置身事外，水道很快就淤塞了，这并不令人惊讶。许多资料强调，尽管 1902 年山东境内大运河的境况非常糟糕，但它仍然可以使用；在漕粮停运及中央政府退出后，自黄河至临清的一段变得无法通行，因此，结束了长途运输。^① 许多官员认为，即使在漕运停止后，水利体制也要维持

① 《山东杂志》第 3 期（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五日），第 9～11 页；《山东杂志》第 66 期（宣统元年六月十五日），第 22 上～下页；《山东建设月刊》第 1 卷第 3 期（1931 年 3 月），“公牍”第 33 页；《河务季报》第 5 号（1921 年秋），第 15 页；《交通史》，第 1787 页；《临清县志》卷 2，第 20 下页；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七日周馥的奏折（光绪二十九年，第 40 箱）和光绪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杨士骧的奏折（光绪三十二年，第 37～38 箱），均见军机处录副奏折。

下去，这是人们可以理解的事。^① 对提出 1901~1902 年削减经费的奏折所发布的上谕，特别说明运河应该维持下去，尽管没有说明由谁来维持。^② 受其影响的地区的外国人，在赞成结束内河漕运的同时，通常认为运河将会被维持下去，甚至应该得以改进。^③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它很快就淤塞了。

1901 年以后水利维修方面局部的成功和更大的失败一成不变地延续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不过，民国时期所作的努力更加广泛，而现在保存下来的这方面的档案也更多。我将要在这里很快回顾一下清廷的努力，当我在第 5 章论述民国时期的水利体制时，再对其中的一些问题重新讨论。

山东巡抚周馥提交了几份改进河务工程的方案。不过，仅有一项要求曾得到了批准：把山东为北京和东北的军队所承担的经费配额中的一小部分，分 3 年转用到急需的黄河维修方面。^④ 在批准保留的这些附加税被用完时，北京坚决拒绝了进一步延伸的请求。^⑤ 周馥更大的计划紧跟在李鸿章 1898 年的

① 光绪二十八年一月三十日御史高熙喆的奏折（光绪二十八年，第 51~55 箱）；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七日周馥的奏折（光绪二十九年，第 40 箱）；光绪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杨士骧的奏折（光绪三十二年，第 37~38 箱）；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杨士骧的奏折（光绪三十三年，第 56 箱）；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吴廷彦的奏折（光绪三十三年，第 56 箱），均见军机处录副奏折。

② 光绪二十八年一月十七日兵部和其他 22 名京官所上的奏折，均见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八年，第 44~45 箱。

③ *North China Herald*, April 2, 1903, p.634; *North China Herald*, April 16, 1903, p.729; *North China Herald*, May 21, 1903, p.984.

④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杨士骧的奏折（光绪三十二年，第 37~38 箱）；沈云龙编《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第 179~180、203、209~211 页。

⑤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五日杨士骧的奏折（光绪三十二年，第 37~38 箱）；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第 10 卷，第 3806、3809、3811 页。

方案之后，这个方案是朝廷要求的；它们受到了称赞，但却没有得到资助。^①

1906年，周馥的继任者杨士骧在山东北部的大运河还能挽救的时候；请求拨款加以浚修；这项计划同样依赖于保留一小笔专用于省外士兵的附加税中的资金。^②除了这件事以外，杨士骧还认为，为了安全起见，中国需要一条内地的运输线路。人们本来以为这种非常普遍的观点将会很容易地被接受：在1900年西方入侵之后，出于安全原因，清廷已把天津的军工厂转移到了山东北部运河上的德州。^③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杨士骧甚至因建议北京放弃税收以便他可以挽救这截运河而遭到了严厉的斥责。^④由于北京对杨士骧的反应几乎不会再鼓励未来的巡抚们为运河而费心，并由于没有其他的人为东阿至临清的河段承担任何责任，官方关于整条运河应该保持畅通的说法显得毫无意义。

即使没有大量的资助，指定专人来负责可能也有极大的助益。对大运河进行全面整治的代价似乎太大，维持以前50年的水平是不可能的了。在漕贡的最后几年里，东昌府的官员确

① 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第10卷，第3756～3757页；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八日周馥的奏折（光绪二十九年，第40箱）；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杨士骧的奏折，均见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三十二年，第37～38箱；《山东通志》（1915年），第3442页；沈云龙编《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第683～691页。

② 光绪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杨士骧的奏折（光绪三十二年，第37～38箱）。

③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杨士骧的奏折，见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三十三年，第56箱。

④ 光绪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杨士骧的奏折，见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三十二年，第37～38箱及上谕；更详细的论述，见博士学位论文，第209～210、213页及注97、98。

实做了足够多的事情来使经过鲁北的船队“畅巡”；每年的支出仅为5万两。^①

在鲁南，那里的一个机构——在一个常驻的盐务官员主管之下^②——及一小支河营仍然保留着，它们做了许多事情。1903年，山东的南运河管理局获得了地方行政经费来维持其运行。^③与此同时，那些使用山东南运河的商人受到了咨询，内容是如何重组船闸的人事和守卫营兵，以及如何减少腐败；作为回报，商人们同意每年捐助13000两。^④1908年，该机构从拨给运河工程后10年的年度款项（每年75000两）中借了215000两的经费（没有利息）来资助大修。两年后，山东巡抚报告说，每年仅花费了中央54000两的资金就完成了常规的维护，使这些借款可以如期偿还。^⑤因此，尽管中央政府保留这个机构是一种最低的姿态，但考虑到它是中央政府责任相对成功的象征，它为地方政府和私人利益集团的努力创造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合力。

山东北运河既缺乏制度上的支持——它变成了远处山东巡抚的责任——也缺乏本地的资金来源。这个地区缺乏一群与官场有着密切关系的强大的商人，再次意味着尽管这里的人均水平比黄运南部地区富裕，但这个地区既缺乏资助其基础设施的后台，也缺乏从国家获得帮助的手段。临清海关比济宁的那些

① 国立故宫博物院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4册，第167页；Dominique Gandar, *Le Canal Impériale: étude Historique et Descriptive* (Shanghai, 1903), p.56。

② 《山东通志》(1915年)，第3464页。

③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八日周馥的奏折（光绪二十九年，第40箱）。

④ 沈云龙编《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第239~240页。

⑤ 宣统二年四月十九日农工商部的报告，与宣统二年四月十九日的奏折一起封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会议政务处档案，文件号6560。

海关更经常地被规避，而它们的用途也由国家来决定，没有任何地方的投入；它们被指定用于遥远的受助者，主要是北京和东北的驻军。^① 在鲁西北的盐商们——由于那里走私的猖獗，被称之为“盐耗”^②——与那些使用山东南运河的盐商们相比，既不富裕，也没有影响力。鲁西北和鲁西南地区的商人们都对完成其销售配额感到棘手，但西南地区的配额在起步时就更大，因而对国家、对商人们均更加有利。^③ 一般说来，山东北部更加开放社会中的商人们，与济宁更大、更有组织性、关系更密切及更具垄断性的商人们相比，在为基础设施游说和资助方面做得更少。

黄运地区的黄河治理也转向了一种更加非正式的、半私人性质的体制。1891年的改革废除了许多专门负责治河的营兵。许多官堤变成了民堤；它们通过地方的努力来维持，由巡抚委派的委员来监督。^④ 正如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的那样，这些变化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向民堤的转变不过涉及了某些地区，但这些地区几乎包括山东境内黄河的所有上部河段，也就是在黄运的那部分。这些变革一旦做了之后，就被证明是持久性的——这个地区在20世纪30年代仍然拥有山东绝大部分的民堤，并

① 关于临清海关的经费及其向东北的转向，如见光绪二十三至二十六年封署的《清单》，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九年，第27甲箱；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的《清单》，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九年，第27甲箱；及周馥相关的奏折。

② 山东南运河疏浚事宜筹办处：《第一届报告》“附录”，第11页。

③ 见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十七日杨士骧的两封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三十三年，第42乙箱。我们必须记住北部环线所包括的远不止是黄运北部，而南部环线则仅仅包括黄运南部的一部分。

④ 《河务季报》第4号（1921年春），第75页；《河务季报》第1号（1919年秋），第107～109页。

几乎不存在什么官堤了。^① 权力集中的黄河行政机构被废除了。^②

因此，省与省之间、同一省份的县与县之间以及县级以下掌权者之间合作的制度性基础全都被削弱了；更具地方性的难题被证明是最为重要的。我们将在第5章中更为详细地分析这种情形；而现在，我们用两件简单的事来说明在新体制下，即使跨越一个很小的地区，进行合作也是多么的艰难。

山东的北运河上发生了一件事。夏津、清河和武城境内的130里运河河段在1891年发生大水灾以后，运河西岸相对富裕的百姓立即自发组织起来，重修了大堤，在40多年时间里再也没有发生过一次水灾。东岸的人口则比较穷且比较稀少，部分原因是由于土地向东倾斜，使之更容易首先遭遇水灾。那里的人们无法维持适用的大堤，而此后他们几乎每年都要承受水灾的侵害。这些水灾又反过来影响了其他的河流，直到侵夺了大约40万亩农田。但东岸没有得到西岸负担更轻的人民——他们从坍塌的东岸为高水位所留下的出水口中获得了利益——或是有关县政府的帮助，即便对开垦的土地征收很轻的税收也能支付治水的费用。^③ 其他地方也一样——如，在寿张县境内黄河的北部及南部沿岸——地方政府允许不均衡的负担

① 如见1933年12月5日河务局呈省主席韩复榘的备忘录，见《山东河务特刊》第6号（1934年1月），“公牒”第25~26页。

② 在黄河行政管理机构停止行使职能后的长时期里，它还继续正式存在着。1891年成立的山东黄河管理机构，意味着即使是以一种纯粹的正式形式，那个行政机构也不再负责整个河务；在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它曾被短暂地废弃过；而在1913年，它被永久地废弃了。1898年的情况，见Immanuel 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第465页；1913年的情况，见《交通史》，第1746页。

③ 《山东建设月刊》第3卷第5期（1933年5月），“论著”，第1~3页。

分配持续下去，即便它导致了频繁的水灾和税收的流失。^①

在某些时候，缺乏合作甚至导致了破坏活动。负责大堤的人从来都只维修一边；《北华捷报》报道说（例如，用修筑凹形大堤的办法）把这条河逼向对岸是“中国人的一种老习惯”。另外，一旦大洪水到来时，让另一边受灾通常是最容易的自保方法。在1917年的大水灾中，靠近德州—恩县边界的大运河西岸的某些村民故意掘开了东岸的大堤，造成500平方英里（几乎达200万亩）的地区受灾，水深达5英尺。他们中的4个人被抓获，并被处以私刑，但他们并不是绝无仅有的试图把水灾从他们自己的地区转嫁到别处的人。同是在这场水灾中，观察家们注意到，对于濮州和范县依靠接近黄河民堤的人民，尽管靠后几英里的官堤得到了很好的维护，但却对他们没有任何安慰；相反，这造成了他们自己的田地排水更慢。在1925年黄河发生水灾时，官员们还有意地掘开了几条大堤；当制造水灾并非总是一种不好的策略时，如果不进行合作，它可能就是灾难性的。^②

（二）运河与地方政治

水利责任下放给更具地方性、非正式的机构，并不仅仅使治水的活动更难组织；它还改变了其目标。对土地开垦和地方水灾治理的重视，越来越超过了交通。在济宁（1902年）、东阿（1904年）和聊城（1910年），漕运结束之后，土地开垦以及因干扰了运河交通，以前本应被禁止的灌溉工程接踵而至；

① 见山东省长公署教育科《山东省各县乡土调查》（济南，1920年），第138页。

② *North China Herald*, Oct. 27, 1917, pp. 217 ~ 219; *North China Herald*, Oct. 6, 1917, p. 23; *North China Herald*, Oct. 3, 1925, p. 9; *North China Herald*, Oct. 10, 1925, p. 47.

在聊城和临清，当地的官员把运河的河床本身作为农田来出售。在济宁地区，都市居民想让运河注满水，而农村居民则更愿意让它成为一条无用的、但却没有威胁的干涸河道。^① 只要运河承运漕粮，那些对它承担责任的人最大的担心就是对交通的阻碍；因而，水被放进了运河，商人则获得了益处，但农民们则承受着水灾的伤害。在漕运结束后的 10 年里，国家的那些侧重点被颠倒过来，即便是在靠近重要商业城市济宁的地区。^②

一旦中央政府不再拨款来维持交通以及不再通过疏浚运河和加固其堤岸来使地方的水灾治理保持相对的和睦，这些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就加剧了。另外，政府监督的结束，改变了地方利益集团之间权力的平衡。1915 年的报告中写道：衙役们通过与私自开垦靠近运河以及甚至私自开垦在河道中的土地的人相勾结而大饱私囊。人们是否不得不对他们所占领的土地付租金或纳税，变成了一件重要的有争议之事，一方是占地者、衙役和乡村头面人物，另一方是县政府和商人们。在济宁，那里的商业利益集团本应非同寻常的强大，但民国初年县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败下了阵；该县精英中的都市成员在 20 世纪 30 年

① 关于济宁的情况，见《东方杂志》第 1 卷第 10 期（光绪三十年十月二十五日），第 172 页；关于聊城、临清及其之间的地区，见《山东杂志》第 9 期（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十五日），第 5 上页；关于东阿的情况，见《山东河务特刊》第 4 号（1932 年 1 月），“命令”第 37 页；通常见侯仁之编《序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第 49 页。关于出售运河河床的情况，见《山东杂志》第 9 期（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十五日），第 5 上页。关于城乡分歧，见刘荫怀《济宁的运河》，《山东文献》第 5 卷第 1 期（1979 年 6 月 20 日），第 84~85 页。

② 山东南运河疏浚事宜筹办处：《第一届报告》第 1 编，第 1 页；关于在漕运结束后发生的一件事例，见沈云龙编《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第 197 页。

代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但还是失败了。^①

这种城乡之间的斗争对理解黄运南部相对强大的精英最终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济宁的城市精英们——就像我们在与铁路和运河相关的事件中所见到的那样——在使基础设施得以构建和维持方面，比黄运北部的那些精英们获得了更大的成功。不过，他们却无法把这种成功扩展得太远，这是因为他们在济宁市（和一些县城）的外部还没有强大到把他们的意愿强加给在其腹地中的乡村精英和衙吏们（在推广棉花方面，这些局限是显而易见的，只是以一种略微不同的方式而已；见第2章）。考虑到强大的城市和乡村精英之间的平衡，黄运南部在获得国家帮助方面相对的成功，不过产生了有限的优势。

在黄运北部，运河工程从来都更依赖国家，这是由于那里的商人集团没有紧密地组织起来。结果，当漕运结束时，它很快就衰落了。没有了漕运船队，如果运河无法通航，地方官们再也毋须对其上司做出交代了；因此，他们没有什么理由来阻止人们垦种或以其他方式阻止运河中的水流。另外，1903年，在临清对运河上厘金的控制从地方官手中被转到了济南派来的一名委员那里。由于这种变化，地方官失去了他也许仍会用于使河流保持通行的那些非常重要的资金。^②

如果地方官们想说的话，他们还是可以使运河通行的。当

① 关于沿北运河地区的情况，见山东南运河疏浚事宜筹办处《第一届报告》“附录”，第9页；《山东建设月刊》第1卷第2期（1931年2月），“命令”第10页关于南部的情况，第10～11页关于县议会的情况。

② *North China Herald*, April 16, 1903, p.729. 尽管一个拥有控制海关关卡权力的地方官可能利用某些收入以自肥，但这种情况不像“个人”收入所显示的那么腐败，这是因为地方官们被寄希望于承担由他们“个人”掏腰包的许多本地公共使命。见 Zelin, *Magistrate's Tael*, pp.47～54, 181。

1907~1908年冬天临清粮食匮乏时，地方官让人把水引入到临清至聊城的运河河段，以帮助运入物资。不过，他仅是想让运河通航到下一次枯水季节，而不是解决更长远的问题。^①1902年以后，除了像这样的危机时期，地方官员基本上没有理由来从事任何运河工程；当1904年临清的私人团体把木制的“收费桥”横置在雨水四溢的运河上，强行向运粮车征收超过其成本数倍的费用时，地方官甚至没有进行干预。^②

（三）恶性循环

地方优势的变化，使得曾是北京重中之重的黄运交通几乎不会有人再来做改进它的工作了；这因此导致我们再次发问：为什么中央政府不仅退了出来，而且在负面结果不断加剧时仍然袖手旁观？部分的解释显然是预算方面的，但我们已经看到小额的资金就可以满足运河继续维持的基本费用。正如第5章将要说明的那样，即使是对运河和黄河全面维修所用的更加庞大的资金，也可能是极其值得支出的。那些短期任职的地方官员们几乎没有理由来维持或改善水利设施，但地方和省利益集团没有采取有效的行动则是令人惊讶的。我们将在下一章考察采取了哪些行动，特别是与地方相关的努力。

其间，我们可以扼要地考察一下为什么黄运的利益集团相对的软弱。原因是与黄运相应的经济衰落——它们越来越恶化——有关，但更多地导源于国家在内地和沿海地区相关的利益变化。

首先，在运河最终被抛弃以前的许多年，它就开始颓败了。至少在黄河改道前20年里，沿山东段的贸易可能极一时

① *North China Herald*, Jan. 1, 1908, p.124.

② *North China Herald*, Dec. 9, 1904, p.1289.

之盛。在接近改道时，临清承受了另一次打击；1853年*，这里遭到了太平军的洗劫，且从未完全恢复过来。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前，济宁比济南要大，并且在商业上也更重要；临清和聊城与济南相埒。到1900年，济南发展得极快，济宁没有衰退，但发展得相对太慢，而临清、特别是聊城则式微了。^①

另外，即使在其繁盛阶段，临清或聊城也从未在政治上居于过重要的地位，除了作为依靠其来源地（山西、陕西和安徽的徽州）的较大商帮的组成部分。济宁商人被组织得更好，但只有两个家族中出过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人物。黄运的商人不仅不具有全国性的影响，而且那些处于像聊城这样被打击得特别重的城市中的人主要是外地人；在1902年以后，绝不会试图来振兴聊城，他们转移到了济南和其他很快就要修筑的津浦路沿线城市。^②

在这方面，黄运南部甚至落在了一些非常贫穷地区的后面。例如，尽管淮北（江苏和安徽的最北部分）特别贫穷，但这里有着需要使用这截运河的重要商人（特别是徐州的盐商），有助于对它进行资金挹注，并把政治上有影响的投资者（包括曾担任过国务总理的段祺瑞）揽进来。^③而在淮北似乎也不像

* 原文如此。太平军北伐援军攻占临清的时间为1854年4月13日。

——译者注

① David Buck, *Urban Change*, pp. 21~29; 杨正泰：《明清临清的盛衰与地理条件的变化》，《历史地理》第3辑（1983年），第115~120页。

② 1985年11月在聊城的访谈记录。许多人迁到了济南，甚至今天该市的一个商业区也主要由那些在20世纪初从聊城来到这里的人的后代经营着。

③ 《农商公报》第3卷第5期（1916年12月），“近闻”第26页；史念海：《中国的运河》（无出版日期，可能是1934年或1935年出版），第175页；《交通史》，第1789~1790页。

山东，当交通与垦种发生冲突时，前者压倒了后者。^①

尽管如此，黄运的资金损失并不能单纯地归咎于它被更为富裕的地区“在外面施加了影响”。就像我们不久将要见到的那样，这种失败，只能通过在国内利益方面享有极大独立性的国家对国际社会施加的压力所做出的反应这样的一种背景来理解。

考虑到在清末作为相对于各州府的济南越来越集中的政治权力及在济南与沿海之间越来越密切的经济联系，^② 我们不禁要把鲁西地区的政治损失看成为经济相对衰落的直接后果。清末民初的山东政治确实有一道重要的东—西（或“齐”—“鲁”）分界，即使在西部地区丧失了经济上的优势后，但它似乎还保持着有利的地位。^③ 在民国前10年中，西南地区的人控制了政府职位和议会的领导席位，并负责把省经费投入到在黄运南部的项目上。袁世凯死后，更多的鲁东人掌握了权力；然而，统治权力仍然主要留在西部地区的人的手中，并且西部地区的领导人与北京有着更加紧密的关系。^④ 只是在1924~1925年之间

① 侯仁之编《序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第48页。

② David Buck, *Urban Change*, pp.27~32, 44, 50, 53, 73.

③ 关于山东各地区的政治分野，见万光炜《民国初年山东政党活动的内幕与省议会的丑闻》，《文史资料选辑》（济南版）第5辑（1978年），第32~42页；夏莲居：《山东独立前后》，《文史资料选辑》（济南版）第12辑（1981年），第29页。

④ 万光炜：《民国初年山东政党活动的内幕与省议会的丑闻》，《文史资料选辑》（济南版）第5辑（1978年），第35~36页；也见邵绰然《田中玉把持山东省议会选举的丑闻》，《文史资料选辑》（济南版）第5辑（1978年），第43~50页；也见 *China Yearbook, 1926~1927*, 第1190页；《中国近代名人图鉴》（台北，1977年），第83、227页；园田一龟：《新中国人物志》（黄惠泉译，上海，无出版日期），第108~141页；Howard L. Boorman,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 1967), 1: pp. 382a~383a, 429a~430a; *China Weekly Review, Who' Who in China*, 3rd ed. (上海, 1925年), 第41~42页。

张宗昌（烟台的一个本地人，得到了奉系的支持）势力的侵入，才最终由东部地区的人从政治上控制了这个省。^①

鲁东地区与鲁西地区相对立这个问题，比国家在内地与沿海相对立的态度这个问题上要小得多。海运和东北粮食生产的增长，意味着清廷可以使用一种相对现代、靠市场驱动的体制来把从其他地方榨取来的剩余转化成京师的食物。^②与此同时，这些正在发展的沿海地区与其他强有力的政治竞争者有着同样的特征。沿海地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与不断加剧的弱点需要在那里进行资源的集中——特别是军事力量，但包括各种公共服务，这是因为几乎在任何领域中的失败都可能导致对主权的进一步侵害。^③例如，长江下游地区曾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比

① 关于张宗昌对鲁东和东北地区的人的依赖，见王翰鸣《张宗昌兴败纪略》，载《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册，第333、346页；李恒珍等：《我们所知道的张宗昌》，《文史资料选辑》（济南版）第3辑（1982年），第1~2、12~19、27、36~39页。

② 关于鲁东与东北之间密切的经济联系，见Gottschang，“Migration”，各页。也见David Buck, *Urban Change*, 第27页。1910~1911年，在鲁东地区一场打击假币的运动中，发现了巨额的真假卢布，掖县和黄县（均靠近烟台）的银行已变成在东北北部的山东人所挣得的外汇的重要票据交换所（也见《支那省别全志》第4卷，第1138页）。同年，由于双方无法达成相互接受货币的意见，在鲁西（特别是高唐）和烟台之间的棉花贸易停止了（见第1章）。

③ 如见Charlotte Furth, *Ting Wen-chiang: Science and China's New Culture* (Cambridge, Mass., 1970), pp. 177~82; Carl F. Nathan, *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 1911~1931* (Cambridge, Mass., 1967), v, 5, pp. 42, 74. 也见Spector, *Li Hung-chang*, 第213~216页中对源于沿海贸易的政府税收的重要性的论述；见Michael Hunt, *Frontier Defense and the Open Door* (New Haven, 1971), 第8~9页及各处对中国政府转为鼓励东北移民与担心外国入侵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常见Rudolf Braun, “Taxation,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 and State-Building: Great Britain and Brandenburg-Prussia,” in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1973), 第243~248、310~327页中通过对税收的分析，对国家与市场发展之间的关系做了论述。

华北更富裕，但仅是在 19 世纪的变革氛围中，这种局面才可以导致对漕粮和北方水利体制的放弃。另外，正如我们在毁林事件中所看到的那样，中国国家的重新定向，以牺牲黄运为代价，甚至使贫穷的沿海地区（像黄河入海口的利津）获得了益处。

在变革的氛围中，裁减掉一个用来转移剩余的旧的、耗资巨大的内地设施，似乎是合乎情理的。问题在于，在放弃水利体制时，清廷最后并不止放弃了一条转移剩余的途径。说得更抽象些，沿海的市场构建既对国家构建的活动有所回报，也需要国家构建的活动。这些机遇和压力使取消一种耗资巨大、以命令为基础的转移剩余的体制颇为诱人。不过，结果却是在黄运造成了每况愈下的政治分化，既使这个地区、也使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到了民国年间，由于中央政府对水利的忽略而造成的难题，可能已变成了国民政府不愿在治水方面担负主要使命的独一无二的原因。至少在如果有人希望来“解决”它们而非仅仅改善它们时，这个体制方面的技术难题已经变得令人望而却步。其间，正如我们应该看到的那样，负责治水的组织失败得如此彻底，以致成功的维修不仅需要资金上的巨大投入，而且还需要人员——既有河务专家，也有其他的官员——的巨大投入。本章的其余部分将分析民国初年治水体制的自然和社会政治形态。

草秸与石头：落后技术的循环

（一）物质上的难题

民国初年，黄运既面临着交通、也面临着水患的难题。尽管我们的研究着重于其社会和政治方面，但如果不对某些物质

上的问题做出描述，这些方面是无法理解的。

黄河及黄运其他的河流可以通行一些船只，但“交通问题”主要是大运河的问题。这些问题分布在三个地区。从济宁略微偏北的地区至江苏边界（通向长江下游的整个河段），运河比人们想象的要更浅、更窄。在干旱时期，只能通行很小的船只。^① 不过，它通常运行得很好；像对过闸时被耽搁之类最为常见的抱怨，说明它仍然是一条繁忙的水道。^② 淤浅给像粮食之类的大宗船货带来了难题，但这截河道依旧是可以使用的商业与旅客线路：例如，从上海启程到鲁西南地区去的传教士，就是乘坐在运河上往来的游船。^③

沿直隶边界从临清至德州（及在到天津的河段上）这条最北的河段，情形也非常相似。由于卫河的缘故，即使在德州与天津之间通上了铁路后，这段河道也有充足的河水来竞争对大宗船货（如棉花）的承运。^④ 不断有人抱怨拥塞（特别是靠近

① 《农商公报》第3卷第6期（1917年1月），“近闻”第30页；《农商公报》第8卷第2期（1921年8月），第56～58页；《交通史》，第1787页；John Ripley Freeman, *Grand Canal Investigation*（康乃尔大学收藏本），p.3.

② 如见沈云龙编《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第165～166页。

③ 如见 H. C. Bartel, *The First Mennonite Mission in China* (Lawrence, Kans., 1913), p.33.

④ 《山东建设月刊》第2卷第3期（1932年3月），“计划”第1、7页；John Ripley Freeman, *Grand Canal Investigation*（康乃尔大学收藏本），p.3. 《天津棉花运销概况》（天津，1937年）中1920～1929年的数据显示，从1920～1923年驳船运入天津的棉花相当于铁路所运入棉花的25%～35%，但那时运入所有地方的数量相当于1925～1929年每年所运数量的3～11倍。1924年，驳船运入的比重在20%以上。当然，不是所有的驳船均通过运河而来，但由于鲁西地区是天津最大的供应地，而且显然不能使用海船，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大多数驳船的运输代表了运河的交通。我们还有许许多多轶闻说明了来自山东和冀西南的棉花是经运河而来。

天津的河道上), 这说明这条水道依然繁忙。^① 500 吨级的驳船不能在西运河上行驶, 大型的漕船也不能在运河上通行, 但载重 80 吨的船只则仍然能够通行。^②

尽管如此, 在这段河道上行船尤为缓慢。像运河的其他河段一样, 多年来它一直没有被彻底疏浚过, 而淤泥已经使河床升高了许多。结果, 它构成了严峻的水灾隐患。在南方, 水灾被“准予”发生。在北方, 人们修筑了从各种角度凸入到运河中的各种各样较高的障碍, 使运河弯曲得令人难以置信。临清至德州的直线距离为 47 英里, 陆路距离为 60 英里, 而水路竟达 93 英里;^③ 另外, 河道的弯曲使得大型船只的运行非常缓慢。从德州乘游船去临清的美国测量人员, 经常发现“我们可以〔上岸步行〕以缩短 300~400 码的距离, 并要花上二三刻钟的时间来等待〔船只〕绕过同一个弯子。”这段水路花了他们 4 天半的时间。^④

从与黄河交界(济宁略北的东阿)至临清的运河中部 70 英里河段, 情况最为糟糕。除了在暴雨或洪灾期间, 这一段几乎无法使用。^⑤ 行脚商人有时乘小船使用这段水道, 但这段水道几乎无法通行可用于远程贸易的大船。^⑥ 运河这段河道的许多部分成了农田。^⑦

运河还存在着严重的水患问题。而尽管运河的交通情况到

① 如见 *North China Herald*, July 8, 1904, p. 82。

② John Ripley Freeman, *Grand Canal Investigation* (康乃尔大学收藏本), p. 35。

③ 《山东建设月刊》第 2 卷第 3 期(1932 年 3 月), “计划”第 1、2 页。

④ 1918 年 12 月 1 日 Carey 的信。

⑤ 1918 年 12 月 5 日 Carey 的信。

⑥ 如见《东阿县志》卷 6, 第 3b 页。

⑦ 1918 年 12 月 16 日 Carey 的信;《山东建设月刊》第 1 卷第 2 期(1931 年 2 月), “要闻”第 37 页。

1910 前后稳定下来，但水患问题仍在恶化。

黄河特有的问题——世界所有河流中最为严重的淤积，有一段许多英里的河床高出了两岸土地，水流多变，从细流到大洪流均有——为众所周知，这里毋须回顾。^① 大运河的水患一直相形见绌，但在 20 世纪早期的黄运，它与黄河水患几乎同样的严重。一般说来，它的严重程度与运输问题呈反方向变化。非常干涸的中段很少泛滥；其他河流则更加经常地淹没占据运河河床的农田。^② 北段经常有高水位，但它也有着一系列长长的堤坝。^③ 沿着省界，直隶资助了每年一次的疏浚，部分原因是担心洪水会冲光通向天津的整条通路（就像 1917 年那样）。^④

南段（并邻近淮北）的问题最为严重。^⑤ 由于北部与比它强的黄河、南部与比它强的淮河交汇，这一段被夹在了两条大河的中间，它没有出海口。尽管如此，它汇集了来自有时包括淮河和黄河在内的许多江河的水流和泥沙。正如 1915 年的一份报告中所说的那样，这个地区“过去曾是大运河的脉搏，但现在则成了肛门”。^⑥ 结果是两条河流均经常发生严重的水灾，

① 一般易读的概述，见 Freeman, “Flood Problems,” pp. 1113~1167. 也见侯仁之编《序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第 60 页。

② 如见《山东建设公报》第 3 卷第 8 期（1933 年 8 月），“计划”第 9 页；《临清县志》（1934 年）卷 7，第 18 上~30 下页对这个地区河运及其问题的叙述。

③ 《山东建设月刊》第 2 卷第 3 期（1932 年 3 月），“计划”第 7 页；《临清县志》（1934 年）卷 7，第 23 上~24 下页。

④ 如见宣统元年二月一日的咨，农工商部档案，案卷号 394，文件号 2985。

⑤ 侯仁之编《序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北京，1940 年），第 48~49 页。

⑥ John Ripley Freeman, Grand Canal Investigation (密西根大学收藏本), p. 93; John Ripley Freeman, Grand Canal Investigation (康乃尔大学收藏本), p. 45; 山东南运河疏浚事宜筹办处：《第一届报告》第 1 编，第 2 页。

而这条河道上构成运河出水口的浅水湖则不断地发展。^① 常规的疏浚可以维持运河的交通运转，但并不足以防止水患。与黄河相同的是，山东大运河的河床淤积得太高；与黄河不同的是，它的许多河岸没有堤坝。^② 由于对湖泊的影响意见不一，湖泊本身的情况被搞得复杂起来。尽管“老天爷”正在扩大它们，但当地的居民从 19 世纪 90 年代就开始发起了无数的、通常发生冲突的开垦湖地的尝试。^③ 在考察了 1919~1920 年的山东大运河之后，约翰·雷普利·弗里曼称它有着世界上所有运河中最糟糕的水患问题。^④

最后，这些问题影响了其他的水道。运河及其湖泊中淤积的泥沙，阻碍了万福河和洙水向其排水；这给离运河 75 英里的地区造成了水患。^⑤ 这条主河道中的问题还使黄运其他河流的问题复杂起来。例如，汶河从异常光秃的鲁南山岭上流注到那些湖泊中，当通过运河的木材进口停止时，鲁南那些山岭上的森林砍伐速度加快了。像许多这类河流一样，汶河非常容易形成毁灭性的突发性洪水：它在 1917 年的泛滥，每秒排水量超过了以前黄河在东阿的那次泛滥——被说成是那里 70 年一遇的水灾。^⑥

① John Ripley Freeman, *Grand Canal Investigation* (密西根大学收藏本), p. 93; 《山东公报》第 1 卷第 34 期 (1912 年 7 月 7 日), “文牍”第 1~2 页。

② 山东省建设厅:《浚治万福洙水河志》(济南, 1934 年), 第 13、14、19、28 页。

③ 《济宁县志》(1929 年) 卷 2, 第 47b~50b 页;《东方杂志》第 1 卷第 10 期 (光绪三十年十月二十五日), 第 172~173 页。

④ John Ripley Freeman, *Grand Canal Investigation* (康乃尔大学收藏本), p. 45。

⑤ 侯仁之编《序天下郡国利病书: 山东之部》, 第 48~50 页; 山东省建设厅:《浚治万福洙水河志》, 第 2~6、10~19 页。

⑥ John Ripley Freeman, *Grand Canal Investigation* (康乃尔大学收藏本), pp. 45, 46。

(二) 政治经济与低级技术的选择

这个地区落后的交通状况，与水利的放任相混合，反过来阻碍了水灾治理。最为重要的是，交通问题进一步阻挠了最重要的工程之一——用石头来更换鲁西地区用泥巴和草秸修筑的大堤。

正如我们很快将要看到的那样，在石头本应既更加便宜又更加有效的地方继续使用草秸，深受前几章所述的两个问题——黄运南部地区通货和信贷短缺以及大宗物品输入的障碍——的影响。不过，一个完整的解释还必须包括本章的关键主题：①地方和国家在治水问题上侧重点的差异；②一旦国家退出了，在治水问题上当地权力天平的变化；以及③一旦国家承担任务的责任变得不明朗时所导致的制度性的难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以继续下去，就阐明了第4个、并且也是更加广泛的主题，我们从政府的植树努力中看到了这个主题的端倪：只要额外的开支不是由政府来承担、额外的水患发生在国家重商主义和民族主义者视为边缘的地区，国家考虑整个福利时宁愿采纳代价更大和效果更差的方案。我们已经对前两个主题做了许多论述；我们将在本章的其余部分对后两个主题作更多的论述，并思考它们对广泛地理解晚清和民国时期国家构建的意义。

由政府经营以用于山东黄河的采石场在济南略东一点的望口山，处于黄运的下游。由于黄河在鲁西地区既宽且浅——部分原因是由于整治黄河所需的石料短缺——运输非常困难，而靠近黄河的大运河已变得太浅，以至于无法利用。不论是约翰·雷普利·弗里曼的黄河治理规划，还是1932年河务局的方案，都要求修筑窄轨铁路，仅是用来运入治河的石料。20世纪20年代，从采石场至一条200里（66英里）远的大堤向下

游的运输成本，超过石料本身成本（每方1元）的4倍。^①

不过，即使这样的成本范围与把石头向上游运输的成本相比也相形见绌：官方资料估计，把石头往上游向鲁西地区运输200里，其成本将高于它在采石场价格的19倍。^② 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的实际价格甚至要更高。^③ 20世纪20年代的修路工程被认为使治水工程的材料供应变得更容易；^④ 但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不论作什么用的石头均从水路运输。到1928年，尽管黄运东部下游超过半数的地方修筑了石头堤坝，但黄运的山东部分没有一处修筑了这样的大堤；仅有最接近黄河主采石场的黄运的一个县东阿正在准备修筑。^⑤

缺乏石料、砖头，或者甚至经常缺乏木材，大堤的修筑者

① 《河务季报》第4号（1921年春），第78页，载有官办采石场的内容；《河务季报》第1号（1919年秋），第10页，有关于运输困难的内容；石头运输的具体问题，见《河务季报》第3号（1920年秋），第134页；关于黄河的规划，见《河务季报》第10号（1925年春），第28页；关于开支，见《山东河务特刊》第2号（1930年1月），“专件”第5页。（《河务季报》的注与201页注④不同。——译者注）

② 在1920年，《河务季报》提供的支出估计数与《山东河务特刊》的数据及我们的计算结果相符。它给出的顺流运费为（疑此处的量词为“每吨”——译者注）每里2分，而石头的实际开采加上运送到河边的费用为1元。它还给出了逆流的运费，每里超过8分，并指出在上游地区可能会使用的采石场附近河边，石头的价格为3元。从采石场向上游200里的距离大致相当于到靠近该省边界的濮州李官屯主堤位置；因而，某些上游地区可能支出较少，但这段特定的距离是至为关键的，这是因为李官屯大堤是保护上游安全所必不可少的。《河务季报》第3号（1920年秋），第134页；《山东河务特刊》第2号（1930年1月），“专件”第5页。

③ 《山东河务特刊》第2号（1930年1月），“专件”第15、45页。

④ John Ripley Freeman, Grand Canal Investigation (康乃尔大学收藏本), p. 53.

⑤ 《山东河务特刊》第1号（1928年10月），表格（无页码），“命令”第10页。

们使用了各种劣质的材料。最常见的是高粱秆。外国专家评论说，中国工人用这种材料可以做出最好的活。^① 尽管如此，秸秆每1体积单位的重量仅达石头的1/20。另外，即使一条秸秆修筑的大堤在开始时与石头大堤一样管用，但它却不会像石头大堤那样用得那么久，这是由于秸秆会慢慢地在水中腐烂。秸秆至多能维持3年；通常为一、两年，但如果是用不恰当的方法割下来的没有根部的秸秆，几个月就会烂掉。^② 石头堤坝可以维持20年而毋须太多的照料。^③ 结果，好的高粱秆修筑的大堤最终是非常昂贵的。解决了每一次对赞成用秸秆修筑大堤的质疑后，在我们拥有价格资料（1920和1935年）的任何一个年份中，仍然显示在濮州李官屯（一个从采石场向上游200里的重要地方，在1928年修筑一条石头大堤前，那里许许多多的秸秆大堤坍塌了）的一条石头大堤应花的费用仅比修筑一条秸秆大堤的费用高1.5~1.7倍，而秸秆大堤仅在极短的时期里才具有同样的效果。^④

从理论上讲，修建廉价的秸秆大堤所节省的资金，可以转化为一种用来支付修复这些大堤的“捐献”。为了叙述的缘故，我已假设这些资金可以每月生出3%的利息；这个地区的借出者指责这种利率，但大概所得的净利要更少，这是由于有些借款没有归还。即便高粱大堤维持两年半，而秸秆的价格也没有上涨，在大堤的修建者们使用秸秆尚没有达到得失相当——比前文估计的实际价格差异要多得多——时，石头的成本也仍然

① 《山东河务特刊》第1号（1928年10月），“命令”第3~4页。

② 《山东河务特刊》第1号（1928年10月），“命令”第4页；Tyler, “Notes on the Hoang Ho,” p. 2; 《河务季报》第1号（1919年秋），第114页。

③ 《山东河务特刊》第4号（1932年1月），“计划”第3页。

④ 见博士学位论文，“附录H”。

肯定高于一条同样管用的秸秆总量的 1.85 倍。加上所观察到的 1920~1935 年之间秸秆价格的上涨（每年 5.5%），使盈亏平衡点达 2.1:1。如果秸秆大堤仅维持 2 年，那么，在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盈亏平衡点就成了 2.2:1；如果有通货膨胀，那么，盈亏平衡点为 2.5:1。这些比率当然是估计数，但每一次所进行的活动都使用了对秸秆大堤有利的假设；在所有的可能性中，真正的盈亏平衡点仍然要高得多。^①

另外，我们对维持黄运民堤所需的秸秆数量的估计数显示，这些当地“捐献的”物品对农民们来说是一项极为沉重的负担：它们每年可能至少值 110 万元，并可能高达 420 万元。^②即使是前述较低的数字也比政府花在山东大堤上的所有经费高出 2 倍多；平均数则接近 1932 年黄河综合规划中山东省所占的年度份额。当然，使用秸秆修筑大堤时，比用更耐用的石头所修筑的大堤对劳动力的征用也更多，使用秸秆修筑的大堤，需要经常地维修。^③换言之，在黄河治理中的总投入（并因此由农民所承担的代价）依然很高；但是，是较高的净投入（投入减去贬值）真正地防止了水患并被用作现代经济的典型标志。^④简言之，把黄运的黄河治理作为当地的责任，意

① 见博士学位论文，“附录 H”。更全面的解释见博士学位论文第 227~231 页，及相关注释，再加上博士学位论文“附录 H”。

② 见博士学位论文，“附录 G”。

③ 如见《山东河务特刊》第 4 号（1932 年 1 月），“计划”第 4 页。

④ Fernand Braudel, *The Wheels of Commerce*, trans. Sian Reynolds (New York, 1982), pp. 244~245; Simon Kuznets, *Population, Capital, and Growth* (New York, 1973), pp. 121~130; 《河务季报》第 3 号（1919 年 10 月），第 124、134 页；《河务季报》第 4 号（1920 年 1 月），第 85 页；《山东河务特刊》第 8 号（1936 年 1 月），“公牒”第 59 页；博士学位论文，“附录 H”。（此处的《河务季报》第 3 号（1919 年 10 月）与注 148 又不同，疑有误。——译者注）

味着国家花费较少的资源，但社会花费了更多。

要消耗比上文所估计的那些数字更少的资源，一个大堤的建筑者可能将不得不修建比石头或砖头堤坝均要差得多的大堤；事实上，除非工程是以次充好，否则，节约是非常少的。一个仅希望完成其工作的监督者可以使用一种非常便宜的草泥混合物；一方夯得很实的这种混合物的成本，在1920年可能仅为2.85元，而到1935年则约值5元。^①以这样的比价，那些没有使用的资源与被留下作为巨大的利润一样，本来是可以产生足够的材料以用于大堤的维护的。尽管如此，建筑和维修甚至像这样最差的大堤比使用砖头（不包括最初修窑的费用）也只不过是便宜一点点。

更加重要的是，这样的一种混合物的效果本应不会太好。当时的每位学者均认为有效的治水需要石头或砖头大堤；^②正如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那样，有效的治水无疑值得花费比使用这种混合物高许多倍的成本。在山东境内的黄河中下游（包括它在黄运的最后几英里及黄运以东的全部）及直隶的河段，1891年以后新修的许多石头大堤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但在

① 主要价格资料来自《河务季报》第4号（1920年1月），第85页和《山东河务特刊》第8号（1936年1月），“公牍”第59页；1方夯得很实的泥草混合物相当于原来高度的60%，其资料见《山东河务特刊》第2号（1930年1月），“专件”第14页。更多的资料见博士学位论文，“附录G”与“附录H”。

② 沈云龙编《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第247页；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第10卷，第3821、3835、3880页；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一日袁世凯的奏折，见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三十二年，第37~38箱；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袁树勋的奏折，国立故宫博物院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26册，第482~484页；《河务季报》第1号（1919年秋），第107页；《山东河务特刊》第4号（1932年1月），第3~4页。

其上段——从该省边界至济南略西的地方，覆盖了黄运的大部分地区——仍然用秸秆来修筑没有什么效用的黄河大堤。^① 这是为什么呢？

被人忽视的黄运交通显然起着主要作用，这使得石头的成本变得如我们上文所述的那么昂贵。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石头的使用仍然比秸秆更有效力。为了解释秸秆的继续使用，我们必须考虑国家放弃黄运在行政上所造成的影响。

1891年的改革，指定山东境内黄河的某些河段——几乎全部在中下游河段——用官堤来保护。这些大堤像以前一样，通过从民间征调的劳役及河营——世袭的专门负责保护河流的部队——来维持；这些工程的资助来自国家的预算。^②

在其他地方（尽管不是专指，但主要是上段），黄河则由民堤来控制。这里既没有河营、也没有国家的经费。^③ 而是在一名由省府委派的委员的监督下，由当地的百姓用当地的资源来维修这些大堤。^④ 即使在民国年间，各省对它们的预算获得了更多的控制权时，民堤仍然被定为自给自足，除了在发生重大紧急事件时会拨给小笔的资金——山东省的预算中，每年民

① 《山东河务特刊》第1号（1928年10月），无页码的表格、“专件”第3页。

② 《山东河务特刊》第1号（1928年10月），无页码的表格；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第10卷，第3718、3949、3951～3956页；沈云龙编《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第279页。

③ 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第10卷，第3731、3939页；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编《黄河水利史述要》，第357页。

④ 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第10卷，第3766页；《河务季报》第1号（1919年秋），第109页；《河务季报》第3号（1920年秋），第130～132页。

堤应急的经费仅为 4800 元。^① 在 1891~1937 年整个阶段，尽管许多官堤是石头的，但却未曾用石头修起一条民堤。当在李官屯（一处人们在山东向上游所能走得最远的地方）和直隶濮阳的主要大堤（分别在 1928 和 1915 年）再次成为官堤时，它们立即被用石头做了重修。^②

由于民堤的组织是临时性且不正规的，某些支出非常的少；例如，各社区在农闲时就不必供养“河营”。尽管如此，这种体制可能阻碍了石头的使用，这是由于石头的费用出自一大群基本的劳动者。^③ 如果没有正式的征税权，要收取这些资金将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没有一个永久的机构，要借这些钱也是不可能的。而且由于这些非正规组织的经费与监工委员个人的经费缠结在一起——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节重新论述——使得人们有着强烈的动机来看重短期的节约，这是因为委员们从不知道他们负责一项具体大堤的时间还有多长。

另外，付给石头的款项可能要用现金，而且可能落到了采石和运石的外地人手中。修筑高粱秆大堤使用的是当地的产品与当地的人力。因此，尽管好的高粱秆大堤过于昂贵，但它可能依然使很穷的社区在凑那些费用时比筹集修筑石头大堤的钱更为容易。正如第 1 章已阐述的那样，黄运的一些县经常承受通货紧缺之苦，并且许多人抱怨民堤的修筑遭到了现金流动问题的阻碍。^④

① 《山东河务特刊》第 1 号（1928 年 10 月），“公牒”第 13 页。

② 《山东河务特刊》第 2 号（1930 年 1 月），“专件”第 15 页；徐世光：《濮阳河上记》，“丁”第 23 上页。

③ 《河务季报》第 1 号（1919 年秋），第 109 页，强调了没有设立适当的永久组织的问题。

④ 《山东建设月刊》第 2 卷第 3 期（1932 年 3 月），“报告”第 45 页；《河务季报》第 1 号（1919 年秋），第 117 页；《山东河务特刊》第 8 号（1936 年 1 月），“公牒”第 86、89 页；《山东河务特刊》第 1 号（1928 年 10 月），“命令”第 30~31 页。

当 20 世纪 30 年代该省建设厅在鲁西南进行一项大的工程时，它总结说，征用人力和物品比收取——或者甚至使用——现金要容易得多；^① 对修民堤的人而言，用现金折换似乎仍然是更可怕的事。可想而知，村民们对这个地区中的榨取也有着道德上的偏好，即便它们更为沉重且更没有效力。

运输问题还体现了后勤方面的挑战。在黄河解冻到农活开始前的短暂间隙里，即使是官堤通常也很难获得石头；^② 1930 年，山东河务局想使用更多的石头，但却没有足够的船只甚至用于满足其眼前的需要。^③ 对规模较小、非正式、资金短缺的民堤组织来说，这些瓶颈甚至更加严重。

但石头并非秸秆的惟一替代品。多年来，官员们一直建议在石头太昂贵的地方使用砖头。^④ 在大运河的繁荣时期，鲁西输出砖头，而制砖在今天仍是那里非常重要的副业。^⑤ 李鸿章和其他人推荐沿黄河每隔几里就建几座砖窑；这应该可以避免运输问题并可省下运输成本，并且在黄河解冻之前，应该有空闲时间用到河务工程上。这种砖窑设施向外人支付的款项比石头工程要少得多，这是由于可以用当地与秸秆大堤相同的材料——草秸或木材（作燃料）及泥——来制砖。砖头的成本平均只占石头的 1/3，从长远（甚至有时从短期）角度来看，这

① 山东省建设厅：《浚治万福洙水河志》，第 37 页。

② 如见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周馥（从山东）和光绪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张人骏（从河南）的奏折，均见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九年，第 40 箱；《山东河务特刊》第 4 号（1932 年 1 月），（来自河北的）“公牒”第 7~8 页；《河务季报》第 1 号（1919 年秋），第 117 页。

③ 《山东河务特刊》第 2 号（1930 年 1 月），“专件”第 5 页。

④ 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第 10 卷，第 3836、3947 页；《山东杂志》第 18 期（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三十日），第 9 上页。

⑤ 杨正泰：《明清临清的盛衰与地理条件的变化》，《历史地理》第 3 辑（1983 年），第 118 页；1985 年 11 月在东平和临清的访谈和个人调查。

比管用的高粱秆大堤可能要便宜得多。^①

毫无疑问，砖头可能要遇上自身组织方面的困难——例如，资助和保护砖窑——但其利益本应是巨大的，而许多私人组织就管理着类似复杂的项目。多村的“闸门公会”，与冀中南一样，在靠近和类似黄运的地区管理灌溉和治水事务。^②

尽管如此，民堤体制有着另外的难处。当这种体制名义上把大堤作为“人民的”责任时——因而把维持大堤的负担加给了那些将最需要把工程做好的人身上——它并没有把大堤工程的控制权交到当地人手中。相反，它加进了来自济南的委员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候补县令或道员；他们的作用是下一节的分析重点。

因此，是秸秆的使用而非石头或砖头大堤阐明了“行政整合”的缺乏。依赖当地的资源、而不是从其他地方购买更合适的材料，以及无力为石头工程和冬季制砖而通过时间差来挪借资金以转移资源，反应了政府除了让每个社区独自面对这些困难（且每年基本上都是从零开始）以外，无法做出任何比这更好的事。一旦我们把所使用的当地的资源标上价格，那么，秸秆修筑的民堤就显得比由上面出资修筑的石头大堤要昂贵得多；另外，秸秆大堤的效力明显要差得多，在大水灾之后，不论是百姓自身，还是国家机构，均不得不动乱。

为了进一步阐明行政整合失败的论点，来把它与杜赞奇所说的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经历着“国家的内卷化”^③ 作一比较，

① 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第 10 卷，第 3822、3836、3947 页。

② 如见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pp.26~38, 山东其他地区的事例，见侯仁之编《序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第 144 页。

③ 以下的总结来自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特别是第 73~77、217~243 页。这些观点中，某些方面在作者对该书的评论中也做了概括，见 *Agricultural history* 63: (Summer 1989), pp.108~110。

可能不无裨益。按杜赞奇的解释，国家的内卷化影响到“富有进取心的经纪人”的成长，这些人依靠在国家和乡村社会之间做中介人为生。中国一向就存在着这种经纪人，但在20世纪随着地方政府的作用和税收的增长，他们才变得多起来。另外，大多数较老的经纪人不是受制于官场内部纪律和儒家信条的真正官僚，就是尽可能地对其村庄进行最好的规划安排以积累威望和其他非货币利益的社区头面人物；后者也受到过分盘剥的限制，因为其他村民的尊敬和村庄的社区意识是他们权力基础的构成部分。传统体制中的第三种中介人——衙吏和役卒——并不符合上述两种情形，而且他们总是被人们骂作寄生虫，但杜赞奇缩小了他们的作用，认为与20世纪的那些雄心勃勃的经纪人相比，他们低下的地位及有限的作用，使得他们的掠夺并不是太多。^①

20世纪富有进取心的经纪人是一个国家的构成部分，这个国家正在进一步进入到下面的社会中，并因此寻找不是来源于村庄或易受村庄感应的地方上的代表；这些地方上新官员的权力基础就是他们的衙门，而不是他们在当地的声望。但国家既不能为这些新官员们付出太多，也不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保护，来使他们真正地呼应它的目标。其结果就是这些新的中间人变得既腐败而又无用，而国家则从农民那里盘剥得更多，但却没有把足够的资金用在合适的地方以真正提供更多的服务。顺理成章的是，不仅与其他地方的现代国家——在这种国家，更多的索取确实意味着更多的资源被用于执行行政中心的意愿——与行政上的突破性进展相比，这个国家内卷化了；而且这个国家还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分析在中国革命前几十年里其合法性丧失的途径。

^①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pp.42~57.

这里所描述的情景在许多方面与杜赞奇的观点类似。具体说来，两者均强调从农民那里所榨取的资源数量的增长，以及最低层次的官僚及亚官僚对大部分资源的侵吞。尽管如此，这种分析对他的观点还进行了补充和修正。首先，民堤行政方面的事例，说明这些问题不一定是一个自觉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因新的任务而自我影响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有意选择——就像它甚至在其巅峰时经常做过的那样——把它以前的使命移交给地方上的人来承担，以节约资金，而不是为了获得更大程度的渗透。在增加国家税收阶段放弃黄河的治理是前所未有的，并反映了帝国主义给中国强加了一种新的重商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治国方略，对此我们将在本章的最后一节进行论述。然而，地方上有时承担国家的那些使命、但不受官场规范约束的剥削人物的增长，却已司空见惯。

其次，本书中地方上新人物的例子（一方面像监督大堤的委员们，另一方面像推广棉花的县劝业所的官员们）说明了20世纪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经纪人的群体问题和行为比杜赞奇所说的要更复杂。杜赞奇强调新的富有进取心的经纪人既没有深深地立足于乡村，也没有深深地立足于传统的官场。^① 所隐含的假设是这两种古老的场合只不过是组织上可以约束当权者肆无忌惮地进行自肥的地方；在20世纪的中国乡村，其他获得一份政治权力的人则是乱世中的社会渣滓。然而，在民堤的事例中，正如我们应该看到的那样，许多腐败出自候补官员的工程，这些人拥有传统的高级功名，而他们作为候补地方官的地位，意味着他们在正规的对其表现进行的官员评定中有着一席之地，并可能对官场的规范承担某些责任。而自委员

^①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pp. 47, 152~153, 215.

制终止后，这些非法的利益被乡村头面人物接收过去，这些人根本没有显示出一种新的社会群体或在村外具有权力基础的迹象。

第2章所述的县劝业所的领袖们实际上与杜赞奇为富有进取心的经纪人所描绘的制度性轮廓更为相像。他们在县以下的层面进行活动，但他们是来自县城所在地，而不是来自乡村；他们得到的拨款很少，但他们利用官方的任命作为权力基础，等等。不过，他们大多数来自精英阶层。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较低级的官员们——至少在黄运北部地区——设法在让大多数农民比以前更富裕的同时，又能促进经济增长及增加政府的税收。因而，他们的影响与监督大堤的委员以及杜赞奇所说的富有进取心的经纪人的作用正好相反。

因而，对各种各样的国家与乡村关系中的经纪人所在之处的结构性分析，既不足以解释他们在国家构建的突破性进展中、也不足以解释其在国内卷化中的作用。我们还需要来考察作为提供者、而不仅仅是盘剥者的国家。在黄运的堤坝维护方面，不仅仅是这样的问题：更多的资源被榨取了，却没有发生那种在一个更有效率的国家中应该出现的突破性进展——预期的服务实际上消失了。19世纪的黄河管理机构，一直使用更多的资源和劳力来做同样的事，这可能就是国内卷化的一个例证；20世纪鲁西的黄河体制，把大规模的浪费与有意对地区进行定等级分优劣结合到了一起。

所有这些问题均说明必须至少考察两种类型的区域背景中的国内卷化。首先，我们必须从国家观的要点来确定所考察的地方，并要考虑到经济发展的中心。在被20世纪早期的国家构建者们予以高度重视的那些地区中存在着大量的证据，增加的税收通常被变成增加的服务。这就是许多市政府和许多经济发达的农业县的情形，这也就是萧邦齐在研究浙江时所说的

“核心县”。^①正如我们在本章最后部分将要见到的那样，至少对新近受重视的鲁东地区的一种主要服务——治水——来说，确实是这样。尽管如此，那些进步是付出了重大代价的，部分代价就是中央政府从像黄运这样的地区中退了出来。在这样的地区中，地方精英和准官员们没有了重大失误之忧，并被鼓励担负更多的角色；他们还增加了榨取，但通常却不能或不愿有效地运用这些新资源。而当这样的腹地区域有可能不遭受增加最多的榨取之苦时，它们似乎变成了这样的地区：在这些地区中，民众与现代国家变得最为疏远——当我们考察在像黄运这样的地区中至关重要的传统服务的衰落时，我们就会理解这种现象。

杜赞奇的分析——其目的是为了对华北是否在政治发展中经历了一种突破性进展的总体评价——遭遇了一个类似于更旧的、试图估价各地现代化程度的著作所遇到的难题。通过忽略某些国家的发展与其他国家的不发展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现代化理论未能看到这两种现象都是现代世界的构成部分这样的事实。同样，杜赞奇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华北在什么情况下确实变成或没有变成现代国家的构成部分的分析尝试，未能看到不同的亚区域是沿着不同的方向在运行，某些地区的成功与其他地区的失败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以及这些不同的结果是20世纪早期中国的全部特征这样的事实。

其次，我们必须引进当地的社会结构作为理解不同地区国家的代理人所取得不同成果的一个变量。在某些地方，当依然执着于建立以其他地方为中心的网络为目标，并动员足够的民众和资源以产生变革的效应时，新的县或亚县层面的工作人员渗透到了村庄中。在黄运北部对新棉种的推广，就是一种极好

^① Schoppa, *Elites*, pp. 83~94.

的例子。正如杜赞奇所指出的那样，在其他时候和其他地方，这些人可能不会直接渗透到村庄中，但他们强大和贪婪得足以把乡村精英改造得更坏，通过使他们无法做事和雇用当地的地痞取代他们来封杀旧式的“保护性的经纪人”。^①同是在其他地方，诸如黄运的南部，这些新的工作人员似乎没有起到丝毫的作用。正是那些像候补官员和根深蒂固的乡村头面人物的传统精英，不是变成了、就是从来都是富有进取心的经纪人。

我们后面将回到失败的政治整合与国家内卷化之间的关系上。现在，重要的是国家内卷化的概念，尽管很有用，但需要修正以适用于黄运。这种修正包括把任何特定的事例纳入到本书所述的关系中：一个地方对更大的经济和行政网络的关系、它在中央政府（反过来受国际政治的影响）目标中的地位及它的社会结构对外部代理者的可渗透性。国家的内卷化是一种主要受政治动力、国家的需要及（杜赞奇著作中的其他地方）中国广泛的文化背景所驱动的政治变革模型：当我们把它置于政治和经济地理、地方社会变化及本书把国家作为服务提供者的分析和对行政整合分析的背景中时，它似乎更适合黄运。

民堤对秸秆的继续使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部分原因是源于黄运所有做事者所面临——糟糕的交通和不完善的货币体系——以及仅有较高层次的政府才能进行补救的难题。尽管如此，民堤的组织还具有长久选用低级技术的特殊弱点。它们既没有正规政府动员民众和资源的一般优势，也没有那些基于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它们确实存在着非同寻常的腐败。本章的其余部分将更为细致地考察这种体制。

^① 沈云龙编《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第165、217页。

黄运的黄河治理

大运河的改革正式废除了专门负责那条水道沿线河务工程的河营；1891年的改革撤销了黄河上的大部分河营。那时几乎没有人为这项改革感到后悔，但许多人在后来则可能会后悔；所采用的新体制具有制造劣质工程和彻底腐败的内在趋势。

许多改革者称河营已过时了。它们的队伍由于裁员和开小差而不断损耗。^① 1910年，《山东杂志》指出，尽管在理论上该省的18支河营每营拥有500名营丁，但即使在发生危机且名义上的减员不超过50人时，它们每营仅能召集100人。^② 与其他旧式的清兵一样，他们的配给不足，而许多人早就失去了其理论上不可剥夺的土地配额。据说许多人靠偷窃物资、走私和当土匪来养活自己，而营官们则把空额营丁的薪饷装进自己的腰包。^③

装备和训练也不符合标准。在1900年面对土匪袭击时，山东河营仅有老式的步枪；许多人竟然从未学过使用火器。^④ 在整个光绪年间，河营被慢慢地裁减了。河南撤销了3支河营。^⑤ 《山东杂志》建议山东采取同样的措施，认为如果按季

① 星斌夫：《大运河》，第178~185、192~198页；国立故宫博物院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5册，第50页；《河务季报》第3号（1920年秋），第126页。

② 《山东杂志》第59期（宣统二年五月十日），第7下页；《河务季报》第1号（1919年秋），第117~118页。

③ 《山东杂志》第59期（宣统二年五月十日），第9上页；《山东杂志》第76期（宣统三年十月三十日），第15上~下页。

④ 《河务季报》第1号（1919年秋），第118页；国立故宫博物院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5册，第50页。

⑤ 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第10卷，第3717页。

节雇用沿河两岸的贫民来承担河务工程，其费用将削减60%。^①

尽管如此，在其他地方，当官员们对河营的数量进行整顿时，提高了剩余河营的素质。一支曾经臭名昭著、毫无用处的沿苏北大运河的河营显然被改造成了一支模范队伍，他们对河务工程如此谙熟且对防止土匪如此有效，以致当他们被再次调动时，“绅民祈求其留驻”；在直隶，袁世凯把大名府3支万金油式的河营削减为一支专门负责黄河河务的300人的河营。^②对1915年直隶黄河巨大工程进行监督的外部人士指出，这些营兵既有经验，又能吃苦；在20世纪20年代参与过黄河工程的O. J. 托德赞成这种看法；弗里曼对营官们的传统技术和黄河本身的知识印象非常深刻。^③但在1902年还没有被裁掉的鲁南大运河及其船闸上的河营，几乎照样没有得到新的训练和更好的装配。^④

不过，山东黄河营丁的缩减还在继续，特别是在西部地区，而且没有拨给资源来改善那些留下的营丁。河务官员最终对这一损失感到后悔。1920年，山东河务局局长坚信维持和改善河营是从技术上培养熟练的黄河河务工人的途径，他计划从修筑土堤的资金中拿出经费，用以提高他们的薪水。^⑤山东建设厅1931年的一份报告纯系批评大运河的衰败，且明显是

① 《山东杂志》第59期（宣统二年五月十日），第7下页。

② 国立故宫博物院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5册，第50、408页。

③ 徐世光：《濮阳河上记》，“丁”第17上、21上、22下页；Oliver Todd, *Two Decades in China, Comprising Technical Papers, Magazine Articles, Newspaper Stories and Official Reports Connected with Work under His Own Observation*（北京，1938年）；Freeman, “Flood Problems,” p. 1142.

④ 沈云龙编《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第251~253页。

⑤ 《河务季报》第3号（1920年秋），第126页。

指 1902 年以后对“官兵”的裁撤。^①

许多观察者注意到，裁撤河营事关丧失他们中许多人积累起来的 20~30 年的河务经验。许多人还注意到了由于使用短期的监督人员和劳动者而不是使用一个始终称职的组织所造成的低效率。总之，晚清、特别是民国时期的许多官员认为，河务工程必须由专职的技术熟练人员（要么是河营，要么是现代的工程师）来承担。^② 不过，在 1890 年新成立的省河务局中，实际上没有给这类人留下什么位置。相反，那些位置被候补知县或少量的候补州官所占据。在山东黄河所分布的 3 个地区中的领导人物及其主要副手也是候补官员。^③

尤为重要的是，这些人还主宰着现场的管理。被派去监督官堤的委员们，既监督河营、也监督百姓，他们也是候补人员。因此，负责直隶黄河南北两岸（每边大约为 28 英里）的官员是两名。最为重要的是，特别是在鲁西地区，被派去监督“民修的”河务工程的人全都是候补文官。^④

我们并不完全清楚候补官员是何时开始主宰黄河行政的。他们的介入始于 18 世纪，但至少到 1853 年，他们仍然听命于相关的正式官员。似乎在 1853 年的改道后他们担负起了主导角色；^⑤ 由于许多地区突然不得不对其前所未有的河患

① 《山东建设月刊》第 1 卷第 3 期（1931 年 3 月），“公牍”第 47 页。

② 《河务季报》第 1 号（1919 年秋），第 110、118 页；《河务季报》第 3 号（1920 年秋），第 109、125~126、133 页。

③ 关于其简要的历史，见《河务季报》第 4 号（1921 年春），第 75 页；《河务季报》第 1 号（1919 年秋），第 118、9、13 页。

④ 《河务季报》第 4 号（1921 年春），第 75、12~13 页；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第 10 卷，第 3951 页；《河务季报》第 1 号（1919 年秋），第 109 页。

⑤ 关于 1853 年以前的委员问题，见 Dodgen, “Hydraulic Evolution,” pp. 47~48；关于 1853 年以后的委员问题，见《河务季报》第 1 号（1919 年秋），第 118 页。

问题，由巡抚派出的委员们很快变得重要起来，这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考虑到其他地方“官督民修”大堤的糟糕记录——1833年的一份报告认为这种体制是长江湖北段所用的三种办法中最腐败和最无效的一种^①——要不是作为19世纪中后期全方位危机的结果，很难想象偏重于这些委员们的大转向。

此后，在整个光绪年间，随着河营的规模、数量和预算的下降，候补官员接管了更多的河务工程。1920年省里的一项研究指出，关键的日期是1894年，那时山东建立了黄河上、中和下游河务局并为候补官员们留出了13个最高位置——在它被决定把更多的河务工程留给当地人以增加效率和节约资金仅仅3年之后。^②

1894年起草的章程规定由“文武官员”充当监督人员，但文官占主导地位。例如，他们对财物获得了单独的控制。1904年，山东巡抚周馥命令县官们帮助动员民夫；不过，他们将在委员的指挥下行事，委员们来确定民夫的数量、他们的任务及他们的配给。即使是被命令到特定的大堤上帮忙的州官们也在委员们的领导下进行工作。^③

在监督民堤时不受约束的委员们的权力，被编成了《北华捷报》中的一篇发生在鲁西的戏剧性的故事，“形象说明了凌驾于下属的高级官员们的可怕行为”。当这个地区的黄河大堤行将溃决之时，负责那个地区三县民堤的委员把县令们召集到最危险的大堤上，并对其进行训斥；在他的整个讲话过程中，

① 关于湖北的事例，见 Perdue, *Exhausting the Earth*, pp. 194~195。

② 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第10卷，第3949~3956页。

③ 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第10卷，第3939、3945~3946、3949页；沈云龙编《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第275、283页。

雨雹交加，县令们被迫跪在泥水里，而如果他们想站起来，就有被革职的危险。^① 尽管这个故事无疑是过于夸张了，但它说出了县令们绝对不可能控制候补官员们行为的几分真相。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尽管大多数委员在官场上是候补的县官，但县官们被视作委员们的“下属”。一份弹劾苏北大运河腐败的奏折指出了同样的情形。它既没有弹劾当地的官员、也没有弹劾河营——他们可能没有什么渎职的机会——而是着重弹劾许多相关的贫穷的候补官员会“侵吞公款”，除非他们被迫“谨慎从事”。^②

委员们不仅仅是无法控制：作为短期派出的外地人，他们在控制将来的水患和实际上由当地组织所承担的维修费用中并无同样的利害关系。即使那些希望其表现能够被人尊敬和能够导致其进入地方官僚阶层的候补官员们，在短暂的任职期间，也不可能指望其带来一种崭新及原本负责的大堤建筑；如果他们不比其他委员让民众承担更多的负担，而且在他们的任期内没有发生大水灾，那可能就足够了。至于那些既不谨慎行事，又不想赢得声望的候补官员，他们的地位使之很容易“侵吞公款”。在官堤上，委员们控制着大部分财物的用度，但至少由河营掌管存货账目。在修建民堤的地区，委员们不对任何人负责。^③

作为秸秆的采购者，委员们具有特别优越的地位。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秸秆很贵，但大多数百姓是采割自家的秸

① *North China Herald*, Oct. 5, 1906, pp.13~14.

② 国立故宫博物院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5册，第53页。

③ 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第10卷，第3945~3946页；《河务季报》第1号（1919年秋），第109页；《河务季报》第2号（1920年春），第127页。

秆；秸秆很少被运到很远的地方或是进行大规模的贸易。^① 因此，委员们不仅有权下令交纳秸秆，而且具有巨大的空间来制定和上报所付的价格，如果他们从官办的采石场采购石头或从他们无法控制的窑场购买砖头，他们就不可能享有这种优势。我们并没有“铁证”来证实这种优势影响到了监督黄河民堤的委员们的决策。不过，1917年《北华捷报》报道了一件发生在苏北大运河上的类似现象，这篇报道说，那里的大堤委员们宁愿修筑高粱秆大堤，这是因为需要不断的开工“以利于承包人”。^② 当徐世光在此前曾转变为民堤——徐注意到那时民堤很快就会坍塌——的直隶黄河河段上指挥一场巨大的维修工程时，他估计所上报的用来购买民堤材料的资金中，有50%~60%被侵吞了。他设置了由河营领导的各种机构来控制有关采购、移运和存储材料的人员；他的那项一直维持下去的维修工程，最终低于其预算。^③ 那时，委员们对持久而又牢固的大堤具有很小的利害关系是一件与当时的情形极为相关的事，而他们和其他中间人获利的机遇与在民堤上对秸秆的持续使用则密切相关。

1902年，当河南与山东共同设法削减某些河务工程上的人员时，时任河南巡抚的锡良注意到了一种惯例。在河南，像运河船闸或大堤扩建的监督者这样的职位，通常被来自山东的候补官员所塞满；在山东，这些位置则被河南的候补官员塞满。^④

① Freeman, "Flood Problems," p.1137; 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第10卷，第3848页。

② *North China Herald*, April 21, 1917, p.119.

③ 徐世光：《濮阳河上记》，“丁”第13上~下页、“丁”第11a页、“后序”第1下页；侯仁之编《序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第151页。

④ 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第10卷，第3721页。

这些河务监督者们在清末的官场和社会中占据了一种反常的位置。他们不是——像衙役那样——在家乡服务的县级以下的官员，他们的权力来自本地的关系，对此，作为外地人的县官可能无法与之相比。事实上，锡良的裁员使得许许多多这样的人回到了家乡来等待其他的委任。被裁撤的大运河船闸上的军官也回到了家乡。（在这两种情况下，许多回去的人寻求县以下的职位，这在名义上被视为低于候补县令的级别，但这提供了许多获利的机遇。）他们也不像知县的师爷，师爷们的上司和后台是直接在台上的。^① 不过，与师爷和衙役相似，他们的职位不属于正统的职官体系，而乡土关系在获得这些委派方面似乎非常重要。

即使没有一种可与衙役相比的本地基础，委员们也至少可以同样免于县令的控制。其时，他们更大的声望与人们推测的在省城中的关系，可能使他们比衙役更能免于绅士和其他当地精英的抗议。周馥指出，山东运河船闸上官员的腐败众所周知，但县令们“不敢干预”；处理这种问题需要巡抚委派一名代表（另一名委员）来与地方名流和受其盘剥的船主进行合作。^②

遗憾的是，我们几乎不知道这些官员的情况或他们是如何被选用的。不过，民国初年较高级别的官员抱怨说，候补县官仍然获取了几乎所有的河务任命；刊印出来的个人资料证实了这种看法。由于这些委员们从没有被派到他们的家乡县份，由当地负责的新制度把河务工程的负担加在了当地人的身上，却

① 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第10卷，第3721页；沈云龙编《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第166～167页。关于地方官员的师爷们的情况，见Ch'u T'ung-tsu,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Cambridge, Mass., 1962), pp. 93～115。

② 沈云龙编《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第165页。

没有设立当地的控制机制。^① 国家和省河流治理费用的削减，可能减少了靠治河为生的人员的数量，但并没有改善负责人员的类别。如果有什么结果的话，至少对民堤上的委员而言，它使奸蠹的形成更为容易。

非正式的交纳秸秆的制度还给村庄头面人物和所谓的“土豪”提供了机遇。事实上，这项制度的不适用给中间人以公款为代价为自己谋利留下了许多空间，如果民众仅面临着委员们的榨取，这使得他们仍然比原来的境遇要好些。（市场对这种整合失败的行政体制提供了一种有用的类比：它们整合得越糟糕，中间人就能索取得越多。）

19 世纪 90 年代，传教士明恩溥描述了这样一件发生在曹州的事。村庄被分派来为官堤的维修交纳秸秆，并将相应地获得报酬。不幸的是，由于秸秆要交纳到很远的地方，接收者可以通过延迟这些秸秆交纳的进度、强迫离家的百姓开销巨额费用，来随意定价。为了避免这种问题的重复出现，县官任命了一名村正来负责未来的秸秆缴纳；他又反过来委任他的 3 名下属。此后，村民均认为这些人会欺诈，但没有人想退回到亲自交纳的体制。由于山东和河南民众据说要把秸秆交到两日路程之遥的地方（比秸秆被运去交易的地方要远得多），尽管有了欺诈的中间人，但这些百姓实际上比没有中间人要好过些。^② 另外，同村人——他在将来可能会帮其邻居的忙——的非法所得很像是从非居民的委员及其下属、而不是从大堤本身转化而来。

这种弊端产生了一种共识：必须使用全然不同的人员。

① 如见《河务季报》第 1 号（1919 年秋），第 12～14、19～22、109、118 页；《河务季报》第 2 号（1920 年春），第 13、125 页。

② Arthur H. Smith, *Village Life*, pp. 230～31; Freeman, "Flood Problems," p. 1137.

1920年，山东河务局局长劳之常清楚地表达了他宁愿要么使用旧的河营，要么使用现代工程师；他颇为赞赏地引用一篇较早的报告中的建议：用受过现代技术训练的人来代替候补官员并尽快结束短期委员的使用。^① 尽管像这样的所有方案都做了建议，但直到北伐战争前，候补官员仍占据着河务局并“监督”大部分地方上的河务。与此同时，正如第5章将要说明的那样，委员们失去控制权的民堤落到了村长和地方头面人物手中，而既不是落到了被撤销的河营、也不是落在了现代工程师手中，后两者则是河务局希望能够替代前者的。

某些候补官员在治河工程中驻留的时间长得足以使他们变得非常有知识。某些行政上的改良是在他们的控制下取得的，而民国初年进行的地理和气象研究，后来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② 但在真正治水中却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成绩。

总体而言，1891年改革以后的黄河工程可能比19世纪80年代的工程要好。对政府来说，这还比19世纪80年代的工程和19世纪40年代的无效工程要合算得多。^③ 但是，所有的改善仅仅与那些特别糟糕的年代有关。另外，在黄运地区，那里的体制被改变得最大，水灾治理并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更为恶劣。

没有任何迹象显示1891年以后的浪费有所下降。不断有人抱怨委员们不但是外行，而且极其腐败。劳之常在1920年

① 《河务季报》第2号（1920年春），第125页。

② 《河务季报》第1号（1919年秋），第12页；《河务季报》第2号（1920年春），第13页；《河务季报》第4号（1921年春），第85页。对测量工作的记述，见Carey, "Michigan Engineers in China," *Michigan Technik* 33: 3 (November 1920), pp. 149~156；关于后来建设局所用的材料，见《山东建设月刊》第1卷第2期（1931年2月），“要闻”第9页；《山东建设月刊》第1卷第3期（1931年3月），“公牋”第5、33~34页。

③ 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第10卷，第4178页。

指出，石方几乎总是至少短少 30%（中间是空的）；许多石方短少 50%~60%。在另外一个场合，他估计，半数以上的河务工程款被浪费了。在专门讨论上游的民堤时，他称自“改革”以来，“勒索”（监理官员所剥夺的非法所得）之风愈演愈烈。他认为，在过去，中央政府的宽容造成了浪费与差强人意的河堤维护相并存，但现在却导致了更多的水患。^①《山东杂志》把黄河问题主要归咎于官员们的“逐利”，并指责济宁大运河（山东仅有的一段仍得到政府资金的运河河道）的委员侵吞了 90% 的资金。^②浪费和腐败给黄河民堤造成了最大的危害，那里却没有人来控制这些委员们，也没有政府的资金来供其盗用，而且，那里许多其他的问题也没有为过错的发生留下余地。

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末，进一步的衰变发生了，县级以下的掌权者比河务局和委员们所造成的弊端对黄河治理的阻碍更大。我们将在下一章更为细致地考察这种情况。在这里，只要看到候补官员们对水患治理的把持极大地造成了资金短缺、分裂、技术落后及既昂贵又无用的治水体制腐败的加剧，就已足够了。

水患的重新分布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向民堤的转变被集中在了某些地区。我们所得到的资料中几乎没有找到区域的优先权是如何设定的，而且，这种优先权并不总是与它们实际所说的相符合。考虑到中国政治思想中“仁”的重要性以及对“功”强调

① 《河务季报》第 1 号（1919 年秋），第 107、115 页；《河务季报》第 3 号（1920 年秋），第 124 页。

② 《山东杂志》第 60 期（宣统二年五月二十日），第 6 上页；《山东杂志》第 76 期（宣统二年十月三十日），第 15 上页；《山东杂志》第 35 期（宣统元年六月十五日），第 22 上~下页。

得相对较少，人们不可能找到一件直截了当地讨论牺牲一个地区而不牺牲另一个地区的资料。不过，这里的官方思想很像我们已经命名为“自强逻辑”的那些重商主义和保护主权的逻辑：黄运再一次深受这种逻辑之害。几乎没有人对削减大运河的资助进行讨论、甚至提一下对那些生活在它附近的人的福利所产生的可能的影响，这尤其令人惊讶；为数少得可怜的几个例外之一是来自陈夔龙的一封奏折，他是后来抱怨像河南这样的内地地区一直被榨取以资助沿海现代化的同一位官员。^① 后来某些省和中央的官员，特别是在民国年间，看到了国家从黄运治水事务中的抽身越发过分，但他们并不能使国家重新评定其地区的优先权。

我们已经看到分布在大运河不同河段的优先权背后的原因。山东南运河影响着那些比鲁北地区任何商人都更为庞大、组织得更好及关系更密切的商人们。仍然继续获得政府资金的苏北和直隶河段，事关依然更为庞大且更有影响力的商人们——包括两淮和长芦盐商，他们的兴盛直接转化成了政府的税收——的利益。^② 就全局而言，对国家来说，这些地区更为重要，可以获得更多的私人资金，而且在技术上也没有山东北运河那么复杂；因此，在这些地区，国家可能会以少量的投入而得到丰厚的回报。

山东北运河就没有这些优势。正如前文指出的那样，即使在1902年政府停止资助后，清廷似乎还在设想山东北运河会继续畅通，但政府压根就没提如何使之畅通。翌年，当北京决

①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四日陈夔龙的奏折，见国立故宫博物院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6册，第204～205页。

② 《顺天时报》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4页；咸丰五年（1855）四月十二日，鲁南运河道（姓名已模糊不清）呈山东巡抚的诉状，见山东巡抚档案（尚未编号），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North China Herald, Dec. 8, 1917, p. 577。

定把天津军械局迁到德州时，许多相关的高级官员们把德州处于大运河上的位置作为一种重要的优势。^① 尽管如此，在分配其本身的费用时，他们最终的表现很像中央政府后来在对待造林活动时的表现那样。他们重视影响着政府经济利益的地区，这也是那些私人解决潜力最大的地区。因此，他们选择那些按重商主义的优先权资金可能流得最远的地区，但在那些地区，它所实现的福利却最少。

在黄河的改革中，国家资金分配的表面标准被公布了：政府将集中资金于最困难和最危险的河段。在山东，最宽阔的上游（覆盖大部分黄运）被认为是最不危险的河段。这部分主要转为民堤；仅有少量的堤坝——通常距黄河 10 英里——仍由政府负责。^② 仍由政府负责的 1256 里（452 英里）山东大堤中，仅有 213 里处于黄河的上段，而上段还包括官督“民”修的 439 里河段中的 285 里及甚至不在政府视野中的 92 里。^③ 直到那时上段发生的水患还是最少，但迄今为止这一段的石头工程也最少，因而是维修频率最高的大堤。

那里较宽的河床，一年里的许多时间是干涸的，特别容易被开垦为田地。当地一直有人施加压力要求允许在越来越接近河道的地方进行土地开垦。一小批重要的官员认为黄河最好的治理方法是缩窄其河堤以便让黄河本身的流水来冲深其河道，从而为土地开垦进行辩护。^④ 不过，提倡把黄河挤

① 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朱恩绂（兵部）的奏折，见军机处录副奏折，宣统二年，第 54～68 箱。

② 《河务季报》第 1 号（1919 年秋），第 107 页；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第 10 卷，第 3939 页；*North China Herald*, Oct. 27, 1917, p.217。

③ 《河务季报》第 3 号（1920 年秋），第 130 页。

④ 如见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第 10 卷，第 4142～4146 页及《老残游记》第 1 章中刘鹗（刘铁云）的观点。

缩到这种河道中的工程师还附加了一个重要条件，这就是需要有石面内堤；^① 而不论是民堤、还是由开垦河地的人所修的私堤均没有使用石头。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开垦和私堤通常使整个治水事业功能紊乱，但开垦者却很难被赶走。1888年，一位受到斥贬的山东河务要员有意设计一场洪水来冲垮前任官员允许修建的私堤；^② 不过，即使这样也没有把开垦者阻挡得太久。

一般说来，1891年以后的地方分权，意味着被认为贡献物品和劳役以维护大堤的百姓，通常正是那些如果维修活动被集中到外堤上就会承受极大损失的人。在国家从山东的黄河上段退出后，更多的人在河道附近种植作物，因而，为原先对中央政府的退出进行辩护的错误消除了天然的界限。^③ 李鸿章和周馥建议用金钱来补贴这些开垦者，这是因为政府无法用武力把他们赶走。但是，中央政府不会拿出钱来贴补，正如在我们第5章将要看到的那样，而省里筹集北京认可的亟须资金的努力也失败了。^④ 让开垦者退出黄河的建议被搁置起来了，而私

① Freeman, "Flood Problems," p. 1154; Oliver Todd, *Two Decades in China, Comprising Technical Papers, Magazine Articles, Newspaper Stories and Official Reports Connected with Work under His Own Observation*, p. 41.

② Tyler, "Notes on the Hoang Ho," p. 6; 刘鹗：《老残游记》，第167～169页；按照他们对这些事件的看法，一名相关的候补官员建议出资给过于靠近河堤的非法开垦者，以使其放弃所垦的土地（与12年后李鸿章和周馥想要做的极为相似），但其他人认为这种出资收买的方法开支太大而予以抵制。

③ 如见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第10卷，第3939页；沈云龙编《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第1153页；《河务季报》第3号（1920年秋），第123页。

④ 沈云龙编《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第154、155、688页；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第10卷，第3756页；也可见下文。

堤仍在妨碍着大规模的河道治理。

包括像曹州这类著名土匪区的山东的上游部分还具有特别严重的治安问题。每个辖区都面临着物资偷窃、与役伙们偶尔的冲突和对裁来加固河岸的树木的非法砍伐，但这些问题在上游最严重。1919年，河务局试图在更接近黄河上段的地区建立采石场，但土匪是那样猖獗，以致这个地点很快就被废弃了。^①

由于上述诸因素，到民国初年，山东黄河的上段显然无法通过本地的单独努力来维护。1917年，河务局局长劳之常指出，就在这里当初看上去是转为民堤的最好地区，由于转归民众管理，勒索问题已在一步一步地恶化；结果，这个地区的大堤坍塌得非常厉害，而百姓已被盘剥得一无所有。他把这里视为当时比中部更危险的河段。在他看来（没有数据证实），这里还没有尾段危险，但在那个地区，省政府仍然对大部分大堤承担责任。^②

河南和直隶也把许多要么是官堤、要么是官民共守的大堤转由当地负担。^③ 尽管如此，河南和直隶所转成的民堤比鲁西地区

① 《山东杂志》第59期（宣统二年五月十日），第9上页；《河务季报》第1号（1919年秋），第111、118页；《山东河务特刊》第1号（1928年10月），“命令”第25页；《山东河务特刊》第6号（1934年1月），“公牍”第7页；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六日杨士骧的片，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三十二年，第46~50箱；《山东河务特刊》第3号（1931年1月），“命令”第33页、“公牍”第10页；John Ripley Freeman, Grand Canal Investigation（密西根大学收藏本），p.21；亦见第3章；《河务季报》第4号（1921年春），第78页。

② 《河务季报》第1号（1919年秋），第107、108页；《河务季报》第3号（1920年秋），第130页。

③ 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第10卷，第3716~3717页；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五日袁世凯的奏折，见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三十年，第47~50箱；《重修滑县志》（1930年）卷11，第29下~30上、32上页。

要少，而早在 1918 年，直隶就把大多数这类堤坝又转成官堤。^①直到北伐战争开始前，所有把山东的民堤转成官堤的要求一律被拒绝，即使在那时，也几乎没有什么要求得到了赞同。^②

河南和直隶还维持着比山东要宽裕得多的河务工程预算。至少在河南，这种预算反映了一种地位，因为黄河在该省经济地理中——并因此在省政府的重商主义考量中——与鲁西黄河的地位极为不同。河南作为一个相对不易渗透的内地及基本贫穷的省份，由于 19 世纪末中央政府侧重点的改变而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正如我们前文看到的那样，至少有位河南巡抚对这种变化表示不满。不过，在这个省中，有着很好的理由不抽走黄河治理的经费。黄河从省城开封旁边流过，且流经这个经济最发达地区的中心；它的最容易泛滥地区之一是与省城和该省惟一的南北铁路交界处均靠得很近的地方。1925 年在该省修建的东西向铁路沿着黄河铺设了许多英里。^③另外，该省没有特别繁荣的条约口岸或必须进行现代化的地区。因而，当中央政府像对待鲁西地区一样，不再重视河南的黄河时，而河南省政府却没有理由来这么做。在民国年间的大部分时期里，是省里的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像直隶一样，其境内的黄河河段很短；而随着 20 世纪省财政收入的增加，^④对这个省来说，进行适当的黄河治理只是很小的负担。

作为这些差异所产生的结果，据山东河务局在 1920 年计

① 《重修滑县志》(1930 年)卷 11，第 31 下页；《河务季报》第 1 号(1919 年秋)，第 10~11 页；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编《黄河水利史述要》，第 366 页。

② 《山东河务特刊》第 1 号(1928 年 10 月)，“法规”第 6~8 页、“公牒”第 13 页。

③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pp. 34, 276.

④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pp. 65~73.

算，它在每1里大堤上的开支为380元，与河南高得多的数字形成了对比，而山东的数字比直隶的数字要差6倍。^①当1911年以后山东甚至进一步削减其本已捉襟见肘的黄河预算时，直隶则把这项开支增加了2倍多。^②

更少的支出几乎总是意味着更多的水灾。总的说来，从19世纪90年代以来比1855年黄河改道至1890年这段时间的水灾要大得多。有些评论者把这些水灾归咎于19世纪60年代末所做出的错误决策，而事实上，在1891年以前的12年里，可以看出每年要发生一次严重的水灾，与此前25年里仅发生3次“大”水灾，^③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如此，这些水灾中的绝大部分是发生在山东黄河的中下段：1879~1890年，那些地区发生了35次严重得足以载入到关于黄河维护的正史中的水灾，与之相比，直隶发生了6次，河南发生了1次，而山东境内的黄河上段则发生了2次。在1891年改革以后，在下段和中段地区情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山东省政府把它所剩下的资金和营丁都集中到了那里；1891~1911年期间，那个地区的水灾下降到18次，而在民国早期的20年里“仅”发生了6次（在1912~1937年期间共发生了8次）。直隶大水灾的数量也有所下降——从1891~1937年间，它所发生的水灾数量与1879~1890年所发生的数量相同——而直到1933年，河南

① 《河务季报》第3号（秋季），第128页。我自己的计算所得出的比率是稍高于5比1，山东是520000元对1787里〔《河务季报》第3号（秋季），第130页〕，等于每里花费291元；直隶为250000对170里，等于每里花费1471元。

② 以25万元与清末的73500两（如见袁世凯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三十年，第47~50箱〕）相比所得，73500两约等于10万元。

③ 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第10卷，第4143页。

境内的黄河再也没有发生过一次严重的水灾。^①

然而，山东境内黄河的上段——这里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向民堤的转变——承受着严重的痛苦。从 1855～1879 年与 1879～1890 年各仅发生两次大水灾，到 1891 年以后的 10 年里发生 3 次及 1902～1911 年之间发生了另外的 9 次大水灾。在民国时期的前 20 年里，它遭遇了另外 11 次（而在 1931 至 1938 年的人为决堤之间共发生了另外的 2 次）大水灾。^② 这些水灾的发生不能归咎于全面的衰落，这是因为 1891 年以前最严重的问题发生在自鲁西向东的下段地区，那里的情况在 1891 年以后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水灾的增加是那些被单独列为向民堤转变的地区所特有的现象。

总之，1891 年鲁西地区向民堤的转化，根本没有形成一种更加具有成本效益的治水体制。特别是与 19 世纪 80 年代相比，实际取得的某些成功是在河南、特别是直隶中下段地区的河营、省里所组织的河伏及民堤的混合。不过，这些改善和治水资金向华北其他地区各种现代化项目的全面转化是以国家和省从鲁西地区撤出治河资金为代价的，那里伴随着资金撤走而发生的组织方面的变化加剧了其负面的影响。那里的损失，与其他地方的所得相比，其价值要更加重要。

这些优先和结果与 1850 年以前盛行的那些优先和结果极为不同，那时慷慨的河务支出和对大运河的重视，确保内地多灾河段有着充足（如果有时是浪费的话）的资金。^③ 相反，国家此时着重在靠近沿海的地区筹集财税和维持控制。在放弃此

①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编《黄河水利史述要》，第 358～365、379～381 页。

②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编《黄河水利史述要》，第 358～365、379～381 页。

③ 如见 Hu Ch'ang-t'u, "Yellow River Administration," pp. 505～513; Greer, *Water Management*, p. 35 及上文。

时相对次要的转移其剩余的内地设施时，政府也失去了在那个地区承担其他项目的能力——使其居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表 4-1 黄河水灾的地区性分布变化简表

	河 南	直隶/河北	山 东	
			上 段	中下段 a
河边陆地的长度(每一边,以英里计)	240b	30	90	160
改革前				
1856~1868 年	0	0	0	0(0)
1869~1878 年	1	1	2	0(0)
1879~1890 年	1	6	2	35(4)
改革后				
1891~1911 年	0	3	12c	18(7)
1912~1931 年	0	2	11	6(6)
1932~1937 年	3	1	2	2(0)

说明：上述计算这些地区内各县水灾次数的数字在《再序行水金鉴》和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编《黄河水利史述要》中的大水灾名单中被专门提到。它们既不是发生水灾的年数，也不是大堤溃决的次数。它们也不能被视为一个完整的名单，这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决定“大”水灾的标准，还因为许多受影响的县的名单是以“和其他”为结果。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收全受影响地区的名单的话，水灾的重新分布将可能甚至更为突出（见以下 a）。

a 最后一列圆括号中的数字代表利津县在山东“下游和中游”水灾中所占的次数，这是黄河在入海前流经的最后一个县。从这个县开始的水灾接近黄河河口，而通常很具破坏性，一般不像那些发生在离海岸更远的地区那么分散。因此，这一地区在山东“中下游”水灾中所占比率的不断增高，随着时间的推移，说明在这个地区和“山东上游”地区之间水灾防范的水平，甚至比上述数字所显示的差距要大得多。

b 这个数字过高地估计了水灾的风险，这是因为河南境内黄河的大部分河段高出黄河这个最危险的地方（靠近开封）。

c 这里所列的 12 次水灾中，有 9 次发生在这个 20 年中的最后的 11 年里。

政府对沿海地区治水问题的过分重视，并没有像它过分强调靠近沿海地区的植树造林那种非常相似的重商主义的理由。与燃料短缺和小水灾不同，大洪水危及到了社会秩序并带来了人道主义的挑战，不论它发生在什么地方，都不得不加以解

决；即使在黄运无法得到外部的治水资金时，它也得到了许多外部救济水灾的资金（不少是私人资金）。^① 另外，靠近黄河入海口地区的许多部分与内地一样的贫穷。尽管如此，仍因保护主权的缘故，需要侧重于济南与沿海之间的水灾治理。

19 世纪末，外国人开始承担一些像疏浚上海港这样对他们有直接影响的小的治水事务。^② 到民国初年，外国团体希望在辽河、淮河、大运河和黄河治理中发挥作用，这些河流均流经华北的许多地区。由于在内地往往遭到抵制，他们在许多沿海地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③ 正如下一章将要论述的那样，中国官员所担心的是允许其介入后可能发生的政治后果；更尖刻地说，那些从河流治理中牟利的人（或利用这种位置作为优遇的人）肯定以警觉的态度来看待竞争的出现。因此，正如亟于让外国人失去进一步干预的借口推动了北满防疫机构的建立并促进了条约口岸的警务改革一样，^④ 某些山东河务局侧重于靠近沿海和与津浦线交界的地方的黄河治理，似乎可以归结于担心被外国人所越俎代庖。

1923 年，在利津靠近黄河河口的地方大堤的溃决，为这些推力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事例。利津本身与黄运的大部分地区

① 見滿鐵《山東地方の黄河水災状況》，第 4、25～26、33～34、48 页中的总结。

② 如 *North China Herald*, Aug. 14, 1896, p. 282, 中报道了外国人疏浚活动的扩大，其中包括苏州河，这是因为这条河变成了一条更加重要的贸易要道。

③ U.S Department of State,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1910 ~ 1929, Microcopy 328 (以下简称“Department of State”), reels 214, 215, 216 和 218, 有许多这样的内容，这些内容强调了美国的参与，但也提到了其他国家。

④ 如见 Nathan, *Plague Prevention*, pp. v, 5, 42, 74; Frederic Wakeman, Jr., “Policing Modern Shanghai,” *China Quarterly*, no. 115 (Sept. 1988), p.420.

同样的贫穷，且作为税收的来源地对国家几乎没有什么用场。尽管如此，由于其处于鲁北沿海的位置，使它一度在限制日本对鲁东的影响方面，成为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是省和中央政府予以高度重视的地方，因而，这里的水灾受到了极大的关注。由于1923年的水灾极其严重，中央政府确实进行了干预，批准了与全国振务委员会会长熊希龄（一名湖南的军阀政客，后转化成了天津的商人和慈善家）签订的一份修堤合同。（与之相比，对1925和1926年在黄运所发生的非常严重的水灾，政府实际上没有做任何事。）不论是美国的抑或日本的团体，据说都对此感兴趣；美国人得到保证，说日本将永远不会得到一份任其增加对山东影响的合同。^① 其间，山东河务局估计维修缺口需要600万元。不久之后，美国团体投标150万元。河务局后来把标价削减为300万元；据说这个数字仍然极大地高于其成本，而人们必须想到他们考虑其政治的关系和亟于避免外国人更多入侵的愿望，可能构成了标价中所存在的差异。但他们在这件事上的估计却是错误的，即便这项工程没有受到美国赈济的长久影响，决策也是前后矛盾的。^② 1920年，国际红十字会规划了一项把水灾救济和道路修筑合在一起的项目，仅由于存在日本人参与的可能性而被否决；^③ 并且正如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那样，当一项大运河的修复工程看上去有日本人的参与时，它也被搁置起来了。

总之，民族主义、竞争的出现和沿海经济所造成的机遇，合起来使政府全力以赴地重视靠近沿海和——在那些像铁路桥

① Department of State, reel 216, document 472, p. 671, 1922年9月26日美国驻济南领事（Gauss）给大使（Schurman）的报告。

② *North China Herald*, Aug. 18, 1923, p.448.

③ *North China Herald*, Nov. 20, 1920, p.530. 也见 *North China Herald*, March 4, 1922, 第576、585页所述的关于烟台港的事例。

附近——构成沿海情势重要特征的地区的水灾治理。不过，黄运却没有这些推力；结果，政府从这个曾经偏重的地区撤走了它对水灾治理的许多资助，并把这些资金用来发展靠近沿海的地区。随着资金方面出现的这种变化，水利问题也重新分布了。

整个华北不是一种国家内卷化的样子，有人在不同的地区发现了两种相反的模式。至少在华北新的“核心”地区，是国家构建合理成功的模式。国家和市场一先一后地向前发展着，而来自其他国家的威胁和可能增加税收的压力迫使国家关注社会及它自己的需要。其间，市场的发展和新的技术催生了提供服务的新途径。

尽管如此，为了资助这种突破，国家在其他地方减少了它的服务，让那些地区自行发展。面对新的重大使命，在被忽略的地区的地方政府和准政府（如民堤组织），实际上被允许用各种方法榨取新的税收，但它们通常无法像核心地区那样，可以利用市场来获得大部分资源。结果，它们进行了更多的榨取，但它们所提供的服务比传统国家曾经提供的服务效果要差得多。因而，缺乏政治的整合意味着当某些新的核心地区经历了国家构建时，其他地区则不仅承受着内卷化，并且还承受着退化。



第五章 灾害的应对

就像我们刚刚谈过的那样，由于中国为了回应帝国主义而对国家战略做了重新定向，这对黄运的治水事务打击尤大。我们最后这一章开头就来估计一下这种打击的经济幅度。然后，本章来考察解决这些问题的各种尝试及造成其失败的社会和政治因素。因此，第4章的许多地方是从更大的政治单位的角度来“俯”视黄运，而本章则集中研究在中央政府所资助的水利体制崩溃后，黄运内部所出现的问题和事务。

当我们考察发生在黄运的事务时，我们在以国家为研究重点的最后两章中基本上没有讨论的一个主题将要再次出现：黄运北部可渗透的乡村社会，与黄运南部地区盘根错节的乡村精英对他们认为有威胁的举措的抵制之间的反差。是这些精英及其衙役的勾结，通常决定了大堤从哪里经过、什么样的土地可以开垦及是否要被放到征税簿上。那些国家喜欢与之进行合作——或者就像在其他地方所做的那样，甚至把水利事务交给他们来办理——看上去更加外向型的士绅，在济宁之外的鲁西南地区非常软弱。把这个地区的乡村精英当作那样的士绅来对待的尝试失败了，许多维修工程一无所成。这个地区的一项重大工程在放弃了寻求与绅士合作后却成功了（尽管承认村庄领袖对河工和在其本村内对其他事情的控制权）；它完全无视当

地领袖要求在所有事情上必须平衡一个村庄与另一个村庄利益的看法。

本章的第二部分考察了民国初年修复大运河的一次尝试，而第三部分则考察了随着民国进入军阀混战状态所出现的另外错综复杂的问题。接下来考察了从清末到南京政府时期（1928～1937年）政府试图与地方领袖进行正式的合作，以维护黄河大堤。接着再考察了这个时期和这个地区一项重大的水利成就：1933～1934年，在鲁西南地区大运河的两条支流上完成了一项治水工程。本章的最后来思考那项工程所用的策略在未来进一步应用时其前景上的局限。

水利衰败的经济成本

黄运周期性的水灾可追溯到1852～1855年黄河的入侵，但直到19世纪80年代，沿着黄河新河道的大水灾才开始出现。1891年中央政府以减少治河资金来应对，使得这些问题再也无法解决了。当中央政府放弃了大运河时，最初对商业的影响比对农业上的那些影响要大得多，但不久以后，运河及其支流也带来了水患。

黄运地区由于交通问题和水灾所造成的每年水利衰败的损失至少达4800万元，这个数字几乎为1920年山东省财政收入^①的5倍，大约相当于黄运地区农业产值的10%；每年的损失可能超过了1亿元。因此，水利设施的维护可能是一项比像修建铁路这种政府实际承担的项目更划算的投资。由于黄运水利设施的放弃与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政府的新使命和新的侧重点联系在一起，也非常有必要来指出这些损失要远远超过第2章所述

^① Duara, "State Involution," pp. 140～141.

的黄运棉农——他们的机遇是外国的影响所造成的——的所得。

水利的衰败至少在四个方面影响了耕作。由于大运河再也不能帮助把汶河、泗水和山东其他河流中的河水带入海中，有些土地完全弃耕了。相反，这些河水在鲁西南地区形成了一系列范围超过 500 平方英里的浅湖，并把东平湖——靠近大运河和黄河的交界处——扩展了大约 50 平方英里。其次，由于国家不再承担其过去的责任，那些靠近江河、运河和湖泊且继续耕种的土地，则承受着更多的水灾之苦。再次，大堤的溃决导致了巨大的水患，特别是黄河。最后，由于洪灾期间盐分的积淀，土壤遭到了长期的损害。^① 对最后一项危害当时甚少有人研究；因此，这方面的资料极少，此处不予论述。但对前三个问题则有着充分的资料来估计其危害程度。计算方法在附录 B 中做了解释，而结果则体现在表 5-1 中。

水利衰败对商业的影响，可以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由于漕运的停止，有些贸易也随之失去；如果没有源于漕运体制的资助，许多这样的贸易本来就不会存在，而它的损失应该被看作是一场打击。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是对清末黄运商业所承受的打击的最好的估测。不过，由于单纯地维持大运河不可能使这些商业保持运营，这些损失将从本质上扭曲对水利衰败代价的估计。在那种情况下，问题就成了不得不使用其成本可能高于运河运费的运输手段所造成的每年的开支。

山东许多商业是为漕运船队服务的；其他人则依附于它，依靠漕运水手们所夹带的合法与非合法的“私货”^②。“私货”包

① 侯仁之编《序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第 48～49 页；John Ripley Freeman, *Grand Canal Investigation* (密西根大学收藏本), pp. 36, 93。

② 见星斌夫《大运河》，第 202～205 页；山东南运河疏浚事宜筹办处：《第一届报告》“附录”，第 11～12 页。

表 5-1 黄运每年平均因水利衰败所造成的农业收入的
损失较低程度的估计数
20 世纪 20~30 年代

项 目	受影响的土地 (亩)	收入的损失 (元)
因大运河沿岸湖泊的扩张	580000	2700000
发生在耕地上的与大运河有关的水灾	1300000	5000000
被变宽的黄河河道所淹没的土地	3000000	12000000
黄河水灾所造成的农作物损失(仅统计重要的溃堤)	未 知	9000000
万福河水灾所造成的农作物损失	未 知	5000000
总 计		33700000

说明：为了避免任何对损失估计过多的危险，这里仅计算属于土地本身的生产能力。因此，这些数据假定所有在淹没的土地上耕种的人，那个时候都可以在黄运找到其他的稳定职业。下列事项没有包括在上述的估计数中：卫河、汶河和其他更小的河流的水灾所造成的损害；水灾所造成的农作物以外的财物损失（非常有把握地说，每年仅因黄河水灾所造成的损失最少为 700 万元）；死亡和非经济损失；长期的环境破坏；相因而生的损害（如匪患）。关于更多的数据资料、计算方法及估计，见附录 B。

括许多用在当地手工艺中的商品，如竹子和各种特殊的木材。这种贸易的终结迫使许多精美昂贵商品的生产者们转向制作较低级的产品，但这些损失的幅度尚不清楚。当聊城和临清的木匠被迫使用当地的木材来制作较便宜的家具时，其收入和境况显然大不如前，但他们却并没有放弃其手艺或离开故土。1902 年以后，鲁西北地区不再输入或输出许多产品，但这些产品几乎都不是原材料。^① 尽管如此，正如第 3 章所述的那样，木材贸易的终结具有更广泛的影响。^②

① 1985 年 11 月访谈记录；杨正泰：《明清临清的盛衰与地理条件的变化》，《历史地理》第 3 辑（1983 年），第 118~119 页。
② 星斌夫：《大运河》，第 203 页，及第 3 章和前文。

即使在 1902 年以后，从临清向北和从济宁向南，仍然有着大量的运河运输。^① 尽管如此，不论是向南、还是向北，聊城——临清与济宁之间最大的城市，在 19 世纪 40 年代，其规模大致与这两个城市（及济南）相埒^②——均失去了其水路运输。在该市贸易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客商们（主要来自山西和陕西）在 1855 年的黄河改道和其他许多危机中均坚持留了下来，他们总是幻想河运迟早能够被恢复。但一俟 1902 年漕运原则上被废除、而不仅仅是作为战争时期的权宜之策，客商们就认识到运河将再也不会被恢复。结果，许多人开始离去。^③

1908 年有篇报纸上的文章指出，聊城受 1902 年以来的运河衰败及没有被列为替代运河作为南北动脉的津浦铁路的经过之地的打击特别沉重；许许多多的房屋正在被推倒。^④ 聊城在 20 世纪之交有六七家会馆（居民的俱乐部，在当时是其他地区商人的聚会之处），但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下降到了 1 家。^⑤ 聊城出生的傅斯年在 1920 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说，他的故乡是如此的依赖于运河，以至于它现在根本没有复兴的机会；他建议移出更多的人口以解决聊城当时的问题。^⑥ 尽管聊城的问题有其他的原因，^⑦ 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停止对运河的维护显然是毁灭性的打击。不过，正如第 2 章所述的那样，即使在聊城式微时，这个城市附近地区的农业仍在继续进行商业化。

① 见博士学位论文的相关部分。

② 见 Skinner,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第 238 页的图表。

③ 1985 年 11 月访谈记录。

④ *North China Herald*, Jan. 17, 1908, p. 124.

⑤ 1985 年 11 月访谈记录。

⑥ 孔德成编《傅斯年全集》（台北，1980 年）第 7 卷，第 2513~2528 页。

⑦ 吴运弢：《聊城客署与储搬业的兴衰概况》，《文史资料选辑》（济南版）第 14 辑（1982 年），第 109~128 页；孔德成编《傅斯年全集》第 7 卷，第 2528 页。

在济宁，城市部分似乎很快就从漕运终结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临清比济宁受到的损害要大，但比聊城受到的损害要小。

1901年以前，每年从南方来到临清的商船达3000艘，但这个数字不久就几乎下降为零。^① 还是从1824年的水灾开始，当清廷首次尝试海运漕粮时，当地的农民就利用每一个没有漕运船队的年份来开垦临清南部的运河河床；此时这些活动基本无人干预了。^② 在临清征收的正式关税本已下降，此时则一落千丈。尽管自临清向北的运河河段仍然维持着运营，但紧接着中央政府的退出，在1902年以后，当地私人“关”卡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③ 20世纪30年代早期，国民党

① 1985年未署名的手稿，据推测是《山东水利汇刊》第5期的内容。

② 杨正泰：《明清临清的盛衰与地理条件的变化》，《历史地理》第3辑（1983年），第120页。

③ 临清海关已经从其鼎盛时期的20万两下降到1896年漕运结束前不久的9万两。1904~1905年，又上升到每年13万两。1934年方志记载的“船钞”仅有1.3万两。但是，使用关税来估计实际经过临清的货物运量，这种方法在各个阶段本来就有争议，在这一时期则尤为复杂。在漕运结束不久之后的开始阶段，20世纪20年代当地形形色色的人在临清及其附近所设立的“密集的”收费关卡，竟把当初的临清海关降到了一个“验票处”的地位；20世纪30年代，大部分关卡连同正式的厘金一起被废除了。这些运费方面的变化和逃税的比重，使我们尚不清楚如何来解释关税的下降。见山东南运河疏浚事宜筹办处《第一届报告》“附录”，第12页；杨正泰：《明清临清的盛衰与地理条件的变化》，《历史地理》第3辑（1983年），第120页；Gandar, *Le Canal Impériale*, p. 58. 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二日杨士骧的奏折及杨的其他两份奏折，这两份奏折均插在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七日的案卷中，见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三十二年，第24（甲）箱。《临清县志》（1934年）第9卷，第8下页。North China Herald, Jan. 27, 1903, p. 1120; North China Herald, Sept. 13, 1907, p. 605; 山东国民政府秘书处1928年7月10日起草的报告（给国民政府），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机关代号1，案卷号334；《临清县志》（1934年）第9卷，第9上页；《农商公报》刊载：《棉花及棉纱、织、生产技术的低高产区》，未署日期的报告（可能在20世纪20年代初至中期之间），第12下~13上页，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038：案卷号2034。

当时再次把运河问题提到国家的高度，并命令清除所有非法的税收；^① 尽管如此，他们却从未重新恢复对整个运河河床的控制。

1902 年以前，至少自 1824 年尝试漕粮海运时起，当临清的贸易已衰落了多年时，自长江下游至济宁的贸易仍然非常旺盛。在 1908 年仍把鲁西地区称为“该省较为富裕的地区”的何塞·马士看到了大运河的衰败，但指出：“〔大运河〕运输量的一个小小的说明，可以在与经过靖江〔Jinjiang，疑为‘清江’——译者注〕关的山东相贸易往来的运输通道的价值中看出来，沿着大运河 250 英里的这一段距离，其中的一部分是这条水路上最糟糕的一段，到山东最近的市场，1904 年的贸易值为 364.6 万两，1905 年为 333.1 万两。”^② 这笔数字对所有那些把货物运往山东通道来说似乎太大了；但即便一小部分是这样，那么，它也说明了一种仍然大于许多沿海口岸的基本贸易。^③ 《山东杂志》估计，在漕运停止后的不多几年里，以货物的分量计算，济宁的运输业下降了 60%~70%，但货物贸易价值的下降要少得多。^④ 由水路承担的济宁与南方的贸易依

① 关于水利事务，见本章最后“官府、乡村头面人物与地方反抗”这一节；关于通行税的废除见《临清县志》（1934 年）第 9 卷，第 9 上页；以及《山东财政公报》第 5 卷第 10 期（1934 年 7 月），“命令”第 16~57 页（总的情况），及《山东财政公报》第 5 卷第 12 期（1934 年 9 月），“命令”第 14 页（临清船税的具体情况）。

② Hosea B. Morse, *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1913), p. 323.

③ 例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东海关（山东海关）的总收入为 80 万两。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六日杨士骧的奏折，见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三十三年，第 42（乙）箱。

④ 《山东杂志》第 35 期（宣统元年六月十五日），第 22 下页。关于民国时期山西市场上货物的价值与重量的比率（这与黄运地区的情况相比应该不会相差太大），见 Sands, “Investigation,” p. 64。

然非常活跃，至少在高度增值的商品方面；该市最大的商号迟至 20 世纪 30 年代还非常成功地依托于运河。在 1912 年济宁修起了铁路后，它与北部和东部地区的贸易也重新繁荣起来。^①

总的说来，大运河的衰败似乎没有给济宁——那里的贸易利润被很好地调度起来，并被用来维护着交通——的商业造成太大的损害。由于本地人的活动与政府的忽略相结合，临清的贸易受到的损害则较为严重。然而，济宁和临清之间像聊城这样的城市和沿卫河自临清向上游的城市（如黄运的河南部分中的滑县）的商业，由于 1902 年的改革而遭遇了灭顶之灾。^②

尽管如此，由于全国的贸易总的说来正在增长，由水路承担的黄运商业没有完全崩溃的仅有的事实，就可以掩盖运河衰败的巨大代价。通过那些修复运河的规划所作的估计数与实际数字相结合，我们得出仅现有的贸易所支付额外的运输费用，其保守的估计数为 700 万～900 万元；再加上由于水利衰败而使得贸易未能成交所损失的利润估计数，这将使损失的数字变得更高。其资料来源和计算方法在附录 C 中做了论述；其结果列为表 5-2。

① 关于通过水运的贸易，见北京大学附设农村经济研究所《山东省济宁县城を中心よせる農産物流通に關する一考察》，第 6～8 页；《山东建设公报》第 3 卷第 7 期（1933 年 7 月），“计划”第 10 页；海山：《玉堂春秋》（一），《济宁市史料》第 1 期（1983 年），第 56、61、62 页；也见《玉堂春秋》（二），《济宁市史料》第 2 期（1983 年），第 91～92 页。关于铁路和济宁的贸易情况，见北京大学附设农村经济研究所《山东省济宁县城を中心よせる農産物流通に關する一考察》，第 4～8 页。

② 关于滑县的情况，见 Wou, “Development, Underdevelopment and Degeneration,” pp. 215～230. 这里未对滑县进行详细的分析，主要是为避免与 Wou 教授研究的重复。

表 5-2 运河交通的衰落给黄运地区每年所造成的损失的
最低限度的估计

单位：元

	吨/英里	每吨/英里的 损失	总 计
1. 因运输转用铁路	11000000	0.009	99000
2. 短途搬运总额	30000000		
2a. 转用双畜大车(假定为短途搬运的一半)	15000000	0.089	1335000
转用小汽车(假定为短途搬运的一半)	15000000	0.271	4065000
短途搬运额(假定各占一半)			5400000
2b. 转用双畜大车(假定占短途搬运的 1/4)	7500000	0.089	667500
转用小汽车(假定占短途搬运的 3/4)	22500000	0.271	6097500
短途搬运总额(假定分别占 1/4 和 3/4)			6765000
3. 因威金对临清至德州段的裁截所作的调整:			
3a. 转用双畜大车(假定为运量的一半)	2500000	0.089	222500
转用小汽车(假定为运量的一半)	2500000	0.271	677500
最低总额	5000000		900000
3b. 转用双畜大车(假定占运量的 1/4)	1250000	0.089	111250
转用小汽车(假定占运量的 3/4)	3750000	0.271	1016250
另一种估计总额	5000000		1127500
4. 在临清至德州段上运行的船只所行驶的额 外距离	75200000	0.009	676800
对所有运行各项的最低估计(1 + 2a + 3a + 4)			7075800
对所有运行各项更为接近的另一种估计(1 + 2b + 3b + 4)			8668300

说明：所有的估计数均限于因现存的贸易运费变高所造成的损失；由于交通问题使得贸易不能成交所造成的损失则被排除在外。详见附录 C。

加上交通和农业的问题，算上其他财产损害的最低估计数，因水利衰败每年给黄运造成的经济损失达 4800 万～5100 万元这样的数字似乎是非常谨慎的估计数；有人可能会得出 1

亿元甚至更大的数字。^① 这样的一笔数字对这个地区有多大的意义呢？对中华民国宏观经济上的估计总是很粗略，但民国初年黄运地区的农业产值每年为 5 亿元似乎不无道理，而且甚至 4800 万元则占这个数目的 9.6%；1 亿元正好占 20%。由于黄运的人口超过了 1500 万，4800 万元平均下来每人仅摊 3 元多；不过，这个地区的人均年收入则可能远低于 40 元。^②

把这些损失与黄运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中所获得的利益进行对比也是非常有益的。由于推广美棉——迄今为止对黄运的收入促动最大的项目——所增加的毛收入，使用不同方法所估计的数字范围从少于 800 万元至大约 1500 万元。^③ 我们还可以根据消费数据来作估计。1933 年的一份报告估计，山东 35 个县每年消费掉价值 3000 万元县际交流的商品。这 35 个县的人口大约占黄运总人口的 60%。^④ 如果这些县具有典型性的话，我们将因此算出黄运地区对这种商品的总消费额大约为

① 见博士学位论文，“附录 I”，特别是第 448 页。

② 对收入的估计是基于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山东省）》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关于黄运山东部分的资料，对黄运其余地区的收入估计做了修正；反过来，把耕地数量乘以潘复所估计的及轶闻逸事中记载的每亩 8 元的收入，所得的估计数与前述数字正好吻合。关于计算损失的更详细方法，见附录。亦见 John L. Buck, “Statistical View,” pp. 33~47. 关于黄运的河北和河南地区各县的人口，见 *China Yearbook*, 1926~1927, 第 4~9 页。按照黄运貌似真实的最大边界，河南和河北部分加在一起可能接近 700 万人口，但这个数字包括某些仅有部分地区属于黄运、或可能所有地区均不属黄运的那些县的人口。

③ 见土井章、殿生文男著，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务部资料课编《北支事情综览》（大连，1936 年），第 261 页，用每亩产量乘以美棉的总亩数（这项数字见博士学位论文，“附录 D”）。其他每亩的产量见《乡村建设旬刊》第 3 卷第 18~19 期（1934 年 2 月），第 14~15 页；满铁天津调查课：《山東の棉産物》，第 47~54 页；及林茂泉《文集》，第 65 上~下页。

④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 2 编，第 151~201 页。

5000 万元。由于商品的消费使得人们的境遇变得好起来，这些数据代表了外部世界对黄运福利所做出的贡献的一个上限，除非帝国主义在某些方面造成了当地商品消费的增长（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考虑到总收入的有限增长，更多的土地被用于种植供输出的作物，而农业改良的努力则集中在用作工业原料的农作物方面）。另外，这次调查中，县际交流的大多数商品来自样本中的其他县或代表了与中国其他地区有着源远流长的贸易关系。^① 因此，即使输入被极大地低估了，但黄运从加入世界经济中所得的利益，甚至肯定要远远小于我们对一个深受压迫的国家放弃黄运的治水造成的损害所作的最保守的估计。

当然，这些损失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在深受水患影响的黄运南部地区的损失可能最大，这个地区从新的贸易机遇中所获得的利益也最少。对于这个最不幸的地区，接近上述计算范围中较高结果的水利上的损失，可能与第 3 章所述的因自己拾集的燃料的缺乏，并因我在各处所估计的黄河沿岸各县的人民因治水所用的秸秆占其平均收入的 3%~7%，而导致收入下降 7.5%（如果全部负担都由黄河沿岸 3 英里之内的那些人民来承担，则占其收入的 8%~20%），这些状况结合在了一起。^② 对于这些人民，新政治经济的代价确实是惊人的。

另外一点也非常值得注意。忽略水利设施的代价显然使维

① 鲁西南和济宁的具体数字，见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 2 编，第 165~189 页（特别是 167 页）及北京大学附设农村经济研究所《山东省济宁县城を中心よせる農産物流通に關する一考察》，第 4~5 页对济宁作为一个“再输出中心”的讨论。

② 当人们不再能够在市场之外满足其自身的燃料供给的需要时，对他们收入损失的估计，见第 3 章“封闭、燃料短缺和森林砍伐”这一节；对黄河大堤所需的秸秆造成的负担的估计，亦见博士学位论文，“附录 G”，第 438~440 页。

护水利的开支相形见绌。如果我们使用第4章和其他地方对维修成本的最低估计数，那么，彻底的水利维修可能不止是一年中它自己在“社会性的储蓄”方面所获得的回报；即使使用最高的开支数，这样的一种投资每年可能会获得大约45%的利润。^① 这些利润率远远高于国家或外国人所投资的那些项目。例如，最大胆的估计，在社会性的储蓄方面，中国修筑铁路的回报率每年大约为20%，并付出了承受不断增长的外国对中国的影响这一沉重的政治代价。^② 因此，即使不考虑人道关怀，修复黄运的水利设施也应该成为重中之重。对黄运的百姓来说，即便政府开征新税，使它可以同时支付发展现代化项目和维持旧设施的费用，那也比对水利的放弃要好得多：社会性的储蓄可能不仅仅是公共部门的其余部分对整个山东所付出的代价的补偿，更不用说黄运了。那么，所进行的维修事务为什么如此之少呢？

士绅与外国人

水利设施维修的困难，使得政府的帮助成为必要之事，但这也阻碍了政府放弃控制权。本章的其余部分将考察民国时期在没有中央政府大力帮助的情况下，扭转水利设施衰败的尝试。这些努力始于1914年，以修复大运河的尝试为开端。

这项工程的赞助人和管理者绝大多数来自济宁这个城市。山东大运河工程的总指挥、4名“咨议员”和24名军官中的

① 计算方法依据博士学位论文，第203、342、527页。

② 关于可以用来推导社会性储蓄的数字，并因此而得出对整个社会在铁路投资方面的回报，见 Heunemann, *Iron Horse*，第127、225~227页。如果有人把37200万元的社会总储蓄作为157万元铁路总投资（国内和国外的）的回报，回报率为23.7%。

12 名来自济宁（4 人来自山东的其他地区，其中包括 1 名曾任济宁县县长的人；8 人来自其他省份）。济宁的参与者们是该市的精英，而且他们还较多地涉足了其他现代化活动。有 3 人曾是当年鼓动把铁路修到济宁的 4 名领袖中的人物；3 人曾在山东省实业部门任过职；1 人曾担任过山东矿务局局长；1 人曾是山东最大的矿业公司的董事；至少有 2 人经营过纱厂；1 人是济宁一家卷烟厂的董事；1 人曾在两条重要的铁路上任过职；1 人是省议会议员；1 人曾担任过济宁参议会议长；1 人是济宁商会的会长；2 人曾在新式学校供过职，等等。最为重要的人物是该组织的会长潘复。^①

潘复的家族属于济宁两个最著名的家族之一。潘家在该县的历史超过了 500 年，这个家族在 16 世纪诞生了第一位官员。^② 潘复本人在 20 岁获得了举人功名；他作为山东省劝业道台很快就开始了把商、工和官职结合在一起的生涯。^③ 在去职后的一段时间里，他领导了济宁的绅士群体抗议对津浦线的规划，劝说这条铁路将要经过的所有四省的绅士和官员们参与到他们的行动中（见第 3 章）。尽管这些努力仅取得了部分成功，但显示了潘复组织其他精英分子的技巧。^④ 1911 年在江苏

① 山东南运河疏浚事宜筹办处：《第一届报告》（疑为“第 1 编”——译者注），第 14～19 页；《农商公报》第 2 卷第 6 期（1916 年 1 月），“政事”第 24 页；《农商公报》第 3 卷第 6 期（1917 年 1 月），“今年”第 30 页；《山东杂志》第 41 期（宣统元年九月十五日），第 24 下～25 上页。关于潘复的重要地位，见 1919 年 4 月 9 日 Carey 的信。

② 《济宁直隶州续志》第 4 卷，第 9 下～22 上页。

③ *China Yearbook*, 1926～1927, p. 1190; 《中国近代名人图鉴》，第 227 页。

④ 如见《山东杂志》第 2 期（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三十日），第 12 页及《山东杂志》第 5 期（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五日），第 1～5 页。亦见袁静波《“兗济支线”与“济宁火车站”修建小史考略》，《济宁文史资料》第 1 辑（1986 年 3 月），第 4～7 页。

结束了短暂的任职后，他在那里顺利地清朝巡抚的一名文员转变为革命政府中的成员，1913年潘复回到了相当于山东实业道台这一老位置上。^① 1915年，他组织投资者创办了一家纱厂，这是济南最早的纱厂之一；这家公司后来创办了临清的第一家纱厂。他后来成为山东省主席、中国财政部次长和财政总长、全国盐务署署长及全国救济总会会长。1927年，他是最后一届北洋军阀政府的国务总理。^②

潘复与鲁西南其他几名政界人物密切合作，这些人中包括单县的周自齐（民国时期山东的第一任督军及后来的财政总长）和济宁的靳运鹏（袁世凯和段祺瑞的亲信，继周自齐之后担任山东督军，后来担任过国务总理）；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张宗昌控制该省之前，这个地方派系一直联合起来占据着山东省大部分关键的职位。^③ 在这样一个官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城市里，潘复在商界和官场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潘复的父亲因声望卓著，1919年“负责”过在济宁最大的一家寺庙中举行的农历七月份最后一天的庆祝活动，在这次庆祝活动中，“济宁绝大多数的中国官员都出席了”。^④ 在他那一代中，潘复的近亲里曾有一名旅长，他的部队经常驻扎在济宁，还有一名地方议员，他是该市大部分重要的慈善

① *China Yearbook*, 1926~1927, p. 1190; 《中国近代名人图鉴》，第227页。

② *China Yearbook*, 1926~1927, p. 1190; 《中国近代名人图鉴》，第227页；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2: p. 440a; 园田一龟：《新中国人物志》，第134页。

③ 万光炜：《民国初年山东政党活动的内幕与省议会的丑闻》，《文史资料选辑》（济南版）第5辑（1978年），第32~42页；邵绰然：《田中玉把持山东省议会选举的丑闻》，《文史资料选辑》（济南版）第5辑（1978年），第43~50页。

④ 1919年9月28日凯里的信。

机构的董事。^①

尽管如此，这个家族在济宁的乡村则没有强大的势力。他们似乎也绝不可能拥有 1000 亩以上的土地。而当时这是一个具有一定意义的数量，对这样一个富裕家族来说，这个数字并不大。在潘复的那位兄弟具有重要影响的那些慈善机构中，80% 的捐款存放到都市企业中，而不是投入到土地上。潘家本身直到 1922 年才有义田，那时他们把家族中的 1000 亩土地放到一个财产管理机构中。另外，当全国的政治风向转变时，潘家就无法控制这块并不太大的免税地产了；1929 年（随着潘复内阁的垮台），一场不知何人挑起的调查得出结论，说这块土地没有被用于慈善事务，必须由县长加以“清算”。^②

这次挫折不仅使这个家族的许多辉煌成就黯然失色，而且使那些 20 多年来在济宁抵制了地方政府和市民领袖（至少包括两名潘家的人）要求他们对其所开垦的湖床缴纳费用的努力所获得的成功黯然失色。济宁的“都市改革精英”^③ 似乎没有人在农村拥有像在华东和华南地区通常具有的参与土地开垦和治水的那种影响。^④

① 《济宁直隶州续志》（1927 年）第 4 卷，第 65 下页；张树源（Zhang Shuyuan）和其他人的特急电报，签收日期为 1918 年 5 月 13 日，并标有“#36”，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机关代号 00：案卷号 1164。

② 关于潘家的情况，见《济宁直隶州续志》（1927 年）第 4 卷第 9 下～22 上页、64 下页，第 5 卷第 10 下～11 上、13 下、21 下页。关于这次调查，见山东省政府向南京所作的 1929 年 9 月份的工作汇报，第 2 页，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机关代号 2：案卷号 110。

③ 这一术语是由周锡瑞在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 (Berkeley, 1976) 中创造出来的。

④ 如见 Frederic Wakeman, *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 ~ 1861* (Berkeley, 1966), pp.153 ~ 155; Peter Perdue, "Water Control in the Dongting Lake Regio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1: 4 (August 1982), pp.747~765。

这种政治力量和弱点非常重要，因为修复运河需要两个重要的政治前提。第一个前提是要由中央政府来参与，因而推动对外资和外国承包商的利用。济宁官商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这座城市中的精英很适合这项任务；在济南和北京，鲁西南地区大量的政治人物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在论述铁路划线的争执及在 1902 年削减预算时维护运河最低功能的争执中所观察到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再次显现出来：黄运南部地区的都市精英们比黄运北部地区的任何人都更富裕、更有组织性和更能影响较高层面的政府。

尽管如此，国家对向黄运提供治水服务再也不感兴趣了；充其量它可以帮助担保贷款。因而，第二项任务——潘复及其朋友们对此并不怎么适合——是开发被开垦或被用来获利的土地的生产力，以便这项工程能够自给。在这里，正如潘氏家族土地的遭遇所显示的那样，相应的模式类似于我们在研究新的棉花品种中所见到的那一种：来自济宁和黄运南部县城的精英们无法克服这个地区中乡村头面人物的反对，这些人也比黄运北部地区的乡村头面人物要强大得多。

这项工程的出资者们最初对交通很看重，但这不是乡村百姓所感兴趣的。当运河委员会向民间、而不是向其委员们征集意见时，他们收到了 28 封来自西南各县的意见书。与这项工程最初的出资者们不同，这些人通常不是生活在县城，而生活在像济宁这样的一个区域中心的人就更少了，并且他们的社会地位要低得多。这 28 人中的 17 人被简单地说成是“公民”。剩下的 11 人中，有 4 人署名为村长。另外 1 人是当地自卫队的队长。有 1 人代表了东平县议会中的东平第四区。1 名称为“绅民”的人可能是一位地位较低的绅士，因为没有署上曾经担任过或是准备就任的职务。2 人是新式学校的毕业生——1 人毕业于一所中学，另 1 人毕业于一所层次很低的师范学校。

只有 1 人——实业厅设在济宁一家机构的一名前助理——可能出没于这项工程的出资者们类似的圈子中。^①

这些人不一定是乡村领袖中的代表人物。但他们提交的建议理应使他们成为那些有影响的农村人中的样本，他们可能有助于在农村中推动这项工程。在上述 28 条意见的摘要中，仅有 1 条是专门建议改善航运的。其他 27 条中的 26 条侧重于水灾治理、湖地开垦，或两者兼而有之；至少有 15 条提到了开垦湖荡土地。如果以潘复为首的这个委员会真的抱着它所宣称的为运河工程构建广阔基础这一目的，那么，它就理应重视土地的开垦。^②

另外，这个委员会很快不得不放弃其仅恃运输就可资助这项工程的最初设想。T. H. 威金向潜在的美国金融家们所作的报告中断言，该项费用仅包括略多于 200 万元的贷款所产生的利息，而即使是对这项工程最简单的调整也需要 500 万元。即便是那些认为威金过于悲观的人也承认该项费用太难估算，以至于无法作为这项工程的依据。^③

用那种方法来资助这项大运河工程也不一定就是必由之途。对通过修复大运河从而使土地可以被开垦出来的数量，最悲观的估计为 58 万亩。据威金估计，济宁南部 192 万亩的土地将变成可耕田，或是数十年中首次不受洪水的侵害；后来的估计数超过了 200 万亩。在弗里曼提出的修改方案中，又在东平附近

① 山东南运河疏浚事宜筹办处：《第一届报告》（疑为“第 1 编”——译者注），第 25~26、54 页。

② 山东南运河疏浚事宜筹办处：《第一届报告》（疑为“第 1 编”——译者注），第 25~26、54 页；关于该委员会的目的，见第 5 页。

③ John Ripley Freeman, Grand Canal Investigation (康乃尔大学收藏本), p. 67; John Ripley Freeman, Grand Canal Investigation (密西根大学收藏本), pp. 129~135, 37。

增加了 30 多万亩。^① 这些土地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对这项工程造价的各种估计数；棘手的事是先找到财路来资助这项工程。

部分问题是“冒出”了对许多土地的认领。大部分将要被开垦的湖地一直到 1855 年、或者甚至 1902 年都是干涸的。在那之前，人们就已耕种了此时将要被重新开垦的土地。即便以前的田主为使淹没的土地免于纳税而放弃了其合法的所有权，运河委员会也并不准备完全否认其子孙们习惯上的权利。^②

还有部分问题是，这个委员会的态度可能出于一种现实的估量，即政府无法把人们从那些土地上赶走。在 10 年前，当政府在鲁西地区宣布对“屯田”的所有权时，它曾彻底地失败了。^③ 1904 年在济宁附近的一项垦地工程也由于与土地所有权的主张发生冲突而流产。山东省政府授权在济宁市成立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拥有足够的资本来承担大规模的开垦事宜。但地势较高并因此较易排水的公地已经被当地人非法地开垦了，这显然是与乡村精英、村庄头面人物和役吏们进行了合作。最后，这家公司无法维护对地势较高土地的控制，而那些土地很快就可以产生效益；结果，他们无法对河流上游的维护进行资助，每个人的土地又重新不断地遭受洪水的侵害。^④ 另外，规划者们似乎考虑应该尊重过去的所有权主张；他们甚至计划对

① 关于估计数，分别见山东南运河疏浚事宜筹办处《第一届报告》“附录”，第 9 页；John Ripley Freeman, *Grand Canal Investigation* (康乃尔大学收藏本)，p. 68；侯仁之编《序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第 48 页；John Ripley Freeman, *Grand Canal Investigation* (密西根大学收藏本)，p. 122。

② John Ripley Freeman, *Grand Canal Investigation* (密西根大学收藏本)，p. 28；山东南运河疏浚事宜筹办处：《第一届报告》“水利规复调查”，第 11 页。

③ 见后面“官府、乡村头面人物与地方反抗”这一节。

④ 《东方杂志》第 1 卷第 10 号（光绪三十年十月二十五日），第 172～173 页；《济宁直隶州续志》第 2 卷，第 48 上页。

自 1855 年以来就淹在水中、当时将要被正式划入东平水库中的 78000 亩土地予以一定的补偿。^①

潘复称将被开垦出来的那些灌溉良好的土地具有极高的价值，但认为想出卖这些土地是不明智的。相反，他赞成尊重那些有案可稽的土地所有权主张，并定下对这些土地每年征收 1 元“改良税”，共征 20 年。这些费用对那些目前完全淹在水中的私人土地，与有些年份可以耕种、但将会从洪水治理中获益的边缘土地均一视同仁。规划者们知道即使这样的费用也很难征收；但如果他们只要能够对济宁南部被排干的 1/4 的土地征税，每年就会获得 48 万元的收入，按年息 8 分计，与为那段运河必需的 500 万元资金所支付的 40 万元利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外，有些土地将不是任何人都能认领去的，这是因为许多家庭已经绝嗣或迁离该地。在那种情况之下，一系列获得授权的公司将通过村庄头面人物把那些土地租佃出去，而一部分租金将自动地用来资助维持治水工程。^②

1915~1918 年，设在济宁的山东运河委员会的大部分时间是花在清理土地的所有权上。^③ 某些相关的文件必须是已经在政府备过案的。但大部分是对该委员会的通知和布告所作的反应，就是邀集人们来证明其所有权。具有正规所有权证明的人将把这些证明提交给村长，由村长把它们拿到县政府来做进一步的认定，并将保证其有效性；如果发现假文献与真文献

① John Ripley Freeman, Grand Canal Investigation (密西根大学收藏本), p. 118.

② John Ripley Freeman, Grand Canal Investigation (密西根大学收藏本), pp. 28, 35, 37~37A; John Ripley Freeman, Grand Canal Investigation (康乃尔大学收藏本), p. 68; 山东南运河疏浚事宜筹办处:《第一届报告》“水利规复调查”, 第 12 页。

③ Department of State, reel 215, document 313, p. 293.

混在了一起，就要专门进行拷问。那些拥有不规范书面文件的人需要找其村长和邻村两名村长作为保人。对那些没有任何书面文件的人则没有一语涉及；尽管如此，一份由该村村长出具、并由两名邻村村长证明的书面材料可能具有足够的效力。除了威胁说要严惩所有恐吓或压迫认领者的村长外，该委员会对没有一名村长作保的所有权主张未作规定。该委员会还制订了管理租佃田地的规章；它为村长们提供了大部分选择和约束佃农的权力。运河委员会拥有自己的调查人员，但其规章明确地表示，当“在百姓中”调查问题时，它将依靠村长们或村委会成员。^① 另外，正规证明最常见的形式可能是纳税凭证——意味着村长、衙役之类的人可能对土地认领最有发言权。

一位证明某人具有土地所有权的村长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并且，还可能承担一定的风险。他也可能不得不安排一位第二个村长来为其村中的不正规文献证明作担保，这是因为大多数人可能与其他村庄中的村长没有私人的关系。因此，村长们不仅在分配巨额地产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对他们所担负的角色的规定，要求他们必须集体行动。对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村庄领袖们的描述，绝大多数不是把他们视为自县级地方官以下的垂直指挥链条中的最后一环，就是把他们视为处在其具体的村庄与这条垂直指挥链条之间的一个经纪人（诚实的或狡诈的）。^② 尽管

① 山东南运河疏浚事宜筹办处：《第一届报告》“水利规复调查”，第11～14页；山东南运河疏浚事宜筹办处：《第一届报告》“规章”，第13页。

② 如见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pp.219～223, 237～239. 对村长们在多大程度代表自己或作为一个联系更密切的乡村精英的代言人的看法仍存在争议；如见 Huang, *Peasant Economy*, 第242～243页。在我看来，在黄运南部地区（比黄宗智和杜赞奇所述的更像是这么回事），村长们通常是其村中最有势力的人物，而不仅仅是一个非常均衡的寡头统治机构中的一员；但这两方面的资料都缺乏，而对当前的分析目的而言，这个问题无足轻重。

如此，在这种情况下，鲁西南地区较高的权力机构对待村庄领袖们的办法很像 10 年前它们在对屯田的争执中所做的那样（此事就更晚了）：因为人们不仅可以代表他们自己的村庄与正式的政府打交道，而且人们还可以进行村际的合作并在与官方打交道时共同代表众多的乡村民众的利益。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山东省政府在这方面走得更远，它建立了一个由黄河某些河段上的村长组成的正规协会。^①

承认习惯上的土地所有权、但却坚持征收改良税，为运河委员会提供了一条似乎有理的偿还它所需贷款的途径。通过承认村长们在分配所垦的土地中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让他们记录下什么人拥有垦地，运河委员会增加了最终收得税收的几率。即便如此，这种折衷本身并不能筹得这项工程的资金。在开头时，潘复曾尝试筹集国内的私人资金：一家获政府批准的大公司将承担基础性的工程项目，而当地一些较小的公司则承担零碎的、显然有利可图的小块土地的开垦。尽管如此，他很快断定如果没有长期安全的合理资助，当地投资的士绅们甚至将失去对小规模收效很快的项目的兴致。他当时向省和中央政府、并在最后向外国人做了呼吁。^②

在 1911 年淮河发生可怕的洪灾之后，北京更愿意让外国人来填补河流治理的真空。意识到靠他们自己根本没有驯服淮河的希望，清廷允许美国红十字会来调查这条河流并提出一项新的治理方案。辛亥革命以后，谈判仍在继续进行，在 1914 年

① 见《山东河务特刊》第 1 号（1928 年 10 月），“法规”第 5～10 页。

② 山东南运河疏浚事宜筹办处：《第一届报告》“水利规复调查”，第 13～14 页；山东南运河疏浚事宜筹办处：《第一届报告》第 1 编，第 5～6 页；山东南运河疏浚事宜筹办处：《第一届报告》“工程计划”，第 1～2 页；山东南运河疏浚事宜筹办处：《第一届报告》“工款概略”，第 1～2 页；Department of State, reel 214, document 210, p. 286。

完成了一项可行性的研究。这项研究断言，如果仍然不对大运河进行共同的治理，治淮将变得极其困难。^①而江苏的大运河则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它被说服尽可能地与潘复所主持的山东大运河修复事务进行协作。正如潘复在倡导向济宁修筑一条铁路时所做的那样，他同样利用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创痛作为论据来帮助其一向被忽略了故乡；他指出，鲁西的经济应该得到发展，以便使逐渐被日本所控制的鲁东地区不会成为山东的“主导”地区。^②

由潘复代表山东运河委员会的谈判，与那些为了江苏的运河工程而向中央政府贷款的谈判分了开来。不过，各方达成了共识：如果可能的话，山东运河、江苏运河及淮河工程应由同一家承包商来承做。^③

美国大使曾向承包商们——美通洋行（American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和裕中营造公司（Siems and Carey Railway and Canal）——提出建议：他们应在与山东方面签订协议前结束江苏的谈判。尽管如此，他们对潘复本人以及他和山东省主席蔡儒楷所显示的将这项工程进行下去的决心的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们违背了这项命令。1916年4月，山东同意向雇用裕中营造公司的美通洋行借款300万美元（约为600万银元）。^④

外国人把这个合同视为一项重大的进展：美国大使称之为“所有外国公司曾经获得的对中国的贷款中最有益的一项”，并

① Department of State, reel 214, document 232, p. 459; document 210, p. 279; document 223, p. 342.

② 山东南运河疏浚事宜筹办处：《第一届报告》“附录”，第23～24页。

③ Department of State, reel 214, document 219, p. 293.

④ Department of State, reel 214, document 221, p. 333; document 213, p. 293.

认为“对中国”来说，条件“基本上太严厉了”。首先，这项协定要求外国人来直接监理这项工程。大使芮恩施指出，在过去，中国人总是想自己监理工程，“部分原因是引进外国的监理公司，极大地减少了〔官员们〕谋利的机会”。事实上，外国的承包商不仅管理建筑本身的事务；而且他们在偿还期限达21年的这笔贷款被还清前，有权向运河和所有已垦的公地推荐管理人员；美通洋行还可以检查所有与运河委员会和省府有关的账户，并可以否决监理工程师们的意见。^①

美通洋行还获得了非常好的金融条款。芮恩施强调这是第一笔规定提供10%佣金的建筑贷款：换句话说，这笔贷款的10%将直接流入美通洋行的腰包，作为它选择承包商、筹集贷款和做其他事务的费用。开始时，这笔贷款仅由运河通行税作担保，但经一系列修改后，又加入了其他的担保：所垦土地上的收入、省里保证弥补所有缺额的承诺及在山东为国家筹集的每年30万元税收的留置权，除了贷款的偿付办法有了更新，这笔税收就不能被转运到北京去。从根本上说，美通洋行既得到了国家、也得到了省里的担保，尽管它们从未与中央政府直接打过交道。芮恩施认为，对一笔“绝对安全的”贷款来说，7%的利润就已经是极其不错的了。^②

在知道了美通洋行将对淮河治理获得第一个投标机会后，江苏也很快签订了同样的协议。后来，这两笔贷款被并成了一笔600万美元的贷款。^③ 山东省议会和督军孙发绪曾短暂地反

① Department of State, reel 214, document 214, p. 296; document 221, p. 334; document 223, pp. 343~344, 353, 362.

② Department of State, reel 214, document 221, p. 333; document 224, p. 376; document 223, pp. 344~363; document 225, p. 384; document 224, p. 469; document 215, p. 299; document 222, p. 336.

③ *Far Eastern Review* 15: 4 (April 1919), p. 356.

对过这个协议的部分条款。当这种反对加剧之时，潘复和国会中山东省的议员们急忙赶到济南与省议会进行辩论；其间，中央政府拿出了在山东征集的部分印花税来代替省议会不愿用来充当担保品的价值 30 万元的土地税。孙发绪被调出了山东省，接任他的是东阿人张怀芝，张是潘复的一位朋友，他支持这项运河工程。^① 美通洋行再也不可能获得比这项工程在济南和北京都拥有有影响的保护者这样的保证更为有力的担保了。

然而，这件事很快就流产了。简单地说，问题出自日本。当 1914 年人们在讨论山东大运河的变革时，中国人为 1898 年签订的一份条约所限，要向德国人提供一项工程；但德国却衰落了，并宣布不反对美国承担这项工程。到 1917 年，在真的签订了一份合同时，日本曾要求得到德国人在山东的特权，但中美均不承认这个要求。事实上，美通洋行——其董事和官员中包括一位洛克菲勒、摩根、杜邦家族的人以及威拉德·斯特拉特——曾按芮恩施的倡议组建起来向这项工程投资，以帮助美国保持“门户开放”政策并限制日本的影响。^②

在合同签订一年以后，日本发出了正式抗议。首先，芮恩施的报告中说这次抗议并不严重，只不过是企图为其他事情设置一个先例。但仅仅过了几天，美通洋行就告诉他即使是一份纯正式的日本抗议也将吓走潜在的股东；因此，他们将向日本兴业银行让出这个项目的 5/12。^③

① Department of State, reel 214, document 234, pp.464 ~ 469; document 235, p. 490; 关于张怀芝的情况，见 *China Weekly Review, Who's Who in China*, 3rd ed. (1925), pp.41~42。

② Department of State, reel 214, document 213, p. 293; document 231, pp.447, 449; document 256, pp.837~839; 关于美通洋行董事会成员的情况，见其 1917 年的 *Bulletins* 第 1 卷第 1~2 期及其 1919 年的年度报告。

③ Department of State, reel 214, document 231, pp.447 ~ 449; document 234, p. 469; document 236, p. 493.

芮恩施被惊呆了。这样的一种协议显然是承认日本在山东的“特殊地位”，而美通洋行又与美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此时美国试图阻止这项工程的话，这可能是挑战日本人对其特权的检验，这是直到欧战结束时美国都希望避免的事。更糟的是，由于山东运河工程被设想是更大的运河—淮河工程的先导，这将使日本把它的影响扩展到辽阔的新地区。芮恩施强调，其时，中国人将理所当然地被美国所激怒；美国通过把淮河工程描绘成一种由红十字会领导的、由一个绝无领土野心的国家承担的纯人道主义事务，已经克服了中国人原来对外国参与内地河务工程的抵制。但是，美通洋行坚称：如果没有日本的参与，政治方面的未知数将使投资变得毫无希望。^①

美通洋行不但把日本银行引进来、而且还计划分享合同中所规定的巨大管理特权的行为确实使中国政府震怒了。^② 在与中国订立的合同中惟一的更动是加进了一个条款，允许美通洋行在“美国以外的某个地区”筹集这笔贷款中的 5/12。对日本二包商的安排是通过美通洋行与日本兴业银行之间的协议来决定的，这份协定毋须中国人签字。1917 年 3 月 31 日，芮恩施的报告中说，潘复和其他的中国人认为美通洋行与日本兴业银行之间的协议是一种“背叛”；但是，到 4 月 14 日，他又报告说，他们“由于受形势所迫，不得不忍气吞声”。^③

到了 5 月份，安徽省议会投票反对所有跨省的淮河规划及

① Department of State, reel 214, document 236, pp.493, 497; document 237, pp.500, 502; document 238, pp.504~505.

② *Peking Daily News*, Feb. 6 and 13, 1917 (重印), 见 Department of State, reel 214, document 249, pp.785, 787, 790; document 252, p. 800 (1917 年 3 月 31 日芮恩施给国务卿兰辛的报告), 前揭。

③ Department of State, reel 214, document 254, pp.809, 812; document 256, p. 824.

所有有外国人参与的治河工程。北京仍然对这项工程割舍不下，并企图让安徽改变决定。^①但美通洋行与日本兴业银行之间的交易已经造成了恰恰是美通洋行希望避免的那种政治不安。在这种情况下，美通洋行希望得到更多的担保，并坚持把修改过的协定提交给中国国会；潘复和其他中国官员通过换文愿意批准这项更动。虽然中国国会无关紧要，但美通洋行还在坚持；不管怎样，这个公司确实拿出了一些资金来资助美国工程师进行更多的调查。^②

这些调查者们规划的方案甚至比潘复所委托的那个方案要更乐观且更有气魄。所用的资金为 1331.8 万元，其诱人的前景包括：所通行的驳船载重量升至 500 吨、开垦超过 100 万亩的土地、另有 110 万亩的土地将免于洪水的侵害、在靠近黄河与运河交汇的地方开始对黄河的治理（包括修建新堤、排水隧道和一条为未来河务工程运送物料的新通道）、对 18 万亩土地提供灌溉水源、一条沿运河搭设的电话线以及新的疏浚船只和其他设施。仅仅一年之内这项工程就可收回投资。^③

尽管如此，这个方案无一语涉及美国金融家们的疑虑，而工程的启动则一拖再拖。如果美通洋行准备在 1921 年 2 月动工的话，那么，灾民们本可以被雇来承担许多活计，并用红十字会的救济粮来付酬，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人和美国大使均指责美通洋行；这项工程的总工程师弗里曼把防范土匪作为托词；而美通洋行仍在坚持“合同”问题必须先予解决。1921 年 5 月，潘复抱怨说，自从换文同意加上所有美通洋行想要的

① Department of State, reel 214, document 261, p. 869.

② Department of State, reel 214, document 256, p. 827; Department of State, reel 215, document 277, p. 0004; document 294, p. 148.

③ John Ripley Freeman, Grand Canal Investigation (密西根大学收藏本), John Ripley Freeman, Grand Canal Investigation (康乃尔大学收藏本), 各处。

更动以来，已经超过3年了；花去了近90万美元，但建筑事务却不见影子。美通洋行回复说，由于中国国会尚未“批准”这个合同，债券无法卖出，而限制美通洋行选择的时机尚未过去。^①

其间，自1914年以来，这项工程的美元成本大约翻了一倍。^② 尽管如此，规划组最后的报告（日期署为1920年8月）仍然非常乐观，而美通洋行的日本合作者们依然兴致勃勃（如果日本人的兴趣所在被人知道的话，可能就无法打消中国人的疑虑了。日本兴业银行已经与日本纱厂做了沟通，日本纱厂希望得到保证，使山东所垦的土地能种植向日本出口的棉花）。^③

在此之间，这项工程失去了政治靠山。潘复在1921年11月暂时退职；熊希龄参与了其他的工程；1921年底，潘复的朋友和济宁同乡靳运鹏结束了为期3年的断断续续的总理生涯；同样是鲁西本地人和这项工程的早期后台的周自齐，在1922年初皖系失败后离开了中央政府的舞台。^④

其时，江苏省得到了北京的批准，在3年里留下300万元土地税用于修建自己的运河工程；这就终结了运河—淮河工程一体化的想法。^⑤ 到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鲁

① John Ripley Freeman, *Grand Canal Investigation* (康乃尔大学收藏本), p. 21; Department of State, reel 215, document 328, p. 381; Department of State, reel 216, document 424, pp. 201~202, 204.

② Department of State, reel 215, document 351, p. 596; 《河务季报》第10号(1925年春), 第27页。

③ Department of State, reel 216, document 424, p. 199.

④ Department of State, reel 215, document 351, p. 604; *China Yearbook, 1926~1927*, p. 1190;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1: 382; 《中国近代名人图鉴》, 第83页。

⑤ Department of State, reel 216, document 380, p. 0019; 《交通史》, 第1790~1810页。

东攫取的特权已经成了中国政治中最具爆炸性的问题；一项可能把日本人引入到鲁西地区的工程将极其不得人心，而不论它对当地具有什么样的利益。^① 1922年，利津靠近黄河河口的地方发生了大溃决，这使山东省政府对治理经费的需要更加紧迫，并引起了重新对寻求在中国河务工程中发挥作用的美国外交人员和工程师们的重视。^② 1916年，外国人已经把山东视为最致力于运河维修的省，但到1922年，它却是惟一没有搞运河工程的省份；运河委员会本身很快因缺乏资金而关闭。^③ 这个委员会的转让，终结了所有获得外国技术和为了一项收益可能更高的工程而取得利息为8%的贷款的希望。^④

因此，黄运南部地区都市精英们打通更高层面的政府——它至少帮助了满足1902和1911年济宁最低限度的基础设施的需要——的能力，在这个时候尚未完全具备。规划者们获得所垦土地上的收益的不确定性，使得外国的贷款和中央的担保变得至关重要，并意味着获得所需的资源将取决于更大的政治活动。尽管如此，对曾把省外的士绅和官员们聚集到铁路问题上的民族主义的诉求，此时已切断了其他的途径。一旦美通洋行引入日本的合作者，那些本来关注维护中国独立的人就对运河修复工程感到厌恶。

① 如见 Chow Tse-t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ambridge, Mass., 1960), pp. 85~82. 出于谨慎的缘故，山东本身没有对反日情绪和活动作概括性的叙述，但无数的资料证明山东社会中每个团体都存在着强烈的反日情绪。

② Department of State, reel 216, document 450, p. 457; document 472, pp. 671~672.

③ *China Yearbook*, 1923, p. 547.

④ John Ripley Freeman, *Grand Canal Investigation* (康乃尔大学收藏本), p. 67.

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黄运治水活动的前景只能是越来越糟。以后的4年里，在黄运发生了无数的军阀战争。一步步入主山东的张宗昌与鲁西地区没有任何联系。他本人来自该省极其偏东的地区，而他最初的权力基础是其家乡县份那些在东北充当煤矿警卫的人；在他整个的职业生涯中，他的身边都是来自那个地区的人。^① 鲁西精英在直奉战争中几乎全都支持失败的前直系（尽管潘复和张宗昌后来做了和解）。^② 事实上，张宗昌对鲁西地区是如此疑忌，以致他下令解散德州的军工厂并在济南附近重新组建，他在那里对控制这家工厂显得更有信心。^③

张宗昌的统治可能是我们所研究的这个阶段里山东最糟糕的时期；河南的形势要略好一些。主要建筑工程变得毫无希望。1925年黄河的泛滥是自1855年以来山东最严重的一次水灾。下一次修复黄运水利设施的正式尝试要等到北伐战争以后了。

国家的分裂与水利治理：军阀时代

当20世纪20年代的治水甚至更受忽视时，国家分裂所造成的阻碍作用并不像人们怀疑的那样大。省政府的对内政策比省与省之间的冲突影响更大，除非军费能以别的方式投入到河

① 李恒珍等：《我们所知道的张宗昌》，《文史资料选辑》（济南版）第3辑（1982年），第1~2、17、36~37、39页。

② 李恒珍等：《我们所知道的张宗昌》，《文史资料选辑》（济南版）第3辑（1982年），第46~47页；*North China Herald*, Nov. 14, 1925, p. 277（注意，靳运鹏的兄弟是吴佩孚的一名高级副手）；关于后来潘复与张宗昌合作的情况，见 *North China Herald*, July 2, 1927, p. 4。

③ 陈瑞林：《德州“北洋机器制造局”与陆军部德县兵工厂始末》，《德州史志通讯》第2辑（1986年），第29~30页。

务工程上。基层的问题最为重要；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些问题从清末一直延伸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20世纪20年代做了一些后来用作证明治水价值的调查。^① 20年代中期，主要在红十字会的监督下，作为救济工程修筑的许多条道路被设计用来改进鲁西地区未来的运河和河务工程。^② 1925~1926年，在濮县大堤上，一些新技术得到了成功的检验，尽管这些技术那时还不能被更广泛地使用。^③

中国大陆关于黄河治理的标准史书强调民国时期各省之间缺乏合作。^④ 省际的敌对状态确实实妨害了治水事务。只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河南、河北和山东才搞出一份黄河下游的联合维修方案。^⑤ 然而，与更具地方性的政治失灵相比，这个问题就太微不足道了。

大运河最严重的问题几乎全都集中在山东一个省。像江苏等其他省份不可能修起最好的运河工程，但它们却确实让整个河段保持畅通；美通洋行对山东运河的规划被设计成与江苏段的各种方法保持一致。^⑥ 另外，迟至1906年，山东巡

① Greer, *Water Management*, 第40~42页叙述了这些年里中国人所受到的西方水利技术的训练（尽管20世纪30年代获得了更大的收获）；关于黄河调查事宜，见沈怡《黄河问题讨论集》。

② John Ripley Freeman, *Grand Canal Investigation*（康乃尔大学收藏本），p. 53；关于后来救济机构在山东所修筑的道路，见 *China Yearbook*, 1928, 第328页。

③ 见林茂泉《文集》第1卷，第6上~16下、184上~187上页的记载；关于这种有限工作的实验性价值，见《山东河务特刊》第2号（1930年1月），“专件”第13~15页。

④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编《黄河水利史述要》，第366页。

⑤ 《山东河务特刊》第4号（1932年1月），“计划”第4页。

⑥ 《山东建设月刊》第1卷第3期（1931年3月），“公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编《黄河水利史述要》，第33、366~367页；Department of State, reel 214, document 221, pp. 332~333.

抚杨士骧认为，如果山东在几年内略微少承担一些北京、天津和东北驻军的物资供应，它可以自己维护好大运河；^① 他想从北京得到的是像 1920 年允许江苏暂时使用它为运河工程所征收的国税。在这个意义上，20 世纪 20 年代相对软弱的中央政府为它提供了一个机会。山东可以很容易地截留足够的资金来创造一个不同的结果；所欠缺的是解决治水问题的决心。^②

另外，治水方面数量惊人的合作在继续进行着。20 世纪 30 年代，山东一如既往地拿出资金和劳力来帮助河南段的黄河工程，正如它在 18 世纪派出劳力来帮助修复河南段的黄河一样。江苏和安徽为使它们受益的山东河务工程进行捐助。江苏为山东濮县几条关键大堤的维修捐助了 20 万元，1925 年的洪灾之后，那时山东全省每年在常规的黄河工程上的支出仅为 52 万元。^③ 1915 年，山东 11 个河营为直隶的一项主要的洪水控制工程奋战过。^④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河北大名县说服了河南河务局迫使滑县对长期被忽视的大堤进行了一些维修。这些压力甚至是在军阀割据的鼎盛时期施加的，而即便是大名——处于下游更远的地方——也不能真正地直接威胁到滑县。^⑤ 反过来，滑县设法从山东那些受这项工程惠

① 见光绪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杨士骧的奏折，见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三十二年，第 37~38 箱；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第 10 卷，第 3806~3809 页。

② John Ripley Freeman, Grand Canal Investigation (康乃尔大学收藏本), pp. 17~18。

③ 《山东河务特刊》第 3 号（1931 年 1 月），“公牍”第 51、97、98 页；《山东河务特刊》第 4 号（1932 年 1 月），“公牍”第 7 页；《山东河务特刊》第 1 号（1928 年 10 月），“公牍”第 21 页。

④ 徐世光：《濮阳河上记》，“丁”第 15 上~15 下页。

⑤ 《重修滑县志》（1930 年）卷 11，第 31 下~32 下页。

及的县份得到了部分的补偿。^① 1910 年山东和河南同意制止所有妨害卫河大局的地方工程，而双方均把这项协议坚持了 20 多年；1931 年罕见的暴雨使得边界上的两边均建起了非法的私堤，但这项协议在 1932 年又重新生效。^② 与山东当局在清除仅影响本省的私堤时通常所取得的成绩相比，这项成就要大得多。

当然，省际的合作是有限的。邻省可能会为一项具体的维修工程进行捐助，但长期的工程就不能指望有稳定的资助或使用遥远省份的税收来为贷款提供担保。但正如上文所说的那样，在清末最后 20 年里，山东和河南两省的重要水利维修工程均没有获得外部的资金。国民政府和其他省份拿出了大笔资金用于水利维修和水灾过后的救济，但对水灾发生的源头却没有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尽管如此，山东本省的政府在鲁西地区的一些大水灾过去之后，甚至做得更少，充其量仅是提供一些救济资金。^③

最严重的合作失败是在同一省份中的县际和县内的合作。

① 《山东河务特刊》第 8 号（1936 年 1 月），“命令”第 16 页。

② 侯仁之编《序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第 146 页。

③ 在利津的事例中，山东省政府忽略了频繁的水灾警告，但却确实在水灾过后既提供了维修方面的资助、也提供了救济。在 1925、1933 和 1935 年集中于鲁西地区的水灾中，省政府在灾后提供了大量的救济（1925 年较少，1933 和 1935 年较多），但对维修方面仅提供了极为有限的资助。关于利津的情况，见 Asia Development Co., *Repairing the Yellow River Break-Kung Chia Ko, Shantung* (1923)；关于鲁西的决堤情况，见山东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山东黄河水灾和水灾救济报告书》（济南，1935 和 1936 年）；林茂泉《文集》第 1 卷，第 6 上～16 下页；关于救灾的一般情形，见满铁《山东地方の黄河水灾状况》，第 4、25～26 页；关于被忽略了的警告，可见 Department of State, reel 215, document 412, p. 167; document 419, pp. 188～190; *North China Herald*, Aug. 16, 1924, p. 248。

一条地方边界两边的两个县之间的问题可能会危及政治的稳定；省河务当局被牵扯进去，而所需的资源通常与省里的能力小有关系。然而，当同一省内的两个县发生冲突时，有争议的那些工程却通常与这两县当地的总资源大有关系，因而只有当每个县政府在本县内为河务工程制定出有效的规划和征调措施的前提下，这些工程才能进行下去。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黄运地区大多数县政府并没有这样的控制能力；重要的决策制定、征税和劳力的征调，通常由立足于更底层的头面人物来承担。

官府、乡村头面人物与地方反抗

北伐军到达北京之后，华北变得相对稳定了；各省的新政权并没有完全听命于新的中央政府，但它们至少不再相互开战了。治理黄运河道的活动又重新开始，而向有民堤的地区委派河务委员的不得民心的体制也寿终正寝了。^①

尽管如此，山东省政府创建新体制的尝试却受挫于乡村头面人物和衙役们对土地开垦和私堤修筑的控制。这种控制和乡村对官府介入的普遍反对阻碍了整理大规模河务工程的尝试。由于省和中央政府均坚持要直接的受益者来资助黄运的治水事务——就像它们自 1891 年改革以后所做的那样——这种反对给资金方面造成了损害。

① 我们尚不完全清楚河务委员是在何时及如何被废除的。尽管如此，他们在 1923 和 1925 年的报告中曾出现过，后来就再也没有提到；正如我们在下文将要见到的那样，1928 年以后的山东黄河体制有赖于村长和“堤长”。林茂泉《文集》第 1 卷，第 6 上～16 下、184 上～187 上页中说，1925 年的洪灾是如此的严重，以致当地一方的士绅与处于另一方的他和潘复直接越过中间人进行交涉，但没有其他资料来证实这一说法。

尽管乡村与国家之间的对立在河务委员寿终正寝后变得更加直接，但它们是清朝和民国初年冲突的延伸。不难想象，这些冲突在黄运南部地区同样最为常见，在那里，私自开垦土地的机会最大，乡村精英们最有能力来抗拒国家，缺失协同治水的危险性最大。

在村庄头面人物、衙役及地权所有者本人的纵容下，大部分土地开垦活动在私下里继续进行，而这通常有违县里的官员们和政府的意愿。^①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事例：乡村头面人物和衙役为保护小工程而危害更大的规划。济宁的政府机关为向已垦的湖田征税以资助治水工程，与衙役们斗争了 20 多年而没有成功。^② 并且，与黄运北部地区农业发展的事例相反，县及县级以上层面的政府从未在土地开垦和治水事务方面培养出一系列可靠的本地代理人。

对不纳税土地进行征税以资助治水事务的最有力的举措，并不涉及被开垦的土地，而是针对与治水工程密切相关的土地。1902 年，当周馥想保留某些土地税用于水利维修时，他被告知可以用别的方法来代替，即把屯田（对那些为大运河工作的人授予的免税土地）变成通常的纳税田地，从这些土地上无论征得多少税收都归他使用。^③

许多省拥有屯田，但山东的屯田最多：在西部 30 个县中有屯田 170 万多亩。随着漕运的结束，清廷计划把这些土地变成普通的土地，向其耕种者们征收“地价”作为免除其当差义

① 山东南运河疏浚事宜筹办处：《第一届报告》“附录”，第 9 页；《济宁县志》卷 4，第 47 上～51 下页；《东方杂志》第 1 卷第 10 期（光绪三十年十月二十五日），第 173 页；《山东公报》第 1 卷第 34 号（1912 年 7 月 7 日），“文牍”第 1 页。

② 《山东建设月刊》第 1 卷第 3 期（1931 年 3 月），“命令”第 10～11 页。

③ 沈云龙编《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第 163、211 页。

务的交换并清除对这些土地进行典押、出售和征税的障碍。开始时，他们计划每亩征收5两银子；仅山东就可一次性地获得一笔850万两（1190万元）的意外之财，这笔钱几乎相当于该省其他方面的总收入。^① 我们尚不清楚省政府在把这种土地放到税簿上之后每年准备得到多少收入。不过，即便是实际征收了极低的税率（可能是每亩2钱）并由北京和济南予以平分的话，这些土地也本应能够完成其以前的使命——承担大运河维修的常规费用。

然而，我们知道，从开始时就不可能收得近850万两的银子。大多数土地非常贫瘠，所以每亩5两的价格应该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另外，尽管这种土地在理论上不能改变，但许多已被典押或被卖过了好几手；许多耕种的人并不知道任何不同寻常的义务。让他们来“购买”这种土地，既会造成其开支紧张、也会激化矛盾。到1902年底，官员们悲观的报告和农村的陈情使得清政府定出了新价码：上上田为每亩3000制钱（2~3两），中田每亩1000制钱，而大部分沙碱地则毋须付钱。^② 把这个价格变成铜钱，消除了一条恐被衙役们用来鱼肉百姓和造成动荡的途径——操纵银铜比价。^③ 周馥还计划允许购田者分3年付清款项。^④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税款也被证明是无法征收的。许许多多握有旧凭证和遗失了凭证以及不知道其土地特殊性质的人，引发了一种注定要导致欺诈、勒索和骚乱的局面。^⑤ 征收开始

① 沈云龙编《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第155、156页。

② 沈云龙编《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第156页。

③ 《济宁直隶州续志》第4卷，第14上页；也见 *North China Herald*, March 18, 1904, p. 575.

④ 沈云龙编《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第156页。

⑤ 《济宁直隶州续志》第4卷，第14下页。

后近 10 个月，有关的 30 个县中，竟然只有 4 个县征收了半数的款项。许多县分文未获。在黄运南部的巨野县，屯长（屯田地区的村长）们领头进行抗议示威；在北部的聊城，数百名屯民在县城举行抗议示威，并在被军队用枪驱散前，攻击、殴伤了一名衙役。^①聊城县令被革职；但当他的继任者试图征收这笔税时，5000 多名百姓涌入到县衙中，砸坏了物品，并殴打了“一名倒霉的班头”，只是在他答应不再征收这些税时，他们才离去。据报告，在其他几个县也出现了骚乱，并伴有一些让步。^②

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发生在济宁及靠近济宁的更偏南的地区。当“出售”屯田的方案在 1902 年公布后，济宁的屯民是第一批请愿反对的人；一些屯长和至少 1 名本地的地保还凑钱来打官司。^③然而，知州姚联奎仍然决定征收这笔款项，可能是为了国库，也可能是为他自己。^④

姚联奎的首次尝试未能收到钱。1904 年 1 月，他做了再次尝试，他说服了一位典当商李某为某些屯田付了款，然后以此作为成例。1904 年元宵节，济宁各地的屯长会集到该市城门附近的一座寺庙中商讨对策。其后，他们中有 32 人来到城里再次向知州请愿并与李某“谈话”。不久，有 1 人被捕。由于消息在街上观灯的人海中传播开来，人们越发愤怒；有些人冲入了县衙，放出了那名被关押的人，并欢呼雀跃般地焚烧了县令的一些私人财产。粮库和其他官方建筑没有遭破坏，而当大火烧起来后，人群散去了。与以前一样，州官感到威胁极

① 沈云龙编《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第 227～228 页。

② *North China Herald*, Nov. 27, 1903, p. 1120; 加藤直子《辛亥革命の山東省における民衆運動》，《史论》第 34 集（1981 年），第 47～49 页。

③ 《济宁直隶州续志》第 4 卷，第 14 上页。

④ 《屯民抗缴地价的斗争》，《济宁市史料》第 2 辑（1983 年），第 73 页。

大，要求动用军队。^①

在郛城、嘉祥、濮州、范县、汶上、寿张和东平很快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在郛城，县令召集屯长们商讨地价事宜，并称仅有一名叫任清合*的人反对此事。任清合很快被逮捕，但2000多名群众包围了县衙，并使他获得了释放。^②回到济宁后，土匪组织利用这种局面来招收百姓加入他们的活动。^③

一名忧心忡忡的巡抚向有关地区派出了两支军队，并命令臬司进行控制。但是，军队的到来并没有让人们驯服。在济宁，一些土匪逃之夭夭并恢复了太平景象；然而，屯民们仍然拒绝纳款。^④在郛城，军队受到了攻击。由于不愿冒在军队和济宁的百姓之间酿成一场严重冲突的危险，臬司与济宁的一班绅商们商量，并让其中的一人在另一场与屯长们的对话中充当调停者。^⑤

最后达成了一项协议，在这个协议里，人们按照周馥制订的兑换率的半价、并按朝廷当初所定价格的1/5~1/12来为其土地交纳铜币。付款的期限延长为7年。^⑥即使这样的地价也从未交纳；山东屯田的收入不到当初所定目标的1%，而仅有一小部分土地曾被放到纳税簿上。^⑦

除了周馥黄河规划的受挫外，这次事件的几个方面很值得

① 《屯民抗缴地价的斗争》，《济宁市史料》第2辑（1983年），第73~74页；《济宁直隶州续志》第4卷，第14上页。

* 档案中也写作“任清和”。——译者注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北京，1985年）上册，第150、153页。

③ 《济宁直隶州续志》第9卷，第14上页。

④ 《济宁直隶州续志》第4卷第14下页，第4卷第15上页。

⑤ 《屯民抗缴地价的斗争》，《济宁市史料》第2辑（1983年），第74~78页。

⑥ 《济宁直隶州续志》第4卷，第15下、16上页。

⑦ 《山东全省财政说明书》第2编，第10页；Duara, “Power in Rural Society,” p. 344。

注意。首先，这次事件是预料之中的。监察御史、其他官员、请愿者和常驻的外国人全都预见到，向屯田征款的举措将会引发暴力冲突，而不会带来收入。即使是这项计划的主要支持者也承认，除非衙役们受到了认真的控制，否则，他们将激起人们的抵制。《北华捷报》驻济宁和鲁西北的记者报道说，那些不得不征收这种不得人心的地价的人，把它称为“洋人税”，并说它是为庚子赔款而征收的，想以此置身于事外。周馥也报告说，人们认为这笔钱将用于赔款。如果确实是役吏们——在不久前义和团起义的核心地区，而当时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军队都在外地——散布了这个谣言，这将有力地证实了许多言官们的看法，即政府没有它可以信赖的代理人来承担像征收这些地价的棘手任务。^①

说得更广泛些，这件事暴露了政府在农村地区非常突出的弱点。不仅仅是其举措的彻底失败让人震惊，而且政府做这件事的方法说明了其势力范围的都市性质。在第一次遭到抗拒之后，济宁知州转向一位有着城市背景的典当商来设置一个缴款的先例；在他本应很容易地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却不能启迪乡村民众来服从他。当臬台想让步时，他与济宁市的“士绅和巨商们”见面，并推选陈守和作为主要的谈判者。^②自1875年以来，陈守和一直是玉堂酱园的经理，这家酱园是济宁最古

① 《济宁直隶州续志》第4卷，第13下～14上页；沈云龙编《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第155～156页；*North China Herald*, Jan. 27, 1903, p. 160; *North China Herald*, Feb. 11, 1903, pp.236, 267; *North China Herald*, Feb. 25, 1903, p. 372; *North China Herald*, Nov. 27, 1903, p. 1120; *North China Herald*, Sept. 30, 1904, p. 74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第150～152页。

② 《屯民抗缴地价的斗争》，《济宁市史料》第2辑（1983年），第74页。

老和最大的生产企业，为包括最近出了一名制台的一个家族所有。陈的部分任务是吸引士绅家庭、他们家族的捐款和公共慈善机构的投资；他在济宁退职的官员们中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尽管如此，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在农村地区有着巨大的影响；甚至无法看出这家酱园拥有大量的土地，尽管它对钱铺、盐号和济宁面粉厂做了多种投资。^① 当济宁州府和士绅们的这些代表与屯长们坐到一起时，他们的会面越过了城乡的分隔。

另一方面，抗议者们在乡村拥有基于村长领导的、强大的关系网络。济宁屯长们的集体行动——组织打官司、制定抗议策略及作为一个群体与济宁和郛城的官员们对话——说明他们并不仅仅是执行来自其村庄以上的命令的个体。^② 他们还与不正规的网络有着许多关系；事实上，正如鲁西南（但不是鲁西北）地区义和团中的那种情况一样，秘密社会的领袖和“正规”的村长常常是同一个人。在当地领导反对征款的郛城屯长任清合，是许多曾经加入大刀会（西南地区的“义和团”）的成员之一。^③ 政府对这件事的事后报告中说，任清合以抵制征款为“托辞”，向 24 个村庄凑钱，并能够按每户土地的数量征集兵丁和武器。^④ 这种按村征收金钱、人力和武器的做法，说

① 海山：《玉堂春秋》（一），《济宁市史料》第 1 辑（1983 年），第 55～56 页；《玉堂春秋》（二），《济宁市史料》第 2 辑（1983 年），第 99～102 页。

② 见《济宁直隶州续志》，第 14 上～15 上页（原文如此，未标明卷数。——译者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第 153～154、156 页。

③ Esherick, *Boxer Uprising*, pp.104, 107～108, 126, 153; 加藤直子《辛亥革命の山東省における民衆運動》，《史论》第 34 集（1981 年），第 48～49 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第 154 页。

明这样的—个组织在许多方面要优于政府和都市精英在农村所控制的网络。

当然，政府和县城中的精英们并非孤立无援；他们拥有许许多多从农村人口那里获利的途径。他们获取农村的产品用于消费或转卖、征收常规的税收、放款或操纵货币兑换以牟利，等等。实际上，正如我们在研究信贷问题时所述的那样，黄运南部地区的都市精英们以在某些部门产生特别巨大的利润的手段，控制着商品和货币的流通。另外，尽管济宁在与周边各县的往来中出现了巨大的贸易逆差，但济宁的居民中确实没有发生出卖农村产业的现象；这种资料也说明，黄运南部地区的主要城市从乡村所获得的实际资源，比它返还给农村的实际资源要多得多，而没有对逆差进行弥补。

一般说来，济宁和黄运南部县城中的都市精英们通过与此时代使他们遭受挫折的那个群体——衙役和村长们——合作来获得这些利益。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当那些群体转向反对或打败他们时，都市精英们至少可以与能够结束这种冲突的人进行对话。在更靠北边的聊城，其县令通过向—群闯进其县衙的人做出承诺而承认了失败；时人的叙述没有提及领导人物。事实上，考虑到黄运北部地区都市和乡村精英们—方的一般弱点，很难设想有谁能像济宁的那些人那样来进行意义重大的谈判。

还有，这次事件让人明白了济宁的都市和乡村精英之间的关系不会维系危及乡村和县级以下权力所有者的重大活动（像土地清查或美棉的种植）。就我们所知，潘家基本上没有把其资财投入到农村的土地上。济宁史志没有提到其他家族拥有用于教育、赡养老人和用于家族成员其他需要的土地，但几个类似的家族却确实参与了玉堂酱园的投资。—方面，（玉堂）孙家确实有—点土地，尽管我们尚不清楚位于何处；这个家族在浙江也有投资，而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们尽可能多地把

资金从济宁转移到了上海的安全之地。另一方面，由于济宁的官商长期以来一直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因而似乎没有什么都市的资财被投入到了周边的农村中。^①

当官员们违反其更理性的判断，试图来做他们在农村的影响以外的事情——即采取反对乡村精英利益的行动——时，屯田跟着就失败了。大多数情况下，在暴力事件发生前，政府和都市精英们就退让了。尽管如此，他们继续不断地做出尝试，如上文提到的士绅出资的土地开垦公司及济宁州府试图向耕种公共“湖地”的人征税。^② 都市精英在治水、垦地和土地登记中的出击无一例外地失败了。

到 20 世纪 30 年代，在一个已经兴起的中央政府支持下的山东河务局和建设厅，规划了许多河务工程。尽管如此，这些规划却要依靠被推选出来的或是权势极大的村长和当地头面人物。建设厅最终完成了一项巨大的疏浚和造堤工程，这项工程涉及万福河、洙水河和许多为大运河及有关湖泊提供水源的较小河流。但它的第二项重要的河务工程——修复大运河本身——却从未获得进展，而河务局更好的治黄规划却踪影全无。有时县以下豪强们的暴力反抗是许多失败的原因。这种反抗使工程受到的挫折经常远远超出了其所在的地区。有的情况下，寿张县 10 名不予合作的里长就阻止了山东境内黄河上部 5 个县河段的大堤维修。^③

① 海山：《玉堂春秋》（一），《济宁市史料》第 1 辑（1983 年），第 64～65 页，《玉堂春秋》（二），《济宁市史料》第 2 辑（1983 年），第 101～102 页；亦见 Jing Su and Luo Lun, *Landlord and Labor*, pp.27, 109～110；北京大學附設農村經濟研究所：《山東省濟寧縣城を中心よせる農産物流通に關する一考察》，各处。

② 《山东建设月刊》第 1 卷第 4 期（1931 年 4 月），“命令”第 10～11 页。

③ 《山东河务特刊》第 3 号（1931 年 1 月），“公牒”第 21～24 页。

一个老大难的问题是民堤和省里所征调的民伕，全成了落在最靠近这条河的那些百姓身上的负担；除非大洪灾就要来临，否则，那些在3英里以外的村庄很少伸出援手。^① 这种负担的不均衡有时会酿成严重的延误。在德县，马颊河和大运河工程的全部负担均落在了一个区中，这使得在一个季度同时完成两项河工成为不可能的事；这个问题通常意味着要留下一个半拉子工程来面对秋季的洪水。^② 把负担集中到一群特别少的人身上，有时会酿成人们对工程的抗拒；但向全县征调民伕的尝试却并不多见，并通常以失败告终。^③ 河务局和县官们均承认那些最靠近这条河的人常常负税过重，并认为水患治理的其他受益者也必须进行捐助；但却没有人来让他们这样做。当东阿大堤上的一名捻长抱怨尚需为所要的石头支付现金时，河务局惟一的建议是要他向黄河沿岸的百姓征收另外的民伕来装运石头。^④ 由于动用民伕比用钱要牵扯更多的相关事宜（居住、吃饭，等等），这些支出又落在了当地头面人物调配的民伕身上，进一步加剧了河边社区来单独承担治水费用的趋向。^⑤ 而如果头面人物们认为没有理由来为一项工程动员百姓的话，那

① 《山东杂志》第59期（宣统二年五月十日），第8下页。

② 《山东建设公报》第267号（1935年11月24日），“公牒”第5～6页；《山东建设公报》第270号（1935年12月15日），“命令”第24页；《山东建设公报》第283期（1936年3月15日），“命令”第39页。

③ 《山东建设月刊》第2卷第3期（1932年3月），“公牒”第1页。

④ 《山东河务特刊》第1号（1928年10月），“命令”第10、30～31页。必须要加以指出的是，这种用劳务来取代资金的特殊方法，在东阿是可行的，这里离官营的采石场不远，并且本身也出产石头；但对黄运的大部分地区则不适用。

⑤ 关于村长对劳役分配的控制，见 Duara, “Power in Rural Society,” 第159页；山东省建设厅：《浚治万福洙水河志》，第40、48页。

么，不论是河务局、还是更加咄咄逼人的建设厅均无法强迫他们这样做。^①

省里的机关也难以阻止当地的管理者们挑动对征用民伕的抵抗。例如，1934年由于县政府盗用了省里用来支付工酬的资金并用征调民伕来替代，在鲁西北和冀西南维修马颊河的两群不同的人中发生了罢工。^② 较为突出的是，黄运北部地区的一次罢工是在外人（共产党）的协助下组织起来的，且没有一次是由乡村精英组织的。这两次罢工最后均被军队所镇压；尽管他们与当地掌权者的分裂可能使这些抗议在社会意义方面比黄运南部地区的抗议更激进，但这两次罢工均没有留下任何持久的让步或制度化了的遗产。^③ 与之相比，我所见到的惟一一例发生黄运南部地区民伕对盗用治河款项——发生在1911年——的抗议是由乡村头面人物领导的，且并没有要求进行结构性的变革；但是，设在北京的济宁绅商的一个民间同乡会被说服来补上了所亏空的资金。在18世纪黄运南部地区对征调伕役的抵抗中，乡村头面人物也似乎起着关键的作用。^④

尽管如此，某些冲突甚至比那些涉及民伕罢工的事件更

① 《山东建设公报》第280号（1936年2月23日），“公牒”第10页。

② 《杜步舟同志忆中共津南特委的几件大事》，《德州史志通讯》第1辑（1984年），第17~18页。

③ 《杜步舟同志忆中共津南特委的几件大事》，《德州史志通讯》第1辑（1984年），第18页。

④ 《山东杂志》第92号（未署日期，可能是宣统三年六月十五日），第40下~41上页（文中没有明说哪一个同乡会被要求拿出这笔钱；看上去像济宁的一个同乡会，但很可能是山东旅京同乡会，《山东杂志》即由他们出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北京，1979年），第335~337页。

难处理；当村民们反对让所有人来承担某些工程时，这些冲突就发生了。这些事件主要发生在黄运南部地区，并牵涉到3个密切相关的现象：非法的土地开垦、未经登记的土地和为了把水滨地区土地上的洪水挡住而修建的私堤。具体说来，由于濮县、阳谷、菏泽、寿张、范县、鄆城和鄄城县境内修筑私堤之风猖獗，以至于山东境内黄河上段的治理工作举步维艰。这些私堤保护着外堤内侧已垦的——往往是非法的——大量土地；这种土地仅在范县就有100多万亩。这些私堤妨碍了黄河全局性的治理，但那些修筑私堤的人却不想就此让步。^①

河务局三番五次地命令拆掉私堤，但命令的执行却有赖于村长们，而该局也认识到这些村长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无视这些命令。^② 19世纪90年代，李鸿章、周馥和其他人曾建议补钱给私自垦种者。^③ 但这种方法却从未实行过，部分原因是由于屯田的资金——从其他占有与治水相关的合法公共土地的人那里征收的款项——无法征收。1933年，该省河务局告诉省主席韩复榘说，必须用新的办法清理这种大堤，这是因为依靠村长们的途径彻底失败了。^④ 与此前一样，这一次又不了了之。

对待私堤问题，就像对待工程的停顿一样，建设厅比河务局干预得更多。但是，这通常仅是在使用土地的冲突已造成了工程停顿了好几年以后它才会插手；政府也仅是在发生了严重的洪灾或发生了针对建设厅的工程上的工作人员的暴力事件时

① 《山东河务特刊》第6号（1934年1月），“公牍”第25～26、39页；《山东河务特刊》第4号（1932年1月），“公牍”第29～30页。

② 《山东河务特刊》第6号（1934年1月），“公牍”第39～40页。

③ 沈云龙编《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第216～217页。

④ 《山东河务特刊》第6号（1934年1月），“公牍”第39～40页。

才会动用武力。^①

在好几种情况下，不是一名村长、就是政府所说的某位“土豪”召集许多人来阻挠工程。许多有案可稽的事件涉及了建设厅的万福河工程，对此我们将作一简要的考察。另一件富有启发性的事件发生在茌平，这是一个正好位于鲁西北黄河以北地区的一个遍布泥泞的县份。

在茌平，私堤很久以来就使一块 1500 亩的地区保持非常潮湿的状况；部分土地被垦种了，而部分土地则被人们用于制作砖瓦。1932 年，建设厅规划湄河附近地区治理工程的调查人员遭到了攻击。尽管如此，1933 年，建设厅公布了一项可能损害窑主们生计的方案，并且还提到了这项工程主要的反对者杜明哲“对土地和水源的霸占”。县政府派出了工作人员，暗示他们对当地的征地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些人员被当地妇女们“造成的一场吵闹”所阻止，而后来又受到了 5 名武装男子的攻击，这 5 人都姓杜。那一年年底，这个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洪灾。次年春，县里派出了更多的工作人员，这一次还伴有县里的军队；他们再一次被受到杜的“谎言”所蛊惑的妇孺们所阻止。在双方僵持时，更多的军队被调了进来，这一次是来自外县，并与附近乡长们进行了对话。只是在这种情况下，规划者们才对作为杜的社区基础的窑主们有所了解，尽管建设厅事后的报告中说这个乡有半数家庭制作砖瓦。最后，军队强迫杜和其他人逃走，县政府和建设厅拟定了一份被认为是保护窑主利益及承诺改进河流治理的新方案。这份报告最后赘了一句

① 《山东建设月刊》第 2 卷第 8 期（1932 年 8 月），“公牍”第 5～6 页，“命令”第 22、24～25 页；《山东建设月刊》第 2 卷第 6 期（1932 年 6 月），“公牍”第 3 页；《山东建设公报》第 3 卷第 6 期（1933 年 6 月），“公牍”第 5～8 页；《山东建设公报》第 3 卷第 8 期（1932 年 8 月），“公牍”第 10 页，“命令”第 6 页。

多余的评论，说在 1932 年以前，湄河由当地人管理，在 600 多年时间里并没有发生严重的冲突。^①

这里最让人吃惊的地方是政府对当地社会的忽视；县政府和建设厅似乎直到那里发生了暴力事件、工程延期和并非必然的洪灾后，才与当地的一些人物进行了磋商。另外，补偿那些“阻挠”者的意见似乎没有得到讨论；很可能是人们了解到并没有可供使用的资金。尽管抗议者们用各种方法来说明那是一个固定的社区，但当局却花了两年的时间来寻找他们反对这个方案的原因；取而代之的是，官员们无一例外地强调对付一些男性“暴民”，他们被认为胁迫或欺骗了其他人。还值得注意的是，黄运北部地区这一小块土地，在经济地理和社会结构上与黄运南部地区很相似（到处是水、私堤、未经登记的土地和强大的乡村“头面人物”），与国家冲突的方法也很相似。但在这里，国家转向了构成正规政府指挥链条中的一环的乡长们，把他们与当地的社会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乡村精英们进行对话，这些乡村精英们在更靠南部的地区中充当着解决争议的关键伙伴。

不论用何种方法，建设厅和河务局都往往无法解决当地头面人物对其规划的反对。由此导致的僵局使得河务工程半途而废，却让一些社区来承受巨大的负担。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濮县和范县黄河上段沿河社区的请愿书中说，居民们宁要官堤和承担河役而不要现存的民堤混合体制及六县共同资金（下文将述及）；他们认为那种索取绝不可能更糟，而不断强化的威压至少可以把工程做完。^②

① 《山东建设公报》第 269 号（1935 年 12 月 8 日），“命令”第 21～24 页。从文中尚看不出来 1934 年是否发生了大水灾，也不清楚后来 1935 年另一个洪水季节过后是否什么都没有完成。

② 《山东河务特刊》第 4 号（1932 年 1 月），“命令”第 9～10 页。

另外，当地人对河务工程的控制恶化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广为人知的问题——税收的流失导致了那些仍在纳税的人承担更重的负担，这又进一步造成了税收的流失。在这种循环的开始，纳税的土地越少，就能更快地逃脱控制；由于“民修”的体制在大多数黄运水道沿岸生了效，只有那些非常接近这些河流的土地才被征税，势态很快变得绝望。

北伐战争之后，河务局在山东黄河上段地区存在的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在20世纪20年代的大洪水之后，河务局决定与当地的、往往是偶然的民堤维护进行合作。尽管如此，恢复这些大堤的官堤地位开支太大，以至从行政角度无法执行。取而代之的是，成立了一个由来自5个（后为6个）黄河上段县份的官员们（各县县长、各县河务工程机构的领导和3名河务局的监督者）组成的委员会。^①其间，对民堤工程现场的控制已从候补官员手中转交给了村级人物，他们通常被称为“里长”。他们有时被邀请来与这个委员会交换意见，但并不是该委员会的成员。^②

除了讨论民堤工程的协作途径外，这个委员会还认为必须向这项工程所惠及的那些地区征收一项受到严格限制的土地附加税。这笔资金将主要用于这些县中的黄河河务工程及帮助当地人减轻过重的维护河堤的负担。与此相联系，设置了一个所有大堤的领导者为了其具体大堤的工程而可以征收的数量范围。^③

① 《山东河务特刊》第3号（1931年9月），“公牍”第21~24页。

② 《山东河务特刊》第1号（1928年10月），“公牍”第18页；《山东河务特刊》第3号（1931年9月），“公牍”第16、22~23页；《山东河务特刊》第6号（1934年1月），“公牍”第2页。

③ 《山东河务特刊》第3号（1931年9月），“公牍”第21页；《山东河务特刊》第6号（1934年1月），“公牍”第2~3页；《山东河务特刊》第1号（1928年10月），“法规”第5~8页；《山东河务特刊》第6号（1934年1月），“公牍”第3页。

如果黄河像 1925 年那样泛滥的话，这些县里的土地被视为将受到这个委员会的工程所惠及；每个县摊到了一个基于其土地申报数量的配额。^① 即使在理论上，这种安排也没有把这些大堤的开支分摊给所有的受益者，他们中的许多人生活在其他县。尽管如此，如果此事执行下去的话，这本应为这项工程提供一个比民堤体制所具有的更加广泛的基础。

不过，这项计划却彻底失败了。尽管它为水灾治理费用设置了一个新的标准，但并未做新的调查；而由于纳税土地上的负担仍然很重，这仍然使人们有必要瞒报土地。没有任何激励机制来促使各县让其村庄做出准确的呈报；即使这样做也只不过是把该县的款项筹给了共同资金，而不是更公平地给这个县分配一项固定的款项，或改善该县的水灾治理。对于村庄及其领导者而言，他们本来就要承担同样的民堤义务而不管共同资金的命运如何，他们甚至更没有理由来进行合作。1925 年没有呈报的许多被淹土地，之所以没有呈报就是因为这些土地毋须政府批准其免税；由于没有登记，它们已经免税了。不少这样的土地还可能是最近才开垦的，往往再次被淹，因而很难查找。最后，得知其他县作弊的消息后，各县甚至更不会全力配合了。^②

结果，这个委员会——和河务局——几近无助状态。例如，河务局在寿张的一次核查中找出了本应向这项资金纳税的“被瞒报的”土地 97500 亩；而登记的土地仅有 20500 亩。鄆城最初申报的土地为 226000 亩，但其后又“找出了”123000 亩；鄆城的一份请愿书中说，邻县鄆城有 80 多万亩的土地本

① 《山东河务特刊》第 7 号（1935 年 1 月），“公牒”第 7 页。

② 《山东河务特刊》第 4 号（1932 年 1 月），“命令”第 10 页；《山东河务特刊》第 7 号（1935 年 1 月），“公牒”第 8 页。

应纳税，但税册上却仅有 228650 亩。^①

一些受挫的地方官员转而开始揭露其他县里的瞒报土地。但只有鄆城县被迫大大增加了所负担的款额。次年在一个垦区中，鄆城在其税簿上增加了 121748 亩土地（但据说那里有大约 60 万亩的土地被隐匿）；郛城增加了 7454 亩（尽管那里找出了 123000 亩）；寿张增加了 9783 亩（与河务局在那里找到的 9 万多亩的隐匿土地形成了鲜明对比）。至少在 3 个县里，未登记的土地仍然超过了已登记的土地。^②

尽管为大堤协同维护事务所征收的费用，仅在洪涝区中对所登记的土地每亩征收 0.2 元，但这意味着与每年向屯田所征收的费用负担是一样的沉重，向屯田征税曾导致了 1904 年的骚乱。像那种情形一样，许多相关的土地非常贫瘠，当然也容易被淹。^③

另外，共同资金征收的现金只不过是那些承认在洪涝区中拥有土地的人将要承受的负担的一小部分。促使河务局对 1929 年大堤的领导者所收资金设置限制的那些负担实际上可能非常沉重，这是因为这些大堤需要他们做出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④ 尽管如此，这些限制与五县共同资金本身一样不起作用。

一份东平的请愿书说出了治河的负担沉重到了什么地步。1931 年，县长的报告说东平沿大运河地区的每亩土地不得不负担河堤工程的 2.3 方材料，这种材料部分是石、部分是土。

① 《山东河务特刊》第 7 号（1935 年 1 月），“命令”第 23 页，“公牒”第 33~34、6 页。

② 《山东河务特刊》第 7 号（1935 年 1 月），“公牒”第 34~35、4、7 页。

③ 《山东河务特刊》第 6 号（1934 年 1 月），“公牒”第 3 页；《山东河务特刊》第 7 号（1935 年 1 月），“命令”第 21~22 页。

④ 《山东河务特刊》第 6 号（1934 年 1 月），“公牒”第 2~3 页。

然而，即便是那种最便宜的土方，每亩算下来也要负担 1.2 元，或是超出了该县基本的土地税 4 倍多；由于石方的价格在东平等于或大于土方价格的 10 倍，真正的负担肯定要重得多。^① 这项工程的最终费用超过了该县所有的土地税。^②

为了修筑民堤而进行的搜刮，其方法没有像诸如在东平官方经营的工程中的方法那样被记载下来。因而，我们使用不同的方法来估计那些盘剥：估算出民堤所需的秸秆的数量，假定它们真的被征走了，并按看似合理的最低市价给它们定价。这个结果是粗略的，但却令人吃惊：如果那些居住在这条河边 3 英里之内的百姓独自承担这项负担的话，这在任何地方都相当于其收入的 8%~20%；即便这些支出摊到了滨河县份的所有居民身上，这也相当于其收入的 4%~7%。^③

在两年的时间里，相关县份的百姓一直疾呼废弃共同资金制度。1931 年，濮县和范县有关地区民堤的负担高出基本土地税的好几倍，但水灾治理却没有得到改善。河务局承认所诉的准确性，即濮县有着一大批未经登记的土地，但并不准备增加其负担的款项，可能反映了他们意识到那些被征税的人可以不承担额外的税负。^④

① 《山东建设月刊》第 1 卷第 2 期（1931 年 2 月），“命令”第 2 页；《山东建设月刊》第 1 卷第 4 期（1931 年 4 月），“报告”第 20 页；《山东建设月刊》第 2 卷第 3 期（1931 年 3 月），“论著”第 18 页；《东平县志》（1936 年）卷 7，第 10 下页。基于与采石场的距离，实际价格可能为 6~7 元。

② 《山东建设月刊》第 1 卷第 4 期（1931 年 4 月），“报告”第 22 页。

③ 估计方法，见博士学位论文，“附录 G”，第 435~440 页。上述范围来自对民堤规模的各种估计。

④ 《山东河务特刊》第 3 号（1931 年 9 月），“公牒”第 15、74 页；《山东河务特刊》第 6 号（1934 年 1 月），“公牒”第 3、25~26 页；《山东河务特刊》第 7 号（1935 年 1 月），“命令”第 39 页，“公牒”第 7 页。

当人们发现其他县并未在治水工程中承担其职责时，他们往往会停止工作。黄河上段县份相应的指控造成了好几项工程的停工，并使好几项工程从头再来。^① 1929年，在鲁西南大运河支流万福河发生大水灾之后，建设厅下令每个县都要对其县内的河段承担责任。金乡县很快启动了治水工程，该县此前曾尝试布置过一项万福河工程。数月之后，邻县鱼台境内却没有启动任何工程；金乡县长的报告中说，那里的人民担心半拉子工程将无济于事，便停止了工作。结果，这项工程直到1933年才运作起来，尽管建设厅把它作为1931年规划运河工程的先决条件。^②

国民党时期大运河的治理活动显示了自清末以来，特别是在鲁西南地区，情况已经进一步恶化到了什么程度。国民政府1931年制定的规划预计比以前的要小得多，而国家承担的费用也少得多；鲁南段工程的预算资金仅为350万元，或者说不到1916年计划开支的半数。第一阶段将花费80万元，这笔钱全部是建设厅确信能够筹到的；但这笔支出很快减为60万元。这笔钱凑起来了；其中半数代表红十字会为工程民伕所捐献的救济小麦。像以前一样，这笔费用的大部分余款最初有赖于运河修建者们去挪借，并用从所垦土地上获得的收入来偿还。^③ 尽管如此，在大萧条期间，由于中国的一些外债几近无法偿

① 《山东河务特刊》第7号（1935年1月），“命令”第8页。

② 《山东建设月刊》第2卷第1期（1932年1月），“论著”第8、9页；亦见山东省建设厅《浚治万福洙水河志》，第2页。

③ 《山东建设月刊》第2卷第3期（1932年3月），“论著”第21页；《山东建设月刊》第2卷第4期（1932年4月），“报告”第67~68页（亦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1932年4月的报告，第9上页，机关代号2：案卷号117）；《山东建设月刊》第2卷第5期（1932年5月），“要闻”第4页。

还，所有的借款将不得不借自国内。并且，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并没有政府成功地得到了这种收入。

另一项方案建议卖掉近 30 万亩的公共荒地，这些土地是因为漕运的终结，由鲁西南的湖泊所形成的。尽管如此，建设厅并没有解释在没有其他人能够对这类土地征收地租或税收时它将如何筹集这笔钱。潘家继续劳而无功地在做这件事；其间，至少有 1 个相关的县宣布了动用所有为当地学校而不是为运河工程筹集资金的方案。^①

一项方案建议山东北运河次年支出 366 万元，但没有说明这笔钱来自何处。这个方案比 1916 年那些方案的雄心要小得多，但那些较早的方案的支出渐渐扩大了 3 倍，超过了 600 万元。^② 1933 年，建设厅修复运河的总费用（包括疏浚其支流的费用）达 1293889 元。它估计这将使价值 2376 万元的土地免于洪灾的侵害。^③ 然而，曾经有过的向这些土地征收款项的情景——相对于这些收入，借款显得太少了——非常惨淡。由于下决心至少要减少运河洪灾的危险，建设厅对运河的两条支流采取了一种更简单、更具强制性的手段——而这是建设厅在水利上所取得的惟一重大成就。

工程师与士兵

尽管万福河及其支流比黄河或运河的名气要小，但它们造成的问题几乎同样的严重。20 世纪 20 年代末，在雨量正常的

① 《山东建设月刊》第 1 卷第 3 期（1931 年 3 月），“公牍”第 39～40 页；

《山东建设月刊》第 1 卷第 4 期（1931 年 4 月），“公牍”第 8、10 页。

② 《山东建设月刊》第 2 卷第 4 期（1932 年 4 月），“论著”第 1～28 页；特别是第 2～3 页。

③ 《山东建设公报》第 3 卷第 8 期（1933 年 8 月），“计划”，第 11、15 页。

年景，它们淹没的土地达 300 多万亩。^① 其河岸的总长度为 947 里（557 公里），许多地方没有任何河堤；^② 而黄河和大运河在山东境内每条河岸的长度大约为 1700 里。万福河存在着严重的淤塞问题，而在被忽略了几十年之后，可以说它比那些名声更大的河道状态更差。20 世纪 30 年代，这些河流和它们所注入的湖泊的每年秋季防洪是山东最大的治水工程。建设厅所规划的维修工程需要 2600 多万方（达 40 多亿立方英尺）土料；^③ 临清至章邱之间的 210 里大运河河段所需的土料不到 150 万方。^④

这项工程还引发了社会性的难题。它需要鲁西南地区 9 个县人民的合作。其中的一个县菏泽是黄河治理方面的合作即将悲惨地失败的县之一；其他许多县份有着差堪相似的混乱名声。这个地区最近还让诸如美棉推广者这些外来的改革者们铩羽而归。当地关于这些河流的剧烈的争端已经持续了好几十年。

尽管如此，在某些方面，这项工程是非常简单明了的。几乎所有的工程都由运土组成，运送土料的开支占这项工程 690 万元预算中的 95%：^⑤ 首先把泥从河中疏浚出来，或开挖一条新的通道，然后用这些挖出的泥再加上其他地方的土来构筑新的河堤。基本上没有规划砖石工程。^⑥ 如果建设厅可以使用征来的民伕，并且或者让地方政府、或者让民伕们自己解决食宿问题，那么，它就可以基本上在其预算之外来完成这项工程。

① 山东省建设厅：《浚治万福洙水河志》，“前言”第 1 页。

② 山东省建设厅：《浚治万福洙水河志》，第 37 页。

③ 山东省建设厅：《浚治万福洙水河志》，“前言”第 3 页。

④ 山东运河疏浚事宜筹办处：《第一届报告》“附录”，第 12~13 页。

⑤ 山东省建设厅：《浚治万福洙水河志》，第 63 页。

⑥ 山东省建设厅：《浚治万福洙水河志》，第 64 页。

如果征调的民伕是从其他重要的活动中转移过来的，那么，这项工程的经济成本可能与那种使用更多的市场物资和熟练的有酬工人的工程的代价同样的高；然而，建设厅却从未意识到这些成本。

使用征调的民伕，并让民伕们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主意。把这些负担压在民伕们身上对那些离民伕们家庭很近的小工程来说是极为容易的；这就是中央政府喜欢搞民堤的主要原因。^① 万福河工程既有民堤的这些特征，又有较大的官方工程的主要优势。当这项工程的负担几乎全都压在了当地人的身上时，更高层面的政府提供了像山东境内的黄河上段非常缺乏的集中调度和高压手段。

建设厅的工程师们非常有效设置了河役的配额。这是因为由他们来决定每条河段的规格——所要疏浚的深度和宽度、大堤的高度和宽度。^② 每个县都成立了由县长、县建设局局长和建设厅派来的工程师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与县里的各区长协商，有权决定如何来征调民伕。有些县中，每村都被迫承担河役（通常每百亩土地征调 5~6 名日工），包括一些离河 80 里的村子；在有的县里，仅有一些区被工程所惠及。然而，建设厅却无视在黄河上段县份已经引发如此众多争端的公平负担问题。几乎没有县际的资金调配、更没有县际的民伕调度来解决负担不均问题。如，巨野县提供的民伕超过了这项工程所需民伕总量的 1/4，但该县仅有 1/7 的人口受其惠及，并且，该县受这条河的损害远比济宁和鱼台所受的损害要小。^③

工程一旦启动，由建设厅派到各县的工程师们对所有的问

① 山东省建设厅：《浚治万福洙水河志》，第 40、48 页。

② 《山东河务特刊》第 4 号（1932 年 1 月），“命令”第 10 页。

③ 山东省建设厅：《浚治万福洙水河志》，第 37~38、41~44 页。

题有着最终的发言权。县长是来协助这些工程师的，帮他来征调所需的河工并惩罚那些阻挠这项工程的人。在总工程师、县长和县建设局长这一层级之下，指挥链条经区长、乡长而延伸到了村长（庄长、首事，等）那里。村长们负责按分配给他们村的名额挑选工程所需的民伕，并确保民伕们带上自己的口粮和工具；如果需要的话，还要安排住处；并充当领工以确保他们村的工程被完成。乡长和区长负责监督更大的地区，并要向总工程师汇报；总工程师成了巡察员（像县长和县建设局长一样）和总管理员。^① 于是，这项工程与许多黄河工程的建设组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具有有一种规范的、轮廓清晰的管理层级，这个层级从村长至总工程师最终延伸到了省政府。

村长具有巨大的权力，这是因为他们可以决定由谁来服这项河役；^② 附在建设厅报告上的大量规定和程序丝毫没有提到投诉这些决定的途径。尽管如此，村长们的作用，与在通常的民堤维护、非法的私垦或在民国早期的大运河工程中的角色相比，受到了更多的限制，主要是因为他们查证土地所有权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另外，万福河工程没有给村长们提供分享权力的机会：他们仅是垂直指挥链条中的一环。

在靠近这个等级的更上部，被派到各县的工程师们可能初看之下很像以前的河务委员。尽管如此，他们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首先，作为工程师，他们是因其技术能力而被选中的。其次，他们负责指派监管者来执行主要在济南拟定的规划，而不能自行决定提供多大程度的以及如何提供洪灾防范。再次，由于这项工程除土料外几乎不牵涉其他材料，贪污腐败的机会是有限的。最后，他们有权使用军队来博取当地的合作，尽管

① 山东省建设厅：《浚治万福洙水河志》，第 62、41、39、40、42 页。

② 山东省建设厅：《浚治万福洙水河志》，第 41~42、121~122 页。

这仅作为最后的一招。^①

建设厅关于这项工程的报告着重强调：这项工程最棘手的部分是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而不是技术上的。^② 尽管如此，这份报告几乎没有关注决定土地所有权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对大运河和黄河工程的叙述中占据了如此多的空间。将要被新的河务工程所占用的土地的所有权，由来自建设厅的人与一名“有经验的”乡长共同决定；县里将对这项工程完成后受其惠及的土地设计和征收一种附加税，然后用征收来的这笔资金来补偿那些失去土地的人。建设厅还宣布，所有目前被这项工程占用的已耕土地，不论其是不是合法登记过的，都应该得到补偿。这项规定避免了那种申诉书淹没运河委员会济宁办事处的情形；而额外的土地费用由县里而不是由建设厅承担。由于建设厅不是为了这项工程而借款，它可以径自宣布征收和设置土地税是地方上的事，而不管这些事如何被解决，它们都不会延误真正的工程。^③

建设厅还回避了分配已垦土地的问题。在短期内，这项工程将不会极大地减少淹没土地的数量；其主要的益处将是对那些已耕土地的防洪保护。^④ 因为这条河被从一个河床转移到了另一个河床中，一些“新”土地产生了。尽管如此，由于这项工程的资金不是依赖于征收这些土地产出的份额，建设厅可以避免这个问题，让这项工程完成后，由各县进行自我供给。建设厅承认，许多其土地被占的人对各县所遵行的手续感到惶惶然，但这种不满并未让建设厅有所改变。^⑤

然而，建设厅仍然必须解决许多关于土地和河流权属的冲

① 山东省建设厅：《浚治万福洙水河志》，第122页。

② 山东省建设厅：《浚治万福洙水河志》，第39~40、121~123页。

③ 山东省建设厅：《浚治万福洙水河志》，第46、57、70、76页。

④ 山东省建设厅：《浚治万福洙水河志》，第113~114页。

⑤ 山东省建设厅：《浚治万福洙水河志》，第57~58页。

突；其回顾性的叙述报告说，在万福河工程可以启动之前，它不得不解决 100 多件久拖未结的村际（或偶尔是县际的）纠纷，这些问题妨害了河流治理。其原因很平常——通常是对大堤的位置、灌溉水源或应该由谁来维护多村使用的设施的争执。尽管如此，鲁西南是个因仇杀而声名狼藉的地区，许多这样的争端由来已久且非常剧烈。某些争端在 1855 年黄河改道改变了万福河时就已开始了；有的持续了好几个世纪。这些世仇往往以打官司为开始，但后来就变成了暴力冲突；有几件仇怨每个秋季都要引发械斗，以致自 19 世纪 50 年代以来没有进行过任何协作治水。不但有村民、而且还有来自县署和更高层面的调查人员被打死的情况；冲突的残酷使得县政府干脆放弃用警察来干预这些争端。^①

在民国时期的前 20 年里，水灾、械斗和政府的不作为仍如其前。^②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越来越严重的水患和北伐战争之后越发稳定的政治局面使得有的县——在新组建的建设厅的鼓动下——试图在 1929 和 1930 年来疏浚万福河。我们所能见到的有限资料中记载了 7 起事件，在这 7 起事件中，这些尝试被暴力和其他行为（有的村直到知道其他村已在合作时才愿意配合）所阻止，从而造成了像使黄河工程陷入停顿的那种僵局。^③ 尽管如此，与河务局——它试图使争执者自行达成一致意见——不同的是，建设厅更多地进行了直接的干预。

① 山东省建设厅：《浚治万福洙水河志》，第 39、67、71、81、91、123 页。最后这项估计得到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末年刑部档案的支持；尽管沿万福河各县很能代表包括那里所发生的山东数百起案件，但我发现没有提到与这些世仇有关的凶杀案。

② 山东省建设厅：《浚治万福洙水河志》，第 92 页。

③ 《山东建设月刊》第 2 卷第 1 期（1932 年 1 月），“论著”第 7~10、67、77、80、81、86、91、94 页；《山东建设公报》第 3 卷第 8 期（1933 年 8 月），“公牋”第 10 页。

大多数情况下，建设厅一开始就让自己的工程师亲自来检查这个地区，然后再召集一次有关的村长、县长（们）和县建设局局长们的会议，偶尔还请一些当地的士绅来参加。好几次这样的会议被说成是吵得面红耳赤，并持续好几天。^①

“一致意见”的达成反映了这项工程技术上的需要，而不是各团体之间的让步，说明了那种会议是向这些团体施加压力的主要场合，而不是给他们提供谈判的机会。在建设厅最终的报告中所描述的 11 起事件中，有 6 起是用胜者决定一切的方法来解决的：所采取的解决方法对整个工程最为有利，对受损者不作任何赔偿。在另外 2 起事件中，建设厅运用了它所说的对双方均有利的技术性的解决方法。仅有 3 起事件可以看出让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② 在其他地方记载的两次事件中，建设厅未作任何调整就干脆驳回了当地人对工程的反对。^③ 在 1 次事件中，县长和县建设局长达成让水流入两个可用的河床中的每一条来做出一次让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在建设厅支持下达成的一致意见也要求只能疏浚建设厅喜欢的河床并修筑这个河床上的大堤；县政府不过是答允以后用自己的经费在第二道河床上修筑水利工程而已。^④

如果这些会议与谈判不太相同的话，那么它们也不是法庭的判决。正是因为建设厅不愿为区分这项工程所占用的登记和未登记的土地而烦心，对这些争端的叙述才没有提及这些要求的合法基础。所做出的决定从未用两条相对古老的方针——村

① 山东省建设厅：《浚治万福洙水河志》，第 70、71、79、88、92 页。

② 山东省建设厅：《浚治万福洙水河志》，第 76、92 页。

③ 《山东建设公报》第 3 卷第 8 期（1933 年 8 月），“公牍”第 10 页，“命令”第 6 页；《山东建设月刊》第 2 卷第 6 期（1932 年 6 月），“公牍”第 8～12 页。

④ 山东省建设厅：《浚治万福洙水河志》，第 67、70 页。

庄最初的相互攻击或以前的协议——来解释；相反，所选择的解决方法是最适合工程所需的那种。

并不奇怪的是，这些一致的意见并不总能结束争端。当冲突仍在继续时，建设厅命令县政府逮捕反抗者的头子（通常是村长）并驱散那些阻挠工程的人。如果即使使用这种方法也不能制止暴力反抗，建设厅就会从省里调来军队。在沿济宁—鱼台边界发生的一起事件中，在1931年4月调来了军队，建设厅的巡查者花了1年多的时间才“解决”了这起纠纷。当济宁的100多名武装村民把军队和工程队赶走时，甚至这种策略也不管用，有4人和好几头牲口被杀死。然而，在1931年的大洪水之后，这些村庄的村长们同意启动修堤工程。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建设厅采取了一点怀柔手段，拿出了7000元来帮助受淹地区承担建设费。还安排了县自卫队来参加工程队，并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来对付以后的所有冲突。^①许多其他事件以其领头者被逮捕而告终；其中的一起事件中，在单县被逮捕的那些人被送到了济南接受惩处。^②

不过，建设厅并非仅仅依赖军队。在这项工程的报告中，有一部分是叙述万福河工程与对未来的工程提出建议的，它一再强调必须改变当地人的看法。它为了这样做而推荐的策略显示了建设厅是如何看待它与当地社会的关系的。

这位工程师被告知不要期望会得到热烈的欢迎。这份报告中说，一般的百姓很像“婴孩”，他们将会慢慢地明白这项工程的益处并极易被引入歧途。乡长、镇长和村长们仅会被自利所驱动。绅士们可以被说服来支持这项工程，但得到他们的支持却不是件易事。应付绅士们的主要目的是“避免飞短流

① 山东省建设厅：《浚治万福洙水河志》，第81～82、87～88、90、94页。

② 《山东建设公报》第3卷第8期（1933年8月），“命令”第6页。

长”——让他们不要成为起劲的反对者。^①

报告建议这位工程师从上层开始做工作。人们把县长视为“父母官”，因而，先让他来积极地赞成这件事是至关重要的。报告指出，一旦这件事搞妥了，获得其他人的支持就会水到渠成；在这件事没有搞妥的地方，整个工程的进展显得举步维艰。^② 在得到了县长的支持后，报告建议这位工程师尽可能多地召集下层头面人物开会，确保他们能了解并支持这项工程。尽管在这里没有提及应该解释哪些内容，但这份报告的其他地方强调必须把指挥链条弄得很清楚，并把每一位参与者的任务布置得极为精确，以防推诿塞责。仅是在论及与当地头面人物的会商时，这份报告才建议解释这项工程的益处。^③ 对其他人可能也做了这种解释，但令人感兴趣的是对这些人却什么也没有说。

另外，尽管建设厅的报告倡导争取有影响的民众的支持，但这些人却没有被列入这项工程的管理层中。如前所述，这项工程县以下的指挥链条是县以下的正规官员和村长们。尽管工程的规章允许“热心的”无官职者参与管理和监督，但这种情形并未出现。^④ 就我们所获得的有些县的监管者的名单和职业来看，这些人当时都担任着某种官职。我们所掌握的他们的年龄，2/3 以上的人不足 40 岁。尽管这不是什么决定性的结论，但这种资料还说明了那些位置不是为了用来选派像重要家族的族长这样的人的。在济宁，我们掌握着许多重要家族和商人的名单，但这项工程的名单中却没有这些豪门巨姓中的人。^⑤ 再也没有比这项工程与潘复所筹划的大运河工程——拥有许许多多

① 山东省建设厅：《浚治万福洙水河志》，第 121～122 页。

② 山东省建设厅：《浚治万福洙水河志》，第 120～121 页。

③ 山东省建设厅：《浚治万福洙水河志》，第 39～40、120 页。

④ 山东省建设厅：《浚治万福洙水河志》，第 41 页。

⑤ 山东省建设厅：《浚治万福洙水河志》，“附录”第 81～89 页。

多的绅士和商人官员，向乡村学校教师等人征求意见——形成的反差更大的了。

这份报告几乎没有提及动员真正的民伕。它强调每个人和每个组织的分工必须明确；而对民伕们，将由其担任队长的村长来做解释。这份报告特别指出，必须向民伕们清楚地说明他们村必须完成的那些项目，以免把工役拖到下一个农忙季节；甚至建议监管者考虑在村内进行明确的分工，让每个家庭承担各自的部分。其他仅有的意见是应该举行几次“开工典礼”，让县长、区长和村长们及尽可能多的观众都能受到感染；^① 对用来为直隶（1915年）和鲁东地区（1923年）的大规模工程鼓舞士气而聘请的表演者、表演项目、授予的奖励等，则没有任何规定。^② 尤为重要的是，报告建议这位工程师，如果想完成这部分工程的话，他就必须对民伕们进行不断的鼓励并对县级以下的官员们进行不断的警诫。^③

从这项工程非同寻常的成就中我们能得出些什么结论呢？首先，它再次显示了承担大规模河务工程所存在的充足的资源。如果万福河工程中计入的劳动力成本精确地反映了民伕们的机会成本的话，这项工程的成本就像对黄河最险恶的河段进行疏浚和修堤所支出的那么多；各县对万福河工程的负担几乎肯定超过了对黄河某一工程的负担。^④ 由于这项工程使用的是

① 山东省建设厅：《浚治万福洙水河志》，第40、47～48、50～51页。

② 徐世光：《濮阳河上记》，“丙”第12上页；Asia Development Co., *Repairing the Yellow River Break—Kung Chia Ko, Shantung*, p. 6。

③ 山东省建设厅：《浚治万福洙水河志》，第39～40、48～51、119～122页。

④ 9个县大约负担700万元，每县的负担大约为77万元（当然，各县的负担不是平均分配的）。与之相比，河务局设想由山东境内的黄河上段6县承担、不用外来资助的工程，其支出“仅”为200万元。见《山东河务特刊》第7号（1935年1月），“命令”第62页。

季节性的“剩余劳力”，即被征来的民伕们并没有荒废其他的事务，所以，万福河工程的某些劳动力成本很可能是假造的。无论如何，这项工程在9个月中征调的近1700万个劳动日工作量基本上不像是真的。^① 无论如何，冬季劳动力本来可以通过用砖来筑堤被用在许多其他的重要河段上。

其次，这次成功的经历向我们展示了黄运南部地区政治的某些社会基础。县政府无力承担这项工程并不令人惊讶，但建设厅的成功却令人称奇。甚至这次对一个通常进行顽抗的当地社会的成功渗透，也说明了更为持久的合作的基础是多么欠缺。在这里，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由功名或其他任何超地方的成就所定义的当地传统士绅在筹办乡村治水事务中发挥了作用。这种人不但没有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这项具体的工程中；而且他们甚至没有在长期的土地和河流争端中起到显著的作用。被查清身份的主要争执者几乎全是村长们或“当地头面人物”，而不是具有功名的人、退休的官员或是官员的亲属。就县政府停止干预这些争端而言，不论什么样的士绅均被剥夺了他们在乡村争端中不得不使出的最狠的招数——利用他们的社会地位对官场施加影响。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建设厅对解决争端所采取的技术决定论的方法，将不会使这种影响重行其道。

在中国的某些地方——通常是较富裕的地区——治水事务长期以来一直通过精英们的会商来办理。这种体制比让工程师们来做决定的效果可能要差，但在尽可能多地照顾方方面面的利益时，它在手法上非常适用。但在万福河沿岸地区，土地和

① 山东省建设厅：《浚治万福洙水河志》，第37、63、119页；关于“剩余劳力”的概念见 Arthur Lewis,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Social Studies* 22: 2 (May 1954), pp. 139~191. 这个地区男性劳力每年的闲季不到两个月。见 John L. Buck, *Land Utilization*, p. 307.

河流的权属有赖于村长和衙役，他们是官吏中最低的一级，但却是县政府中混得最久和在当地根基最深的人物。具有更广阔利益的正规政府和精英们基本上被排除了。其时，利益越来越狭隘的乡村领袖们无法解决对河流的争执，尽管这种争执的代价在不断地扩大。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沿黄河上段地区的乡村领袖并无二致。

因此，是相当于县级以上的那些官员们来打开了地方的死结。在早些时候，潘复和黄运地区的其他精英们就希望把国家作为一种外部资金的来源加以引入。失败之后，他们又希望让它来作为保护未来受益者（土地开垦者、容易受淹土地的田主）所得利益的保证人，作为回报，由这些受益者来承担这项工程。换句话说，这个地区的都市精英们认为他们无法用中国其他时期和其他地方非常普遍的“礼拜式的”样式来办理治水事务；因而，他们希望利用政府来解决“免费搭车者”和“拒不合作”的问题，这些问题给资助基础设施造成了极大的困难。^① 如果政府本身不来资助这项工程，他们希望它能够通过出售被这些工程所改善的土地的明确而有保障的名分来获得一些必需的资金。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这个地区似乎缺乏且需要这种保障性的名分；另外，与水灾防范不同，它们可以被售给个人、也可以不给他们。

然而，正如其结果所显示的那样，那些拥有这种土地的人——以及村长、衙役和其他对其地权提供有效证明的人——

① “礼拜式 (liturgy)” 的概念源自 Max Webber；见 Max Webber, *Economy and Society*, ed.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Berkeley, 1978), pp. 194 ~ 199, 1023 ~ 1025, 1097 ~ 1099. 在中国的应用，见 Mann, *Local Merchants*, esp. pp. 12 ~ 21, 30 ~ 35. 关于“免费搭车者 (free-riders)”，见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Mass., 1965), pp. 9 ~ 16, 60 ~ 65.

对政府所提供的条件没有丝毫的兴趣。因此，那些能够提供水灾防范的人则不愿简单地从通常的收入中把它捐献出来，并无法通过出售一种像地权那样明晰可辨的好处来支付这笔费用；其时，那些不把国家作为地权的保护者来竞争的人，又不可能提供水灾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建设厅所采取的解决办法——动用军队来让当地的百姓和当地的领袖人物接受治水工程所需的合作——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竟成功地强迫促成了这样一种合作，把农民动员到这样的一种地步，以至于在这个阶段的华北地区都是极为罕见的。

尽管如此，这项工程的结构仍然使得村长们至少牢牢地控制着一件重要的事务：在其村内的劳务分派。与黄运北部地区棉业公会所做的不同，建设厅没有尝试越过村长们直接与农民们接触。军队的动用使黄运南部地区的村长们变得循规蹈矩，但没有使他们退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尚没有对他们进行严重挑战的迹象。

尽管建设厅确实发现了一条毋须改变社会或政治基础或付出巨大的现金成本的治水途径，但这条途径具有内在的局限性。首先，强制劳役通常不能被用来代替其他的投入，就像这里的情形一样，如果没有巨大的效率损失，盘剥劳务的能力未必意味着榨取名义上数量相同的资金的能力。即便一项同样规模的工程可以找到足够的资金，但用起来可能就不那么简单了；万福河沿岸地区的官员们显然担心只要把这么多的资金投入流通就可能会造成经济上的“动荡”。^① 这种担心部分原因是由于通货操纵和控制的结果，这种操纵和控制不但使乡村的征税者、而且使同一个县城中对改善鲁西南地区的治水事务感兴趣的某些精英们大获其利（见第1章）。

^① 山东省建设厅：《浚治万福洙水河志》，第119页。

其次，强制也要花费金钱。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即使在省政府不愿直接承担治水费用的时候，它也愿意承担强制的开支。^① 另外，以万福河为例，省政府的负担很轻，仅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动用了一些军队。假如河务局同时寻求军队的支持，或者建设厅在北运河工程中也这样做的话，这些费用可能会让济南大感不安。在万福河工程的建设中，建设厅曾收到了济宁和滋阳地区的田主们非法修建大堤的报告。建设厅赞同这些大堤会引发洪灾的说法，但认为洪灾并非迫在眉睫；它建议这些县不要“挑起冲突”，但如果还有堤坝被修筑起来的话，只管再次报告。^② 这项建议，与它在万福河工程上咄咄逼人的方针形成了鲜明对比，说明建设厅知道自己的强制力量已成了强弩之末。这样的一种认识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建设厅常常要等到水灾发生之后才来插手，并说明了较大工程的建设仍然使其政治资源捉襟见肘。

另外，这些在万福河上修筑的土堤需要经常的维护。沿万福河各县被要求成立一个由县长、县建设局长及沿河所有区长、镇长、乡长和村长组成的维护委员会。除了每年一次的疏浚和大堤维修外，这个委员会将负责沿河的植树并保护其免遭农民、打柴者和牲口的破坏。实际工作再一次被分割开来，并被分配给了在村长领导下的各个村庄；村长反过来要适应一直

① 关于韩复榘对这项工程的本意及愿意动用军队的情况，见山东省建设厅《浚治万福洙水河志》，第2页。韩对鲁西南地区的许多改革倡议予以支持，但只派出人员，而没有给予资金。在一位参加者看来，这些倡议只不过是企图把这个地区纳入韩的统治之下，见徐树人《我在乡村建设派的活动与见闻》，《文史资料选辑》（济南版）第2辑（1982年），第50～68页。这种看法肯定过于简单，但韩肯定意识到了“平定”西南地区往往可视为保障对全山东统治的关键。

② 《山东建设月刊》第2卷第7期（1932年7月），“公牋”第10页。

通向县长的人物链条。开支将由县里承担。^① 如果这些县自行完成了这项计划、而“被解决的争端”不死灰复燃的话，该省的规划将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但如果该省不得不继续进行监督、威胁或让各县忙忙碌碌的话，万福河式的方法就一无所获。至于把这种方法用在别的地方，在黄运北部地区对抢棉活动的镇压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如果建设厅能够取得直接受益的一大批关键群众的信任，那个用来维护强加的河务工程的组织本来会拥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否则的话，那里的工程维护甚至可能比鲁西南地区的更难，这是因为那里不仅没有可供合作的乡村精英，而且甚至没有较多的乡村领导力量。对山东北运河的不断蚕食，说明后来的情况更像是这么回事。

在这项工程完成不久之后，万福河本身就需要进一步的维修。1933年，在河南兰封，黄河发生了一次大洪水，造成了黄河的一些河水流经一条旧河床并冲入万福河。大约有200万亩的秋季作物受淹，而万福河大堤则严重受损；不过，这场洪水不到1个月就消退了，冬小麦得以按时播种，而建设厅认为万福河工程经受住了考验。^② 这样一场可以侵袭一个“成功”设防的地区的大洪水，就引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在考虑万福河方法能够被应用到一个多大的地区的限度时显得特别重要：“当地的解决方式”——即使是那些覆盖了9个县的解决方式——也并不能真正地替代大规模的水利工程。黄河的洪水在两年后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清清楚楚的回答。洪水掠过大运河，并侵入万福河——沿河各县的伤亡最重，难民也最多。^③

① 山东省建设厅：《浚治万福洙水河志》，第115～118页。

② 山东省建设厅：《浚治万福洙水河志》，第106、107、113页。

③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编《黄河水利史述要》，第381页；《山東地方の黄河水災状況》，第6～7、10～24、35～36页。

结论 黄运、中国与世界

前文试图对黄运的社会和政治经济概况作一介绍。我们之所以要选择研究这些具体的商品、人们的活动和关系网络，是因为它们非常重要、具有非常合理的资料记载且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两个关键的主题：黄运内部当地社会变化的意义，以及在更广阔的中国政治经济中，黄运地区的变化所造成的影响。

我试图用我的阐述既来说明理论上的关系，也来说明一个缺乏资料记载的地区居民们的生活经历；这样做牵涉尽可能多地使用包罗万象的资料。当试图尽可能多地保留基于地文学的更为传统的计划的严密性时，它还需要试用对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地理上的变化很大，而不是提供了一个固定的背景——的黄运适用的空间分析方法。本章仍要与我们所了解的黄运、黄运历史所告诉我们的更广泛的问题及这里所使用的那些阐明了适用于其他区域研究方法的逻辑分析相结合。

首先，本书提供了清末和民国市场差异及其局限的案例研究。20世纪初，被认为是非常软弱的中国政府的行为，实际上对市场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影响，而不管国家是推动了这个进程（就像棉花的推广那样）、还是有意地限制了它（就像信贷中的情形那样）。无论如何，地方政府在这些进程中的作用都

至关重要，并且，由于太平天国以后地方精英越来越操纵了县及县以下的政权，^① 当地的社会结构最终塑造并限制了腹地民众对更大市场的参与。正如省政府、或者甚至是中央政府通常根据与其他层面的政府或外国人的控制所作的斗争来看待货币政策、兑换率和基础设施一样，地方精英和官员看待诸如是否帮助推广美棉和如何组织银铜兑换这样的“经济”问题，也引发了如何维持对其领域进行控制的问题。因而，乡村、县级层面和都市精英的不同结构，使黄运的北部和南部地区在面对相同的压力和机遇时，有着截然不同的反应。

因而，我将要更广泛地讨论当“突破”和“内卷化的”模型包含了重要的进步时，这两个模型都并不足以解释中国革命前农村发展的性质和局限。它们均排拒二元理论，并把农民经济放在中国整个发展的背景下来考察；^② 在我看来，这两个模型都没有发展到足够的深度。马若孟、勃兰特和罗斯基正确地对中国现代部门的发展是以牺牲传统经济活动——或与传统经济活动相孤立——的观念进行了挑战，但却用一种直接的激励绩效来替代它，这种绩效仅受铁路、电报和轮船的使用范围及中国企业家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前所拥有的时间数量所限。我在这里想要说明的是，现代与传统部门之间的关系既是政治性的、也是经济性的，并与主要受国家战略所塑造的途径中的不同活动大不一样。一旦我们考察诸如拾柴和治水之类的间接影响和非市场活动时，这些相互作用还较少地显示出单方面的主动性。最后，它们可能既通过精英和当地政府对来自沿

① 如见 Kuhn, *Rebellion*, 特别是第 211~215 页。

② 对经济二元论的一般论述，经典性的资料见 Lewis, "Economic Development," pp. 139~191. 对中国的“二元经济”非常有影响但做了某些修正的论述，见 Murphey, *Treaty Ports*。

海的压力做出反应（就像黄运南部地区信贷中的情形那样）、也通过对当这种政治经济给像黄运这样的地区带来了更“天然的”灾害时所发生的大规模混乱来做出更广泛的反应，进行着自我约束。另一方面，黄宗智认为“农民经济”中天然存在着一种内卷化的推动力，这种情形无法被现代部门或被国家及精英们的干预所改变。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不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都与现代英国的初期所发生的更加基本的变化形成了对照，而没有太多地注意中国的变化本来却是多么的重要。至少就黄运而言，我认为我已经说明了国家构建者、外国人、地方精英和其他非农民活动者的战略确实在黄运的政治经济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引发了重大变化（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此外，正如农村经济中商业化了的部分——特别是棉花和手工业——所具有的重要性一样，无视非商业化经济活动中的变化是非常危险的。至少在像黄运这样“较不发达的”地区，非商业化的活动依然在其经济中占据巨大的比重，并且绝对不会是一种一成不变的经济。要估计诸如农村中的拾柴和治水这类非市场化活动中的变化范围通常是很困难的，但这些变化却是整个农村生活水平中的非常重要的方面；就黄运来说，它们的急剧衰落超过了从商业和技术发展中所获得的适当而真实的收入。我们对这些变化的直接估计，尽管显得粗略，但却是理解乡村经济生活中巨大的实物部分的必要步骤，通常要么通过奇闻轶事、要么通过非常隔膜的代理人来了解这种生活。

我还强调，尽管那些变化发生在市场以外，但它们可以与那些推动棉花、信贷和其他商业化活动的政治经济的相同因素联系在一起。这项工作试图拓宽我们的农村经济画面，既把货币化了的也把非货币化了的成分包括进来，并至少用最近对货

币经济研究所获得的某些系统的和精确的理论来着手探索非货币化的事务。我认为，这样一种复合的画面，为我们推动正在进行的关于农村生活水平的演变趋向、现代与传统部门之间的关系（并因此关系到解放前中国保持增长的“突破性的”前景）的讨论，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也为推动我将在最后所说的三个主题——国家的作用、帝国主义的影响和中国各地区（及通常的空间单位）之间的关系——的讨论，提供了最好的机会。

黄运的事例要求并揭示了一种把我们对清末和民国时期国家的两种相反的印象合到一起的新方法。首先，我们对19世纪及20世纪初中华帝国的衰落情景非常熟悉。这种衰落在中央政府对农村控制的缺失及其基本功能（秩序的维持、自然灾害的防治和保卫中国主权免于外人的破坏）的糟糕表现方面反映了出来。^① 在黄运所发生的事件为这种趋向及某些估价这些趋向对普通民众影响的基本途径提供了充足的文献记载。无论如何，更近的文献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幅20世纪初中国国家构建的图画，把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发展与1949年后曾出现的最强大的国家联系在了一起。这种学术研究注意到了社会发展——特别是在大都市——的互补性及现代国家的需要，并指出了与欧洲和其他地区相并行的国家构建。^②

① 如见 Sheridan, *China in Disintegration*, pp. 18 ~ 26; Fairbank, "Introduction," vol. 10, pt. 1, pp. 3 ~ 6, 34。

② 通常见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Vermeer, *Economic Development*; Greer, *Water Management*; Joseph Fewsmith, *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 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 1890 ~ 1930* (Honolulu, 1985); MacKinnon, *Power and Politics*。曼素恩的观点更接近于这里所列出的一种论点，即赞成19世纪末和20世纪中国“核心地区”的“国家构建”，而对“边缘地区”所发生的那些事情持保留态度（*Local Merchants*, pp. 6, 10）。

上述两种趋向都是客观存在的。总的说来，它们要求我们越出不是用单纯的直线论、就是用单纯的循环论的模式，这两种模式认为政治和经济的变量不论在什么时期全都按同一个方向移动，并在整个国家（或至少在一个大区）中是这样的。我们还需要使用新的模式，来理解像村庄为外来者提供的可渗透性和村民们在更广阔的网络中寻求机遇的意愿这种地方性的现象。这些现象通常被认为一起发生了变化，并被认为不是沿着直线型（沃尔夫）、就是沿着循环型（施坚雅）的宏观层面的变化模式在发展。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在那些变化通过社会结构中的地方性差异折射出来的时候，可渗透性和开放性才变得格外分明，并且反映了更广阔世界中的发展趋向。^①

有人可能会指出中国四分五裂的特殊性并不符合通用的共性，从而试图调和两种均有充分的文献根据但却截然相反的叙述；有人可能甚至会说，在那一时期的中国史上并不值得使用“国家”的称谓。然而，这样的一种思路并不能令人满意。它没有为我们所发现的结果提供组织的框架；它还忽略了在其广阔的领域内确实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北京和南京政府的存在，在一些重要事务（如治水）上省际合作的持续，以及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所作的跨越清与民国分野的民众和资源动员方式的连续性。总之，它忽略了各自统治着比欧洲大多数国家的人口要多的基本相同的省政权的存在，这些政权在沟通基层社会时有时显示出惊人的能力。

这项研究一直试图系统地分析与国家构建同时发生的国家

① 关于施坚雅的观点，见“Closed Community,” pp. 270~281. 关于沃尔夫的观点，见“Closed Corporate Peasant Communities in Meso-America and Central Java,”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3: 1 (Spring 1957), pp. 1~18。

的放任，以替代对这个时期的中国国家进行归纳的放弃。我认为，我们所发现的每一个趋向中的一些规律，指向了这些趋势之间的联系，这些趋势反过来显示出了令人费解的历史逻辑。

一个首要的区别是国家在其作为资源的榨取者与其作为服务的提供者（并因此是资源的分配者）的能力之间的差异。毫无疑问，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正如那些看到了国家构建的人所强调的那样，中国政府榨取的能力极大地提高了。^① 尽管——就像杜赞奇和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榨取的效率极为低下，从农民们那里榨取来的许多东西依然被地方上的征收者所吞没，但国家和各省所得的收入也增长很快。即便我们对北京和南京中央政府的“国家”称号持保留态度，但我们仍将发现其收入有了很大的增加。无论如何，受到削弱的那些人是国家税收征收中具有独占性的人物，如县级以下的官员、土匪、省里的政客、秘密社会、军阀和其他也从百姓那里榨取更多资源的人。^②

与不对等的榨取者们的增加相联系的是资源分配中的惊人的低效；并且，主要是作为一个有效的公共秩序、治水等事务的提供者的国家不能有效地行使职能及失败的结果，吸引了那些认为这个阶段中国的国家已崩溃了的学者们的关注。与之相匹敌的军阀们的榨取，提供了在没有改善服务的情况下农民们的负担上涨的最清晰的案例，尽管这些早已发生的事仅覆盖了我们所研究的这个阶段的部分时期。但即使在黄运的重要争斗结束之后，我们发现当地的掌权者们仍在进行苛重的榨取，而

① 如见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pp. 65~85。

② 如见 Elizabeth Perry, "Tax Revolt in Late Qing China: The Small Swords of Shanghai and Liu Depei of Shangdong," *Late Imperial China* 6: 1 (June 1985), pp. 110~111。

在其使用中几乎没有进行协调；在黄运南部地区的治水活动中，县级以下的掌权者们所操控的大规模实物输纳与以前更廉价的、提供了一种持久的常规例证的体系相比，几乎没有促成治水事务。

把榨取与提供服务区分开来，还使得我们对国家构建和国家崩溃的混合形态从地理上进行分别对待；然而，对这个阶段的主要研究著作极大地忽略了这种区域性的变化。在战略上显得重要和商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长江三角洲、京津地区，等——国家增加了其影响力，而不让其他的竞争者来控制正在创办的机器工业。另外，这些地区强大的商业经济不但使得在当地可以征收税收，而且能更容易地流通和分配。结果，人们看到了萧邦齐、裴易理、斯泰芬·麦金龙等人所指出的当时在核心地区国家和社会的强化。^① 人们还发现在这些地区中，国家既变成了一个更加成功的捐献者、也是一个更加成功的榨取者——警察、公共卫生和其他关键服务看起来确实得到了改善。因此，对这个地区的研究所见到的国家构建过程，在地方层面上，看上去与现代欧洲早期阶段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显得很有意义。并不是这些地区缺乏孔飞力、杜赞奇等人所强调的县级以下贪婪的人员，而是这些地区的民间精英和越来越活跃的国家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了约束。

尽管如此，正如本书叙述交通、治水和植树时所强调的那样，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为取得在这些沿海地区所显示的活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部分代价是国家从其曾经极为重视的地区退了出来，而这些地区此时既不能提供充足的财富、也没有

① Elizabeth Perry, "Collective Violence in China, 1880 ~ 1980," *Theory and Society* (May 1984), pp. 427 ~ 454, esp. 449; MacKinnon, *Power and Politics*, pp. 6 ~ 11, 219 ~ 224; Schoppa, *Elites*, pp. 5 ~ 8, 186 ~ 187.

足够的外国威胁来维系负担沉重的政府的兴趣。同治中兴(1862~1870年)时期,河漕剧减使得对长江下游税收的削减成为可能之事,这似乎是一个转折点;^①然而,在国家把隐含在这些政策中的对运河维护和内地黄河治理的放弃制度化之前,竟花费了30余年的时间。

过于单纯地强调沿海地区财富的影响,可能意味着我们所研究的这个阶段的中国政府成了这些地区富裕阶级的俘虏。当这些群体显然非常强大并值得国家对像江南这样的地区予以某些关注时,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中国的国家仍然极大地独立于任何特定的阶级。^②另外,财富并不能单纯地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黄河资金投入方面的变化,让我来仅举一个例子。许多靠近黄河河口的县——利津、滨县等——与山东黄河上段的那些县份一样的贫穷。资金从上段大量移入下段,与国家在靠近最受威胁的沿海地区保卫其主权的自身利益的关系极大,而受这些沿海县份任何特定阶层的影响极小。

这种从地理上对中国国策变化的分析,反过来导向了本书所试图强调的另外一个方面。尽管近年来我们对中国国家在盛清时期的情况了解得非常多,但对1850年以后的国家所做的研究几乎没有看到这种重新定向的含义。有人认为,我们所描绘的18世纪极富成效的国家的图画,正凸显了这个国家后来

① Polachek, "Gentry Hegemony," pp. 223 ~ 227; Wright, *Last Stand*, pp. 163 ~ 167.

② 如, Parks Coble,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 ~ 1937* (Cambridge, Mass., 1986); Lloyd 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1974); Esherick, *Reform and Revolution*. Joseph Fewsmith, *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 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 1890 ~ 1930*, 第4~7页提供了赞成国家甚至在南京时代独立于上海资本家阶级和长江下游地区其他精英的著述的总的看法。

的衰落；无论如何，我们对传统的明清国家想要做的那些事的进一步理解做得相当的少。即使是讨论 20 世纪早期中国新型国家构建的著作，也往往研究 20 世纪早期中国政府缺乏“自觉进行现代化”的趋向。^①

与像明治时期的日本这样的政府相比，中国的政府无疑没有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现代化活动；不过，中国的治国方略在某些方面出现了根本性的突变。这个国家从对“再生产”——所有地区都与其有关，并且，那些在维持自身的生计方面具有极大的困难的地区通常获得了特别的关注——的强调，转向了对守卫关键地区的强调，以与其他国家展开竞争，并——正如中国领导人最近所说的那样——鼓励某些地区“先富起来”。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承担了许多通常被视为体现了现代化国家特征的任务：改革金融和货币、统一度量衡来促进贸易的发展、增加政府的收入、创建职业的城市警察武装、甚至包括设立像电报这样的现代基础设施。^②

另外，这些努力在他们作为其发展目标的地区顺理成章地获得了成功。这种成功既通过对核心地区的案例分析、也通过指出 20 世纪早期的中国实际上确实取得了用来衡量 20 世纪国家“成功”的最普遍基准——真正国民生产总值相当高的增长率及工业中非常有效的快速增长——的著作体现了出来。^③ 从

①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pp. 4, 248.

② 关于度量衡的情况，如见《山东政俗视察记》；关于金融和货币情况，见 Rawski, *Economic Growth*, pp. 120 ~ 180；关于警察武装的情况，见 MacKinnon, *Power and Politics*, pp. 151 ~ 163, MacKinnon, *A Late Qing-GMD-PRC Connection: Police as an Arm of the Modern State* (Tempe, Ariz., 1983)；关于收入情况，见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pp. 58 ~ 73。

③ Rawski, *Economic Growth*, pp. 268 ~ 333, esp. 331 ~ 332.

今天向后看，我们可以看到，20 世纪初期的中国国家体现出了现在同一类别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许多特征：极其依赖关税、商业税和外国贷款；对现代都市和国际竞争具有强烈的倾向性；并且，尽管在农村地区的基层影响力很弱，但仍具有许多新的能力。与那些后来沿着这条途径发展的许多国家相比，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做得并不太差。即使在保护国家的独立方面，与促进现代部门的发展方面相比，中国国家做得较不成功，但它比 1945 年以前的大多数亚洲国家做得要好。

与此同时，国家却至少放弃了明清时期国家的某些传统使命。为了我们的研究目的，它所放弃的最重要使命是通过对大运河和黄河的维护来保证华北内地的生态稳定。然而，这里可以先举其他几个例子。例如，对军费支出的重新定向，在明朝和清初，军费主要花在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边界地区，并伴随着促进粮食贸易和以别的方式稳定西北生计的尝试。在新时期中，对中国的威胁来自沿海地区，军费主要花在创办一些现代军队和江南、福建沿海、京津地区及其他东部核心地区的军事工业方面。^① 第三个例子，是原来用于扩展西南新开发地区和其他边界上的灌溉网络的预算，被用来疏浚沿海港口、修建联接重要城市的铁路及在重要城市建立航空工厂。^②

在这里，同治中兴成了一个早期的分水岭。尽管在对儒家教育的强调、对群众动员的无动于衷及对减税来复兴农业经济

① 关于西北的粮食贸易，见寺田隆信《山西商人の商人研究：明代における商人および商業資本》（京都，1972 年），特别是第 17～80、101～106、120～157 页；Peter Perdue 全面地研究了清朝粮食供给与西北防御之间的关系。

② 关于边境的治水问题，见 James Z. Lee, *State and Economy in Southwest China, 1250～1850* (Cambridge, Eng., 待版)。

方面，它可能是“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堡垒”，^①但中兴标志着清政府通过把江南地区（及其他富裕地区）从资助更贫穷地区的使命下解脱出来，从而对19世纪中期的机遇和威胁做出了反应的早期例证。到20世纪初，中国国家事实上采用了一种“挑选胜利者”（“picking winners”）的政策——这里相当程度上是根据工业来划定地区的。与明清时期力图稳定专制帝国和保护国家的独立免受长江下游精英们的影响这一战略相比，这种战略与20世纪应对国际竞争的国家战略更为相似^②（还值得注意的是，1850年以后对那些没有通过科举考试的官员招收名额的增加，尽管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但造成了有助于明清时期的国家对江南精英们的全国性权力进行限制的地区学额的废弃^③）。

此外，在重新配置其资源时，国家向地方精英们发出了配置他们的资源的强烈信号。国家为长江下游地区提供的减税和其他优惠，成功地让那些在太平天国时期失去了资产或将其财富转移的人重新对土地、治水及其他改良活动进行投资。尽管有些学者指出，长江下游的精英们在20世纪退到了通商口岸，

① 这种观点的经典说法，见 Mary C.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 ung-chih Restoration, 1862-74* (Stanford, 1957), esp. 1-10, 300-312。

② 明清两代的皇帝都极为小心地阻止江南的士绅变得过于强大。关于明朝的情况，如见 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Fang Chaoying, eds.,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New York, 1976), pp. 385, 387-388；关于盛清时的情况，见 Philip Kuhn,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Cambridge, Mass., 1990), esp. 70-72。

③ 关于非科举人员录用名额的增加，见 Ho, *Ladder of Success*, pp. 47-50。关于地区学额的情况，见 Benjamin Elman,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via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0: 1 (Feb. 1991), pp. 14-15。

但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许多人在农村仍然具有影响力，有的在上海客居一段时间后本人又回来了，有的把他们都市中的一些盈利投入到乡村的项目上。^①

在此期间，黄运南部地区像潘复这样的家族在当时的捻军运动中失去了许多土地（黄运北部地区没有与之差堪比拟的家族）。然而，他们获得了关于他们那个地区前途的极不相同的信号；并且，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在1870年以后，他们通过集中在济宁、济南、北京和天津的活动重置了他们的家业。20世纪的乡村地区落在了资本更少、眼界更窄的乡村头面人物的手中。

19世纪中期，国家予以优先发展的地区的变化——及其精英战略的回应——动摇了黄运的福利成本。尽管这个地区确实从东北的发展、外贸的增长和沿海城市现代产业的兴起中获得了一些利益，但新的治国方略——在封闭、生态破坏和水患方面——使得这个地区得不偿失。并且，主要是这些被上述变化所边缘化了的地区中，许许多多的农民从这种国家构建的形式中选择了共产主义的途径：这种途径至少首先答应腹地的人们，他们毋须等待核心地区的发展浪潮蔓延到他们那里时，就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

这些结论还具有方法学方面的含义。其中之一是我们需要思考空间方面的动力。当其边界基本没有变化的地文学上宏观区域的概念具有巨大的生产力的时候，^②它在20世纪越来越

① 见 Fei Xiaotong, *China's Gentry*, 关于最著名的“社会性腐蚀”的假设；Schoppa, *Elites* 是说明长江下游地区的许多精英继续遵从施坚雅所说的机动策略的一部出类拔萃之著作，这种策略包括对其家乡地区的人文和经济资源的最终回报。

②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一文最早建立了这种模型，并很可能是现代中国研究中最有影响的一篇文章。

变得紧张起来。这里对空间的研究，注意到了其含糊和变化的边界，没有为那种——甚至是 20 世纪的——框架提供替代物，但它确实补充说明了要求我们注意有助于创建市场边界、核心与边缘地区及生态变量本身的政治动力。另外，它揭示了在那些代表空间网络中心的“核心形态”与那些代表一种空间等级中心的“核心形态”之间的区别。

在一篇约 20 年前发表的关于中国专论的文章中，伊斯兰教徒艾拉·拉庇都斯指出，把中国连为一体的链条的主要象征是等级象征——在当地人与更大单位之间的垂直联系——而伊斯兰世界的关键体制通常被作为网络（在谁也不能指挥其他人的水平群体之间的联系）来看待。但他指出，根据网络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内聚力与根据等级的标准来衡量伊斯兰世界的内聚力具有相同的可行性。^① 从那时起，我们确实看到了学者们对中国的网络——宗教教派、地区之间的贸易网络、当地的社团和文人的私人组织——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当这些网络不是完全水平的时候，它们必然比正式的中国政体要更像这么回事。

这些网络中的某些部分——特别是像那些文人网络，这种网络只能在财富集中的地区兴起——在我们所熟知的中国政治地图和施坚雅设计的大区地图的地区等级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② 但有一些则无法看出。黄运南部一个贫穷的农业县单县

① Ira M. Lapidus, "Hierarchies and Networks: A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Islamic Societies," in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Carolyn Grant (Berkeley, 1975), pp. 26 ~ 42.

② 如见 Benjamin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 1984), 对考据学派网络兴起的研究。

的中心，对华北白莲教网络的延伸是惟一的一个惊人事例。^①本书所述的黄运北部地区与南部地区之间的反差告诉我们，可以把核心地区的各种特性要么归入到网络的核心形态、要么归入到等级的核心形态中；如果不做出这样的一些区别，要评定我们所研究的某些地区的核心或边缘地位是极其困难的。

根据某些关键的变量，黄运南部似乎比黄运北部更像核心地区。作物种植指数（每英亩每年种植的季数）更高，表明土地的使用更加精细；毫不奇怪的是，这种使用方法与更大范围地运用灌溉、更多的产出和每亩投入更多的人力相并行。土地的所有权更加集中。那里获得功名的人要多得多，而在民国时期，其影响不囿于本地区的政治人物则更多。国家在这个地区所征收的税收也较多。在18世纪时，这个地区对税收改革的抵抗颇类似于江南的抗税活动，而不像华北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抗税斗争。事实上，它非常符合施坚雅所说的核心地区的经典形式：对国家的抵抗来自根深蒂固的当地掌权者，而不是来自非正统的和一无所有的人，这些人是国家在贫困和混乱的边缘地区的主要对手。^②

但如果用其他标准——第2章所述的人均收入、对更大市场的参与、专业化商品的消费和对外来的组织者们（包括那些寻求改变征税事务、种植模式或其他业务的人）普遍的接纳——的话，黄运北部地区显然具有更多核心地区的特征。还

① 关于单县的情况，如见 Susan Naquin, "Connections between Rebellions: Sect Family Networks in Qing China," *Modern China* 8: 3 (July 1982), pp. 337~360。

② 如见 Zelin, *Magistrate's Tael*, pp. 149~152；对黄运北部和南部地区“核心”特征更详尽的论述，可见博士学位论文，第379~381页。见 Skinner, "Cities and Hierarchy," 第308页，分析了对国家哪种类型的抵制把核心和边缘的特征表现了出来。

有其他标准——诸如在太平时节可免于一般土匪祸害这样的相对安全因素，但包括城市（特别是临清）在内，在不太平时节均是叛军们最心仪的猎物——可以被加进去。^①

有些学者指出，如果核心形态的各个方面并不足以共同变化的话，我们就应该抛弃核心—边缘的框架。^② 与之不同的是，我则宁愿把上述现象归入到两种类型的核心形态中。垂直的、或等级的中心参照了一个普遍保守但却收入短缺的国家那些特殊利益的标准。它们包括总的财富、完成新增税收配额的能力及产生那些能够让自己在国家或省级层面获得消息和/或抗拒那些危及其地位的要求的精英。至少在我们的事例中，这些特征均协同变化，而在黄运南部地区比其北部地区要被申述得更多。

网络或水平的核心形态涉及与官僚指挥渠道无甚关联的另一套联系中的位置；这种核心形态在黄运北部地区表现得更强烈。一个重要的例证可能是对远程贸易的参与。当大运河处于繁盛阶段时，聊城、特别是临清（而非济宁）是山东远程贸易的主要码头；黄运北部地区部分粮食供给甚至有赖于远程贸易。^③ 临清和聊城还拥有巨大的客商社区和专门经营来自东北、蒙古及整个华北和西北地区产品的贸易市场。^④ 济

① 见博士学位论文，“附录 E”，关于对人均收入的研究；Naquin, *Shantung Rebellion*, 第 88 页，论述了是临清而非济宁成了各种造反和抢劫者的目标；杨正泰：《明清临清的盛衰与地理条件的变化》，《历史地理》第 3 辑（1983 年），第 119~120 页，博士学位论文，第 367~370 页。

② Myers and Sands, “Spatial Approach.”

③ 许檀：《明清时期的临清商业》，《中国经济史研究》第 2 期（1986 年），第 135~157 页，特别是 148~149 页。

④ 许檀：《明清时期的临清商业》，《中国经济史研究》第 2 期（1986 年），第 135~157 页，特别是 148~149 页；杨正泰：《明清临清的盛衰与地理条件的变化》，《历史地理》第 3 辑（1983 年），第 115~120 页；《临清县志》（1934 年），“食货”部分。

宁的贸易尽管相当可观，但主要是地区性的，也不太专业化，并被本地商人和官员所控制。^① 在我们所关注的这个阶段中，黄运北部地区为沿海的纱厂生产棉花，并与广为延伸的信贷和通货市场有着更多的联系；这个地区还种植更多的其他出口作物，如花生和烟草，并较多地进口煤油、机纱和其他现代商品。^②

正如第2章所强调的那样，外来者们发现在黄运北部地区比其南部地区更容易改变其结构和发展进程。甚至对国家的代表者们也是这样，只要他们着重于对当地社会的渗透（对于这样的一项使命，根深蒂固的掮客和税吏们则是一种障碍）而不是尽可能多地进行榨取（对于这样的使命，上述那些人通常构成了有利条件）。尽管黄运北部地区从没有像其南部地区那样拥有巨大或可靠的税源（较低的田税和盐税配额及对临清海关逃税的不断投诉即为明证），但国家发现那里的征税方法更容易受到影响。1728年的税收改革并没有遇到来自类似于鲁西南地区的地方精英们的反抗；两个世纪之后，国民政府发起的反对当地非法征收附加税的运动也在黄运北部地区搞得比南部地区要好得多。^③

简言之，正是由于缺乏巨富和强大的精英，使得黄运北部地区按有助于其被包容到更加水平的网络中的垂直标准来说，显得较不重要。在19世纪末，由于中国国家对黄运的任何地

① Jing Su and Luo Lun, *Landlord and Labor*, p.27.

②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2编，第151～201页对进口的统计。

③ 关于18世纪的事件，见 Zelin, *Magistrate's Tael*, pp. 149～152 及博士学位论文，第376～377页；关于20世纪相对应的事件，见《山东财政公报》第5卷第3期（1933年12月），“公牍”第3、10～12页；《山东财政公报》第6卷第7期（1935年4月），“转载”第11页。

区均不甚重视，黄运南部地区较大的吸引来自官僚阶层关注的能力仍然维持下来：它的部分运河河段依然获得了某些资助，在那里修筑了一条铁路的支线，这个地区的一些人仍然在更大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如此，垂直的中心比其过去曾经有过的形态所具有的优势要少。这里所说的黄运北部地区具有许多优势；它对水平网络更大程度的参与，使得它更成功地适应了——尽管并非毫无痛苦地——更加广阔的世界中的新角色。

黄运的事例还理应影响到我们如何来思考帝国主义的冲击这一问题。我在整本书中，始终强调作为一种对黄运产生冲击作用的帝国主义的重要性，即便那里外国的实际影响要微乎其微。另外，尽管这里所述的与外国人的实际联系大部分相对要好一些，但我认为中国与西方的相遇对黄运的生活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超出一些纯经济研究所做的那样，即观察更为容易的、有些教条的帝国主义第一顺序的影响——诸如黄运农民卖出花生油来购买煤油这样的新机遇，并比过去有了更好的照明条件，或者说，观察黄运对战争、赔款和编练新军所付出的代价。^① 与之不同的是，我们必须把中国国家的变革作为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影响的组成部分来对待，而不是与经济影响的模型孤立开来，并视为其外因。政体的变化涉及许多偶然性，并很难与一般的模型相吻合；但当具体事件显示出它们与经济变迁是如此不可分割时，我们就应该修改模型，而不是无视这些现象。

就本书甚至强调帝国主义对内地的影响而言，它赞成“依

① Heunemann, *Iron Horse*, pp. 2 ~ 13, 240 ~ 248; Rawski, *Economic Growth*, pp. 5 ~ 10, 106 ~ 116.

附”和“世界体系”传统的观点。^① 它也对上述两种论点做了重大的发展——由于用一种情况下出现了“现代化”、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却没有出现“现代化”来取代研究“发达”和“不发达”地区的出现，我们理应探讨这些结果成为一种单一过程组成部分的途径^②——并把这种观察应用到突然被推入到世界经济和国家体系中的一个大国的国内政治上。

尽管如此，除了这个方面以外，这里所提出的论点或者与依附理论、或者与世界体系的观点有所区别。首先，这里所强调的不是关于黄运融合到世界体系中的负面影响；它强调的是旧网络的崩溃而不是新网络所造成的损害。就黄运所发生的真正的融合而言，这可能比没有融入到新网络中却造成了旧网络崩溃的这种选择要好。黄运与新经济的关系也并不全都是依附和世界体系理论通常认为把边缘与其核心联系起来的树枝状类型——在这种类型中，当地人在他们与之贸易的较高层面的中心地区中并无选择的余地；中国旧的根深蒂固的中心地区的等级——它保证了某些竞争和各个层次的选择——从未被彻底摧毁掉。^③

另外，与把融合的方式——例如，不论一个地区是否变成了一个经济作物、低薪劳动力或移民的供应地——视为一个地

① Wallerstein, *Modern World-System*; Henrique Cardoso and Ernesto Faletto, *Dependency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Berkeley, 1979); Moulder, *Modern World Economy*.

② Wallerstein, *Modern World-System*, pp. 3, 10, 232; Henrique Cardoso and Ernesto Faletto, *Dependency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pp. 8~28.

③ 见 Carol A. Smith, "Regional Economic Systems: Linking Geographic Models and Socioeconomic Problems," in *Regional Analysis*, ed. Carol A. Smith (New York, 1976), pp. 34~36, 51~58, 对树枝状类型做了论述，以反驳施坚雅学派提出的在帝国主义背景下的市场等级的观点。

区社会结构和政治的决定因素不同，这里一直强调的是当地社会结构和中国国内政治是如何形成这种融合方式的，在这种方式中，不同的亚区有的被融入了，有的则没有。西方对中国的攻击不是由地方的变量所决定的，并就中国国家必然从帝国主义那里接受了重新定向这个角度，黄运旧网络的崩溃也许是一个纯粹的依附现象。但正如我们在讨论治水和修筑铁路时已经看到的那样，即使在向强调更可渗透的地区转向的背景中，许许多多的途径依然支持着旧的体系。它至少把三种发展混合在一起产生出这样一种痛苦的转变：外国的残酷入侵、恢复环境退化不断上升的成本和长江下游地区所产生的经济剩余的暂时减少。而即使在那时，如果我们能够想象到一种中国和外国列强之间所产生的不同的生活方式，黄运本应更容易地被放弃——特别是由于太平天国后长江流域很快比过去生出了更多的绝对剩余。^① 即便我们同意国家不得不抛弃黄运，我们对信贷和棉花市场的叙述显示，各种各样的地方反应有可能既让长期的结局（如收入水平、政治结构的改变等）、也让当时的经历变得大不相同。

最后，本书是为了构建一种特殊的方法，在此之中，像国家构建和市场融合这些大的发展进程，由于由当地的差异所造就，反过来造就了这个地区中普通人的生活。在考察本地的信贷市场、税收缴付、经济作物的机遇、农业中不断变化的劳动力需求、对拾荒权的威胁、越来越严重的燃料短缺、粮食问题和不断增加的强制劳役、实物需索（在黄运南部地区）及令人

① 这里不是用来争论 1870~1937 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农村人均产出是正在快速提高（勃兰特）、还是基本上停滞不前（黄宗智）。但考虑到都市的发展、人口重新开始增长和对农村发展甚至非常保守的估计，这个地区绝对的剩余肯定极大地增多了。

不快和社会性分化的棉花巡护中的服务（在黄运北部地区）时，我一直试图用亚区、社区类别、阶层等，尽可能不落俗套地来突破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如果资料允许的话，可以加上其他内容。例如，尽管我在这里极少提到性别问题，但有人可能会指出这里所讨论的许多最严重的问题对妇女的影响比对男人的影响要大。妇女是拾荒和打柴行列的主要成员，更不用说不得不用极少燃料来烧饭的那些人了；有些资料证明在山东水灾过后的饥荒中，女性所受的苦难也不成比例。^①相反，确实开始进入这个地区中——主要在黄运北部——的一些家庭的现代商品，包括了特别能够减轻妇女负担的两种商品（煤油和机纱）。尽管我所找到的证据很少，但它们显示出20世纪30年代在这些商品稀缺的鲁西南地区的农村妇女，比黄运北部地区的农村妇女的工作日数要多得多。^②

在这种论点能够被坚持下去之前、甚至在我们拥有这里所述的一个发展进程中彻底的“农民视角”之前，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例如，这里所用的阶层的定义仍然非常粗略。但是，这里所描述的区别——和联系——是一个开端。像这些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大规模结构性的变化过程如何结束，它们如何改变了各种各样重要（尽管通常是日常性的）的活动，以

① 关于拾荒和拾柴，见第2、3章；关于黄河洪灾之后的死亡率，见 Lillian Li, "Life and Death in a Chinese Famine: Infanticide as a Demographic Consequence of the Yellow River Flood of 1935,"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3: 1 (July 1991), pp. 466-510。

② 关于鲁西南地区妇女们特别长的劳动日数和贫困状况，见天虹《鲁西农妇生活的一瞥》，《大公报》（天津版）1934年7月8日，第11版；这篇文章明确地把这些问题与燃料短缺、煤油和机纱匮乏等联系在一起。与之相比，鲁西北地区妇女的劳动日似乎一向较短，即使那些织布的人：如见《鲁北十县农业调查报告》，《山东农矿报告》第13期（1930年1月），第8、21、33页。

及这些变化的经历如何因社区类型的不同——一个人在那些社区中的地位、在前帝国主义秩序中那个社区的地位和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观念中的变迁——而系统地发生变化。在那种途径中，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寻求一种受社会科学启示、但仍保留了人文优点的历史。



附一 鲁西北和鲁西南各县名称

正如“导言”中所述的那样，黄运的边界不能总是被精确地固定下来。黄运北部和南部地区的内部分界也是这样，为了第2章的研究目的而作的内部分界（基于山东的资料）与鲁西北和鲁西南的分界线一致。因此，在第2章所作的统计中，我试图从各个方面把任何不明确的县进行归类，来提出我自己的观点，这有可能被证明是很困难的。例如，鲁西西北部边界上特别贫穷的4个县——濮州、范县、寿张和阳谷——最早被剔出了西南地区，并且在统计人均收入时，从经验上被包括在西北地区，这是因为我想尽可能充分地证明西北地区的人均收入比西南地区的要多。下面是为第2章的研究目的而定义的西北和西南地区各县的名录。对决定选择各县的更详备的解释——为了利用资料而这样做，我的分界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的那些分界略有不同，加上对人均收入、植棉亩数等的统计——见博士学位论文“附录D”和“E”。

西北地区：聊城、堂邑、茌平、清平、莘县、冠县、馆陶、高唐、恩县、临清、武城、夏津、邱县、德州、平原、禹城、朝城、观城。

西南地区：滋阳、汶上、济宁、金乡、嘉祥、鱼台、菏泽、曹县、单县、城武、定陶、巨野、郓城、鄄城、东阿、

平阴。

至少部分属于西南地区，但从这些统计中被略去了的县份有：濮州、范县、阳谷、寿张、邓县（Dengxian）*、掖县、邹县、曲阜、泰安。

（由于资料不足）西北地区从这项统计中被略去的县份有：博平。

* 疑为“滕县”。——译者注



附二 水利衰退造成的农业损失

对基本估计的说明

由于鲁西南湖泊扩张而“失去”的土地数量从来都是不准确的。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期，人们都试图对这些浅湖中的某些土地进行垦种；他们通常能短暂地取得成功，但只有大规模的工程才能保证长久地开垦大部分土地。

对通过大运河的维护而开垦的湖地数量的最低估计为 58 万亩，大部分分布在济宁和鱼台。^① 依据这项估计的规划涉及恢复旧运河最低程度的维修，而不是改善它；因此，对这项工程将来开垦出来的最低土地数的估计，应该是对运河衰落所造成的耕地损失数量的保守估计（更随意的估计数量不等，有的估计这项工程开垦的耕地亩数达 192 万亩，而 1919 年对下游运河的规划方案也保证从东平湖下面向更北的地方开垦出 40 万亩土地）。^② 把这些土地的出产率定为每亩 8 元似乎是比较

① 山东南运河疏浚事宜筹办处：《第一届报告》，“专列”第 9 页；《山东建设月刊》第 1 卷第 4 期（1931 年 4 月），“论著”第 17～18 页。

② John Ripley Freeman, Grand Canal Investigation (密西根大学收藏本), pp.35～36, 135。

谨慎的估计；^① 因此，每年因土地沦为湖泊而未能种植的作物的最低价值超过了 450 万元。如果依靠这些土地的所有劳动力真的能够找到相同收益的工作的话——一个可疑的假设，但这样做是出于格外的谨慎——我们应该把额外产出的估计削减到只剩下土地本身的产量；这些土地一个好的替代物是田租，这个地区的田租通常为 60%（水灾造成的损失，将在下面计算，毋须作这样的调整，这是因为劳动已经被投入到了那时已经失去了的作物上）。因此，我们对损失的估计是 270 万元。^② 如果我们使用更近的数字的话，从湖泊进一步的扩张中所得出的损失数字将高达 960 万元。^③

运河水患的代价甚至更大。这些水患最坏的影响实际上在苏北可以看得出来，^④ 所以这不在我们所关注的范围中。但是，在山东的损失甚至也是惊人的。在清末，由于运河淤塞造成的洪灾，鲁西南 7 县（济宁、鱼台、汶上、邹县、掖县、东平和东阿）每年平均有 1311693 亩土地被允许免税。^⑤ 1911 年以后的损失可能更大，这是因为运河的状况在持续恶化，但这些年里的损失数字却从未编列过。^⑥

① 山东南运河疏浚事宜筹办处：《第一届报告》，“专列”第 11~12、19~20 页，列入了此项估计。博士学位论文，“附录 E”，使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出产数字，算出黄运的山东部分每亩农产品为 8.6 元。由于这里所讨论的许多土地处于济宁—鱼台地区，其产量理应更高；“附录 E”估计鲁西南每亩的产出为 10.2 元。

② 关于这个地区田租的例证，见 Huang, *peasant Economy*, pp.205, 210, 212。

③ 侯仁之编《序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第 48 页。

④ 侯仁之编《序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第 48 页。

⑤ 山东南运河疏浚事宜筹办处：《第一届报告》，“水利规复调查”第 1~2 页、“专列”第 21 页。

⑥ 《山东建设月刊》第 1 卷第 3 期（1931 年 3 月），“公牒”第 40 页；《山东建设月刊》第 1 卷第 4 期（1931 年 4 月），“论著”第 17~18 页。

此外，免税为受淹土地提供了一种非常保守的估计数。并不是所有这样的土地都能获得免税，这是因为政府并不愿意放弃税收。另外，许多被淹的土地并不在税簿上。在清末，中国大约多达40%的耕地没有经过登记。^①水利衰退可能使黄运的税簿尤其名不副实；一些被作为“淹没”土地而剔除的土地仍在种植，并且，开垦和河床改道所产生的新地很少进行登记。黄运还拥有山东170万亩屯田中的大部分土地，这些土地最初被允许以免税作为为大运河或漕运船队付出劳役的回报；即使在这项义务没有了之后，这些土地也通常没有被登录到税簿上。

除了免税的数据外，我们仅有另外一种含糊的数据：1914年的一份报告中说，“比年来”，运河已经淹没了上述7县7000多万亩的土地。^②如果“比年来”指的是从黄河改道以来的整个阶段，这项数据与每年大约130万亩的免税数字相吻合；如果不是的话，每年的损失将要大得多。因此，把130万亩作为谨慎的数据，这一说法得到了证实。

如果同样用上述的每亩8元作为产出估计数，我们得出大运河每年给鲁西南造成的水灾损失超过了1000万元。^③尽管

① Wang Yeh-chien, *The Land Tax in Imperial China, 1753 ~ 1908* (Cambridge, Mass., 1973), pp.7, 24, 27.

② 《农商公报》第1卷第5期（1914年12月），“政事”第2页。

③ 增加的130万亩乘每亩8元，得出1040万元。每年只能种植一季的土地，每亩大约只能产出5元，两年三熟的土地——这在鲁西南地区极为普遍；有些土地甚至一年两熟——每亩的产出为8元。据潘复推测，由于得到了特别良好的灌溉，这种土地可能产出更多，但我出于谨慎的缘故，没有考虑这种可能性。由于前面做了估计，我此后把这项数字减半，以足以容纳某些被视为经常遭灾而免于纳税义务的土地仍能种植某些作物的可能性；由于农作物通常不得不少于普通作物的半数以获得免税，这项统计几乎肯定比必需的谨慎更保守。对产出的估计，见山东南运河疏浚事宜筹办处《第一届报告》，“专列”第11~12、19~20页。

如此，由于具有免税资格的土地仍能种植一些作物，我们为了更加谨慎的缘故，把上述数字减去一半。所得到的每年 500 万元的数字，仍然使我们算出仅运河造成的农作物总损失每年至少为 770 万元。

黄河衰败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但从黄河维修来估计潜在的开垦亩数是相当困难的。专家们对黄河应该有多宽的河道莫衷一是，并且没有人掌握在任何已有的大堤内有多少土地被全部淹没和多少土地被辟为农田但却被不断发生的洪灾所冲毁的可靠资料。尽管如此，弗里曼（他似乎被 1949 年以后的治河工程所证实）估计，仅从开封以东至黄河和大运河的交汇处——大约 200 英里，全部属于黄运地区——从 3.5~7.75 英里宽度不等的一条带状地带，全都在官堤之内，可以从被淹没或洪涝频发的土地变成安全和肥沃的农田。^① 如果仅用最窄处来作为这条地带的宽度，那么，这条地带包含了黄运地区 268.8 万亩受影响的土地。弗里曼认为在许多地方这条地带可以被开垦得更宽；另外，黄河也在某种程度上比运河以东的黄运地区所需要的要宽。因此，把过宽的黄河造成的土地损失定为 300 万亩仍然是非常保守的。即便我们假定所有这些土地仅是“经常发生洪涝”，而不是“一直被淹没”，我们也应该每年加上 1200 万元作物的额外损失，动态损失总额达 1970 万元。^②

当然，在外堤垮塌的年份，更多的土地遭受了洪灾。为了避免对任何洪灾损害的重复统计，我们在这里仅统计 1900~

① Freeman, "Flood Problems," 第 1123 页计算，在那个时期，一条 4~8 英里的条形地带被淹没了，但黄河在大部分时期里应该仅有 1/4 英里宽，甚至在其高峰期也仅为半英里宽。

② 这项数字是通过从一类转移到另一类土地的亩数乘以我们估计的各类土地每年农作物平均损失的差异得来的。

1937年之间的6次洪灾，在这6次洪灾中，一条显然处于弗里曼所述的可垦地带之外的大堤垮塌了。^① O. J. 托德估计1933年的黄河水灾——在1890~1937年间，不是属于第二大就是第三大洪灾——造成了24000多万元的损失。^② 如果被分摊到1900~1937年的整个阶段，由于仅那项数字每年就要增加600万元——我承认，它的某些部分不属于黄运地区——很难看出6次（至少）涉及弗里曼所述的条形地带以外决堤的水灾何以能每年不超过900万元，这使黄运每年的农业损失达2870万元。^③

此外，水利问题是累加的。例如，大运河问题加剧了万福河和洙水河及其支流的灾害；这些较不出名的河道把鲁西南（曹县、菏泽、单县等）遥远地区的水流送到靠近济宁的一连串湖泊中，这些湖泊反过来通向与南方相联系的运河、淮河和大海。多年来运河的淤塞明显影响到了这些河流：1915年对大运河的研究仍然没有看出任何问题。^④ 但由于运河变得无法接纳这些河流的河水和淤泥，它们变得无法控制，自1855年以来，使西南地区受到了最严重的洪灾影响。^⑤

1930年的一项研究估计，仅在那些靠近河口的地区（在济

① 武同举编《再序行水金鉴》第10卷，“附录”第1~4页。

② Todd, *Two Decades in China*, p.91.

③ 我们拥有数据的两次洪灾损失共达28400万元或“每年”的损失为700万元。如果我们加上1925年的洪灾——通常被认为与有充分文献记载的1933年的洪灾同样严重、或者比它更严重，并使用与1933年洪灾损失相同的数据——这项数字将跃升为1300万元左右，仍然有三次洪灾未被计入。因此，即便上述数字包括某些不属于黄运的土地（1917年在直隶东南部地区，1933年在鲁东南和苏北地区），年平均900万元的数字仍然显得非常谨慎。

④ 山东南运河疏浚事宜筹办处：《第一届报告》，“专列”第2页。

⑤ 山东省建设厅：《浚治万福洙水河志》，第113页。

宁和鱼台)由1900年以后的河流衰败造成的农作物损失每年达300万~800万元;损失的差别在于洪水仅仅是冲垮了秋季作物还是又阻碍了春季作物的播种。^①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淤泥的积塞还造成了上游的洪灾;仅1929~1930年(我们拥有可靠数据的阶段中的头两年)的农作物损失即达3000多万元。^②因此,在20世纪20和30年代,估计每年农作物的损失至少应该上升到500万元,这个数字对每年损失的估计仍然偏低。

因此,现在我们对每年农作物损失最保守的估计大约为3500万元。这个数字还不包括由卫河和许多较小、又不稳定的河流所造成的损失,以及那些源于黄运、但在其他地方体现出来的损害。这项数字还略去了非农作物的损失。鲁西南地区在1935年黄河洪灾中仅房屋、牲口和其他财产的损失就超过了1亿元;^③若加上这次和另外两次与之相仿的黄河大洪灾造成的非作物性财产损失,每年的损失数量将再增加700万元,总损失超过4100万元。加上“附录C”中所计算的交通方面的损失,总损失达4800万~5100万元。当然,这项数字仍然没有列入许多较小的水灾、死亡或其他非经济性的损失。^④

更高数字的产生

那些可以作为洪灾损失更高估计数据的基础的资料在前文

① 山东省建设厅:《浚治万福洙水河志》,第83~84页。

② 山东省建设厅:《浚治万福洙水河志》,第108、113页。

③ 满铁:《山東地方の黄河水災状況》,第52页。

④ 满铁:《山東地方の黄河水災状況》,第52页概述了这些损失。更完整的叙述见山东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山东黄河水灾救济报告书》上、下册(济南1935和1936年),这部报告书也是这里所引用的许多较短的、更容易看到的报告的基础。

已经提到：被淹土地的其他估计方法、非作物性损失的计入等。我们仅需改变一些保守性的假设，损失数字就可超过1亿元。我们可以说，尽管那些被大运河和黄河水灾淹没的土地在登记为被淹时可以种植一些庄稼，但这种情形将不足以抵消由于未经登记、寻求免税却未获允准或虽被淹没但由于田主在衙门中缺乏门路而要继续纳税的未获免税批准的被淹土地的数量，以此为不把大运河和黄河水灾所造成的每年损失的估计数减半的做法提供合理的依据。若抛开那种做法，这些损失每年又要增加1700万元；有人甚至可能赞成成倍的免税数字，这又将增加更大的损失数字。若使用对大运河所淹没的“湖地”的更高估计数字，每年的损失合计达700万元；对不一定是沿黄河的被淹土地更高的估计，将增加约300万亩，农产物的价值达1440多万元。如果不是仅仅计算三次最大洪灾中的非作物性财产损失，我们再加上其他三次几乎同样残酷的洪灾与数十次较小的水灾，那么，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把对这些损失的年均估计数字增加到700万~1500万元，在我们的总额中加上另外的800万元。基于同样的原则，对由六次最严重的黄河洪灾所造成的农作物损失的估计，可以很容易地翻上一倍，甚至达到这里估计数字的更高倍数，这里把这些最严重的洪灾一次所造成的损失定为前述估计数的1.5倍，以此代表40年中的总数。据这些资料，再加另外的1000万元肯定不无道理。这些修正值合起来将在前述的4800万~5100万元估计值中再加上5600多万元。这些步骤将使我们的估计总额超过1亿元。即使是那样的数字仍不包括其他河流的水灾或大堤维修本身的成本、也不包括没有依据已佚的1935年报告中所说的更高数字所估计的500万元交通损失的增加部分（见“附录C”）。我们还坚持这样有疑问的假设，即如果水利治理使任何额外的耕地变得可以耕种，耕种那些田地将需要在其他地方已充分就业

的劳动力进行转化；抛开那种假设将使我们的估计数字又增加好几百万元。我们也没有调整对许多土地最初确定的每亩产出价值的估计。

因此，超过 1 亿元的数字似乎令人难以置信；我们估计的 4800 万～5100 万元的数字几乎肯定是偏低的数字。即便如此，它也高得足以说明国家的退出对黄运产生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也是本书其他地方所用的数字。



附三 黄运水利失修所导致的 额外交通成本

T.H. 威金估计，如果大运河被按照一项达 750 页的研究进行修复的话，每年从山东大运河其他形式的运输中转移过来的货物达 4100 万吨/英里；遗憾的是，我在其他资料^①中并没有找到最初的证据，而仅有结论和一些解释。在这 4100 万吨/英里中，1100 万吨/英里是通过通行来运送的，3000 万吨/英里是山东省内的地方运输（威金实际上按运河河段把这项数字进一步分开，但我们在这里无需考虑这种重新分割）。

弗里曼估计，运河运输的成本每吨/英里为 0.009 元。在类似的线路上，铁路运输成本每吨/英里为 0.0172 元；^② 我假设铁路是交通运送的另一种备用方式。《支那省别全志》（第 4 卷，第 234 页）按一名搬运伙用一种特定的运输方式——他能

① 主要参见 John Ripley Freeman, Grand Canal Investigation（密西根大学收藏本）；John Ripley Freeman, Grand Canal Investigation（康乃尔大学收藏本）。

② John Ripley Freeman, Grand Canal Investigation（康乃尔大学收藏本），p.66。

够拉多少斤并能走多远——每天搬运的数量，列出当地各种陆路运输的运费；由于这些运费是白天的费用，它们并不包括夜间住宿的任何支出；因此，这可能事实上低估了一个人不得不付给当地人超过 30 英里的搬运费用。以这种运输方式——两匹牲口拖拉的大车——得出每吨/英里的运费最低为 0.098 元（假设两贯京钱等于 1 元）。对于更常见的“小”车（即独轮车）而言，算出的运费为每吨/英里 0.280 元。因此，运河运输和双畜大车之间的运费差价每吨/英里 0.089 元；运河与小车之间的运费差价每吨/英里为 0.271 元；铁路与运河相比，运费比率略低于 2:1，双畜大车与运河相比，运费比率略低于 11:1，小车与运河相比，运费比率超过 31:1。1935 年关于恢复运河的可行性报告中列出了相似的比率。^①

运输方式	每吨/英里相当于运河 船运的倍数	运输方式	每吨/英里相当于运河 船运的倍数
铁 路	1.7	独 轮 车	16.0
轻便铁路	2.0	卡 车	25.0
骡 车	10.8	肩 挑	28.3

这些比率可能反应了每一种运输方式在其实际使用距离中的成本；例如，就长途搬运而言，独轮车将不再比卡车便宜。

如果我们把当地运输的 3000 万吨/英里平分给双畜大车和独轮车来承担，那么，我们将得出：

$$15000000 \times 0.089 = 1335000$$

$$15000000 \times 0.271 = 4065000$$

$$\text{¥ } 5400000$$

① 侯仁之编《序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第 32 页。

如果我们把这种划分方法改为更可能是由独轮车承担 3/4 部分、双畜大车承担 1/4 部分的话，我们将得出：

$$\begin{aligned} 7500000 \times 0.089 &= 667500 \\ 22500000 \times 0.271 &= 6097500 \\ &\text{¥ } 6765000 \end{aligned}$$

这是此处所采用的数据。如果我们加上威金所说的由于农业条件的改善等总贸易将增加 50% 的话，这些数字将更高得多。

由于沿临清至德州段造成了额外的支出，威金没有对此加以论述，我们对此使用了同样的方法。首先，我假定这条河段在维修后将使运输量大增，且以威金确实论述过的所有河段中每英里最低的比率来承运：河道的每英里为 10 万吨/英里（这是极其保守的，因为临清是北运河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并且是卫河——从河南和陕西* 运输货物的主要通道——与大运河交汇的地方，而德州则是运河和铁路运输的重要转运站）。其次，我使用这些地区之间 50 英里的一段距离，这是这条河段在拉直情况下的长度（见下文）。这就得出了 500 万吨/英里的数字；如果这项数字的半数是从双畜大车、半数是从独轮车运输转过来的，那么就节省了 90 万元。如果比例是 1/4 对 3/4，那么，节约的数字将是 112.75 万元。

然而，正如本书所述的那样，各种水灾治理措施已把这条河段延长了 47 英里。继续穿梭于临清和天津的 5000 艘船只，行驶这条河段每艘每年往返不可能少于两次，这是因为它们在当时会造成经济损失。如果它们每艘每年正好往返两次，并平均装载 80 吨的货物，这将等于 7520 万吨/英里额外的运量；如按每吨/英里 0.009 元的运河运费来计算，这涉及多余的

* 原文如此，“陕西”疑为“山西”之误。——译者注

67. 68 万元的开支。^①

把上述各部分相加，我们得出由于运河淤塞而改为短途搬运所造成最低的额外损失为 697. 68 万元；加上长途搬运所造成的 9. 9 万元的损失，总损失超过了 700 万元。如果假设当地运输量的 $\frac{3}{4}$ 而不是 $\frac{1}{2}$ 由独轮车承运的话，损失数将是 866. 83 万元；如果我们同意威金的说法，认为运河运输将由于维修后商业的全面发展而进一步兴盛起来，水利衰落所造成的总损失将要高得多。

① 《山东建设公报》第 3 卷第 8 期（1933 年 8 月），“计划”第 9～10 页；John Ripley Freeman, *Grand Canal Investigation*（康乃尔大学收藏本），p.35；《支那省别全志》第 4 卷，第 229、543～544、547 页；Gandar, *La Canal Impériale*，注 56。

征引文献

一 中文部分

《重修滑县志》，1932。

《重修泰安县志》，1925。

《大清历朝实录》，台北重印：华年出版社，1964。

陈伯庄：《小麦及面粉》，上海：交通大学研究所，1936。

陈瑞林：《德州“北洋机器制造局”与陆军部德县兵工厂始末》，《德州史志通讯》第2期（1986年）。

程守中：《山东考察报告书》，济南，可能刊于1934年。

《党在德州地区早期活动的几件大事》，《德州市志通讯》第2期（1986年）。

《邓县乡土志》，1907。

《德平县志》，1935。

《东阿县志》，1934。

《东方杂志》，1901~1937。

《东平县志》，1936。

董汰生：《山东歌谣集》，济南，1933。

《杜步舟同志忆中共金南特卫队的几件大事》，《德州史志通讯》第1期（1984年）。

《恩县志》，1909。

《工商半月刊》，1934。

“国立故宫博物院”文献编辑委员会：《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73～1975。

“国立故宫博物院”文献编辑委员会：《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77～1979。

郭士杰：《旧中国开滦煤矿的工资制度和包工制度》，天津：新华书店，1985。

海山：《狂风卷起烈火燃——记火柴厂工人的三次罢工》，《济宁市史料》第1期（1983年）。

郝本水：《禹城城南的农村》，《民间半月刊》第3卷第19期（1937年2月10日）。

海山重印《玉堂春秋——济宁市玉堂酱园简史》，《济宁市史料》第1期（1983年）。

何云龙：《菏泽农村的事实》，《农业周报》第4卷第14期（1935年4月12日）。

《河南农村金融之调查》，《社会经济月报》第2卷第11/12期（1935年）。

《河务季报》，1919～1922。

《胶澳县志》，1928。

《齐河县志》，1933。

《近代鲁西北地区农民斗争史略》，《聊城地方史志》第2辑（1983年7月）。

景甦、罗仑：《清近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修订本，原来的节译本由 Endymion Wilkinson 译为 *landlord and Labor in Late Imperial China*），济南：齐鲁书社即将出版。

《济宁市史料》，第1～2辑（1983年）。

《济宁县志》，1929。

《济宁直隶州续志》，1927。

竞生：《山东人民之负担》，《山东杂志》第89期（宣统三年五月十五日）。

孔德成编《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临清县志》，1934。

刘鹗（刘铁云）：《老残游记》，济南：齐鲁书社，1985。

刘南云：《忆党在济宁市的早期活动》，《济宁市史料》第1期（1983年）。

吕伟俊：《韩复榘》，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

吕伟俊：《韩复榘统治下的山东税收》，《山东史志资料》第1期（1984年）。

吕伟俊：《韩复榘统治下的山东金融》，《山东史志资料》第8期（1985年）。

《鲁北十县农业调查报告》，《山东农矿报告》第13号（1930年1月）。

《鲁西各县农村经济现状》，《农村经济》第1卷第11期（1934年9月1日）。

罗子为《邹平私钞面面观》，《乡村建设旬刊》第4卷第29期（1935年7月）。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见《毛泽东选集》（北京，1971年）。

《民国日报》（济南版）《每周增刊》，1929～1930。

《农商公报》，1914～1926。

《农业周报》，1929～1937。

潘敏德：《中国近代典当业之研究（1644—1937）》（硕士论文，“国立”台湾师范大学，1983）。

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1

年第1期。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

《清平县志》，1936。

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河南省棉产改进所工作总报告》，无出版社社名，1936。

任济民：《菏泽县推广美棉议与民生议》，《乡村建设旬刊》第3卷第1819期（1934年2月）。

《杀盐巡》，《山东民间小说》，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

《山东财政公报》，1933~1935。

《山东曹州府菏泽县乡土志》，光绪十四年。

《山东高密潍县之农村借贷》，《工商半月刊》第6卷第4期（1934年2月15日）。

《山东公报》，1912~1913。

《山东工运史料》。

《山东河务特刊》，1928~1936。

山东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山东黄河水灾救济报告书》上、下册，济南，1935和1936年。

《山东建设公报》，1933~1936。

《山东建设月刊》。

《山东民众教育馆刊》，1930~1937。

山东南运河疏浚事宜筹办处：《第一届报告》，济南（?），1915。

《山东全省财政说明书》，济南，1913。

《山东劝业汇刊》，1912~1924。

《山东省第一行政区县政改进案说明书》，《乡村建设旬刊》第4卷第28期（1935年7月），“特载”。

山东省公署教育科：《山东省各县乡土调查》，济南，1920。

山东省建设厅：《浚治万福洙水河志》，济南，1934。

《山东省交通图》，济南：山东省地图出版社，1985。

山东省农业区划委员会：《山东省综合农业区划》，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

《山东省县政建设实验区公报》，1935~1936。

山东省政府实业厅：《山东工商报告》，济南，1931。

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山东民间娱乐》，济南，1933。

《山东通志》，1915。

《山东政俗视察记》，济南，无出版社名，“序”的日期署为1934年。

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山东民众教育月刊》。

史念海：《中国的运河》，无出版日期，可能是1934年或1935年出版，西学书局。

《寿光县志》，1934。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史述要》，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4。

《顺天时报》，1911。

园田一龟：《新中国人物志》，黄惠泉译，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0。

孙敬之：《华北的经济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唐承涛：《祸国殃民的“利济钱票”》，《济宁市史料》第1期（1983年）。

天虹：《鲁西农妇生活的一瞥》，《大公报》1934年7月8日，第11版。

《天津棉花运销概况》，天津：金城银行天津分行，1937。

《统计月报》，1929~1930。

《屯民抗缴地价的斗争》，《济宁市史料》第2辑（1983年）。

王翰鸣：《张宗昌兴败纪略》，见杜春和、林斌生、丘权政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北京，1981年）第2卷。

王梦上：《注意解决农村能源问题》，《光明日报》1980年7月19日，第4版。

王瑞征执笔《尉迟修职同志在临清的革命活动回忆》，《聊城地区党史资料》第10期（1984年）。

王守中：《清末山东收回路矿利权运动》，《中国地方史志论丛》，北京，1984。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吴承明：《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内市场》，《历史研究》第168期（1984年4月）。

吴国桂：《玉堂星火——济宁市玉堂酱园工运概况》，《山东工运史资料》第16期（1985年2月10日）。

吴金赞：《中华民国林业发展之研究——民国元年至民国三十五年》，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82年度博士学位论文。

吴相湘编《鲁案善后月报特刊——铁路》，民国史料丛刊第17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

吴云弢：《聊城客署与储搬业的兴衰概况》，《文史资料选辑》（济南版）第14辑（1982年）。

《武城县志续编》，1912。

《乡村建设半月刊》，1933。

《乡村建设旬刊》，1934~1936。

谢鑫鹤：《聊城师范学生的革命风潮》，聊城地区行政公署出版办公室编《光岳春秋：山东革命斗争回忆丛刊》，济南，1981。

徐世光：《濮阳河上记》，1915。

许檀：《明清时期的临清商业》，《中国经济史研究》第2期（1986年）。

徐运北：《鲁西北党的建设片断》，聊城地区行政公署出版办公室编《光岳春秋：山东革命斗争回忆丛刊》，济南，1981。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289～1937）》，北京：科学出版社，1963。

杨汝南：《农谚和农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32。

《雍正朱批谕旨》，10卷本，台北：文选，1965。

《禹城县社会调查》，《农业周报》第4卷第19期（1935年5月17日）。

袁静波：《“兗济支线”与“济宁火车站”修建小史考略》，《济宁文史资料》第1辑（1986年3月）。

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

《政府公报》，1916。

中共济宁市委党史资料整理小组办公室：《济宁星火》，《济宁市史料》第1辑（1983年）。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以下是注释中所引用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的馆藏号。

《旅京山东同乡会称为鲁境东盗日甚吁恳剿有关文件》（1918年7月），机关代号00：案卷号1164。

《山东省报告厘定省内“剿匪”办法及推行情形有关文件》（1923年9～10月），机关代号00：案卷号1166。

《山东省报告灾情账》（1927年7月～1928年10月），机关代号1：案卷号334。

《山东省政府一九二九年四月至十二月工作报告》（1929年4～12月），机关代号2：案卷号110。

《山东省政府一九三二年一至十二月行政报告》(1932年1~12月),机关代号2:案卷号117~119。

《河南省政府一九三一年七、八、十一、十二月行政报告》(1931年7、8、11、12月),机关代号2:案卷号124。

《山东审账委员会请求该省受灾各县的一九三一年的田赋蠲除》(1932年5~6月),机关代号2:案卷号1832。

《河南省苛征棉花税捐》(1931年4月~1935年1月),机关代号2:案卷号3082、3083、3084。

《农商工部刊载棉花及棉纱之生产技术的低高》(残缺)(未署日期,可能编于20世纪中前期),全宗号1038:案卷号203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直皖战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5。

中国交通部交通史委员会:《交通史》,南京:交通部,1937。

中国近代货币史委员会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2卷本,上海:群联出版社,1965。

《中国近代名人图鉴》,台北:天一出版社,1977。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编《清实录山东史料选》,济南:齐鲁书社,1984。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79。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东省)》,南京:国际贸易局,1934。

仲中明:《阳谷坡里暴动回忆》,见聊城行政公署出版办公室编《光岳春秋:山东革命斗争回忆丛刊》,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

二 西文部分

Alitto, Guy. *The Last Confuci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American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Annual Report*, 1919. New York, 1920.

American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Bulletin* 1: 1, 1: 2. New York, 1917.

Armstrong, Alexander. *Shantung*. Shanghai: Shanghai Mercury, 1891.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sian Energy Problems*.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82.

Asia Development Co.. *Repairing the Yellow River Break—Kung Chia Ko, Shantung*. N.p, 1923.

Aston, T. H. and C. H. E. Philpin. *The Brenner Debate: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Averill, Stephen. "Party, Society, and Local Elite in the Jiangxi Communist Movemen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6: 2 (May 1987) .

Baker, John Earl. *Explaining China*. London: A. M. Philpot, 1927.

Balazs, Etienne.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 Trans. H. M. Wrigh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Banking and Currency in Tsinan." *Chinese Economic Monthly* 2: 2 (November 1924) .

Bartel, H. C. *The First Mennonite Mission in China*. Lawrence, Kans. (?), 1913.

Bayly, C. A. *Rulers, Townsmen, and Bazaars: North India in the Age of British Expansion, 1770 ~ 1870*.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Bedeski, Robert L. *State-Building in Modern China: The Kuomintang in the Prewar Period*. China Research Monograph no. 1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1981.

Bergère, Marie-Claire. "The Role of the Bourgeoisie." in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 ~ 1913*. ed. Mary C. Wrigh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Billingsley, Philip. *Banditry in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Boorman, Howard L.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Brandt, Loren. "Chinese Agriculture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1870s ~ 1930s: A Reassessment."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2: 2 (April 1985) .

Brandt, Loren. *Commerci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entral and Eastern China, 1870 ~ 1937*.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Braudel, Fernand. *The Wheels of Commerce*. Trans. Sian Reynold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2.

Braun, Rudolf. "Taxation,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 and State-building: Great Britain and Brandenburg-Prussia." in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Bray, Francesca ed. *Agriculture*, vol. 6, pt. 2 of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ed. Joseph Needham.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Bressler, Raymond G., and King, Richard A.. *Markets, Prices and Interregional Trade*.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70.

Buck, David. *Urban Change in Chin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8.

Buck, John L.: "A Statistical View of Shantung."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1: 1 (Jan. 1927).

Buck, John L.: "Cost of Growing and Marketing Peanuts in China."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5: 3 (Sept. 1929).

Buck, John L. *Chinese Farm Economy: A Study of 2866 Farms in Seventeen Localities and Seven Provinces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0.

Canaday, Frank. *Papers of Frank H. Canaday*.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Cardoso, Henrique and Ernesto Faletto. *Dependency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n Press, 1979.

Carey, Clifton O'Neal. "Michigan Engineers in China." *Michigan Technik* 33: 3 (November 1920).

Carey, Clifton O'Neal. *Papers of Clifton O'Neal Carey*. Bentley Historical Librar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Carlson, Ellsworth. *The Kaiping Mines, 1877 ~ 1912*.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Chen, Hanseng. *Landlord and Peasant in China*.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6.

Chen, Jerome. "Local Government Finance in Republican China." *Republican China* 10: 2 (April 1985).

"China's First Agricultural Institute," *China Weekly Recorder*, May 12, 1923.

China Weekly Review. *Who's Who in China*. 3rd ed. Shanghai: China Weekly Review, 1925.

China Yearbook 1926 ~ 1927 and 1928. New York: E. P. Dutton, 1927 and 1928.

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 1921 ~ 33.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1927 ~ 35.

Coble, Parks.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 ~ 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Chow, Tse-t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Chu, Samuel. *Reformer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5.

Ch'u, T'ung-tsu.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Cochran, Sherman G. *Big Business in China: Sino-Foreign Rivalry in the Cigarette Industry, 1890 ~ 193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The Concise Columbia Encycloped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Cronon, William. *Changes in the Land: Indians, Colonists, 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3.

Darling, M. L., *The Punjab Peasant in Prosperity and Deb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Deutschland Reichsmarineamt. *Denkschrift Betreffend die Entwicklung des Kiautschou-Gebiets*. Annual. 1902~8.

Dodgen, Randall. "Hydraulic Evolution and Dynastic Decline: The Yellow River Conservancy 1796 ~ 1855." *Late Imperial China* 12: 2 (Dec. 1991).

Duara, Prasenjit.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a North China Village in Late Imperial and Republican Times." *Stone Lion Review*, no. 5 (Spring 1980).

Duara, Prasenjit. "Power in Rural Society: North China Villages, 1900~1945." (哈佛大学 1983 年度博士论文).

Duara, Prasenjit. "State Involution: A Study of Local Finances in North China, 1911~1935."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9: 1 (Jan. 1987).

Duara, Prasenjit.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 ~ 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Eastman, Byron. *Interpreting Mathematical Economics and Econometric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4.

Eastman, Lloyd.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Elman, Benjami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84.

Elman, Benjamin.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via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0: 1 (Feb. 1991).

Elvin, Mark.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Esherick, Joseph.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6.

Esherick, Joseph. "Number Games: A Note on Land Distribution in Pre-Revolutionary China." *Modern China* 7: 4 (Oct. 1981).

Esherick, Joseph.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7.

Esman, Milton and Norman Uphoff. *Local Organizations: Intermediaries in Rural Developmen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Fairbank, John K.. "Introduction: The Old Order."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ed. John K. Fairbank, Vol. 10.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Fairbank, John K., Edwin O. Reischauer, and Albert M. Craig. *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3.

Far Eastern Review. 1914~21.

Fauvel, A. A.. *La Province Chinoise du Chan-toung: Géographie et Histoire Naturelle*. Brussels, 1892.

Fei Xiaotong (Fei Hsiao-t'ung). *China's Gentry: Essays on Rural-Urban Relation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8.

Feuerwerker, Albert.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Sheng Hsuna-huai (1844 ~ 1916) and Mandarin Enterprise*.

Cambridge, Ma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8.

Fewsmith, Joseph. *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 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 1890-193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5.

"Foreign Funds for Railways." *Beijing Review* 29: 21 (May 26, 1986).

Franck, Harry A.. *Wandering in Northern China*. New York and London: Century, 1923.

Frankel, Francine. *India's Green Revolution: Economic Gains and political Cos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Freeman, John Ripley. "Flood Problems i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 May 1922.

Freeman, John Ripley. *Grand Canal Investigation*. (康乃尔与密西根大学收藏本)。

Furth, Charlotte. *Ting Wen-chiang: Science and China's New Cul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Gamble, Sidney D.. *North China Villag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3.

Gamble, Sidney D.. *Ting Hsien: A North China Rural Community*.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Gandar, Dominique. *Le Canal Impériale: étude Historique et Descriptive*. S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1903.

Geertz, Clifford.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3.

Gillin, Donald. " 'Peasant Nationalism'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3: 2 (February 1964).

Goodrich, L.. Carrington and Fang Chaoying, eds.,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Gottschaung, Thomas. "Migration from North China to Manchuria: An Economic History, 1891 ~ 1842."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2.

Greer, Charle. *Water Manage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of China*.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9.

Harriss, Barbara R.. "There Is Method in My Madness: Or Is It Vice-versa?" *Food Research Institute Studies* 17: 2 (1979).

Hartwell, Robert M..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 ~ 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2: 2 (1982).

Hayami, Yujiro. *A Century of Agricultural Growth in Japa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5.

Heunemann, Ralph. *The Dragon and the Iron Hors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Hinton, Harold C.. *Grain Transport via the Grand Canal, 1845 ~ 1901*. Harvard Papers on China, no.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Ho Ping-ti.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 ~ 195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Hsiao, Kung-ch'un.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0.

Hsu, Immanuel.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2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Hsu, Leonard S. *Silver and Prices in China*.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35.

Hsu, Ying-sui. "Tobacco Marketing in Eastern Shandong." reprinted in *Agrarian China: Source Materials from Chinese Authors*, ed. and trans. Research Staff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39.

Hu, Ch'ang-t'u. "The Yellow River Administration in the Ch'ing Dynast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4: 4 (Aug. 1955).

Huang, Philip C. C.. "Analyzing the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ountryside: Revolutionaries versus Western Scholarship." *Modern China* 1: 2 (April 1975).

Huang, Philip C. C..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Huang, Philip C. C..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 ~ 198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Hucker, Charles O.. *The Ming Dynasty: Its Origins and Evolving Institution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8.

Hummel, Arthur.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1944.

Hunt, Michael. *Frontier Defense and the Open Doo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I Songgip. "Shantung in the Shun-chih Reign: The Establishment of Local Control and the Gentry Response, Part 1." Trans. Joshua Fogel, Yamane Yukico, and Inada Hideko. *Ch'ing Shih Wen-t'i* 4: 4 (Dec. 1980).

Ichiko Chuzo. "The Role of the Gentry: An Hypothesis." in *China in Revolution*. ed. Mary C. Wrigh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 1922-1931*.

"Improving Inland Waterways." *China Reconstructs* 34: 8 (August 1985).

Isaacs, Harold.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Johnson, Chalmers.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Johnson, David; Andrew J. Nathan, and Evelyn S. Rawski.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5.

Jones, Susan Mann. "The Organization of Trade at the County Level: Broderage and Tax-Farming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Select Papers from the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 No.3, 1978 ~ 1979, ed. Sunan Mann Jon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 1980.

Kann, Eduard. "Copper Banknotes in China."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5: 1 (July 1929).

Kann, Eduard. *The Currencies of China*.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26.

Kelley, David. "Temples and Tribute Fleets." *Modern China*

8: 3 (July 1982).

Krishna, Raj. "Farm Supply Response in the Punjab (India-Pakistan): A Case Study of Cotton."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1.

Kuhn, Philip A.. "Local Taxation and Finance in Republican China." In *Select Papers from the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 No.3, 1978~1979, ed. Sunan Mann Jon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 1980.

Kuhn, Philip.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Kuhn, Philip.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Kuznets, Simon. *Population, Capital, and Growth*. New York: W. W. Norton, 1973.

Lapidus, Ira M.. "Hierarchies and Networks: A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Islamic Societies." in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Carolyn Gra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5.

Lee, En-han. *China's Quest for Railroad Autonomy, 1904~1911*.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77.

Lee, James Z. *State and Society in Southwest China, 1250~1850*.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待刊。

Lee, Robert H. G.. *The Manchurian Frontier in Ch'ing Hist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Leonard, Kate. "Grand Canal Grain Transport Management." *Modern Asian Studies* 22: 4 (1988).

Leonard, Jane Kate. "Grand Canal Grain Transport Management." *Modern Asian Studies* 22: 4 (1988).

Levenson, Joseph R.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Lewis, Arthur.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Social Studies* 22: 2 (May 1954).

Li, Lillian. "Life and Death in a Chinese Famine: Infanticide as a Demographic Consequence of the Yellow River Flood of 1935."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3: 1 (July 1991).

Lippit, Victor D..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in China." *Modern China* 4: 3 (July 1978).

Love, H. H.. *Papers of H. H. Love*. Olin Library, Cornell University.

McCloskey, Donald N. and John Nash, "Corn at Interest: The Extent and Cost of Grain Storage in Medieval Englan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 1 (March 1984).

McCloskey, Donald N.. *The Applied Theory of Price*. New York: Macmillan, 1985.

MacKinnon, Steven. *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Yuan Shi-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 1901 ~ 190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0.

MacKinnon, Steven. *A Late Qing-GMD-PRC Connection: Police as an Arm of the State*. Tempe, Ariz.: Western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983.

Mallory, Walter. *China: Land of Famine*.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26.

Mann, Susan. *Local Merchants and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1750 ~ 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Merriman, John M.. "The Demoiselles of the Ariège, 1829 ~ 1831." 见 John M. Merriman 编, *1830 in France*. New York: Franklin Watts, 1975.

Morse, Hosea B.. *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13.

Mote, Fredric. "The Growth of Chinese Despotism." *Oriens Extremis* 8: 1 (August 1961).

Moulder, Frances. *Japan, China, and Modern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Murphey, Rhoads. *The Treaty Ports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What Went Wrong?*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0.

Myers, Ramon H.. *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Myers, Ramon H., Barbara N. Sands. "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5: 4 (Aug. 1986).

Nadaud, Martin. *Mémoire de Leonard, Ancien Garçon on Maçon*. Paris: Voix Ouvrières, 1948.

Naquin, Susan. *Shantung Rebell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Naquin, Susan. "Connections between Rebellions: Sect Family Networks in Qing China." *Modern China* 8: 3 (July 1982).

Naquin, Susan and Evelyn Rawski. *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Nathan, Carl F.. *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 1911 ~ 193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Nee, Victor. "Toward a Social Anthropolog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11: 3 (July-Sept. 1979).

Nevius, Helen S. Coan. *The life of John Livingston Nevius*.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1895. (1985)

North China Herald. 1900~37.

Olson, Mancur.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Owen, Norman. "Abaca in Kabilolan: Prosperity without Progress." In *Philippine Social History: Global Trade and Local Transformation*, ed. Alfred McCoy and Eduard de Jesu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2.

Owen, Norman. *Prosperity without Progress: Manila Hemp and Material Life in the Colonial Philippin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4.

Paulson, David. "War and Revolution in North China: The Shandong Base Area." 斯坦福大学 1982 年度博士学位论文。

"Peanut Trade of Shantung." *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 16: 16 (April 19, 1930).

"The Peanut Trade of Tsingtao." *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 11: 348 (Oct. 22, 1927).

Perdue, Peter. "Water Control in the Dongting Lake Regio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1: 4 (August 1982).

Perdue, Peter. *Exhausting the Earth: State and Peasant in Hunan, 1500 ~ 185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erdue, Peter. "Government as an Obstacle to Industrialization: the Case of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7: 4 (December 1967).

Perkins, Dwight H.. "Government as an Obstacle to Industrialization: The Case of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7: 4 (Dec. 1967).

Perkins, Dwight H..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 ~ 1968*. Chicago: Aldine, 1969.

Perry, Elizabeth J..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erry, Elizabeth J.. "Collective Violence in China, 1880 ~ 1980." *Theory and Society* (May 1984).

Perry, Elizabeth J.. "Tax Revolt in Late Qing China: The Small Swords of Shanghai and Liu Depei of Shangdong." *Late Imperial China* 6: 1 (June 1985).

Polachek, James. "Gentry Hegemony in Soochow." in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Frederic Wakeman and Carolyn Gra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5.

Pomeranz, Kenneth. "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 Stat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 1900 ~ 1937." 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88.

Pomeranz, Kenneth. "Review of Prasenjit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 ~ 1942*." *Agricultural History* 63: 3 (Summer 1989).

Rankin, Mary.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 ~ 191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Rawski, Thomas G.. *China's Republican Economy: An Introduc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York, Joint Center for Modern East Asia, 1978.

Rawski, Thomas G..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9.

Record of Former German and Japanese Embassies and Consulate. Micro-film RG 242, T-179.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rchives, 1962.

Rosenblith, R.. "Forests and Timber Trade of the Chinese Empire." *Forestry Quarterly* 10: 4 (Dec. 1912).

Ross, Lester.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China*. Bloom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1988.

Rowe, William.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Rozman, Gilbert. *Urban Networks in Q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Rozman, Gilbert e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New York: Free Press, 1981.

Sands, Barbara N..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Market Integration in Shanxi Province, China, 1928~1945."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85.

Schmidt, Vera. *Die Deutsche Eisenbahnpolitik in Shantung*.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Verlag, 1976.

Schoppa, R. Keith. *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Schrecker, John. *Imperialism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Germany in Shantu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Schultz, Theodore.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Schwartz, Benjamin.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Scott, James C.. *Weapons of the Weak*.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Shantung Groundnut Trade." *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 9: 29 (Sept. 11, 1926).

Shaw, Norman. *Chinese Forest Trees and Timber Supply*. London: T. Fisher Unwin, 1914.

Shue, Vivienne. *Peasant China in Tran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Sheridan, James. *China in Disintegration: The Republican Era in Chinese History, 1912 ~ 1949*. New York: Free Press, 1971.

Sheridan, James. "Chinese Warlords: Tigers or Pussycats?" *Republican China* 10: 2 (April 1985).

Skinner, G. William. "Chinese Peasants and the Closed Community: An Open and Shut Cas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3: 3 (1971).

Skinner, G. William. "Cities and the Hierarchy of Local Systems." 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G. William Skinn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Skinner, G. William.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s 1, 2, and 3.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 1

(November 1964), 24: 2 (February 1965), 24: 3 (May 1965).

Skinner, G. William. "Regional Urbaniz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G. William Skinn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Skinner, G. William.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Skinner, G. William. "Presidential Address: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4: 2 (Feb. 1985).

Smil, Vaclav and William Knowland. *Energ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The Real Energy Cris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Smil, Vaclav. *Biomass Energies*.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83.

Smil, Vaclav. *The Bad Earth: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in China*.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3.

Smil, Vaclav. *Energy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8.

Smith, Arthur. *Village Life in China*. New York: Fleming, Revell, 1899.

Smith, Arthur.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and Ferrier, 1900.

Smith, Carol A.. "Regional Economic Systems: Linking Geographic Models and Socioeconomic Problems." in *Regional Analysis*. ed. Carol A. Smith.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6.

Smith, George. "Improving China's Cotton." *China Weekly Recorder*, Dec. 12, 1923.

Spector, Stanley. *Li Hung-chang and the Huai Arm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4.

Stross, Randall. "Number Games Rejected: The Misleading Allure of Tenancy Estimates," *Republican China* 10: 3 (June 1985).

Stross, Randall. *The Stubborn Earth: American Agriculturalists on Chinese Soil, 1898 ~ 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6.

Tawney, Richard Henry. *Land and Labor in China*. 1932, reprinted Armonk, N. Y. : M. E. Sharpe, 1966.

Thaxton, Ralph. *China Turned Rightside Up*.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Thorp, James. *Geography of the Soils of China*. Nanjing: National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1936.

Tiedemann, Rolf. "The Persistence of Banditry: Incidents in Border Districts of the North China Plain." *Modern China* 8: 4 (Oct. 1982).

Tilly, Charles. "Food Supply and Public Order in Modern Europe." In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 in Western Europe*, ed. Charles Til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Tilly, Charles. Princeton: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tate-Making." In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 in Western Europe*, ed. Charles Till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Ting, Leonard G.. *Recent Developments in China's Cotton Industry*. Shanghai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36.

Todd, Oliver. *Two Decades in China, Comprising Technical*

Papers, Magazine Articles, Newspaper Stories and Official Reports Connected with Work under His Own Observation. Beijing: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Engineers, 1938.

Tsao, Lien-en, "The Currency System in Manchuria."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and Bulletin* 6: 4 (April 1930).

Tyler, William. *Notes on the Hoang Ho or Yellow River.* Special Series no.29. Shanghai: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1906.

U.S Department of State.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1910 ~ 1929.* Microcopy 328.

Vermeer, E. B.. "Income Differentials in Rural China." *China Quarterly* 89 (March 1982).

Vermeer, E. B..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ovincial China: The Central Shaanxi Since 1930.*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Wakeman, Frederic Jr.. *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 ~ 186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6.

Wakeman, Frederic Jr.. "Policing Modern Shanghai." *China Quarterly*, no. 115 (Sept. 1988).

Wallerstein, Immanuel. *The Modern World-System.* 2 vol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6.

Wang, Yeh-chien. *The Land Tax in Imperial China, 1753 ~ 1980.* Cambridge, Ma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Webber, Max. *Economy and Society.* ed.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7 (8).

Wiens, Thomas. *The Micro-Economics of Peasant Economy: China, 1920-1940*. New York: Garland, 1982.

Will, Pierre Etienne. *Bureaucracy and Famin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William, G. "Chinese Peasants and the Closed Community: An Open and Shut Cas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3: 3 (1971).

Winkler, Robert, and William Hays. *Statistics: Probability, Inference, and Decision*. 2d e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5.

Wittfogel, Karl. *Oriental Despot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Wolf, Eric. "Closed Corporate Peasant Communities in Meso-America and Central Java."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3: 1 (Spring 1957).

Wong, R. Bin and Pierre Etienne Will. *Nourish the People: China's State Civilian Granary System, 1650-1850*.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1.

Wou, Odoric Y. K. "Development, Underdevelopment and Degeneration: The Introduction of Rail Transport into Honan." *Asian Profile*, 12: 3 (June 1984).

Wright, Mary C..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7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Zelin, Madeleine. "Huo-hao Kuei-kung."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79.

Zelin, Madeleine. *The Magistrate's Tae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 *Decennial Report, 1912 ~ 1921. shanghai, 1923.*

中国交通部邮政总局: *Postal Atlas of China*. [南京, 1933 年]。

三 日文部分

足立啓二:《大豆流通と清代の商業的農業》,《東洋史研究》第 33 卷第 3 期(1974 年)。

天野元之助:《山東農業經濟論》,大連:滿鐵經濟調查會,1936。

青島民政部鐵道部:《調查資料》第 3 輯,青島:青島民政部鐵道部,1918。

青島守備軍民政部鐵道部:《東北山東(渤海山東沿岸諸港、濰縣芝罘間都市)》,《調查資料》第 17 輯,青島:青島民政部鐵道部,1919。

中國農村慣行調查刊行會:《中國農村慣行調查》6 卷本,東京:岩波書店,1953~1958。

土井章、殿生文男著,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總務部資料課編《北支事情綜覽》大連,1936。

旗田巍著《中國村落と共同體理論》,東京:岩波書店,1973。

今井駿:《抗日根據地の形成過程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思潮》第 108 期,1971 年 6 月。

神戸正雄:《東亞經濟學》,東京,1942,第 1 冊《遠東經濟研究》。

加藤直子:《辛亥革命の山東省における民衆運動》,《史論》第 34 集(1981)。

北支那開發株式會社調查局:《魯西棉作地帶の一農村に

おける勞動力調査報告》，1943。

興亞院技術部：《北支における林産資源調査》，東京，1940。

北京大學附設農村經濟研究所：《山東省濟寧縣城を中心よせる農産物流通に關する一考察》，北京，1942。

南滿洲鐵路株式會北支經濟調査所：《北支農村概況調査報告》，東京：南滿洲鐵路株式會北支經濟調査所，1940。

滿鐵：《山東地方の黄河水災状況》，天津，1936。

滿鐵天津調査課：《山東の畜業》，天津，滿鐵，1936。

滿鐵天津調査課：《山東の棉産物》，天津，滿鐵，1942。

松崎雄二郎：《北支經濟開發論：山東省の再認識》，東京：ダイヤモンド社，1940。

越村衛一：《中國大陸分省地圖》，東京，1972。

寺田隆信：《山西商人の商人研究：明代における商人および商業資本》，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72。

東亞學所：《山東湖沼群地帯の地域調査》，東亞學所，1940。



译名对照表

Adchi Keiji 足立启二	Graves, Maureen
Amano Motonosuke	莫琳·格拉夫斯
天野元之助	Hatada Takashi 旗田巍
Bartlett, Beatrice	Honig, Emily 韩起澜
比阿特丽斯·巴特利特	Hu Tinggan 胡廷干
Brandt, Loren 洛伦·勃兰特	Huang, Philip 黄宗智
Chayanov, A. K. 恰亚诺夫	Imai Shuin 今井骏
Chen Hanseng 陈翰笙	Jin Yun-peng 靳云鹏
Chen Kuilong 陈夔龙	Ju Deyuan 鞠德源
Chen Shouhe 陈守和	Kambe Masao 神户正雄
Cochran, Sherman 高家龙	Kato Chokushi 加藤直子
Doi Akira 土井章	Klatzkin, Amy 艾米·克拉兹金
Duara, Prasenjit 杜赞奇	Koshimura Eiichi 越村卫一
Du Mingzhe 杜明哲	Lao Zhichang 劳之常
DuPont 杜邦	Lee, James 李中清
Esherick, Joseph 周锡瑞	Levine, Sheila 希拉·莱文
Freeman, John Ripley	Liang Shuming 梁漱溟
约翰·雷普利·弗里曼	Lindert, Peter 彼特·林德特
Gamble, Sidney 西德尼·甘布尔	Liu E 刘鄂 (刘铁云)

- Lu Weijun 吕伟俊
MacDonald, Alan
阿兰·麦克唐纳
Matsuzaki Yujiro 松崎雄二郎
McCloskey, Don
唐·麦克罗斯科
McClosky, Donald
N. 麦克罗斯奇
Merriman, John 约翰·梅里曼
Morgan 摩根
Morse, Hosea 何塞·马士
Myers, Ramon H. 马若孟
Nash, John 纳什
Pan Fu 潘复
Pattinson, David 戴维·帕金森
Perkins, Dwight
德怀特·帕金斯
Perry, Elizabeth 裴易理
Ono 小野
Peng Zeyi 彭泽益
Rawski, Tom 汤姆·罗斯基
Reinsch 芮恩施
Ren Qinhe 任清合（和）
Rockefeller 洛克菲勒
Sandstrom, Joanne
乔安妮·桑德斯特姆
Spence, Jonathan
乔纳森·斯宾斯
Scott, James 詹姆斯·斯科特
Shi Nianhai 史念海
Smith, Arthur 明恩溥
Stone, Charles 查利斯·斯通
Straight, Willard
威拉德·斯特拉特
Sun Baoqi 孙宝琦
Sun Faxu 孙发绪
Tawney, Richard Henry
R.H. 托尼
Terada Takanobu 寺田隆信
Thaxton, Ralph
拉尔夫·萨克斯顿
Tian Wenjing 田文镜
Todd 托德
Tono Fumino 殿生文男
Wei Qingyuan 韦庆远
Wiggin 威金
William Rowe 罗威廉
Wong, R. Bin 王国斌
Wu Chengming 吴承明
Wu Tingyi 吴廷诤
Xiliang 锡良
Xong Xiling 熊希龄
Xu Shiguang 徐世光
Yang Shixiang 杨士骧
Yao Liankui 姚联奎
Yuan Jingxi 袁景熙

Yuan Shuxun 袁树勋

Zhang Huaizhi 张怀芝

Zhang Yao 张曜

Zhou Fu 周馥

Zhou Ziji 周自齐



译 后 记

作为一名教书匠，我最为惭愧的是自己的无知。我曾发现自己在课堂上津津乐道的某些“新”观点早已被国外学者研究得非常透彻，这对我的震撼非常之大。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职业，减少内疚之情，我只得把许多时间花在阅读国外学者的著述上。

《腹地的构建》一书，在1993年即已出版，并在1994年获费正清东亚研究奖。而我迟至2000年才在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读到它。我从1995年就着手研究淮北地区的社会生态变迁，当时觉得自己已经有了许多“新”见解。读了这部著作后，我非常惊讶这部著作的许多思路正是我当时所思考的，这让我对这部著作深感佩服，也促使我对淮北地区的社会生态变迁作进一步的探究。

我要感谢彭慕兰教授能慨允我翻译此书，并牺牲度假时间帮我查对部分人名和书名；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杨群先生、宋月华女士等所做的大量工作；感谢我的朋友张信教授对此事的促成。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孟茹、岳父母孟智玲、徐仁玲，他们除在生活上对我进行关心照顾外，还一直鼓励我从事并做好这份清贫的工作。

陋译出版之时，女儿雨荷也将来到这个世界，此译也是一

位身无长物的父亲送给女儿的小小礼物。

本人的学术水平较低，竭诚欢迎方家批评指正。

马俊亚

2004年4月26日

于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